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

华北治安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

K264.33/1

华北治安战 (下)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DC17/0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8468



天津人民出版社

888468

华北治安战
(下)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 1/2 插页2 字数340,000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500

统一书号：5072·5

定 价：1.46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章 大东亚战争开始前后的治安战	(1)
一、华北方面军的各项紧急施策	(1)
当前形势和方面军的一般施策	(1)
发动南方作战时华北的作战和警备	(4)
接受基本任务 肃正作战 警备及管内治安状况 促进作战 研究及训练 设立对共调查班进行情报谋略活动 冬季肃正作战	(17)
冬季山西肃正作战 第十二军肃正作战	
二、政务、经济的指导和当地的情况	(32)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	(32)
华北政务指导要领 方面军政务指导机构概要 省以下各地 方行政指导——华北的特务机关 蒙疆的政务指导机构 华北的政治情况和新民会	(47)
租界行政的移交 中国武装团体的状况 新民会的体制和性 质的改善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施策	(55)
经济指导的紧急措施	(57)
华北经济指导方案 紧急粮食对策 经济封锁	
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	(61)
“同甘共苦”声明 内外各项政策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移交华中	(63)
移交经过 军事措施 行政措施	
三、思想战的指导	(69)
思想战指导纲要	(69)

华北民心的动向	(72)
思想战的进展	(75)
四、中共及重庆政府的动向	(79)
中共的各项施策	(79)
大东亚战争以前的政策 对大东亚战争的方针 开战后的动 静 重庆政府的动向	
第二章 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	(86)
一、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	(86)
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工作	(86)
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91)
加强国民政府的措施	(96)
财政筹的支援 清乡工作	
二、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施策	(99)
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	(100)
各兵团的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103)
三、华北方面军的警备阵营	(108)
新师团的编制和战斗序列的变更	(108)
方面军的兵团部署	(111)
四、华北各种主要措施的实施概况	(114)
大力推动经济建设	(114)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119)
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	(121)
五、华北全区的长期肃正作战	(130)
四月中的敌我情势	(130)
第二次冀南作战(十二号作战)	(135)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5月1日—6月20日)	(140)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4月1日—6月10日, 8月11日—9 月上旬)	(172)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175)
山东方面的作战	(184)
蒙疆方面的作战及警备	(186)
夏季占领地区内治安概况及肃正建设的成果	

——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	(189)
第三章 1942年度下半年的治安肃正情况	(192)
一、整个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	(192)
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准备工作——从设想四川作战到准备工作的中止	(192)
二、华北方面敌情概况	(199)
重庆军概况	(199)
中共及共军的状况	(202)
小康状态的国共关系	(206)
三、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警备情况	(207)
作战、警备概况	(207)
五号作战准备工作	(211)
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213)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リ”号作战）	(220)
第三次鲁东作战（“と”号作战）	(224)
四、推行治安建设各项措施的概况	(225)
加强特务机关与扩大、巩固治安圈	(226)
华北、蒙疆的政治情况	(238)
新民会的活动	(239)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	(243)
五、对敌经济封锁	(247)
概况	(247)
经济封锁的执行情况	(248)
物资配给、物价、货币流通的情况	(252)
从敌区获取物资	(254)
中共方面的经济反封锁	(255)
六、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260)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61)
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	(262)
实行精兵简政	(262)
生产自救运动	(264)
重建冀南根据地实况	(265)

七、向对华新政策的转变	(268)
关于设置大东亚省的问题	(268)
国民政府的参战问题	(270)
当地军方的意见及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贯彻	(272)
八、新政策在华北的实行情况	(274)
华北方面军的新姿态	(275)
中国方面的参战体制	(277)
华北日军官兵的思想动向	(279)
第四章 1943年度的治安战	(282)
一、关于华北方面军的全面施策	(283)
新年度的作战警备计划大纲	(283)
关于进攻作战的研究	(287)
兵备的整顿	(288)
兵力的集结训练与警备部署	(292)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充实、整備	(297)
二、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	(301)
1943年春冀西作战（“は”号作战）	(302)
1943年春太行作战（“ヨ”号作战）	(305)
四十号作战（5月24日—6月20日）	(315)
1943年夏太行作战（“シ”号作战）	(315)
第十二军管区内的肃正作战	(318)
三、蒙疆方面的对苏作战准备	(319)
一向的作战设想	(319)
促进作战准备	(320)
作战准备纲要的指示	(322)
情报部的设置	(324)
四、推行新政策引起的波澜	(325)
中国经济情势严重及其紧急对策	(325)
华北、蒙疆的经济政策	(329)
清丰事件	(335)
五、华北方面军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与治安特别施策	(337)
8、9月份的敌情与治安恶化的原因	

——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337)
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	(341)
治安特别措施	(356)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建立及初期作战	(360)
预料中的治安新情况	(390)
第五章 1944年至1945年的治安战	(398)
一、京汉作战与华北治安的对策	(398)
京汉作战（“コ”号作战）概要	(398)
确保新占领地区的治安	(402)
兵团转调和新兵团的编成	(406)
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409)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第二期作战	(420)
中共方面的军事状况（1944年）——局部的反攻	(424)
二、对华政治谋略的施策	(427)
改变对中共态度的工作	(427)
中共对形势的判断	(429)
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429)
重庆方面的政治状况	(433)
三、战局恶化中的各种紧急措施	
（1944年后半年至1945年初）.....	(433)
中国派遣军态势的转变	(433)
华北方面军治安警备和兵力配备的变化	(438)
确保经济和运输的对策	(446)
四、1945年4月至6月的状况	(450)
中国派遣军的新作战计划	(450)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452)
最后的和平工作	(459)
五、战争结束	(462)
日本的停战	(462)
中国方面的状况	(465)
结束语	(467)
译后记	(484)

第一章 大东亚战争开始 前后的治安战

一、华北方面军的各项紧急施策

当前形势和方面军的一般施策

1941年12月8日黎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接到发动“あ”号作战（南方作战）的特别电报之后，立即命令实行“对华北敌国权益处置要领”。随后召集各兵团长举行会议，会上大家重新表示完成任务的决心。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即席作了训示：“一、希望振作士气，促进治安肃正，二、要在前线指挥，克服一切困难。”训示的基本精神如下：

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继续压迫重庆政权，保证资源的获取，从而对领导日华合作的（指日本与伪政权合作。——译注）全面战争作出贡献。

对事变的处理，是我国不可动摇的国策。新的作战并未减轻方面军的任务。随着新的作战的扩大，华北方面军将转到次要地位，加之由于兵力的抽调，难免陷入防守观念。如果看清将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尽快确保华北的安定，并且要保持能以适应

新意图的形势，此点极为重要，切须铭记。

安达参谋长，对这一训示作了解释。其讲演内容如下：

不难预料，重庆政权将以此作为反攻良机，而采取各种活动与美英相策应。

特别是在华北，共军和支持他们的民众以为抗战前途有了光明，试图积极进行反攻和破坏活动。

今后形势的发展，与“あ”号作战的进展有极大关系。估计欧洲的形势，特别是随着德、苏战争的推移，重庆的动向将有重大的变化。在此情况下，有时可能在其武力、谋略、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暴露出弱点，对此，我们应当密切注视形势，尽力抓住良机，采取适当的措施。

方面军今后可能还要减少一些兵力，尽管如此，还要极力确保现有地区，而且对敌人的活动，应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展开积极作战，促使治安更加良好。还要努力开发重要资源，取得所需物资，以培养我国国力。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负担，使我皇军全面作战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对重庆政权应严加压迫，使之不能蠢动和抬头。

“あ”号作战的开始，是实现使建设东亚共荣圈前进进一步的国策。为此，方面军应在中国大陆发挥坚定的支撑作用，对全面战争作出贡献。

参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冈村司令官的意图极为积极，比起以前更加重视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也就是对中国事变的解决极为关心。有这样一段事情：开战前的11月27日，在南京召开的方面军司令官会议上商谈中国事变处理方案时，曾讨论了对重庆的进攻作战问题。在当时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中将的“从军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第十一军述说虽可以经由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应随着摧毁敌战斗力的作

战，同时加强策略宣传，以谋求局部停战，达到保境安民为目的。甲集团（华北方面军——译注）述说要以十个师团兵力越过秦岭进攻重庆。如果是这样大规模的进攻计划，当然第十一军也应三路并进从正面进攻。这就是会议时的一段议论。”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具体计划，可能是出于对英美战争前途的忧虑，谈到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方案。但是，未出半年，这一设想就具体化了。这一点或许有助于理解方面军司令官的想法。

至于开战前后的心情，从《冈村大将日记》的下面几段话可以看出。“11月30日，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空前严重时机。我是乐观主义者，但考虑到战争的前途，多少也有些担心。”又，“12月28日，近来，一得暇便立刻进入沉思默想之中，往往考虑到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的对外方针究将如何？于是就更加希望中国的全面和平。”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过去把治安摆在第一位，就是要使华北成为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参谋长在讲演中说：“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这就是说，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它在形成东亚解放战争重要一环的使命中，其比重逐渐增大，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

方面军的一般施策，仅能从这些训示和讲演之中见到一些，还缺乏有关具体内容的史料。

12月22日，畑总司令官视察华北各地的敌国权益接收后的情况来到北京，冈村司令官向其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及方面军的一般施策，其内容如下：

在开战后十天之内，由于我军迅速而且公正地对权益的处理

及初战的辉煌胜利，加以相应的宣传等，给敌人及一般民众以相当影响，华北形势对我有利，目前看不到敌人的特殊活动。占领区域内的中国民众，现在都认识到日本惊人的实力，通过治安强化运动，有逐渐服从我军强力领导的趋势。

然而，国民党的军队，已于12月30日接到反攻指令，共军也频繁宣传日本与英美开战对中国如何有利，一部分匪众有蠢动迹象。我军应随着宣传的深入，利用此一时机，以局部攻势使之发生动摇，因势利导，努力促使敌方崩溃。

在上述形势下，有关方面军的施策，曾在上次兵团长会议上作了明确指示，大致依据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本着努力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继续压迫敌人的方针，加紧推行下列各项重点施策：

一、振作士气，积极作战，彻底讨伐。

二、确保重要资源，为充实我国防力量作出贡献。

三、促进现地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四、加强对中国方面的政治指导，使政略、战略的措施无懈可击，努力发挥总体力量。

此外，考虑到与苏联开战时我军的对策，势将抽出一定的兵力，军队的部署需作必要的调整，应始终坚持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的边缘，以局部攻势作为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对此问题正在研究中。

以下就方面军的军事、政务、经济、思想等各种施策执行情况加以叙述。

发动南方作战时华北的作战和警备

接受基本任务 中国派遣军根据12月3日发出的大陆命^①第五百七十五号，以总作命^②甲三二六号命令所属各军执行的基本任务，兹将其中有关华北方面军的各项摘录如下：

① 大本营陆军部命令。

② 中国派遣军作战部命令。

一、华北方面军必须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一线以东地区的安定，更应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重要地区的治安，并努力压迫敌人。

二、在前项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

三、华北方面军与第十三军之间的作战地区的边界线如下：山东、河南两省与江苏、安徽两省的边界线在1942年1月1日0时以前，仍按原来的边界线。

四、为了促使抗日势力的衰亡，华北方面军应对面前的敌人进行谋略工作。

五、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除上述各项外，并应施行下列各项措施：

(一) 加强对敌封锁。

(二) 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努力培养我军的战斗力。

(三) 根据作战需要，经总司令官许可，得以部分兵力派至满华国境线附近的热河省内。

根据上述命令，总参谋长作了如下的指示：

一、对敌封锁应按下列各项实施：

1. 在需要的处所，构成适当的切断线，严禁物资的流进流出。

2. 对我占领地区内主要城市的物资，严禁向敌方流出。

3. 特别注意向敌方流出物资的主要道路及我兵团之间的间隙部分。

二、对我军战斗力的培养，应按下列各项实施：

1. 确保占领地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其资源便于开发、取得及运输。

2. 加强我军在当地自给自足的能力，积极取得并利用占领地区内外的资源。

3. 在取得占领地区以外的物资时，应妥善计划，不使削弱我军对敌的封锁。

三、航空部队（略）

在这项命令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作战地区的边界线的变更以及强调加强对敌封锁和战斗力的培养。这些都是重要问题，应另行叙述。

当时，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其概要如下：

在青岛以及徐州附近集结的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师团，根据11月6日大陆命第五百五十五号，分别编入南方军、第十五军的战斗序列，在近期将脱离方面军司令官的隶属及指挥。第十七师团为第十三军所属部队，现仍配属于第十三军。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主力，为了参加第十一军的汨水作战（“沙”号作战，后发展为第二次长沙作战），在太原附近集结以后，于12月8日夜出发。

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概要

（括号内为师团长、旅团长）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方面军直辖兵团

第二十七师团

（富永信政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

（原田熊吉中将，指挥骑兵第四旅团）

第一一〇师团

（饭沼守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

（铃木贞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

（林芳太郎少将，配属于第十三军）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

（吉田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田中勤少将）

注：骑兵第四旅团（佐久间为人少将）是隶属骑兵集团的部队。

第一军司令部

司令官 岩松义雄中将

第三十六师团 （井关切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 （长野祐一郎中将）
第四十一师团 （清水规矩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 （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津田美武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 （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 （若松平治少将）

第十二军司令部

司令官 土桥一次中将

第二十一师团 （田中久一中将）
第三十二师团 （井出铁藏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 （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 （盘井虎次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旅团 （河田隼太郎少将）

注：第十七师团（平林盛人中将）、第三十三师团（榎井省三中将）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现正配属于该军。

驻蒙军司令部

司令官 甘粕重太郎中将

第二十六师团 （矢野音三郎中将）
骑兵集团 （西原一策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 （真野五郎少将）

此外，当时方面军的主要幕僚如下：

参谋长 安达二十三中将、参谋副长 有末精三少将、第一课长 山本茂一郎大佐、第二课长 本乡忠夫大佐、第三课长 广濑四郎大佐、第四课长 西村乙嗣大佐、高级副官 木村千代太大佐

肃正作战 “あ”号作战将开始时，方面军根据情况判断，预料到重庆将与英美呼应进行反攻，共军随着新事态的发展将开始进行破坏活动，方面军以“一举将敌对势力的权益掌握在我军手中，先发制人，粉碎敌方的企图，宣扬我军威力，防止民心动摇，确保境内治安”为主要目标，指导各兵团进行积极的讨伐，确保资源及交通线。

其主要肃正作战行动如下：

第二次鲁南剿共作战(11.5~12.23) 此次作战是我第十二军利用鲁南共军（徐向前所属的山东纵队）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从11月5日开始的作战。各兵团在包围进攻之后，以长期驻守的战术，进行顽强彻底的扫荡，摧毁敌人根据地设施，并进行了政治、经济及劳工等工作。从12月1日开始，进入第二期第三阶段作战。共军在开始时采取退避分散、空室清野的战术，因此很少得到捕获机会。但是，到12月中旬左右，由于天寒和饥饿，从潜伏状态，逐渐集结兵力开始游动。各兵团趁机在作战地区内外开始活动，继续扫荡，给共军以严重打击，遗弃尸体超过五千。

山西省的肃正作战 以陵川附近为根据地的重庆第一战区第二十七军（在华北唯一的中央军）有南下迹象，方面军抢先展开攻势。即以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及第四十一师团的步兵约七个大队、第三十五师团的步兵约二个大队的兵力，于12月14日开始包围作战，予敌严重打击，遗弃尸体超过一千。因其主力逃脱，作战于21日结束。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为了整顿和改变新警备地区的现

状，对盘据在太原西北地区的共军决死第二、第四纵队，从12月20日开始，到年底为止，进行肃正讨伐（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部也曾参加）。本地区原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防区，因该旅团参加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故太原的警备由第四十一师团的一个步兵中队接防。

渤海道地区的肃正讨伐 第二十七师团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在渤海道西部（河北省东南部）进行了肃正作战。继此，从17日以步兵约四个大队及搜索队的兵力，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相协力，讨伐了渤海道东南及山东省境内的中共游击队，到年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肃正效果。

鄂尔多斯作战 为了封闭重庆军的冬季反攻，驻蒙军骑兵集团主力与蒙古军鄂尔多斯挺进队，在12月25日，渡过结冻的黄河，于月底在齐登（包头东南约70公里）附近，进行了歼灭战。后在1942年1月17日，再进至鄂尔多斯新民堡（包头东南偏南约70公里），奇袭第八战区傅作义所属骑兵第七师等，随后摧毁该地附近敌根据地设施，20日撤回原防地。

警备及管内治安状况 鉴于国防所需的华北资源的价值显著增加，确保这些资源已成为华北方面军的重要使命。因此，敌人策动的目标，也针对这些资源及运输资源的交通线，其方法越来越隐蔽和巧妙。但防止此种活动不能分调多大的兵力，各兵团应与肃正作战互相配合，努力于事前侦悉敌人的企图，采取各种辅助手段，特别是要指导并加强民间会社的自卫及警防组织。

在这期间，未曾蒙受很大的损害，但据“方面军战时月

报资料”记载，管内治安状况如下：

华北治安概况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敌方错误判断我军在中国的兵力将要减少以及根据蒋介石加强游击战的指令等，从12月中旬前后开始，其游击活动显然活跃起来，匪害次数比上月有所增加，尤其是推行策略性的宣传，以致对新中国武装团体的策动和唆使民众破坏通信线路事件随之增加。

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战的胜利，迅速机敏地对敌对势力权益的处理，解除在中国的英美军队的武装，以及香港的陷落等，使占领区内中国一般民众对我国的实力及真实意图加深了认识，依靠日本的心理有所增长。

然而，敌方大事宣传驻华日军将要撤退，日本必败，以扰乱民心，策动反日，其谋略工作也有逐渐增强的倾向。这些都是值得注意，应予警惕的。

蒙疆地区治安概况

一、察南东部地区的平北游击队，因我军长期的扫荡及各种工作，虽然逃向北方崇礼县和满洲国方面，但在讨伐队回到原驻地后，最近又有向旧根据地移动的倾向。

晋西北的共军尚未发现特殊活动情况，依然加紧募兵并扩张基层组织。日前去兴县晋西北军区的干部，似已回队，估计其行动将趋活跃。

巴盟地区的绥蒙游击队，由于我警备队及警察队的讨伐，他们在各地辗转移动，其势力似有削弱。但据报告说，敌人企图对丰镇以西铁路沿线及银矿山（绥远北方约99公里）附近我方警备机关开展冬季攻势。同时，对共产党向商都方面的渗透也应注意。

二、傅作义向我地区派遣便衣队的活动，从黄河封冻前已开始活跃。

后套（五原地区）、伊盟（鄂尔多斯方面）的敌人，进入冬季逐渐活跃。估计敌人在警戒我军对其进攻的同时，在局部地区似

有向我进攻的企图。

三、在阳原（察南）西南方山地，最近有乔日成残匪盘据蠢动。

四、苏联外蒙军，担心我方进攻，似有许多特务潜入内蒙。

关于“中共今后动向”，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在剿共方针中，有如下的记载：

一、加强宣传战

在开战初期，由于日本取得伟大胜利，显然使敌方的宣传遭受很大的挫折和困难。但是重视宣传战的共军，巧妙利用每天的战况和世界的形势，进行欺瞒夸张，鼓舞自己队伍及其势力范围内的民众的士气，以图保持和加强战斗力，同时对我方进行巧妙的策略性宣传。

二、展开游击战

估计敌人不会立即以正规军进行大举进攻，但有可能随时随地进行游击战和选派工作队员从事破坏通信和交通线的工作。值得忧虑的是，敌人可能对我军的生产机关、军需资源地带或警备兵力不足的地方，以扰乱治安为目的，向我进行袭击或策动。

三、加强谋略战

（一）对新中国的武装团体，设法使其内部瓦解，或策划背叛逃亡。从根本上破坏治安机构的各种谋略活动将更加激烈。

（二）预料敌人将使其工作人员潜入我方生产机关、工厂、军需资源存贮地、重要都市，与内部工作者互相勾结，搜集情报、暗杀要人，放火、破坏，散布流言蜚语，进行各种扰乱活动。

四、加强民众武装的动员

对共区民众加强训练，同时更企图掌握我占领地区的民众，对之加以训练、指导，使之武装起义。为实现以上各项工作，共党的地下工作，在各方面表现活跃。

五、反经济封锁

敌方为对付我方的经济封锁，推动其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禁止向我方地区流入物资，今后还要加强这种政策，防止我军从敌区得到物资。

参考：

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状况

中共以陕西北部为根据地，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所谓“解放区”，在这里组织党、政、军的各种力量。在华北的军事组织，于第十八集团军属下，分设两个边区军区和两个直辖军区。

晋察冀边区军区，自1937年10月成立以来逐渐扩大，设置了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四个军区。冀西地区有党政军的中枢机关，在太行山脉北部及河北平原地区，设置了根据地。因此，它威胁着华北主要交通线、铁路及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等战略要点。

晋冀鲁豫边区军区是在1940年8月成立，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组成。党政军的中枢机关设在太行山内，特别是有向东方扩大势力的企图，以囊括山东省西部及其北部的广大地区。

晋北军区，成立于1940年11月，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及蒙疆的晋北地区。此地是通往陕西省和晋察冀边区的走廊，也是进入阴山山脉及热河方面的根据地。

山东军区，因远离中共中央，设立较晚，在1941年春开始成立。由鲁南、鲁北、淮海、胶东军区组成。

通过1941~42年的“精兵简政”政策，进行了内部整顿，其党政军的组织都有显著的改变。

促进作战研究及训练 部队多年以来，进行高度分散部署，难免使教育训练工作受到影响，加之这次新作战的开始，动员兵力大为增加，当然要抽出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致使兵员的素质下降。

方面军根据这些情况，要求将重点放在提高“警备”教

育之上，通过干部教育以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对部队的机动灵活的教育，方面军司令官亲自检查各部队的警备情况，听取有战斗经验者讲解战例，努力发扬其成绩。此外，研究中共的游击战法，特别是对如何能够捕获歼灭“退避潜伏之敌”这一问题，上下一致进行研究，提出创造性的意见，虽曾逐次得到一些成果，但仍是今后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方面军为实现确保占领地区治安这一基本任务，作了必要的训练和研究，此外，对占领地区以外地区的进攻作战也作了研究。

方面军要求各兵团，“根据形势的变化，或策略上的需要，或是由于更积极的企图，必须对外围敌军展开进攻，为此，应不断地对这些问题作好准备和研究”。

作为研究主题的外围地区，应考虑五原、延安、西安、郑州等方面。对西安的进攻战已经作了研究。到1942年1月末，在第一军制订了对伯工作（对阎锡山的工作—译注）的“陕西省进攻战”，在方面军制订了以武力压迫重庆为目的的“西安洛阳作战”等方案。该两者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

对苏备战的研究和训练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为具体和迫切了。

大本营在开战前曾考虑到“对美英荷作战同时又不得不
对苏作战的情况，这对日本来说将是最险恶的局面。此时，要从中国派遣军抽调相当兵力转向北方，但派遣军应确保日本必须的国防资源，尽力防止敌方势力抬头，确保我军在中国大陆指导战争的基地”。要求当地各军研究准备兵团转调办法和今后的警备形势。

对此，华北方面军在12月23日，向派遣军作了报告，报告中说：“有关同苏联开战的方案，考虑到将被抽调所需要的兵力，届时军队的部署应作适当的变动，坚持确保现在占领地区的边缘地带，并以局部攻势完成此等任务，现正以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课题进行研究中。”

大本营根据需要，拟向满洲方面转调兵力，指定从华北调第十七、第三十二、第三十六、第四十一等四个师团；从华中调第六、第二十二等两个师团。12月29日，以大陆指^①第一千零六十三号指示进行对苏作战训练。并要求各该兵团“在不妨碍现在任务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对苏作战训练”，“暂定截至1942年3月底以前，力求按期大体完成基本教育”。

注：对关东军在12月3日，以大陆指：“适应形势的推移，限1942年春以前，进行作战准备，并逐渐补充和加强”。

据此，方面军及被指定的兵团，制定了移动计划，努力进行干部教育。方面军在北京召集所属兵团的旅团长级干部，讲习了对苏战法，以便进行普及教育。但因忙于肃正讨伐，几无宁日，加之各部队驻地分散，训练很难进行。

设立对共调查班进行情报谋略活动 华北方面军为适应新形势，采取了各项积极的措施，特别重视情报活动。在12月8日兵团长会议上，参谋长作了如下讲演：

情报工作的重点，在于探察“あ”号作战战况的推移和动向，使对敌人及民众的各种措施适应对华作战警备的任务。

为此，观察面前的敌军政战两方面的动向，注意占领地区内

^①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指示。

各阶层各方面的情况变化，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意外灾害。同时抓住敌人的弱点，利用可乘之机，不断地抢在敌人前面，努力推动各项措施的实现。

随后在12月23日发出了“方面军情况报告”，其中有如下的叙述：

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中国事变的性质必将发生变化。值此时机，方面军决定在情报工作上，适应各种措施确定重点，特别对开战以来有关影响占领地区内治安和苏联外蒙动向的情报，都要尽力搜集。

必须强调政战两方面的情报与各阶层情报的搜集及其统一处理。所有这些情报，大体分为军事情报和治安情报两类。

在军事情报部门中，方面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于12月设立了对共调查班。过去在北京设有“黄城事务所”作为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机关，但随着它的机能的扩大，已经成为军内的机关。其总部设在北京的“六条公馆”，在济南、太原、石门派出支部，配属于驻在当地的兵团。总部拥有成员七、八十名，开始时以黄城事务所成员为基干（不用中国人作职员），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及富有学识和经验者。支部成员为五至十名，必要时由总部增援。主要业务：（一）调查敌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缴获的文件；（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三）综合、评价送来的情报；（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

育；（五）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在1942、1943年期间其成绩最为显著。

治安情报，以各地特务机关、兴亚院以及各会社(公司)的调查部为主体进行活动，并以军事行动范围以外的情况为对象。即（一）行政机构的整顿及工作情况；（二）纳税情况；（三）通货流通情况；（四）物资上市及配给情况；（五）交通通信机关的建设及被破坏的情况；（六）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及理解的情况；（七）日语教育及其普及情况；（八）民众的心理状态及生活情况。上述各项是调查了解的主要目标。

关于谋略工作的开展，已在上述兵团长会议时强调，或诱导敌人实现局部停战、或参加和平归顺我方、或诱导使之成为摇摆不定的中间势力。12月23日的“方面军情况报告”中，对其实施的情况有如下叙述：

随着新作战的进展，逐渐予敌以深刻影响，鉴于策略上的措施，尚有不少工作，现正努力进行中。

1. 扰乱中共的工作，在中共内部结成反共派别，使之引起相互矛盾和摩擦，从内部促成思想上的分裂，这一扰乱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2. 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以后叙述）

3. 与“对伯工作”相关联，目前对傅作义和于学忠的工作虽正在着手准备，但尚在联系阶段。

4. 随着此次开战，要注视部署在所辖部队中的投诚部队的动向，针对情况作适当指导，但目前尚无特别动摇迹象，大体保持平静。

反谋略事项，由于作战资材及民用物资等管理和收藏设

施不完善，容易成为潜入敌人的谋略目标。如将这些东西焚毁或作废，一旦需要时，就会影响战斗力。因此，避免大量物资堆积一处，要加强警备，妥善储存，周密注意，以保安全。所幸这些方面，尚未遭受大的损失，但通信交通设施遭受破坏的事情则尚未绝迹。

冬季肃正作战

由于方面军各次的肃正讨伐，我军在表面上的活动很少，专心于精兵简政的方针，积极进行地下活动，推动民众武装，准备进行反扫荡。另一方面，在1月前后的游击期一过，重庆军的蠢动，虽暂呈平静局面，但进入2月，其局部进攻和扰乱活动又活跃起来。

注1：关于民众武装，在前年12月，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对边区武装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指示：（这是六条公馆搜集的情报）

一、全边区民众应在反扫荡战斗中，组织并武装“民兵肯抗先基干队”及自卫队。

二、民众应准备的事项：（一）彻底做到空室清野；（二）建设泥土房屋；（三）迅速转移牲畜；（四）组织商人武装；（五）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武装准备委员会应检查全面工作情况。

三、军事机关，应对于实弹射击、投弹、野外战斗演习、露营训练及武器使用、保管和检查工作，进行指导。

四、政治机关，应对正规军、游击队及民兵自卫队具有正确的认识，了解有关武装委员会的纲领和民兵的具体工作，以及目前抗战的状况。

注2：蒋介石于1月23日向各战区发出特别指令，以侦察日军状况、研究总反攻时的进攻战术及振作士气为目的，命令第一线守备部

队以一个月为一期，规定地区和时间，轮流展开行动。

方面军根据年度计划（后期）的作战指导纲要，从1月以后，展开了对华北全区的积极的肃正讨伐作战。首先订出计划施行的是第一军的冬季山西肃正作战、第十二军的鲁中及鲁西作战，其它各地如冀东、冀南、河南各地也都进行了猛烈的肃正讨伐。

方面军的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次战斗。

担任苏淮地区防务的第十七师团，在1942年1月1日，又调回第十三军。

以下概述主要肃正作战的情况。

冬季山西肃正作战（一号作战） 第一军计划从2月上旬开始，约以一个月的时间，在山西全境进行剿共作战，企图击溃共军和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获得并搬运其武器和物资，以便扩大治安地区的范围。为此，在1月11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命第三十六师团在晋东南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在沁河河岸地区、独立混成第三及第十六旅团在晋西北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石太线南方地区，分别进行肃正作战；又命第三十七师团在夏县周围及中条山脉南部进行扫荡。在这次作战中，所用兵力计有步兵约二十三个半大队，山炮兵约二十七中队，野战重炮兵约两个大队。此外，方面军命第一一〇师团的步兵约三个大队及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主力，与第一军协同作战。

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晋东南地区 第三十六师团是由师团及歩兵团司令部、

步兵第二百二十二、第二百二十三、第二百二十四联队、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联队等（编制定员为13,952名）所组成，驻扎在泽州、潞安、沁县地区，担任太行山脉南部地区的肃正警备工作。

第一期作战（2月2日——7日） 各部队拟对桐峪镇、洪水镇两地附近进行分进合击。于2日至4日之间，由辽县、沁县、襄垣、潞城出发进至目标附近，但共军事前即已分散潜伏，未遭遇大的部队。以后我各部队在该地一带进行了扫荡。

第二期作战（2月8日——25日） 师团主力与从京汉西方武安西进的第一一〇师团的部队协力，在涉县、黄泽关（涉县东北36公里）、黎城北方、桐峪镇东南的广大山岳地带进行了扫荡。交战次数虽不多，但因这一带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根据地，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资材，摧毁了各种设施。在此期间，师团的一部从襄垣地区向沁县东南地区，随后又在潞城北方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扫荡。为了说明这一时期部队行动的实例，从第一军作战记录中摘录有关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联队长：高木正实大佐）的行动如下：

高木部队，8日向外搬运在洪水镇附近发现的钢材，9日从该地出发，黄昏进至黄烟洞（洪水镇东南偏东15公里），10日发现了很多武器和资材，在其附近一带进行扫荡，摧毁了该地的敌方各种设施之后继续南下，击溃各地之敌，于16日进至黎城东北地区。随后，为了奇袭涉县附近之敌，于17日黄昏由该地出发，18日进至西达城（涉县东南24公里）及涉县北方地区，但因未能与第一一〇师团取得联系，遂从该地区上溯漳河上游，在东崖底（桐峪镇南方6公里）及黎城北方地区进行了扫荡，25日在黎城

集结。在这期间到处与敌人展开交战，击溃敌军约达1,200人。

●考：

黄烟洞的战斗 黄烟洞是个被险峻山岳所围绕的谷底小村庄，早就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武器补充据点。设有兵工厂、地下作业场、仓库等，从石太路方面运进钢材，制造补给武器弹药。第三十六师团早拟攻占黄烟洞，曾数次试行进攻，但都未能成功。1941年11月11日，在步兵第二百二十二联队长葛目直率大佐指挥下，以混成步兵三个大队为主力，采取攻坚战术进行猛攻，于17日将其攻陷（共军守备兵力约一个营）。我方虽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但摧毁了根据地设施，缴获了很多生产器材和武器。

第三期作战（2月26日至3月4日）各部队大体上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了扫荡，随后回到原驻地。因有情报称，从洪水镇逃向张店（沁县南约35公里）附近的共军约有一个团，袭击我警备区。为此，在辽县附近集结的葛目部队立即转向张店附近一带进行扫荡。

在上述摧毁共军根据地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在“第三十六师团步兵第二百二十二联队战斗详报”中有如下记载：

第一 捕获歼灭敌人的适当手段及意见

一、以大部队从正面广阔展开包抄，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这样的战术虽然需要大量兵力，而且很难隐匿我军企图，但对聚歼善于逃避的共军，确属有效办法。

其要领及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 部队应以几个纵队同时展开，再分散至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构成有如网眼的小单位，不论地势如何都要大小不漏地齐头并进进行扫荡，此时尤应注意与其它部队之间不要出现空隙。

2. 小部队的齐头并进，由于地形以及有无需要扫荡的村庄、灌木林等原因，前进速度当然不同，在各部队出现差距时，在其间隙部分，易被敌人逃脱。因此，要密切与左右的联系，在作计划时，对一天的行程要留有相当余地。

3. 越接近目的地，越要使包围圈更加严密、牢固，此时兵力如有余裕，可留置一部于重要地点，并以之进行扫荡或掩护后方的运输，这也是一个有利方案。

4. 在构成包围圈时，从四面包围不是完善办法，应从八面、十二面，从各种高低不同的地势分进合围，这点十分重要。

二、为隐匿我方意图应采取的手段

对善于侦悉我方进攻意图的共军，隐匿我军企图是歼敌人的重要条件。

1. 故意向真正作战的相反方向前进，用这种假动作欺骗敌人。

2. 从远处的集结地，发挥机动能力一举形成包围圈。

3. 在攻击准备期间，要加强防谍观念。

4. 在攻击前进时，要避开有名的道路和村庄。

5. 利用穿便衣的尖兵和侦察员。

三、采取奇袭包围的方法

夜间采取大规模的灵活行动，乘敌不备，在拂晓前完成包围或隔断敌人。此时倘遭遇敌方步哨或警戒部队，切不可受其牵制，主力应迅速穿过继续前进。马匹和苦力（被强征的苦工——译注）的声音容易暴露企图，应将行李，马驮部队留在后方。重武器及炮兵等，应使之不误天明以后参加战斗，随后向前追赶。

四、包围圈要适合兵力，限制在某种程度的小地区，形成细小的网眼，必要时可以反复进行彻底的局部包围。

五、采取反转攻击法

敌人每于我部队通过后，逐渐在我后面集结，因此，我佯向某方前进以欺骗敌人，在适当时机，迅速掉转头来进行攻击。在有多余兵力时，可构成两层包围圈，对于从第一层包围圈逃出而

放松戒备的敌人，可由第二层包围圈部队协力，予以夹击。

第二 发现敌人隐藏物资的方法

一、向居民、俘虏进行讯问，利用苦力、翻译、工作队搜集情报。

二、登上村庄的高处或屋顶仔细眺望时，往往能发现情况反常的地方，那里无路可通，要靠地道或梯子等搬进物资，此等迹象即敌隐藏物资的所在。

三、敌人隐藏的物品，多在离村庄50—200米远的断崖、地缝、梯田（都是从道路或村里不易看到的地方）。因此，搜索时必须以一部人力搜索村内，另以主力搜索村庄周围。要注意敌人多在攀登困难的断崖绝壁中间，挖设横洞，用“悬吊法”隐藏人员或物资。这种地方都有巧妙的伪装，必须多加注意。

四、在隐藏物资的洞穴上，往往放些煤灰、干草、马粪，或立有墓标等进行伪装，或由房屋内部挖有横洞与之通连。

五、隐藏物品的地点，往往埋设地雷，多在小棍棒或木片上，拴上地雷的细绳作为记号，对此应加注意。

六、适当使用善于发现问题的士兵和富有经验的人员。搜索应付出必要的时间，也要将重武器及炮兵部队包括在内，如有可能应使用较大的兵力。

第三 宿营及给养方面有关参考资料（原文省略）

笔者注：作战地区虽是共军根据地，但空室清野只有村内做得彻底，实际很少需要送粮食来。这一地区过去曾多次进行肃正作战，原以为敌方房屋烧毁殆尽，但从这次大规模作战看来，烧毁的仅是一部分，部队在宿营方面未感到困难。

第四 其他

一、此次作战彻底破坏了敌方物资，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在另一面，敌人为了报复和掌握民心，预料将更加积极宣传日军的暴行。此外，对我方通信及交通线的破坏将更加活跃。

二、根据此次经验，敌人对物资的隐藏和地雷的埋设方法将更加巧妙。

三、此次敌区一般居民受损害的为数不少。如果不采取只处置确属敌方物资的方法，将使民心叛离，带来很坏的影响。

沁河河岸地区——第四十一师团 第一期作战（2月2日——16日）。师团在2月2日凌晨从安泽、霍县、灵石、介休、沁县、府城镇（安泽东方10公里）同时开始行动，于3日拂晓对盘据在沁源一带的决死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六旅完成了包围网，虽然一再压缩包围圈，但敌人还是逃脱了。于是，在作战地区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彻底扫荡沁源周围地区，从8日以后，令各部队以最小的分队为单位分驻各地，进行了严密的讨伐，以摧毁敌人根据地，搜索敌人物资。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石太线南方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第一次作战（2月1日——6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十一至第十六大队组成）从1日以后，逐渐由太古、芦家庄（榆次东北约25公里）、和顺出发，搜索驻在宜城镇（和顺西方45公里）地区一带以新编第十旅为主力的部队，在5日进行包围并迅速袭击时，敌已逃脱。

第二次作战（2月7日——20日）旅团以主力在宜城镇附近一带进行扫荡，同时以盂县警备队在该地东北地区扫

荡了晋察冀军第十九团。

第三次作战（2月21日——3月4日）旅团原计划在石太路北方地区及东部省境地区进行扫荡，但为了消灭新编第十旅旅部及专员公署，以主力在榆社北方山岳地带反复进行了扫荡。

晋西北地区——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作战（2月3日——3月6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六大队至第十大队组成）为了搜索暂编第一师，第一次在石佛河（五寨西方30公里），第二次在保德，第三次在岢岚附近，试图包围急袭，但敌人早已分散逃逸，一无所获。在此期间扫荡了上述各地附近敌人盘据的地区。

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作战（2月5日——3月5日）旅团（由独立步兵第八十二至第八十六大队组成）为了歼灭盘据在兴县一带的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及第二〇七旅，旅团在2月5日从岚县南北之线向西挺进，至3月25日，各讨伐队分地区进行扫荡，有的地区还反复进行了包围急袭。虽取得相当成果，但敌决死第十四纵队及独立第一旅的一部依然盘据在其以南临县附近。因此，旅团以主力南下扫荡了临县、离石以北的地区。

晋西南地区 第三十七师团是由师团及歩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二百二十五、第二百二十六、第二百二十七联队、山炮兵、工兵、辎重兵各联队（编制定员13,952名）所组成，担负黄河河防及以运城为中心的地区的肃正警备任务。

在此地区扰乱治安的是重庆方面的游击队和土匪。师团遵照第一军的全部山西地区的肃正计划，从1月6日至22日，

肃正夏县平地，随后从2月15日至27日，扫荡了中条山脉（芮城西方）南部地区，摧毁了敌人根据地。

有关上述冬季山西肃正作战，在“第一军作战经过结束语”中，有如下的记载：

此次作战，对敌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游动兵团的战斗力未能予以彻底打击，深为遗憾。但全面摧毁了敌人根据地及盘据地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认为对共军打击甚大。特别是我军以统一时间，在全山西广大地区同时发动进攻，使敌人大部不能逃到远方，同时使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可以断定，通过今后的彻底经济封锁和连续不断的讨伐，将使敌人战斗力益趋削弱而走向崩溃的道路。

潞安特务机关在2月的月报中，对此次作战后管辖区内的治安状况，作了如下叙述：

共军似正企图展开全面游击战，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通过地下工作，扰乱我方治安。盘据在陵川地区的第二十七军在所辖各县内设置“县游击支队”，积极收揽民心和征集粮草。一部游击队员出没于我军兵站线附近，割断通讯线路，抢夺合作社运输的物资，夺取居住证，袭击县警备队分驻所。此等情况不胜枚举。

3月份的月报中还有如下一段叙述：

中共以恢复和重建由于此次作战被破坏的根据地及经济作为当前的紧急施策，重新组织各县政府，彻底精简机构，同时依靠民兵和出工的办法，来扩充军队，并通过春耕的措施，强调增加生产，努力增强抗战力量。

壶关、陵川一带的中央军，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一方面加紧整顿部队和收集粮草。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此次作战给予敌人的深刻影响。

第十二军肃正作战 鲁中（十号）作战（2月5日——26日）第十二军以步兵19个大队（其中有驻蒙军独立步兵第十一联队长指挥的步兵3个大队参加）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方、博山东南方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鲁苏战区司令）所属的重庆军，于2月5日发动攻势，随后缩小包围圈，摧毁了敌人根据地的设施。

从12日以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到26日在沂水东北及西北地区进行了扫荡，同时另以一部在日照北方追及于学忠部，但未能将其捕获。又，对新编第四师长吴化文进行的归顺工作也尚无结果。

鲁西作战（3月1日——7日）为迫使持观望态度继续活动于山东省西部平原地区的孙良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军长兼鲁西公署主任、第一游击队总指挥）速作决断，对之进行包围作战，由第三十二师团在钜野西南地区，骑兵第四旅团在单县附近，分别击溃敌有力部队，获得了战果。后来，孙良诚终于率领所部二万五千人归顺我方，4月22日发出参加和平阵营的通电。汪兆铭主席即日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孙良诚的行动，对重庆方面在华北的将领，在心理上给予很大影响，从此以后，归顺部队逐渐增加。

冀东道肃正作战——第二十七师团 冀东地区，是中国关内连接满洲的要地，鉴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敌我双方都非常重视确保该地区。当初，该地区民众的抗日思想十分强烈，中共方面从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即曾

努力扶植军事势力，但由于距离山西根据地太远，以及日军方面的强力肃正，难以取得进展。然而从1940年秋以来，在山西的日军对敌加强了压力，敌遂沿太行山脉北上，其东进部队行动显著活跃起来。从此，在冀东方面沿长城线的山地一带似已扩大了根据地，其活动也渐趋积极。

冀东道当时是第二十七师团驻中国的步兵第一联队（队长：田浦竹治大佐）及辎重兵第二十七联队（队长：中西学中佐）担任的北部防区。师团将防卫重点放在中部（津海道）、南部（渤海道）防区。在步兵团长指挥下，分别部署了驻中国的步兵第二、第三联队，主要担当冀中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方面军的意图，拟在将来由治安军担任冀东地区的警备，而将1941年5月1日治安军第一期建军部队（第一至第三集团）和在同年11月第二期建军部队的主力（第四至第七集团）移驻于该地区，与日军共同担任剿共作战。

1942年1月上旬，当地共军对训练尚未成熟的治安军同时开始了攻击，使已经出动讨伐的治安军，在玉田、遵化之间的山谷地带遭到伏击，约有两个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此次战斗中担任治安军教官的日本军官七人战死，治安军的团长一名负伤。日军警备队也立即展开扫荡，但共军乘势竟对日军也进行了多次袭击。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李运昌、副司令：包森）以铁厂镇（丰润北30公里）一带为根据地，第十一团向玉田，第十二团向乐亭方面游动，冀察热东进纵队进入冀东道西北的山区。

师团在1月10日，从中部防卫队（驻中国步兵第二联队）抽调步兵一个半大队，使之增援冀东道西部地区，同时

于24日任命在沧州指挥中部、南部地区的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为北部防卫司令官。

铃木少将转移到唐山后，2月上旬在全区开始了扫荡。此时搜索已经发展了地下组织的共军已属困难，但偶尔也展开激战。2月5日在遵化县甲庄子的战斗中，田口休助中佐（指挥驻中国的步兵第二联队的集成大队）战死。2月17日确已判明，冀东军区副司令包森在遵化县毛家庄战死。肃正讨伐进入3月份仍在全区继续进行。

此次中共将攻击重点指向治安军，这显示出中共为了分化瓦解治安军，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而过去一向是巧妙地进行地下秘密工作。方面军对共调查班于1941年12月对此曾发行了有关调查资料以唤起注意。

其要点如下：

在冀东地区发现的敌方所谓伪军伪组织工作
地下工作方针

冀东地方，如从敌人政策的深度来看，比晋察冀边区尚处于落后阶段。然而中共政治力量，是在与华北新政权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故其中心工作是对华北新政权的各种组织，实行打进、利用、扰乱、诱惑等所谓的“赤化工作”。

伪军工作

中共对伪军的工作，以新政权的治安军、警防队、警备队为主要对象，对之进行瓦解或争取。其基本方针是，“如保留其原来立场有利，即不使之投降，而以之做为抗日力量留在敌人内部；倘已暴露不投降将有被消灭的危险时，应断然使之投降”，其所采取的手段如下：

一 政治手段

与上层军官亲密交往，针对武装队（指治安军等伪军，下同。

——译者)所发生的怀疑、不满和动摇的情况,巧妙地进行煽动宣传。对士兵则加强宣传工作,或促使士气低落。优待俘虏,不没收其私物,对之进行教化。在言语或文字中不提伪军,不进行谩骂。

二 军事手段

原则上以政治争取为主,尽可能不进攻武装队的据点,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事先经司令部或政治部批准,方可进行攻击。如受到武装队的攻击时,虽可进行自卫还击,但原则上避免杀伤,重点放在缴获武器上,并要进行煽动宣传。

对有密切关系的武装队,在军事上退让一步,如通过八路军地区时,应将该地开放给与方便,以便取得政治上的利益。

三 与新政权武装队的交涉

交涉谈判,由团级以上的军政机关进行。

各部队与武装队的接触,应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宣传。在交涉中,要保守己方的秘密,不对无关人员谈论,在进行交涉时不要使农民有所察觉。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不得为有关武装队购置物品。

此种工作的要点为,“在长期坚持工作中,利用伪组织为掩护以达到我方目的,甚为必要。因此,应有计划、有组织地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内部进行组织工作”,并指出“应有计划地使可靠党员打入伪军或伪组织内部,搜集交通通讯机关及机要部门的情报,利用伪组织及伪设施为我方进行通讯联系,这点极为重要”。

此外,争取神父、教士,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利用教徒与自己地盘以外的抗日匪团进行军事上的联系等,这从各地发生的事例可以证明。

在方面军参谋部制订的“剿共指针”中,关于1942年以后中共的“伪军伪组织工作”有如下的记述:

中共的伪军伪组织工作

对新政权武装部队及官员、公务员，停止过去那种称之为“汉奸”和谩骂的作法，从1942年前后开始，实行怀柔政策，称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其目的是先使他们中立，然后转向反日抗日，以期在中共总反攻时发动“内应暴动”，从内部攻击日军。

甲、对武装部队的手段：

（一）使之放松警备和保护敌方工作

在警备方面尽量放松，默许中共工作人员通行和运出物资，工作人员潜入我方时，在住宿、证件、联络等方面给与便利，以免被我方破获。

（二）获得枪枝弹药的供给及出售

目前，共军获取枪枝弹药十分困难，据说七成是靠新政权提供的。所采取的方法是由武装部队直接或通过农民间接转卖，甚至无惜将武器等供给敌人，有时采取故意被俘解除武装等手段供给敌人武器。

（三）用为作战时的内应

共军在袭击我方据点时，或开城迎人，或协同共军进攻皇军，或在作战时故意放枪，通知情报，使敌早期逃逸，或投奔敌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对武装队员家属工作

共军详细调查我武装队员家属的身分，并了解他们的兴趣嗜好及朋友关系，通过家属、亲戚、朋友间接怂恿他们抗日，或发出书信，秘密争取他们，使他们仍潜伏在我方。

（五）令其传递情报

将我方的行动、措施、计划等一一通报给中共。

乙、对官员、公务员的手段：

（一）使之破坏我方措施和进行资敌活动

使官员消极怠工、作风败坏，使我方一切措施归于失败，或从反面加以利用进行资敌活动。

（二）奖励反日的贪污行为

故意制造贪污行为或压迫民众，破坏民众对新政权的期望，离间民众使之与政府及日本分裂。另一方面宣传新政权腐败堕落的行为，甚至冒称日军作出恶劣行为，挑拨日军和民众的关系。

（三）对各机关乘机进行反利用

使党员及工作人员打入新政权的行政、经济、文化各部门工作，或使我方工作人员转向敌人，利用这种条件进行资敌活动。利用建设施工掌握民众，以便从中捞取好处，或利用经济机关之便以取得物资，利用通信交通之便，传送情报或设立通信网。

（四）借报方面

与前述对武装部队的方法相同。

其他方面的冬季作战

河南方面 骑兵第四旅团在2月7日至18日之间，迎击向新黄河右岸淮阳附近袭来的汤恩伯及何柱国两集团的有力部队，当即将其击退。第三十五师团也在2月下旬，扫荡了渡过新黄河向我袭来的孙桐萱所属部队。

河北方面 第一一〇师团所属各部，不断展开剿共作战，有的部队几乎是连日不断地进行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尤其是2月5日在南宫西南地区对冀南军区第四旅进行的扫荡，2月7日在保定南方蠡县附近对第九军分区部队进行的讨伐，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但是，河北地区比其它地方的民众生活和文化程度较高，更因中共势力进入的较早，其地下组织发达，因此，对这种地区不能只停留在讨伐肃正工作方面，挖出间谍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警备石门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向

畑总司令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关于管区内的治安情况有如下的记述：

旅团根据所属大队及旅团的计划，在管内地区屡次进行扫荡，并与各地小部队的积极肃正讨伐相配合，使敌匪势力显著减少。但在我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敌方宣传及各项工作则相当深入。依靠配属的宪兵等，在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方面，现正取得成效。对山区经济封锁的加强，由于我军的部署和构筑的工事以及中国方面各种设施的配合，已经取得了成果。

二 政务、经济的指导和当地的情况

政务指导的基本方案

华北政务指导要领 大东亚战争开始时对华北政务的指导，是根据“对英美开战时有关华北政务指导要领”施行的。12月8日兵团长会议上，参谋长在讲演中对其宗旨作了如下的说明：

“あ号作战”时政务指导的要点，在于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摇动，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附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的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各兵团应通过特务机关、新民会等各种机构，采取一切手段，使之了解皇军实力和日本民族之伟大。此外，要努力揭发扰乱民心的敌性分子，同时使民众牢记日华同生共死的道理，忍受消费品的统制和限制，并使之协助增加生产和开发资源。

为此，在加强指导的同时，应使之认识世界形势，特别要认

清实现东亚民族解放的大好时机，从而积极协助我方的政务指导和
和对英美采取的措施。

据观察，自从开战以后，华北民心甚为稳定，对日军的信赖加深，以解放东亚的热情协助日方的气氛逐渐高涨起来。我军拟加强此种气氛，以使华北成为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据点为目标，进行政治指导。坚决贯彻既定方针，指导中国方面将各种措施集中于“强化治安”与“安定民心”方面。

1. 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不拘泥细节，切实掌握政治大纲。

2. 提高中国方面行政机关，特别是道公署的机能，加强新民会、县警备队以及农村自治自卫能力等，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能力。

为了使中国方面积极进行活动，强调要求各军和兵团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为治安而行使指挥权时，应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

方面军政务指导机构概要 方面军司令官在作战方面应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但关于政务工作，则受陆军大臣的直接领导，应掌握华北政务指导大纲精神，根据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九条规定的行政统监权，统治监督占领地区内的行政。即对华北有关全面的重要事项，可直接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或根据需要（主要为有关经济事项）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代理长官 盐泽清宣少将）担任幕后指导。因联络部长官直接受命于兴亚院，在机构上属于二重系统。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业务分担表

1941年12月1日第四课制订

区别	军官、高等文官	业 务
课长	高级参谋西村乙嗣大佐	掌握课内业务
有关政务及对外活动事项	(笠井半藏中佐)	一 有关中央政权及华北政权事项；二 重要对外活动事项；三 课内教育事项。
	参谋塚本政登士少佐(大概中佐)	一 有关作战命令、训令、训示、会议事项；二 有关新民会事项；三 有关劳工事项；四 有关特务机关人员的教育事项。
	大概实中佐(塚本参谋)	一 有关模范地区事项；二 文教及社会团体事项；三 思想宗教事项；四 地方行政事项。
	笠井中佐(大概中佐)	一 有关中国方面财政事项；二 特别工作费事项；三 有关道、县联络员事项；四 有关直辖特务机关事项；五 有关地方行政事项。
	浅野修中尉山西中尉	一 有关政务、经济、情报事项。二 国际法关系及其他必要事项。
	大沼喜久雄陆军教授	
	(兼) 参谋浅川秀和中佐	一 有关中国青年党的指导事项；二 其他所有○标记的业务。
	(兼) 斋藤钟三少佐	一 有关第四课与报道部联络事项

续表

区属	军官、高等文官	业务	
经济关系	参谋 中村祐次少佐 (片山参谋)	加藤晋主少佐 久保中雄主少佐 (兼) 大井大尉	一 有关金融事项;二 资金审查事项;三 有关产业(农产、轻工业)指导事项;四 有关军管理工厂事项;五 有关进出口及配给机构及其运营事项;六 有关各开发公司及其事业事项;七 有关“物资对策委员会”事项;八 免税及报关事项。
	(兼)参谋	渡边岸郎少佐 (加藤少佐)	一 有关总动员事项;二 有关物资动员事项;三 有关产业(农业、轻工业除外)开发指导事项;四 资源调查事项;五 事业审查事项;六 有关马产及马政事项。
交通关系	西野夫佐 恒中	上村竹治少佐	一 有关运输统制事项。 二 有关铁路事项;三 有关道路、汽车、水路事项;四 有关船舶、港湾、水运事项;五 通信(电政、邮政、广播)事项。
		平岛三树大尉	一 治水、水利事项;二 都市计划事项;三 电业事项;四 有关建设总署事项;五 有关航空、气象事项。
庶务	平松安雄中尉 (浅野中尉)	一 庶务;二 机密文书保管;三 阵中日记及月报;四 功绩登记。	
备注	一 在本表以外,有十三名“嘱托”,在本课工作。 二 根据业务的闲忙,互相支援,以推动业务顺利进行。		

注：第一课参谋福田毅大尉兼管有关航空及气象事项。

当时，在政务工作方面，辅助方面军司令官的为参谋部第四课，其所担任业务的情况有如以上附表。

另一方面，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各省及各特别市政府内，根据日华顾问订约，设有顾问部（由最高顾问、顾问、

顾问辅佐官等组成，其身分为日军的“嘱托”——日军聘用的编外人员。——译注）。顾问部是为协助中国方面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而设，因此顾问担任的工作是向中国方面各长官提出建议，回答其谘询，特别是为了顺利推动业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调整双方的关系。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最高顾问为佐藤三郎（预备役陆军中将），丸茂藤平，并兼任新民会的顾问。

注：华北政务委员会任用和招聘了由方面军司令官推荐的日本技术
员、教授、教官、教导员等为政府职员，其具体数字不详。

省以下各地方行政指导——华北的特务机关 方面军除统治监督华北全部行政之外，并直接担任河北省、北京及天津两特别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各省，则分别由第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团担任指导，其具体业务由各省及各特别市特务机关负责。对道以下各地区的行政指导，由各师团、旅团适应各地情况，命所属特务机关负责，这些地区的特务机关，为了对中国的道公署、县公署进行幕后指导，派有道、县联络员（当时称省顾问、县顾问均非正式职称）。

各特务机关长，一方面作为兵团的政务幕僚参加政策的规划和制定等工作，另一方面作为政务执行机关担当着极其复杂的多种工作。

1941年12月在华北的特务机关的概况有如下表：

华北方面军管内(蒙疆地区除外)特务机关一览表

1941.12

特务机关名	配属部队	机关长	政务指导公署数				
			省、特别市	道市	县(局处)	计	
河北省(保定)	直辖	铃木繁二大佐	1	1	22	省 1 市 2 道 9 市 2 县 131 局 1 处	
北 京		松崎直人大佐	1	1	15		
天津特别市		雨宫美少将	1				
天 津	27D	山下哲夫中佐		市 3 1	40 (局)处		
石 门	110D	石田丰藏大佐		市 3 1	37		
邯 郸	1Bs	冈田翼作中佐		1	河北11 河南6		
河南省(开封)	35D	高田利贞大佐	1	市 1	河北 3 河南 6	省 1 道 2 市 1 县 4 县(准) 2	
新 乡		大江庸吾大佐		1	19		
归 德		4KB	原田喜代藏中佐		1		13 淮 2
山西省(太原)		植山英武大佐	1	市 1			
临 汾	1A	关根淳一郎中佐		1	19	省 1 道 4 市 1 县 92	
运 城		37D	高藤俊三中佐		1		15
崞 县		3Bs	若山磨一少佐				12
太 原		9Bs	恩田忠录中佐		1		12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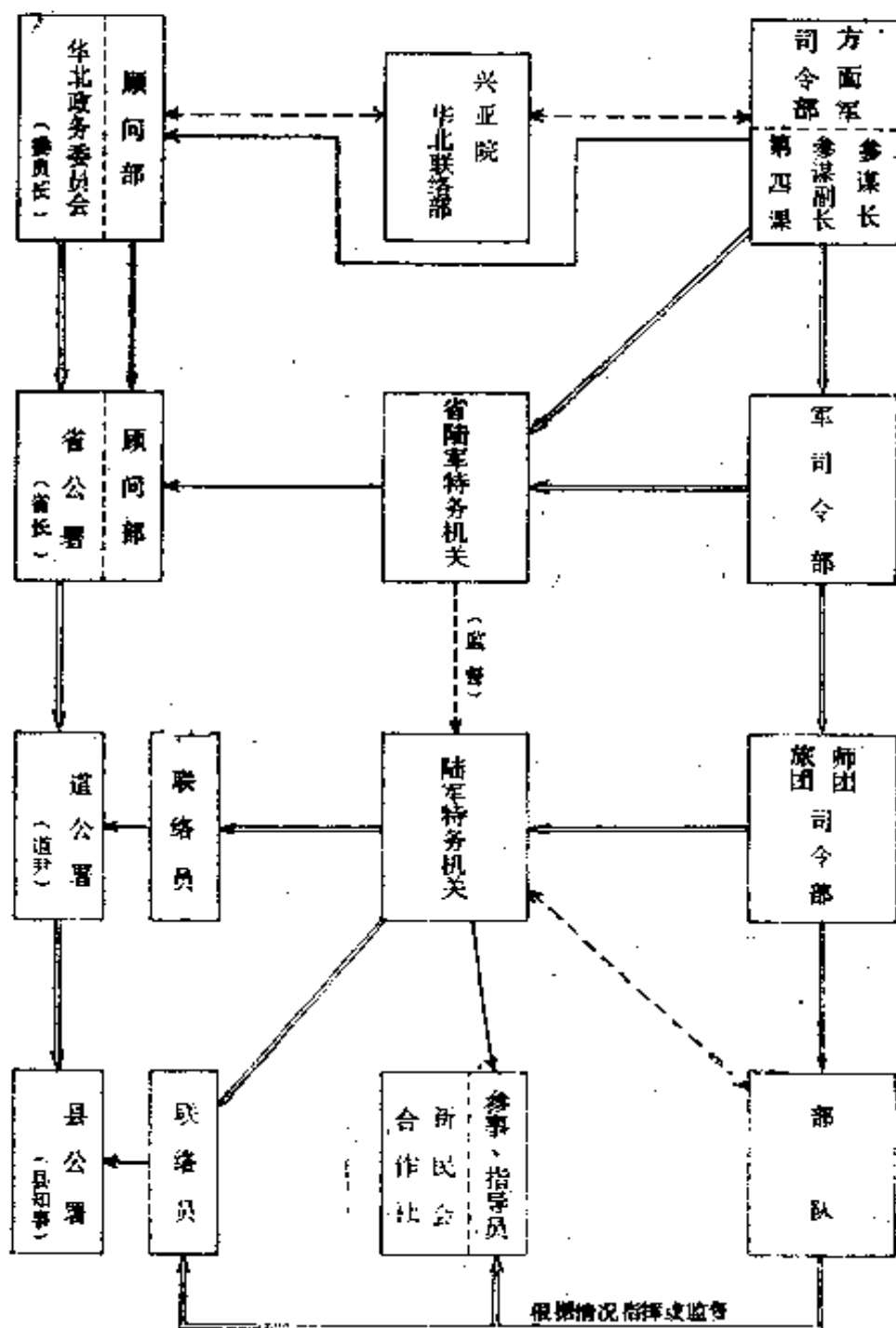
阳泉		4Bs	千叶一良少佐			9	
汾阳		16Bs	宫内幸五郎 中佐			13	
潞安		36D	深见幸次少佐		1	12	
山东省(济南)			河野悦次郎少将	1	市 ⁹ ₁	95	省道 市 县 专 市 县 1 10 2 105 1 1 25
芝罘		山东机	新乡荣次中将		市 ¹ ₁	16	
苏北(徐州)	12A		江田稔中佐	专1	市1	苏 ¹² 淮 ⁸	
海州		17D	赤枝孝之少佐			苏5	
合计			21	省 4 特别市 2 专 1	道 25 市 7 县 396	局 1 处 1	
备注			<p>一 “专”是苏北行政专员公署，“苏”是苏北地区、“淮”是淮北地区、“局”是新海设治局、“处”是兴隆县办事处</p> <p>二 青岛特别市的政务指导，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担任</p> <p>三 太原特务机关，在独立混成第九旅团调走以后，关闭一个时期。</p>				

在1941年底中国地方行政机关，在总县数的398县之中恢复了366县。

但是，经详细调查县政恢复的情况，实际上行政命令仅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而已，大多数达不到边远的乡村。特别是山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和靠近黄河的西部山岳地带以及河北省的津浦、京汉两铁路的中间地带，山东省的中部山岳

地带，均为非治安地区。（1941年底，在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统治下的土地总面积约为8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一亿一千万）。

华北的政务指导机构有如下图。



备注：

1. 二⇒指挥一→幕后指导
……>联络调整
2. 兵团（军、师团、旅团）长须将讨伐肃正与政务指导结成一体来规定所属部队及配属机关的任务，并对之进行监督指导，负有确保作战地区内治安的一切责任。
3. 兵团参谋长受兵团长之命，分别监督指挥作战幕僚的参谋部及政务幕僚的特务机关，负责指导治安肃正计划的统制和施行。
4. 特务机关长受兵团参谋长的监督指挥，参加有关政务指导的策划，指导省、道、县的政务施行。治安恢复以后，如果县的行政指导可从部队指挥官处分出时，就直接指挥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担任县公署的指导。
5. 各部队指挥官，专门担任管辖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为此，指挥或监督地区内的宪兵、县联络员、新民会指导员，在一定的方针下谋求治安的恢复。

方面军虽以这种组织对中国行政机关进行幕后指导，但为促使中国行政官员自觉地行动，应尽量使中国方面的人员站在前面，不干涉其细节，适当给以指导。由于中国方面的自觉性难以树立，因而第一线部队和特务机关等基层单位，从对治安负责或政治兴趣出发，多有深入参与政治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因此，方面军特别用很大力量，扩充各特务机关和提高道、县联络员的素质。

1941年11月，召集县联络员、新民会县次长等共116人，就剿共工作及乡村自治社会的建设，集训了一个月。此外，并在日本国内另行招募新民会会务职员，以此等办法来提高日系指导员能力。

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方面军在“政务指导要领”中增加了“加强特务机关”一项，指示由所属兵团，抽调必要的人员，配备到各特务机关，或从新民会日系职员中抽调适当人员临时到特务机关工作，以此充实特务机关的力量。

此外，由方面军参谋部塚本参谋充当教育主任，从12月4日到10日，对“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约100名毕业生进行了特别教育，随后将他们分配到各特务机关工作。关于这些人员的服务要领，在18日向各特务机关长发出通知如下：

一 要使他们成为特务机关加强军风纪的核心，注意予以指导。

二 在特务机关长直接监督下，使他们担任收集情报、辅助制作计划、联络、视察等业务，避免在外常驻或单独工作。

三 服装，要尽量着用军服。

注：“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在1941年9月成立于南京的江宁，负责对中国各地特务机关的人员进行教育。由于过去特务机关的人员除机关长外，大部都是部队的文职人员或“嘱托”，因此教育队的目的就是要从军人中选拔长于此道的专家分配到特务机关。教育队的队长为派遣军的参谋副长（首任队长土桥勇逸中将，其后任为野田谦吾中将）。学生队长为乌饲恒夫大佐。学生是由各兵团选拔的大学和高专毕业的优秀预备军官约200名。教育期限分为三期，第一期三个月，第二期三个半月，第三期六个月。到1943年初，根据“对中国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改编特务机关，解散了教育队，到此为止，从该队毕业的人员共约650名。

教育内容，除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课程外，特别要教导作为政务指导人员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尤应着重于精神要素的培养。该教育队还起到挖掘军内人才的效果，据说毕业生在各地的活动，都受到了好评。

另一方面，活跃在治安肃正第一线的部队是如何进行政务指导的？现举一例加以说明。从第一一〇师团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于1941年11月28日召集所属宪兵、联络员、新民会职员开会时，以部队长身分所作指示的摘要中，可以看出当时联络员等人的工作方法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肃正建设各项措施的情况。

长岭部队长的指示（摘要）

以下所讲的都是本部队根据师团、旅团的肃正建设计划提出的要求。

一、牢记对中国方面进行指导的重要性

师团肃正建设计划有五大重点：（一）积极不断的讨伐；（二）彻底加强对山区的经济封锁；（三）加强农村的武装；（四）铲除共产党地下势力；（五）推动中国机关（包括新民会）的活动。其中除第一项积极不断讨伐，中国方面是处于协助日军的地位外，第二至第五项则完全以中国方面为主，日军则属于对其推动支援的性质。这就是说，在师团计划五大重点之中，有四点是在此参加会议的宪兵联络员、新民会职员应当担负的工作。这也是师团即皇军对诸位所期待的，其意义的重大，切望深刻体会，努力工作。

特别是本联队管区以内，并无大规模的敌正规军，只是一些伪县政府及伪区公所所属的武装团体和土匪。因此，地方上的大部分治安肃正工作，相信中国方面是可以承担的。

二、加速治安肃正工作

最近，为指导后期肃正建设计划，在石门召开了部队长会议，师团长对与会的全体部队长作了极其强烈的训示，要求“到明年3月，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师团管内重要地区的肃正工作”。我们有义务必须竭尽全力实现这一训示。为此，若以过去的速度进行治安肃正工作是不够的，为了到3月以前能达到师团长的要求，必

须大大地加快速度。

你们若以一般的方法指导中国方面工作，提高速度十分困难。自事变以来我从事多年指导中国的业务，深知其中情况（长岭大佐1938年曾任华北治安军军事顾问）。搞这项工作，必须任劳任怨，坚决引导中国方面尽力加快速度，只要拿出献身战场的精神，这是能够做到的，否则到3月就不可能完成肃正工作，那时我们就违背了师团长的命令。

三、推动中国方面开展活动

师团的肃正计划五大重点之一，就有推动中国方面（包括新民会）的活动一项，这是你们诸位的全部责任。这一重点能否实现，全看你们的努力如何。至于如何推动中国方面的活动，其具体方式方法，诸位的上级特务机关长虽已作了全面的教导，但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站在前面进行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干涉，要使他们负起责任来。在某种程度上要大胆地信任他们。同时，还必须具有使他们不得不追随和听从我们幕后指导的强烈意志和信心。看看柏乡县构筑封锁沟的事例，再看看近代征服异民族和征服以后应如何统治的历史，就能够懂得，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是如何的重要。

四、加强县警备队

本联队的方针是在管区的外围县境，构筑隔断壕，并在此部署日军防止敌军侵入，管区以内则完全以中国的武装团体担任警备。为此，希望各县的警备队要排除万难，加强组织，增加人员，此事对县联络员寄以最大的希望。

对预算及武器不足等问题，不要诉苦抱怨，坚决实现军队的要求。

五、促进县警备队的活动

希望促使县警备队单独或数县联合实行讨伐，目前任县拟订了此种计划，立即对之表示极大的敬意。

六、县知事励行亲身视察检阅

要指导县知事、县警察局长对保甲自卫团、县警备队，乡村

自卫组织等勤加检阅或视察。王揖唐委员长不顾年老挺身而出巡各地的模范行动，应予效法。

七、加强农村自卫力量

至3月底止本联队管区十三县的全部农村（山地封锁沟以西除外）都要成立保甲自卫团，要在村庄周围挖沟筑墙，增加扎枪、手榴弹、洋炮。特别要在下列地点加强农村自卫力量。

（一）沿本联队管区和邻接部队交界处县境构筑隔断壕的村庄。

（二）铁路和山地封锁沟中间的村庄。

要指导和训练各乡镇保甲自卫团与邻村相互协助，对抗敌匪。县知事、警察局长、警察分所长、新民会职员等，应经常巡视农村，提起警惕，检查对付敌方来袭时的动作。

八、中国方面对经济封锁的活动

目前对山地的经济封锁，完全由日军及其指挥下的部分警备队、警察直接在封锁沟进行监视，中国各机关对经济封锁工作尚未见有所行动。诸君要通过保甲制度，推动负责监视和监察封锁的机关及负责统制购销的机关积极行动起来，以使封锁更加严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有大量物资流出封锁线以外。蒋介石在江西对共产地区所施行的经济封锁，就是利用保甲制度才完成的。这是值得深思的。

九、经济建设

对此问题，相信特务机关长已有指示。本管区内有关植树造林和粮食、草料的增产，应迅速制订计划，不失时机地动手准备种子、开垦田地，以便明春立即投入生产。此项计划要在12月份内作好，并提交特务机关长及本部队。

十、武装青年训练生

青年训练生是新民会的卫兵，应当率领这支卫兵，离开县城进入农村，从事各项工作，特别应使之努力加强乡村自卫力量和铲除共产党的地下势力。过去指责新民会只在县城内埋头于办公室工作，希望今后彻底加以改变。

十一、宣传

在宣传工作上想进一言，即如元世祖（忽必烈）所说的“应天唯以至诚，拯民莫如实惠”；又如有的共军干部看到石门的繁荣而放弃抗日的信念。这就是说，用远大的理想和大东亚新秩序的信念作为新民会工作重点，向乡村民众灌输是很难收效的。还是给他们以实惠，这是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以我军占领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向敌方和民众进行宣传，是十分有利的办法。以上所述仅供参考。

十二、配属宪兵

有关配属宪兵，诸位的工作，已由有关教育负责人作了详细指示。只是从目前情况看，在本联队管区内已无大股敌军，主要任务是铲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而这项工作需要靠配属宪兵的侦查，对此艰巨任务特别希望各位努力完成。

对地下工作的侦查，在日本国内尚有很大困难，何况在语言不通的外国，其困难程度是很明显的。因此，对各位的辛苦，衷心表示同情。对这种困难的工作切忌急躁。前军司令官多田骏的“治安工作必须抓紧但不可急躁”一语，值得深刻体会。

十三、联队的治安肃正计划

在此仅就联队肃正计划的必要事项叙述如下：

（一）首先以赵县、隆平、南和为重点，在与其邻接部队交界（县境）的地方构筑隔离壕，将日军、县警备队及保甲自卫团部署该线进行守备，防止敌军侵入。

（二）其次，将重点移向铁路和山地经济封锁沟的中间地区，加强该地区的保甲制度和乡村自卫力量。到3月底，该地区的日军将任务全部移交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县警备队、警察），然后撤走。

（三）赵县、元氏、高邑、柏乡、尧山、内邱、邢台、任县等八县的治安工作，要提高到石门模范区的水平，而县城及县以内的警备，则让中国方面自行担任。

诸位指导中国的工作，要符合上述计划要求。

十四、警备电话和自行车

在赵县、隆平、南和新近已分驻日军，有线电话线不敷使用，希望县里购买部分警备用的电线，借给日军使用。根据师团命令，在各大队内分别编成自行车讨伐队，各县要准备自行车十辆，借给日军使用。

最后想讲一讲诸位以及诸位与派出的日本守备队之间的融洽和切实执行命令、指示问题。

无论收揽多么能干的人才，如果日本人之间彼此不和，就绝对做不好指导中国方面的工作。因此，希望顾全大局，放弃小我，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在现地工作的日本人最需要的是“人和”，这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我们修养不深，往往是懂得道理而不能实践。在满洲的日本人高唱“日满亲善”，对此，曾经听到满人说：“搞日满亲善，莫如先搞日日亲善，日本人之间互相反对，甲所说的事和乙说的事互不一致，我们满人不知何所适从。”这是有必要深思的。

诸位上级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以及在剿共及治安工作上对诸位有指导监督权的联队长和大队长的指示，都必须诚心诚意认真执行。对于命令和指示怀有私心、采取消极反抗态度、没有工作热忱的人，不管多么有才能，不仅没有资格在大陆第一线工作，而且作为军队的文职人员，应该说是违反军纪的行为。

蒙疆的政务指导机构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不参与蒙疆的政务指导工作，其行政由驻蒙军司令官统治监督。方面军根据需要监督指导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少将）。联络部长官虽然担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幕后指导，但是该政府内的最高顾问以下的日系职员已形成各部门实际工作的核心。（首任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1941年11月27日辞职，后任为大桥忠一。政厅内日系职员约占全体职员的10%，警察系统职员约为22%。）因此，蒙疆与华北有显著不同，与

满洲国相似。在此，日方的意图易于贯彻，相反却削弱了当地蒙古人、汉人等的积极主动性，但在日本的强力指导下，正在向“高度防共地带”的建设迈进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军、联络部、政府不同系统的各机关之间的意志沟通及各机关内部的人和问题。为了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曾不断努力加以解决。

驻蒙军的特务机关人事安排如下：

厚和特务机关（机关长 小仓达次少将）

大同特务机关（机关长 铃木重种中佐）

包头特务机关（机关长 稻森利助中佐）

德化特务机关（机关长 松尾勇大郎中佐）

阿巴嘎特务机关（机关长 牧野正臣中佐）

注：阿巴嘎特务机关，是关东军情报部支部，兼驻蒙军的特务机关。

这些特务机关，在事变当时是政务指导机关，随着各政厅内的日系官员地位的巩固，逐渐从政务上放手，而改成军直辖的情报（谋略）机关。1939年3月16日，发出了停止政务指导的命令。它和华北的特务机关的性质完全不同。

华北的政治情况和新民会

大东亚战争刚一爆发，王揖唐委员长立即发表声明，阐明了全面支持日本进行战争的决心，尤其在华北经济政策方面，要与日本更加紧密联系，要求华北一亿官民团结一致，即使不直接拿起武器，也要充分尽到参战的责任。

随后，为了贯彻各项施策，于1942年1月14日召开各省

长及特别市长会议，会上王委员长明确指出华北参战的三大方针：（一）确保治安，安定民心；（二）开发重要物资，采取粮食对策；（三）树立非常时期的经济体制。会后，各省管辖下的道、县、市长也逐级召开会议，以便与从3月末开始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将政策贯彻到一般民众中去。

租界行政的移交 3月2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将天津英租界行政移交华北政务委员会。该租界在开战时，由军接管，改称“极管区”，由第二十七师团长统辖监督该区行政。政务委员会接收后，使之作为“特别行政区”隶属于天津特别市，由该市长负责处理新的行政。广东英租界的行政，在3月25日移交国民政府。移交经过如下：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有关在中国接收敌性权益事项，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在1月20日，决定如下：

一、天津英租界及广东英租界的行政，移交国民政府，其时间另定。

二、敌国系统的文化设施（学校、教会、医院等），在我方不需要的，以及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和重庆系统的文化设施等均移交国民政府。

三、在上海公共租界接收敌性权益进行工作时，只要不妨碍我方政策，应尽量使中国方面积极参加协助工作。

四、在进行以上各项工作时，应采取适当措施，扩大其政治效果。特别应指导国民政府不要只顾收回权益，而应使之欣然协助日本帝国完成战争。

2月18日，日本政府也发表了关于移交的声明。2月24日发出移交的命令。

中国武装团体的状况 对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及其他武装团体，日方根据1941年1月的“中国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进行了调整和指导。1941年12月3日的总长指示中，亦要求根据上述纲要执行。这些武装团体的任务主要是在我军占领地区内协助我军维持治安。在纲要的“方针”部分有如下的记述：

一、中国武装团体，当前，以协助我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肃正工作为主，并且以成为国民政府推行政策的支柱为目的，除另有规定者外，考虑各地方的特点，以乡土自卫，保境安民为整顿、指导的主要目标。

二、将来，随着事变处理的进展及国民政府的发展，逐渐在整个占领地区统一进行整顿，刷新军容，以日军为后盾，独自担任治安工作，可能时，则使之协助日军作战。

三、整顿、指导及运用大纲等，实际上均由日军统制之。

“指导要领”中规定：“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为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华北治安军、蒙军及其它武装团体，隶属于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整顿装备的数量为：国民政府直辖军队约在十一万以内，华北治安军约在十万以内（包括剿共军），蒙军约在一万以内”。

在华北及蒙疆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中有：（一）治安军（中国称为华北绥靖军）、蒙古军、部署在华北的国民政府的直辖军及日军各兵团所指导的投降部队和谋略（特务工作——译注）部队等；（二）省、特别市、道、县、市等的警察队、警备队及蒙古警察队；（三）乡村武装；（四）铁路、水路、通信警备队（如华北交通会社及华北电信电话

株式会社的警备队)；(五) 工厂、企业的警备队；(六) 其它被批准持有武器的团体。

在华北由政务委员会的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管理军事及警察等一切治安业务，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由治安总署职员兼任。由华北方面军军事顾问(部长田岛彦太郎少将)负责对之进行指导。

治安军自从建军以来已有二年，总兵力为五万四千人，其主力由第一至第七集团组成(每个集团为两个团)，部署在冀东道。第三期建军的部队(从1941年12月开始)共六个团，正在保定及通州地区进行训练。此外，在密云、平谷附近有担任警备的警防队(司令王铁相)约四千人，预定最近改编为治安军。治安军存在的问题是，训练不足，尚不能独立作战，将来增加兵力时预算相当困难，并且需要成倍增加日军教官。

在投降部队中，对兵力多而且素质较好的部队，给以“剿共军”的名称，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发给固定军费，令其在当地日军指挥下，担任治安警备。“剿共军”总兵力约八千，分为第一至第三路军，部署在河北省的顺德附近和山东省莱阳附近。其它投降部队，一般称作“皇协军”，暂时发给军费，目前逐步进行整顿，准备将来解散，其总兵力约有一万七千人。

在开封东方陇海铁路沿线，有“和平救国军”(为国民政府直属部队，由第一至第三军组成，亦称开封绥靖军)共约二万五千人，在该地兵团长的指导下，担任鹿邑、亳县两处的行政。方面军拟于将来命该军担任涡河(由开封东流向

蚌埠)以南的县政,指导其逐步扩大治安地区的范围。

和平救国军,是以旧军阀吴佩孚的地盘为基础,它与豫东道地区有较深的乡土关系。该部队驻地与重庆军第一线邻接,一直保存到战争结束。该部队受到华北方面军的支援,自主地担任该地区内的军事和行政工作。

县警备队,是在日军进驻以后,为加强县自卫力量,逐步改编了旧有的县保安队及警备队而形成的。方面军对其实力评价很高,十分重视。至1941年底,兵力约达九万五千人,步枪约有七万九千枝,轻重机枪约230挺,手枪约5,000枝,自动步枪约400枝,每县平均有253名,枪222枝。对于县警备队的指导工作,在各县由日本驻军担任,在中央归治安总署管辖,军事顾问部担任指导。

警察也逐步恢复了事变前原有的组织,经过改编重新教育,到1941年底,总人数达六万九千人,其中半数配备有轻武器。每县平均有144名,配备枪68枝。由驻各县日本宪兵担任指导。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为治安总署警察局,他们也受军事顾问的指导。

新民会的体制和性质的改善 随着事变的发展,新民会从思想团体向政治团体演变,由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要求在体制和性质方面,有更大的改善,以便积极展开活动。

12月13日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召集新民会中央总会日系职员,就该会今后的活动以及日系职员应有的精神准备和行动准则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要求各兵团贯彻执行。指示中强调“目前皇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期,应使华北成为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为了能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只

有依靠新民会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国人心向新民会，积极参加新民会的活动”。因此，必须支持“以中国人为中心进行新民会的活动”，“积极发现优秀的华人领导者”。

有关方面军培植指导新民会的设想，冈村司令官曾向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在8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又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明确了以下意图：

一、“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持新民会”

自从去年11月30日，缔结日华基本条约以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已为国际所承认，对该中央政府的扶持和加强乃是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然而华北的特殊性在条约上也有所规定，政治事务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执行。为了使政务委员会具有实力，必须扶持和加强作为其基础的新民会。这样首先加强华北，同时也就是加强了中央政府。如果立即将华北一切都使之南京化了，那并不是加强南京中央政府的明智作法。

华北始终处于日华的特殊地位，只有依靠日华关系的巩固，以及同被加强的华北、华中保持正常关系，南京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共产党的对策，大家知道，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现将双方阵营加以对比，我方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也未必很差，但以新民会与共产党相比，则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对共政策的困难性，可以说就在于此。

以上两点就是必须加强和扶持新民会的理由，方面军不惜一切努力推动新民会的发展。

二、“新民会为彻底的中华民国的新民会，决不可成为日本

人的新民会”

华北的中国知识分子，厌恶国民党腐败作风，倒有些憧憬着共产党。然而现在亲身体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终于感到厌弃，因而希望自己在华北结成第三新势力。新民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说来，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是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革新日华合作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只要使中国人活跃起来，新民会就有可能充分地发展。如象现在这样以日本人为中心进行活动，不仅妨碍第三势力的结成，而且也不可能从教化团体性质再向前发展。

但是，这绝不是说日本人就不需要了。正相反，要使中华民国新民会得以顺利地成长，则绝对需要日本及日本人的大力支援，尤其是在情况复杂的地方，日军、宪兵以及日本侨民等都必须挺身而出，促使中国人的新民运动顺利开展。

三、“国民党与东亚联盟的关系：所谓国民党（指汪伪国民党——译注）乃是同志益友，而东亚联盟则是思想精神的一致”

新国民党和新民会是中国新体制的姊妹组织，其地位是对等的关系。从树立革新思想的历史来看，说新民会比国民党先进并不过分。因此，去年中央部曾经决定，在华北由新民会，在华中、华南由国民党，划分地区各自协助治安肃正工作，互竞其善。现在国民党不将力量集中于华中、华南、有些反而进入治安已经恢复的华北，这是迹近避难就易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国民党是不应进入华北的。东亚联盟的思想，和新民会纲领中的善邻结盟的思想相一致，新民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具有共同思想内容的组织。因此，新民会应团结一致，普及东亚联盟的思想。但是，在华北于新民会以外另建立东亚联盟支部，以及在新民会内进行东亚联盟支部的活动，都是不许可的。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国民党利用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为外国团体，而将各党各派纳入国民党内的政治手段。因此，新民会有责任指导东亚联盟保持其原来纯粹的目的。

总之，不论是对国民党、或是对东亚联盟，新民会都应站在

启蒙立场主动加以指导，万万不可处于被动地位。

四、“新民会日系职员立场是顾问和监察，日本人参与新民会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

新民会应改变协和会（伪满的组织——译注）的想法，它是彻底的中国人的新民会，应改变过去那种狭隘的指导方法，对于中国人以自己的意志所结成的革新势力，应给以极大的关心和声援，使其愿望得以正当实现。但是，由于各地治安尚未稳定，需经常进行频繁讨伐，这对于没有政治部队的日军来说，就需要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加以很难找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必须逐渐由中央部门培养中国人以之替换日本人。

12月24日，新民会适应新的形势，为了促使完成其原来的使命，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过去一向采取下情上达的方式，按照县联合、道联合、省联合协议会的顺序最后召开全体联合协议会。但这次则作为紧急措施，而对全体协议会上决定的各项方针，采取了逐级向基层组织进行上意下达的方式。

全体联合协议会，明确了适应时局的新民会运动方针，提高对时局的认识和自觉性，以积极推进向来的基本工作，并对于治安对策（防止共产党及其他不法分子的策动，进行宣传，搜集情报）及确立自给自足经济政策，建设新民农村自治社会等具体工作方针一一作了指示。

为使新民会真正成为以中国人的力量和由中国人负责的组织，逐步进行了机构改革。首先，在中央总会设立了政治局和宣传局，整顿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地方撤销了道办事处，新设并加强了道总会；在县总会内设立了自卫科和训练科。县自卫科是将过去一直实行的“农村自卫”运动纳入本机构之中

的，训练科主要是将县公署领导的“保甲训练”，从民众组织的立场，采取由新民会协助进行工作的方式。

此外，充当县联络员从事地方行政工作的日系职员，统一安插在新民会内，使之兼任县联络员工作，从而使民众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施策

12月10日，蒙古政府发表声明并发出布告，阐明了大东亚战争解放东亚的意义，号召蒙疆民众奋起“打倒、驱逐中国共产党，奠定管内治安，振兴产业，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全力协助日本”。尤其是政府主席德王，强调兴亚协力政策，于1942年1月17日，颁发了“兴亚手谕”，用以鼓舞斗志。同时为了集中蒙疆民众的总体力量，组织了“兴亚协力会”，设总部于张家口，并在察南、晋北各政厅及各盟公署所在地设立分会，在市、旗、县公署所在地设立支会。政务院长（吴鹤龄）就任会长，各行政机关的长官担任直接领导。该会纲领定为：（一）发扬东方道义，（二）协助大东亚战争，（三）确立治安，（四）提高民生。进行活动的第一步，先由捐献军用飞机运动开始，接着发行公债，召开“打倒美英”民众大会等等。

政府规定从1月1日到3月底，为第二次施政跃进运动时期（第一次为1941年9月），进行贯彻政策的活动。其重点是加强和推动地方行政基层组织，同时整顿户口、加强自治机能、进行宣传工作、调整物资收集配给机构，以期扩大和加强治安地区，在全管辖地区同时开展活动。

通过实施新制度，街、镇、乡、村的组织，取得相当好的成果，如民众生活和文化程度高的察南、晋北、巴盟工作进展顺利。但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地籍整理上有困难的地方，只能为今后作些基础工作。

在晋北政厅，一向就以灭共工作为施政的重点，结合此一运动，将警察队、自卫队与军队结成一体进行讨伐，并积极开展宣传和有关民生的工作。

注：当时的行政区由二政厅（察南、晋北）、五盟（巴彦搭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伊克昭）组成，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1940年6月底调查）525万人（其中汉人502万，蒙古人15.4万，回民3.8万，日本人3.3万）。

当时的武装部队，正规蒙古军约有6,000人，武装警察队约有5,000人，准正规的投降部队约有7,500人。

蒙古军在1940年进行整编，由总司令部（司令李守信）、骑兵四个师（各师到基层都是三三制）、直辖炮兵队、通信队、汽车队、以及军政、教育等机关所组成，部署在日军警备区外围的蒙旗地带。

总司令部设在厚和（今呼和浩特——译注），第五师师部在土木尔台、第六师师部在大树湾、第七师师部在德化、第九师师部在百灵庙。驻蒙军的军事顾问部负责培养和加强部队的工作。这些师均为野战部队。

投降的绥西联军、白凤翔等部队驻于包头西部及西北地区，与在五原的重庆军之间，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

现将蒙古军整编后的状况概述如下：

通过1942年底的军制改革，整编了骑兵四个师，编成野战第七、第九两个师，部署在商都、六合营。同时新编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五个防卫师（各师的兵力1,000名左右），其指挥官由盟长、旗长等行政长官兼任，使蒙人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成为一体。

在肃正讨伐方面，由1942年底直到1943年春，在察南延庆地区参加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对共军肖克部队的讨伐，立了大功。此外并时常支援第二十六师团在阴山山脉内进行的扫荡，和骑兵集团、战车第三师团在鄂尔多斯的作战。后来，1944年底，在中公旗防卫战斗中已经成为能以独立作战的部队了。

1945年春，再次进行了军制的改革。军政机关过去设在厚和的总司令部内，在张家口只设有蒙古军联络部，但在本年4月，将联络部升级，在政府内设置军事部（部长李守信兼任），军事部统辖军政、警察两项业务，撤销了治安部。同时将汉族地区的武装警察队改编为第三、第四、第五师。从此，蒙古军担任汉蒙两地区全部蒙疆的防卫任务，虽已构成代替日军之势，但其实力还很薄弱。此外，它还负有对外蒙和苏联准备作战的使命，但除监视国境、搜集情报之外，训练和构筑军事设施，都未能进行。

妨碍居民自卫能力加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蒙古军官兵出生于东蒙，存在乡土观念，汉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度有日本行政官吏介入其间等，因而使军、官、民之间的感情缺乏联系，这是需要指出的。

经济指导的紧急措施

华北经济指导方案 方面军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承担着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的任务，同时还要确保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和民生，因此，必须竭力作出贡献，使日本能以安心达成其战争目的。华北的经济指导方针是，“尽快确立军、官、

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这一方针，从以前通过肃正建设计划时起，一直努力执行到现在，今后仍无变化，但在要求的程度上，则更加强烈和迫切，必须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

此际，切忌急剧的变革，应将和平产业部门尽量让给中国方面，促使其积极活动，并设法促进军管理工厂的移交工作（1941年7月7日发表声明，对40个工厂解除军管，现正办理交接手续）。

紧急粮食对策 确立粮食对策是治安工作和安定民生的基础，是完成各项政策的根本。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华北粮食依靠管区以外供给已感困难，必须紧急确立日华军、官、民粮食自给的体制。

当时华北粮食需求情况，主食的自给率（生产对需要的百分比），可推断如下：

面粉为53%，杂粮为98%，军用大米为20%。

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方面军预先曾采取对策，与各有关机关作了相应的调整，兴亚院联络部在12月8日，制定了“紧急粮食对策”（包括确保、保有、配给、增产等各项措施）、“小麦征购促进对策纲要”、“主要粮食配给统制纲要”、“非常物价及物资对策纲要”等，并力图贯彻执行。此外，为了保有主要粮

食，调整供求及平衡价格，设立了财团法人华北食粮平衡仓库，于12月1日正式开业。由于各地谷物仓库设立迟误，为此，对特务机关长进行了督促。1942年1月15日，方面军召集了“政务关系军官集会”，除根据既定的粮食增产五年计划之外，又就执行“华北紧急粮食对策纲要”及“华北紧急增产实施要领”作了指示。其施策要点有三：

- 一、为了能以简易迅速地增产，立即打井20万眼，通过改良局部土地而改善水利。
- 二、促进粮食上市，并作好由敌匪地区取得粮食的工作。
- 三、加强以日华人为对象的重点配给，严格实行对消费的调整。

执行时，在军的强力指导下，以日华官民的精神总动员为基础，要求合作社系统、从事爱路工作的华北交通公司、担任技术指导的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负责水利建设的建设总署、作为收货机关的小麦协会、粮食平衡仓库、作为调查机关的华北交通公司资源局及满铁调查所等，加强联系，实行强有力的统制。要避免只根据局部要求而陷入封锁经济，必须考虑到全管辖区的整体。关于紧急打井计划的设想如下：

打井20万眼的增产计划，是根据产业五年计划对各种农作物增产计划、土地改良事业及水利事业等，紧急加强的措施，是紧急粮食对策纲要的主要项目。因此，应迅速动手，到4月底最少打四万眼，到6月底打八万眼，其余到明年3月底全部完成。华北政务委员会为支援打井工作，无偿供给烧砖用煤，并发放贷款。

方面军的上述施策，立即开始执行，到1月底接到各地关于打井准备调查、粮食仓库的建设以及紧急粮食增产委员会成立等的情况报告。兴亚院在2月5日召开了中国蒙疆粮食对策会议，采取了从满洲调进杂粮，从华中调进面粉的办法。

经济封锁 关于加强经济封锁问题，在指导战争方面也极重视。1941年12月3日，在中央命令和总长指示中，对此亦有所指示。方面军也对整个华北实行统制，并指导认真进行封锁。在上述1月15日召开的政务关系军官的集会上，方面军参谋副长也提出如下的强烈要求：

自正式开始经济封锁以来，仅四个月，成效可观。重庆政权和中共的经济状况，估计今后更将陷入困境，现在正是进一步施压力使之屈服的好时机。此外必须彻底切断外围的旧法币地区，否则随着旧法币的贬值，物价上涨的恶劣影响将有波及华北之虞。所以，方面军指示，必须更加严密地切断华北外围地带。

在华北内部地区，方面军指示的封锁地带有晋察冀、晋冀豫边区根据地，由于该地区物资贫乏，更应严加封锁。然而，委派各兵团封锁的地区，尤其对于物产丰富的敌区，希望尽量考虑新的办法。即应权衡剿共方针与获得粮食问题的轻重，除对应剿灭的主要敌人外，不要一律加以封锁，要运用我方政治力量及收购机关，主动有计划地收集物资。

各兵团与敌区之间应构筑严密的封锁线工事，以防止物资的外流，同时在武力支援下，设法收购敌区的物资，尽力推行封锁政策。

中共对此虽然采取了各种对策，但由于天灾、经济政策失败、日军的压力等等因素，解放区的经济状况非常穷困。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41年的新年献辞中提出了经济优先于军事的论调，即所谓“今后，对日战略，其比重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在当年3月的八中全会和6月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等，也都企图加强经济战。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海上通道被切断，于是效率不高的滇缅公路地位变得重要了。因此决定了扩充该公路、在确保从盟国运来物资的情况下转入攻势的方针，以图首先确保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

“同甘共苦”声明 汪兆铭主席得悉日本对美英宣战后，立即召开紧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了政府的态度，宣言“根据日满华的共同精神，为了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与友邦同甘苦”（所谓同甘共苦声明，有别于以前的共存共荣），从即日起与敌对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继于次日即11日，召集各政厅长官共同决定了一系列政策：（一）迅速确立治安；（二）扩大生产，节约消费；（三）扫除英美思想，发扬建国精神；（四）活跃民众运动；（五）推动全面和平；（六）增强军事力量等。14日又召开地方长官会议，传达了政府的方针。此外，新闻广播有关单位，从9日起，同时展开宣传东亚民族解放的大规模活动。汪主席也在18日通过南京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支援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但在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国是否直接参加大东亚战争却成了问题。

畑总司令官在日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载：

国民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是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共甘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战。后者在口头上说的动听，但其真意则是想由国民政府接收英美的权益。另外，想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其内心包藏着严重的功利思想。汪主席似乎就属于后者。

国民政府为了日华合作，尤其是密切两国经济关系，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最大问题是币制改革，驱逐旧法币，废止军票，逐步统一发行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旧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率为二比一，到1942年6月30日全部兑换完毕，在华中政府管辖地区，只流通储备券一种货币。从日华协力的立场出发，在1941年6月21日，青木一男、犬养健、福田赳夫、滩波理平、桥井贞等就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对金融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2月19日，重光葵被任命为新驻华大使，于1943年1月10日到任。）

内外各项政策 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华侨工作成了紧急问题。政府过去设有侨务委员会，在法属印度支那发行有华侨的报纸，并向南方各地派遣大批工作人员，努力争取华侨。战争爆发后，侨务运动随之迅速展开。12月23日，刷新了委员会的阵容，同时派遣政府要人分赴广东、汕头、香港各地，并在汕头设立了侨务特派员公署。其目的是要使华侨与英美断绝关系，停止支援重庆，将其精神和经济力量转向于建设新中国。

上海公共租界在日军的管理下，正在设法复兴，国民政府未参与此事。我军在接收该租界后，排除原参事会内的敌

对势力，于1月7日，由冈崎胜男就任参事会议长，由日、华、德、瑞士的代表分别就任参事会的副议长及其成员。

在此以前，汪主席于1941年11月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提出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号召。1942年1月1日，发表了运动的纲领。纲领中写道：“遵奉三民主义，完成中国革命，要对大东亚战争作出贡献。”这是新中国全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具体说来，就是想要清除旧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组织全民力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所以称之为改善生活、改造精神的革新运动。

这一运动，计划将宣传、组织、训练工作分为三期进行，包括政府机关、党、各种民众团体在内，开展广泛的活动。7月9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决定了实施大纲，开始进入了具体活动阶段。至于运动与东亚联盟的关系，在决议中写道：“新国民运动重点放在国内革新，东亚联盟的重点是对外团结一致，都是站在一个出发点，期望达到同一目的”。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移交华中

河南、安徽、江苏各省北部的占领地区，因是华北、华中的接壤地带，使之归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还是依旧作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势力范围，对此，当地日军犹豫不决。这是多年来在军事、行政、经济上的悬案。此次首先在日军方面，将这一地带从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分离开来，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然后再去解决行政方面的问题。

移交经过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但是，该政府与当初的期望

相反,不得不以比预料更小的区域作为其势力的基地,因此,扩大其政治及经济力量,成了基本课题。华北、蒙疆在中国事变爆发后不久即分别建立了新政权,其复兴建设的进展远远超过华中。南京政府虽为中央政府,但从当时的实力和政策方面考虑,决定承认蒙疆的高度自治,对于华北则根据其特殊性,使之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中间机关,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

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该会组织条例(1940年3月10日公布)第一条规定“在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辖区内处理防共、治安、经济及其它由中华民国政府委任的各项政务,并且监督辖区内的各省、市政府”,同时发出指示“临时政府时期管辖区域内实施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得因设立本委员会有所变更”。

在南京政府方面,并不喜欢根据华北的特殊性强调其自治,而是想要在将来将华北切实掌握在中央统辖之下,当前之计,首先在上述组织条例中,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管辖地区,从临时政府时期的版图中,划除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的江苏、安徽、河南各省北部地区。然而,实际上,有关接壤地带的所有工作,几乎不得不全部委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承办。在华北方面则采取“舍名就实”的态度,表面上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对缩小华北自治权和移交管辖地区却表示了强烈的抵抗。

在日本方面,本想以分治合作方针扶持各政权,从中尽力调停。但自中央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其威信和政治力量,

采取了分阶段逐步解决问题的态度。有关管辖区域问题，“华北、华中接壤地带”的“苏淮地区”（江苏省北部的徐海道地区，一市十七县和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地区四县），因接近南京，农产品、盐、矿产资源颇丰，既富有经济力量，又为铁路、运河等交通中枢，汪主席早就强烈要求移交该地区。

于是，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兴亚院联络部、中国方面以及当地关系方面等，从1941年初开始，几经协商后，于大东亚战争爆发时采取措施将该地区移交华中。

12月10日，中国派遣军下达总作命甲第三百二十七号附件：“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将军事、行政、经济等各项移交工作，分阶段各在不同时期进行，以避免引起混乱和动摇。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处理纲要

第一 方针

华北、华中接壤地带中，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河南省北部，在目前仍维持现状，徐海道及淮北地区，在1942年初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区域。

为此，应速作准备，一俟准备完了，逐步实行移交，移交细则另行规定。

在进行移交时，应采取妥善办法，避免招致人心不安和动摇。

移交时期另行规定。

第二 要领

一、军事 另行规定

二、政务

（一）徐海道及淮北地区，暂作为国民政府直辖下的特殊地

域，中国方面的政务由苏北行政专员公署（暂定名称）执行，苏北行政专员，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国民党的活动，由中国方面处理。

（二）徐州兵团长，对徐海道及淮北地区有关中国方面政务的幕后指导，应受总司令官的指挥，而通过特务机关长执行工作。

（三）苏北特务机关及海州特务机关，仍隶属于徐州兵团，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不受登集团（第十三军代号——译注）特务机关本部长的指挥。

（四）为使徐海道及淮北地区经济问题的处理顺利进行，总军司令部、华北军、当地军有关人员之间，应采取 措施 密切 联系。

徐海道及淮北地区的经济指导工作，由华北方面承担。

以上现场问题的处理，华北、华中方面均通过总军司令部，由特务机关长负责解决。

三、财政

（一）徐海道行政费，以往作为徐海道政务费列入国民政府的预算中，今后将其作为苏北行政专员公署行政补助费支出，为此，暂由华北的中央税项下拨付。

（二）淮北地区行政费，与徐海道行政费一并包括在苏北行政专员公署的行政补助费内。

四、治安

（一）绥靖军仍保持现状，隶属于军事委员会。

（二）警察队、自卫团等地方治安机关的组织系统，暂仍保持现状。

（三）治安费所需款项，作为经常费用列入行政专员公署财政预算中。

五、教育

（一）教育组织及其监督系统，继续维持现状。

（二）教科书，尽速采取措施，改用国民政府制定的课本。

六、社会设施、社会团体

按国民政府的政策处理，其与政策无碍者，不妨继续存在。

七、思想

新民会的省总会、道办事处、特殊地区办事处等，均予以撤销，但对其人员，应由推行中国方面政策的东亚联盟组织尽可能予以吸收。

八、交通、通信

(一) 铁路在正式处理以前，仍保持现状，使我军军事运输和对口供应物资运输得以顺利进行。

(二) 大运河、内河等航运，华北、华中方面的内河船舶，应一并加以利用，以便使物资流通顺利进行。

(三) 连云港的建设和经营，因与铁路方面有关，应根据“二”之(四)，以现状为基础，由华北交通公司执行之。

(四) 汽车运输事业，亦暂以现状为基础，作为华北交通公司的一项事业予以经营。

(五) 通信亦继续维持现状。

九、通货

在徐海道地区应暂准为“联银券”流通地带，继续保持现状，以缓和徐海道金融的急剧变化，并防止由于“联银券”的不稳定引起全华北的动摇。

淮北地区暂时保持现状。

十、物资

对于物资流通，不应掣肘，尤应考虑华北的需要（主要为农产品）。为确保其需要，应采取特殊的措施。

军事措施 在上述纲要下达的12月10日，中国派遣军根据“总作命甲第三百三十六号”，对部下的方面军及各军下达了基本任务，其中命令将原属第十二军作战地区的苏淮地区移交给第十三军。即：

华北方面军、第十三军之间的作战地区的境界规定为山东、河南两省与江苏、安徽两省间的境界。

当时担任这一地区防卫的是第十七师团。该师团原系第十三军属下的部队，从1941年2月以后，隶属华北方面军，从第二十一师团接替了该地区防卫任务。中国派遣军在发出上述命令的同时，又发出了总作命甲第三百二十七号指挥转移的命令，

一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将第十七师团（兵站汽车一中队及防疫给水部的一部在内）及在徐州的陆军病院划归第十三军司令官指挥；将驻徐州附近的宪兵队划归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指挥；此外，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归我直辖。

二 第十三军司令官在一定时期内，对徐海道地区的治安及警备，仍保持现状，特别应与华北方面军密切协力。

三 第十七师团长，有关政务工作应受我的直接指挥。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配属于第十七师团。

四 前项各部队的指挥转移时间，定为1942年1月1日0时。

第十三军根据上述命令，于12月25日发出了“登集作命甲第四百五十四号”命令，布置了各兵团的基本任务。按照这项命令，第十七师团，1942年1月1日0时恢复原建制，并将汽车第二十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徐州陆军病院、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徐州派出所、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配属于该师团以保证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但是，问题并未由此得到解决。徐州宪兵队虽在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但有关编制部署、教育

训练、人事等一切事项，依然由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掌管。

徐州陆军病院也是同样情况。虽划归第十三军指挥配属于第十七师团，由于隶属系统的关系，该病院的教育训练、人事等，仍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负责。

为了统一责任，根据中国派遣军4月6日的上报，于4月27日将华中派遣宪兵队及华中陆军病院予以改编，新设了徐州宪兵队及徐州病院，这样，问题始告解决。

行政措施 在行政方面，由于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政府力量不足，改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地区，乃于1942年以后，将准备完毕的部门逐步办理移交。1月24日，苏淮特别行政区筹备就绪，2月19日于徐州市设立了行政区公署。苏北及海州特务机关，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配属于第十七师团长，有关政务问题则不经过第十三军而直接受总司令官的指挥。但是，有关经济指导问题，仍由华北方面担任，实际情况并无变化。为了防止因急剧变动引起人心动摇，决定使财政、治安、教育、交通通信事业、通货等仍保持现状并使之继续发展。后来又逐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直到停战为止，在华中、华北一体化问题上仍是一个悬案。

三 思想战的指导

思想战指导纲要

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针对日益紧迫的形势，从11月初，一直进行着“对敌宣传攻势”及“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的宣

传”，于12月3日又制定了“あ号作战时的华北宣传计划”，在计划中的方针指出：

美英两国在东亚是日清华三国的共同敌人，这一点应使中国民众有深刻的认识，以便将民众心理集中在东亚民族解放这一问题上。强调消灭与美英勾结的重庆政权及中国共产党，乃是华北全体居民的责任，以此推动占领地区居民积极主动地与我方协力，并设法分裂和争取敌区内的民心。

本计划的重点为：（一）对中国的宣传以中国政、会、民各机关团体的活动为主；（二）对占领地区的宣传以安定民心为主要目标，并贯彻此次战争是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三）对非占领地区的宣传，应使其酿成反蒋反共的气氛，期使敌方抗战体制崩溃；（四）使在华日侨提高自觉，对战争作出贡献。

报道部还制定了“处理英美权益时的宣传报道计划”，计划着重提出“本措施系根据国际法规的合法行动”，“安定民心”，“利用此一时机提高反对美英的思想”等。

此外，方面军在实施军事、政务、经济等各项政策时，应抓住机会，强调：（一）阐明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二）提高向东亚民族解放迈进的觉悟；（三）重新认识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中华北的特殊性（以上各点后来经新民会采纳为针对时局运动的基本方针）。

12月8日，方面军司令官按照“华北政务指导纲要”中所计划的那样发表声明，阐述了在东亚解放战争中华北参战的实际意义，并对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全面协助我方施策的希望。该委员长也在当天发出了全面协助，特别是

在经济政策上团结一致协助日本的训令。该声明和训令，通过军和行政机关系统，向全体进行了贯彻。

方面军为了进一步全面推动大东亚战争时的思想战，12月8日，制定了以下的纲要，并于10日作了传达。

对美英战争的思想战指导纲要

第一 方针

一、此次对美英的战争，是新秩序对旧秩序的对抗斗争，阐明东亚解放圣战的意义，指出挑起战争的责任在于美英。强调日华满三国为了确立东亚共荣圈，应当互相协力，分担战争义务，直到最后胜利。因此，华北应自觉地作为日华满三国合作的模范地带，努力完成任务，以期安定和振奋民心，而使敌人动摇分裂。

二、在华日侨，尤应深刻体会“宣战大诏”，以冷静刚毅的态度，完成作为战争核心的天职。

三、为了完成思想战，应使中国各机关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关于开战的意义和目的，应照下面所述进行指导：

此次战争是对美英东亚政策的清算，美英等旧秩序国家长期以来，为维持其势力和妄想达到称霸东亚的野心，打着和平的幌子，助长东亚祸乱。这次战争是解放东亚的大好时机，是日华满三国为了民族自卫和建立东亚共荣而进行的圣战。应使之牢记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三国共同协力，必能突破任何困难而达到最后胜利，这是深信无疑的。

二、关于敌方的不义和弱点的宣传，应作如下的指导：

此次战争完全是美英方面阴谋挑起的，其渊源甚远，自过去数世纪以来，美英就对东亚进行侵略和榨取。敌人无论使用如何美妙的名义，其真正意图，从此次欧洲战争中依靠美英的国家的悲惨命运已可清楚看出。应以其极端利己的行为，与我方坚定不移的理想加以对比，着重进行宣传。

当前华北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及共军，它与美英的阴谋串通一气，助长华北的祸患，必须将此事实更加明确地揭露出来。蒋共合作的重庆残余政权，不过是在彼等利己势力勾结中存在而已。其结局必将走上欧洲依靠美英的国家的悲惨道路。对此应借开战的机会使之重新加以认识。

三、关于开战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应按下述要求进行指导：战争将引起物资不足，物价上涨，在生活上多少要造成困难。必须使民众认识，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内“自给自足经济”，这是难免要出现的暂时困难，应该甘心忍受。要强调节约和增产，并积极协助政府推行经济统制，决不可引起不安和动摇。

四、开战后华北的前进方向依然不变，对此应作如下指导：此次开战，对于以治安为主的华北施策，不应有任何变更，必须更加促进日华合作的发展。为了完成兵站基地的任务，更应强调现行的施策，使所有华北的人员各安其位，努力工作。

五、利用作战报道进行思想指导。

在对美英作战的过程中，适时利用作战情况的报道，使之相信我方必胜，同时严加取缔流言蜚语，努力防止由于敌方的虚假宣传使民心发生动摇。

华北民心的动向

日英美开战后的数日内，华北的民心、政治、经济的动向平静，几乎看不到动荡不安的现象。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对管内的一般动向，于12月17日，向兴亚院作了如下报告（要点）：

（一）开战第一天，受到相当冲击的华人，一般表现出忧虑的状态，但在第二天就恢复了平静。我军初战的战果和宣传指导，使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有何变化，现在尚难断定。但是，一贯

横行的英美蒋方面对日本的诽谤宣传却被压了下去。这可以断定，对华北民心给了相当好的影响。

(二) 民众的心理状态，因其立场和处境不同，似有各种表现。一般看来，估计对日本持积极态度或表赞同的约占20%；对日中合作表示不关心的约占40%；民族意识旺盛，反对日本的约占40%。知识分子有信赖日本的趋势，但学生和英美系知识分子的反日倾向却仍然很严重。一般民众则希求和平与生活安定，因为战局的一进一退，立即给他们带来影响。

(三) 对战争结局的看法，大部分人在其内心顽固地认为，“日军初战虽占优势，但在长期战中不能取胜”。并且认为：一旦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将处于最后的难局。这种潜在的对日观念，今后必须充分加以注意。

(四) 根据调查民众对时局关心的事项的结果，痛感政府当局有大力加强启蒙宣传工作的必要，同时觉察到在我方也有必要注意对民众的思想指导。

(五) 在金融物资方面，虽然多少受些影响，但因我方处理得当，目前无大动摇，大致尚属平静。部分民众有囤积现象，在小商店和粮食商人当中，有居奇拒售倾向。

兴亚蒙疆联络部，对蒙疆的一般动向，12月24日作了如下的报告（要点）：

(一) 汉族知识分子，对日本与英美作战的实力怀有不安的心情，但由于初战告捷，对日本的信赖有所加强，一般对日方的领导表现出协力的意向。但仍有部分人过于相信英美的力量。南方作战激化转调驻蒙日军时，有的担心共军、傅作义军及马占山军难免对蒙疆再次发动进攻。

(二) 居领导地位的蒙古人，从内心欢迎日本大获全胜。但在上层人物中，有的认为日军主力转向南方，治安形将恶化，而往他处避难；有的主张赶快运用实力实现蒙古独立；有的公然宣称战争最后将以英美胜利而告终。

(三) 一般民众不论汉人或蒙人对时局都不关心。但在农村，有的人因受共军的宣传和重庆广播的影响，过分信赖英美实力，不相信日本的战胜，对此动向应予警惕。

以上是开战初期的状况，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产生了种种想法。1942年1月12日，华北联络部次长盐泽少将，曾到大本营作了如下报告：

自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华北的关系非常容易处理了。新民会副会长殷同说：“从欧美势力中解放东亚这一问题已经明确了”。但另外有的对东亚战争的长期化担忧，有的担心日本势力将代替美英势力大举进入中国大陆。今后必须对处理在华的权益、军管工厂问题、租界问题及汪政权参战等问题，迅速确定方针。此外，殷同等人认为，将来汉民族与日本民族之间，对各自势力推进的方向，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参考：

关于电波战 在思想战方面，必须确立理性概念和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当时与宣传工作有关的“电波战”的情况，在“华北方面军情况报告”中，有如下记述（要点）：

过去，对天津英、法租界内与重庆、香港通讯的敌性电波，曾进行了侦查和干扰，并为破坏其宣传广播，努力开展了电波战，但因人员和设备不足，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接收租界以后，此一问题宣告解决。但重庆的秘密电台，仍潜伏于京津两地的各角落，而中共方面正在我占领地区内，到处积极进行活动。我军除尽力对其挖掘外，并在运城、开封设立了野战广播局，主要对西安进行谋略宣传广播。此外，在华北各主要地区，指导华北广播协会逐步设立广播电台，使之进行与治安肃正有关的广播。（军方为了支援华北广播协会，自1940年6月以来，制造了强力无线广播器和对重庆定向天线，以之封锁敌性通讯，并对中国内地进行广播。）

思想战的进展

中国政府各机关，不仅要说明大东亚战争的理性概念，而且要通过具体实践，加以彻底明确，主动地对各民众团体进行领导。华北防共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按照12月11日的决定，在各地召开了“华北反英美民众大会”。12月16日开幕的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王荫泰），宣布了总会的使命为：“华北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强化治安，即剿共。合作社的工作重点不仅是对敌进行经济封锁，而且应使处于敌我势力下的民众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便从中共方面分离并夺取民众”。会上还制定了各地合作社的活动方针。

有关学校教育，自从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以取缔抗日、容共、党化（蒋系国民党思想化）教育，铲除英美思想、重新教育教员、改编教科书、普及职业教育等为方针，努力促使各学校的复兴。特别是对于教员，以新民思想大力进行再教育，并在教学课程中逐渐推广了日语教育。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作为紧急措施，在日军管理下接收敌性的各种学校，其处理办法为：（一）小学校全部、中学校尽可能“改编为中国公立或只由华人经办的私立学校”，不能改编的予以关闭；（二）高等教育学校原则上予以关闭；（三）关闭学校的中国学生，转学到其它中国学校。根据以上方针，截至1942年3月，在关闭的135所小学校中恢复了84所，在关闭的49所中学校中恢复了35所。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齐鲁大学，历来敌对行为极为明显，不仅

实行抗日思想教育，并且是美国、重庆谍报活动的据点，对此均予关闭。

其次再讲基督教的情况。战争爆发以来，北京教区华人教徒，在“自主、自养、自传”的口号下积极展开活动，于1942年3月中旬，脱离了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美国教会管理人方面也予以响应，将教会的一切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方面。此种情形很快扩展到全华北，三十多个教派、二千多所教会、三十万信徒，组成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对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此种行动，方面军应以此次开战为转机，加紧实行强有力的思想攻势，以期具体贯彻思想战指导纲要。1942年1月15日，在政务军官集会时，方面军要求各兵团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积极进行指导：

一、对于思想上站在抗日阵营的华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强调指出，继续抗日是地道的英美走狗，是榨取东亚的帮凶，是对大东亚的全面背叛，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转向和平阵营。

二、对于亲日阵营内的中国人，要强调皇国的盛衰，亦即大东亚兴废的关键，使之理解日华不可分离的命运，特别要使之认识到华北是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担负着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

三、应当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对此应加注意。

除以上措施外，特别要调查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思想动态，针对敌方的思想攻势，采取提高防谍思想、取缔谣言等

防卫对策。现从方面军参谋部在3月初所写的“对日本人思想动态的观察”中摘录如下：

一、大东亚战争爆发，气氛稍现紧张，但一般公司职员、商人等日本人，尚未脱离住在大陆享有治外法权的唯我独尊心理。军人中有一部分仰仗战地特权、行为不检、破坏军纪风纪的分子。官员、公务人员中，有持雇佣观点和进行贪污活动的分子，以颓废萎靡情绪散布流毒的也大有人在。

二、泄漏军事机密，大都是由于缺乏防谍观念造成的过失。必须将“防谍即针对各国对我进行秘密战的防卫战”的观念，贯彻到一兵一卒，以至每一国民。

三、反军反战的言行，乃是忘掉了国家民族的立场，只顾个人利害及幸福。其思想根源出于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乌托邦的人道主义、绝对平等主义，必须牢固树立贯彻日本精神的指导思想，坚决改革不正风气。

四、战争长期化、缺乏物资、治安不良、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等，使日本人的信念受到压力，从而产生败战的意识，有的进行恶意的批评，有的制造流言蜚语。特别是在大陆居住的日本人，深深沾染了所谓殖民地的气氛，对此除有待个人修养之外，还应进行适当的指导。

五、必须排除当地各机关的对立争执，创造明朗的工作环境，使不满分子及敌人在我内部无活动之余地。

存在上述不利于实现国家目的的思想是自然的，此外，各民族具有特殊的民族精神，对此已倾注了相当力量进行处理。但是仍有一部分人的情况很不理想。其中也有为敌人利益奔走的。中共正是乘此空隙积极展开了思想攻势。例如，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2月17日，发表了如下的社论：

“在中国的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为了反对新侵略战争

展开斗争，决定在1942年春，于延安召开华北各地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以八路军及新四军里边的日本兵为主体组织的“反战同盟”、“觉醒联盟”，仅在华北就有十处。这些团体的日本兵，在俘虏生活期间，清算了过去的帝国主义思想，成为反战战士，成为与共同敌人作战的中国人民的战友，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在前线与中国士兵一道，从事对敌军的工作，有的在后方学习革命理论，为将来工作作好准备。这样的日本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成为日军一支革命力量，也是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援者，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将召开的大会，将提出以对日军的宣传作为中心的课题。

过去一年来，看到日军士兵的情绪和行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表现在俘虏的增加，从厌战情绪向反战情绪发展，军纪松弛，出现了援助八路军等崭新的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价这些事实，也不能以此很快就断定反战情绪已经充满日军中，或日军已经开始崩溃等等，现在还未能达到对全部日军发生影响的程度。日军由于士兵的素质低下，战斗力虽有些下降，但还不能认为是普遍现象。虽也出现了向八路军自动投降者和支援者，但这也属于个别的情况。现在可以断言的是，今天的日军已不是四年前那种样子了，他们已经容易接受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确实是事实。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初期胜利，他们的厌战、反战情绪，也可能被冲淡而模糊不清。但是战争变成长期消耗战，随着日军势力的削弱，这种情绪将加速发展而达到高潮，我们的反战宣传，一定能被日军士兵所接受。（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一译注）

注：冈村方面军司令官，看到很多被中共俘虏的日军士兵坦白了军情，也有的逃亡投敌或思想接近中共，殊为慨叹。更有甚者反为中共所利用（所谓以夷制夷），对此他叙述如下：

中共俘虏我方负伤或逃亡的士兵时，先将他们交给中共阵营内的日军士兵或日本通，让他们对俘虏进行人物鉴定，认为可以使用的就留下，没有使用价值的就释放。被释放回到我军的逃亡

士兵由日本军法会议以投敌罪予以严重处罚。被留在中共方面的，要接受教育训练，即所谓洗脑筋，然后使之从事对日宣传谋略工作，或参加第一线战斗。在对中共讨伐作战时，在中共遗弃的尸体中发现有日本兵的尸体，使我前线官兵极为愤慨，也有再次成为我军俘虏回来的。

四 中共及重庆政府的动向

中共的各项施策

大东亚战争以前的政策 由于苏联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在1941年前半年，中共对于日德与苏联的关系，采取不明朗的态度。但是到同年6月德苏开战以后，中共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对外强调结成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对内坚持国共合作，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8月底以后的日美谈判，估计日美有可能妥协，极力提倡加强中国本身抗战的力量，以阻止美国的对日妥协，期望日美谈判不能成功。对此可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所载消息中清楚地看出。中共甚至希望日中、德苏间的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广泛的国际战争以至世界战争。因此，在国内以调整国共问题为中心，与重庆政权反复进行折冲。此外，对各党派进行工作，强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从以上中共的态度可以看出其政策为：（一）通过国内团结、加强抗日战线，肃清重庆政权内部的对日妥协的空

气，使之对日继续抗战。（二）钉住日本大规模的兵力，阻止其北进，牵制日军对苏的军事行动以拯救苏联的危机。

（三）防止美国对日本妥协，促使其参加战争。

上述情况，主要是在中共宣传方面明显表现出来的迹象。但是，中共党政军在各地的实际行动，其重点则放在：

（一）始终为本党的势力进行工作，即整顿加强抗日根据地。（二）使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成为精锐部队。（三）贯彻政治工作及群众工作。

中共估计，临近12月，日美必将开战。11月26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汉、满、蒙、回、苗各民族及东南亚、印度、缅甸各地区代表共130余人，开始了国际统一战线具体的活动。

随后，在12月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会上通过了“我等誓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与全国青年共同协力，为消灭法西斯战斗到底”的宣言。

对大东亚战争的方针 战争刚开始，中共中央立即于12月9日，对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有关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同时发表了关于太平洋战争宣言，表明了态度和方针。其宣言的要点如下：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侵略美英及其他国家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美英及其它各国崛起反抗，是保卫独立、自由、民主的解放战争。日本此一侵略行为，与日本对中国、德意对欧洲及苏联所进行的侵略行为是同出一辙的。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明确地分为，进行侵略的法西斯阵营和进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营。法西斯阵营在开战初期可能取得一些胜利，在一

个时期内也可能继续这一残酷战争，但不久就要出现资源枯竭，其国内人心动摇，最后导致失败，所以反法西斯阵营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打倒日本法西斯，必须动员全部力量，完成以下各项任务：

一、中国和英美及其他抗日各友好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在太平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二、全国军队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应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和新四军排除一切困难，坚持在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力牵制敌人。

四、对日军和日本人民，对朝鲜、越南等民族，对中国被占领地区内的民众，要大力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阵营的宣传鼓动，促使他们在日本内部建立反法西斯阵营进行斗争。

五、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各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军费和弹药。

六、对亲日派和亲德派加以制裁，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全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在政治组织上，要能够分担抗日建国的责任。

八、南洋及其它各地华侨，应加强团结和联系，排除分裂活动，与各友好国家政府及其地方民众协力，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通过以上要点，可以了解中共的一般态度。现摘记有关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如下：

一、结成并发展全中国人民、华侨及南洋各民族的抗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的组成分子，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政府、党派、各阶层的人民以及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和日本各殖民地的人民。这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民众的

联盟，是上层的，也是下层的联盟。并使之实现中美英和其它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合作，同时改善当地民族的经济地位，组织民众，在所有日军占领地区内展开游击战。

二、通过与英美的合作以消灭日军，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前提，中国内部要团结，改革政治和军事，积极牵制和打击敌人，以准备反攻，是英美战胜日本的重要条件。

三、应当大力开展南洋及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对华侨的工作方针是使全体华侨团结起来，进行反日斗争宣传，支持祖国的抗战，参加并援助居住地政府的一切抗日活动，纠正华侨内一部分共产党员的极左倾向，使他们与居住地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

四、在华南、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的占领地区等处，应努力展开游击战，与各抗日友好国家及英美等军事行动同心协力，并要得到他们的援助，务使游击队的各项政策，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纠正他们中间存在的左倾倾向，使其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

综合上述各项方针政策，其重点可归纳为：（一）结成太平洋地区各民族的统一战线；（二）缔结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军事同盟；（三）在日军占领地区后方全面展开游击战；（四）大力开展华侨工作；（五）促进华侨及各民族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六）实现中国内部各党派的参政。

开战后的动静 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概如上述。1942年1月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元旦献辞”对战局的前途和新的任务，作了如下的论述：

1942年是在东西两战线展开空前激烈战斗的一年。日本、德

国继续进行更加残酷的战争，对被占领地区将更进一步加紧压迫和掠夺。然而反侵略战线方面的力量日益增强转入反攻，全世界的战争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法西斯阵营一定遭到惨败，民主国家将走向最后的胜利。

国际的新形势对我国抗战展开有利的局面，预示了中国的必胜。但这一胜利不是拱手旁观即可得到的，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即可得到的。胜利到来的快慢，取决于各民主国家的努力如何，以及我们的斗争进行的如何。

这一空前未有的反侵略战争，对我国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迅速准备反攻、加强内部团结、进行民主革命、加强敌人后方工作、发展民族经济。完成这些新任务的关键，是发扬严肃紧张积极进取的攻击精神。（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译注）

在中共的对外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日苏关系的态度。当重庆《大公报》要求苏联对日立即宣战时，《解放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社论说：

苏联，在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反侵略阵营，对日宣战只是时间和形式上的问题。现在苏联面对轴心国的中心德国，只有打败德国，才能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目前要求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是过分的要求，反侵略阵营在此期间，应当作好反攻准备，支援友好国家的战争。（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解放日报》核对。——译注）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避免刺激日苏之间的关系。

在对内问题上，调整国共关系是重要政策之一。德苏开战以后，中共对重庆政权的态度有了很大缓和。在同年10月前后，中共中央对军队以及各行政机关，发出了指示。（传

说中共鉴于德苏战争中莫斯科危急，召集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与国民党妥协的建议。)

大东亚战争开始以后，由于两党妥协，中央部门关系逐渐好转，但在地方基层的对立并未有所缓和，武力冲突依然激烈。中央的妥协也是出自政策的立场，每当遇到根本问题时，依然发生对立。

重庆政府的动向 重庆政府和党的首脑得到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报道之后，认为“日美的冲突，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终于提高了”。当天对日本发表了声明，并在9日正式对日德意宣战。又对美英苏以电报提出立即组织反轴心国共同军事会议的建议。

11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与美英合作，与苏联接近。为了加强与美英荷澳的联合，20日与各国大使进行了协议。23日宋子文就任外交部长，企图与美国的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并加强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权。

23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在重庆召开了美英重庆各国代表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派遣重庆部队对缅甸进行紧急防卫，美国在滇缅公路上堆积的、已经交付的援蒋物资转交给英国，以及长期援助重庆计划等问题。26日英国与重庆缔结了军事协定。美国和重庆之间在实质上发生了新的关系，这是中国大陆方面战争区域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最大原因。

12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以鼓舞士气，指令各战区开始全面的积极行动。从15日开始，以十天的时间，召开了国民党九中全会，讨论了对新局面的政策，在反

轴心联合的根本方针之下，通过了（一）设立战时参政会，（二）委任蒋介石全权行使国家总动员法，（三）制定国家土地管理法等决议事项。

第二章 1942年度前半期的 治安肃正工作

一、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

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工作

随着在南方各方面作战的胜利，作为下一步的施策，对重庆的作战方案和对苏、对澳、对印的方案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开战前夕的10月下旬，东条内阁在重新讨论国策时，就“与美、英、荷开战将对重庆有何影响”问题举行了联络会议，会上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对美、英、荷开战，将使蒋介石依靠 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译注）阵营的团结而进行长期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与美英等国的协作越发巩固，抗日战争将坚持到底。日华全面和平势将推迟到全部战争终结才有可能。

二、出于丧失上海、香港等援蒋据点，帝国南进活动进一步开展而切断了滇缅公路运输线，日本保持了在南方作战的成果。南洋华侨的援蒋中断，致使蒋在财政经济上受到压力，从而削弱其抗战力量。与此同时，一般民众，甚至重庆政权的主流派，继续抗战的斗志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在那些灰色的将领中，有更多的人投靠南京方面。于是引起重庆统一战线的分裂，蒋政权势必

越来越衰弱。

这种判断，是在不直接对重庆政府加强更有力的政治、策略等各种施策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在11月15日的“关于促进结束美英荷蒋战争的腹案”中，虽然认为迫使重庆政府屈服投降，除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的间接成果外，还必须直接加强对重庆政权的作战，但是，当时确已无此余力，故未作具体作战计划。所以重庆政权在日本对美英等开战后的动向，就成了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十分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作战初期顺利进展时更是如此。从12月15日前后开始，参谋本部认真研究了重庆工作。正如预料的那样，重庆方面没有对日全面和平的动向。因此决定暂不进行和平工作，静观事态的发展。首先制定了一个建立谍报路线的方案。这个方案经联络会议研究讨论，于24日决定了“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其要点如下：

大本营陆军部主管部门应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努力侦察重庆方面的动向，此时概不涉及投降条件等事项。随着形势的演变，适时地从谍报工作转入迫降工作，但其时机和方法另行规定。进行此项工作时，应利用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译注）。

根据这一决定，当天即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关于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的指示

一、日本帝国根据附件第二“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工作的有关事项”，利用形势的演变，特别是作战的成果，掌握有利

时机，为了策划迫使重庆政府投降，首先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

此工作委任大本营陆军部执行，各有关机关予以协助。

二、大本营陆军部统一领导第一项工作的大纲，主要委任中国派遣军来执行。

三、中国派遣军必须遵照下列各项进行工作。首先以上海租界、香港等地为基地，调查并利用新争取过来的中国要人或其他外国人以建立对重庆的谍报路线。

1. 对我方意图须严格保密，特别是对可利用的中国、外国要人进行调查时，务须周密谨慎。

2. 应采取统一措施进行工作，避免把工作交给直属军以下的人分担。

3. 如果必须委托大本营陆军部以外的与帝国有关系的机关（包括以这种机关为背景的个人在内）协助时，事前应取得中央的谅解，务希谨慎从事。

4. 不许通过轴心国和中立国的外交官来进行对重庆工作。

5. 于1月底前确定关于建立谍报路线的具体计划，为此，必须事先取得中央的承认。

6. 不得暴露我方的意图，应特别周密注意。

附件二、（笔者略）

注1：传达本指示时，大本营曾作如下的说明：“开战后，在外务省、兴亚院、海军、民间等中间，有种种对重庆工作动态，所以大本营陆军部针对这种情形急速予以统一领导。”

注2：自1940年以来，虽然禁止现地驻军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但并非完全不要谍报路线，如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据说就接受过建立工作路线的特别命令。

注3：作为上述指示的具体措施，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对居住在香港、而且与重庆保持着联系的要人，如胡文虎（星岛日报社社长）、郑晓棠（富中行总经理）、陈济棠（重庆政府的政府委员）、杜月笙（原上海财界要人）系统，以及许崇智（陆军上将）、颜惠

庆（原驻苏大使）、宋美龄和宋霭龄的朋友李星衢（财界要人）、林康侯（万国红十字会分会长）等名流，请他们出来工作，并计划由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控制使用他们。

工作的具体化并不容易，直到预定的1月底，工作计划未见进展。3月12日左右，参谋本部主管人到南京与中国派遣军有关人员协商后，制成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根本上有些地方与对重庆的判断不相符合。

中央方面在2月初，对今后的战争领导方案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在3月7日的联络会议上通过了“世界形势的判断”、“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其它决定。其中对于“重庆政权的动向”作了如下叙述：

一、重庆政权的抗战力量虽然日趋低落，而且其财政经济状况已陷于困境，但仍依靠党和军队的威力，坚持强韧的抗战意志，并期待着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致放弃抗战。而且最近日益加强了同苏联的合作，并设法同印度民族接近，与此同时，并致力于抗日统一战线。

二、如果美英援蒋的滇缅公路切断，轴心国战果的扩大，以及其它对美英苏的依赖出现不可靠的情况，再加上见到日本实力逐渐增强，则其抗战体制最后必将崩溃。

在这里所讲的与开战前的判断略有差异，即无需等到全部战争结束，重庆抗战体制有可能招致崩溃。但是，在“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关于对重庆的方案仍然只是决定要竭力设法建立一条谍报路线。

畑总司令官对此做出判断：“除以武力使重庆屈服外，别无解决办法”。他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东亚战

争以如此战果胜利进展，而重庆方面却一直没有倾向和平的迹象，反而更加强硬起来，中央对此稍感焦虑。因此，大本营内部甚至有人指责派遣军过于谨慎。”

3月27日，中国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建立对重庆的路线，6月底以前暂且只限于利用在香港、上海、西南三个地区掌握的中国人的谍报路线”，而且在指令中还附记有“在中央统制之下，除派遣军总部外，可不参加此项工作。”

但是建立对重庆谍报路线工作，不一定是容易完成的。重庆不能轻易动摇，从而在香港、上海所掌握的中国人也不好行动。根据他们的说法，“在唤起舆论向蒋呼吁，并取得明显成果以前，要听任他们去做。希望对他们的职务、住地都不要加以限制。”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此外，3月31日，大本营还做了有关“对华宣传谋略”的指示如下：

日本帝国大致在平定缅甸北部之际，积极地大规模地开展厌战及反对英美的思想运动。特别要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

一、统一国内电台，对重庆进行广播宣传攻势。

二、通过特定掌握的重要人物，对重庆进行广播讲话或让他们发表声明。

三、选拔投诚的士兵、掌握的人物及第三人等，对他们进行教育后，使之潜入现地进行宣传，特别加强厌战、反英美思想运动。

四、在中国各地，发动适合当地情况的民众运动。

五、利用本年夏秋季节，在配合欧洲战局所采取的政治、战略措施的同时，实行宣传谋略攻势。

在此时期，应对严加挑选的特定将领进行争取工作，开展利用国共关系的工作，以及与作战有直接关系的谋略等活动。

当时中国方面于30日，即国民政府迁都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更加积极地展开了思想攻势、归顺工作以及民众运动等等。

其后，因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本营如后所述，对重庆采取武力解决方案的比重益形加大。因此，于7月11日大本营参谋次长就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建立工作，给派遣军总参谋长发出指示。下达指示时附有说明：“从轻松的意义看来，所以作为次长的指示发出；中央也不着急，而要谨慎从事；这不是和平工作。”指示内容如下：

- 一、希望建立对重庆中枢部门的谍报路线，侦察其政治动向。
- 二、应将以香港为据点的对重庆谍报路线加以整顿收缩。
- 三、对与本工作有直接关系所掌握的重要人物，应限制在最小限度。
- 四、担当直接工作的人物，应严加保密，避免与外界接触。
- 五、占领区的日华官民对重庆中枢部门的谍报工作，仍需予以监视。
- 六、利用国民政府职员直接进行本工作，要给对方以和平工作的印象，因我方意图有被察觉之虞，应极力加以防止。

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大本营鉴于南方作战初期的顺利进展，早在2月前后就作出了形势判断：“为了完成长期战争，一反过去预定采取

的守势战略，现在已是转而采取攻势战略的时机。”因此，对于战前所预定的攻取地区以外的，即对外围要地积极进行局部作战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全部兵力的运用，以及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未做具体研究。在1942年3月7日召开的联络会议制定的“关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中的对重庆方案，也只是根据1941年12月24日通过的“根据形势演变对重庆迫降的工作有关事项”制定的。具体说来，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对重庆谍报路线的建立。在这次会议上，政府方面提出了“如果在军事上没有解决的办法，就放宽和平条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解决”的方案，但因当时的形势不适宜，终于被否决了。另外，在参谋本部内部，根据既定计划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将长期驻华的三个师团调回日本，而重新编制六个驻华警备师团，现正进行准备工作，其军备设想也颇消极。

另一方面，中国派遣军始终对中国事变的解决表示强烈的关心和责任感。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对中国方面的积极作战也做了种种研究。中央也曾预先暗示，“开战后，如果形势许可，则增加在中国方面所需的兵力，以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但由于增加兵力的时机不明确，尽管感到有向四川发动进攻作战的必要，却未能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派遣军各部队从1月末以来经过调整后，制定了一个方案，并于1942年12月20日向中央提出了申请。这个方案的设想是：“预定在今年夏秋季节，华北方面军对西安进行作战，第十一军对长沙、常德进行作战，两方面的作战均应击败面前的敌军，特别要寻找中央军予以击破，同时要占领各

主要地区，藉以加强对重庆的压力。”大本营对此避免正面的回答，一直拖到3月29日，才召开幕僚联络会议，决定了“1942年度在中国方面维持现状”。派遣军领会中央的意图尚未确定，乃继续进行研究。

华北方面军参谋岛贯武治大佐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的叙述：

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剿共作战，以期迅速恢复治安，但如能增加作战所需兵力而形成有利局面，认为可以设法歼灭西安方面胡宗南指挥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的部队。然而当时第八战区的部队在与我军对阵的同时，与延安的共军也处于对峙状态。如仅将西安攻下，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共军有利，因而考虑在下一步就消灭延安。

这件事已被列入方面军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之中，而且于1942年2月初向中国派遣军作了报告。但是，中国派遣军比起西安作战来，更为重视长沙、常德作战，至于消灭延安更是不在话下了。

注：方面军把西安作战称做“五号作战”，到5月间又改称为“五十号作战”。

参谋本部自3月7日召开联络会议以后，开始研究南方作战第二阶段的设想。与此相关，在中国战场如不更加积极地使用武力，就无法使重庆早日投降的想法，开始抬头。特别是军部上层早就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因此更增强了这样的气氛。

3月19日杉山参谋总长上奏“关于今后的作战指导”条陈时，在其研究中的中国事变处理方案的腹案中，有关于动用武力的积极措施。其要点如下：

在整个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希望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断然设法尽快解决。

考虑到切断滇缅公路后，要使全中国普遍受到影响，最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选定这一期间开展积极的行动，是对我方有利的。

作战要领，从其它方面调遣几个兵团与驻华兵团一起，共同进行大规模作战。

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战略要点，使重庆政权受到直接威胁，或策划分裂瓦解其各部队，使重庆政权更加丧失控制力量。

进行上述作战时，应密切结合政治谋略，特别是要加强经济的压迫。

由此看来，该腹案只不过是极不明确的作战设想而已。但是，3月下旬大本营在讨论今后作战指导方案时，关于对华处理问题，攻占重庆论已成为争论的核心。

3月27日，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起草了“对重庆作战指导纲要（草案）”。4月以后，在参谋本部内外进行了审议。在4月1日的“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中记载着“自中国事变发生后，这是前所未有的处理事变的绝好机会，如失此良机，就只能在英美蒋结成一体的体制下进行处理。因此，设法使之脱离这种体制乃是成败的关键，这是不容犹豫的。”

4月6日，杉山参谋总长视察南方的归途中，在上海与畑司令官悬谈，传达了上述关于对中国事变处理方案的内情。4月16日在召开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时，第一部长向后宫总参谋长汇报说：“对华处理问题，始终要积极迫使蒋

政权屈服，现在正研究讨论包括完成大规模作战在内的具体方案。”自此以后，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开始加紧了迫使重庆屈服方案的研究工作。此外，4月16日前后，在中央统帅部的“对华形势的判断”中，有如下的记述：（摘要）

“重庆政权长期抗战的结果，对反抗轴心国有利。现在企图在对内方面迅速加强其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对外方面则促使英美加强对东亚的关心，并策划拉拢苏联。在军事方面尽管由于我方历次作战使其战斗力逐渐削弱，但蒋介石的统治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专心致力于整训军队，以便作好下一阶段总反攻的准备。与此同时，极力设法坚守缅甸北部、确保中印联络路线，并在福建及其它各地秘密建立了航空基地，企图破坏日本本土和在中国海上的海路交通。这都是我们所能看到而且应当注意的。在经济方面，由于南方作战的结果使之丧失了上海、香港以及其它沿岸地方的公路及滇缅公路。今后应进一步施加压力，杜绝中国同英美的联络。这一切仍然可以看做敌人方面的最大弱点。然而如果从四川北部大后方具备自给自足的各种要素来看，从中国事变带有民族战争的色彩来看，以及从敌人方面还坚持轴心国必败的信念各点来看，还不能指望蒋政权的早日屈服。至于缅甸作战的成果会给敌方抗战力量带来多大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估计其结果需要到今年夏季以后才能具体表现出来。

当时华北方面军不知道中央军部这些动向，单纯地从维持华北治安和对敌施加压力的观点出发，企图到南方作战结束后，大约在6月或9月间就可以向西安发动进攻，击溃第八战区胡宗南部队，然后消灭中共的最大根据地延安。在4月中旬及5月中旬向参谋本部提出实行本作战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派遣军参谋部也因为得知上级的意图迟了一些，直到4月中旬为止，为了打击重庆，他们还曾判断，与

其采取政治策略手段使重庆脱离英美，不如通过作战手段击溃长沙和常德的第六和第九战区的部队，夺取谷仓地带比较有利。但是没有考虑到一举完成攻占重庆的作战。

注：关于对中共问题

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部，对于华北方面军主张采取西安作战的方案，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这一问题姑且做为研究考查的对象。

加强国民政府的措施

财政等的支援 南方作战获得辉煌战果，使重庆方面受到威胁，同时也给占领地区的治安带来了良好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日本方面为了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译注）的政治力量，而采取了各种措施。

3月，把天津和广东的英租界移交给国民政府管理。在

通货政策方面，3月31日停止了储备券和旧法币的等价兑换，5月末采取了整顿措施，以新币与旧法币为1:2的兑换率回收了旧法币。这对于促进统一币制、打击旧法币，以及加强中央储备银行对华中金融的统制能力和调剂军费的能力等方面都给予了支援。

另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清乡工作的支援，也以加强国民政府为其主要目的。

但是，中国方面缺乏政治、财经方面的人才，廉洁的官吏很少，因而不是靠外部的援助所能加强的，一定要从内部加以整顿。

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晴气庆胤大佐，对国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国民政府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即丧失了过去和平运动的热情，一味追求理想而缺乏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对战时情况下的政策和施政的关心渐趋淡薄，而且也没有统治能力和经济方面的基础。参加政权的人们热衷于获取权利，政府成了贪官污吏的巢穴。由于这是出于日本政府的计划，因而日本在国际信誉上也应负一半责任。但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进行整饬，否则是无法加强其政治力量的。

清乡工作 清乡工作具有与“华北治安肃正要领”不同的特点。现在简述如下：

1941年7月以后，选定长江下游苏州以北的江南地区，为了将该地区建成模范和平地区，开始了清乡工作。清乡就是要扩大江南工作的成果，要在国民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所有省市普遍实行这一工作，以便建立地方治安，复兴和繁荣民生，从而达到加强

国民政府政治力量的目的。

这就是说，清乡工作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划定一定地区为清乡地区，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以日本军队和中国方面警备武装力量，在指定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与此同时，发动中国方面的军、政、党、民各方面的全部力量投入清乡工作，设法恢复治安，振兴政治经济。日本方面在结束军事行动后，即无需参与一切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由中国人自行建设自治、自卫和自力更生的和平地区。这样一来，日军的负担即可减轻，而且随着清乡工作各种措施的进展，清乡工作地区逐渐扩大而遍及全国，最后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这一设想是从局部和平过渡到全面和平的解决中国事变方案的实践，具有根据新条约的规定使日华合作具体化的意义。

自1941年初以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从3月份开始了具体准备工作。汪兆铭亲自就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由警政部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日本方面第十三军及军事顾问部参加了委员会工作。首先在南京至上海间长江南岸及苏州以北划定一小块地区，从7月份开始了第一期清乡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在无锡北部地区，相继开展了第二期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42年清乡工作进一步扩大开展，在江南地区，由乡镇到城市，包括主要交通路线在内的模范地区逐渐建设起来。同年夏季，因第十三军主力部队调去参加浙赣作战，清乡工作暂时停顿。同年秋季，重新开展了扬子江北岸地区、上海周围、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工作。1943年，在安徽省浙江省境内也进行了清乡准备工作，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得到显著扩大。然而，在这期间，清乡工作与国民政府的一般行政发生了矛盾，而且矛盾逐渐激化，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程度。在人事上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到同年6月，清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

二、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施策

从日本方面来看华北治安战的全部经过，自中国事变爆发到1938年，是武力戡乱作战时期，治安肃正建设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9——1940年，第二阶段1941——1942年，第三阶段1942年以后到战争结束。

第二阶段是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如能顺利进展下去，收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特别是1942年，过去的各种施策逐渐显示出效果。同时，断然实行了各种新的措施，密切协调了肃正和建设两方面的工作，而且结合大东亚战争初期整个战局的顺利开展，使得华北方面的治安情况迅速好转，局面也随之扩大。

另一方面，中共受到外部压力，加以其内部在政策上的矛盾日益严重，致使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八路军的势力等等都缩小了，这是中共最穷困的时期。这在中共方面的记录中也有如下的记载：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发展的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进行反英美战争，在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以攻击国民党（重庆）为辅，以攻击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以及残酷的“三光政策”，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使我党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期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我党根据地缩小了，解放区人口已由一亿降低为五千万，八路军也由四十万人左右减少到三十万人，干部也损失了很多，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状况。但是，我党在华北敌后解放区的干部以发了霉的黑豆和高粱来充饥，士气昂扬地坚持了战斗。另一

方面，共产党中央在1942年的“七·七宣言”中也曾指出，这一年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同时还号召敌后的军民坚持度过最后危机，并号召共产党员做在敌后地区坚持斗争的模范。于是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为其后党发展的第三阶段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原文核对。——译注）

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但是，本章和下一章则主要讲述治安肃正建设的最兴盛时期的状况。

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

1942年度，华北方面军考虑要以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改编成两个以治安警备为主要任务的师团；根据情况，为了调动兵团对管辖区以外进行攻击作战的需要，在运用兵力上应保持灵活性；考虑到有必要恢复管辖区内的治安、开发重要资源、促使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飞跃进展等等情况，策划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方面军的直辖区缩小到只限于河北省，而且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兵力，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

2月25日、26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了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下述年度计划大纲：

第一 方针

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

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努力完成日军总兵站的使命。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第二 要领

一、根据“方面军治安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设想，主要是将确保治安地区的任务，逐渐移交给中国方面的军、政机关。日军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向外推进其势力范围，并设法将非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而从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面积。

在本年度内，务期将河北省大部、山东和山西各省以及蒙疆的主要地域都变成治安区。

二、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华北方面军计划进行的肃正作战如下：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

上述两项作战，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直属兵团进行。为此，由第一军抽调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统归方面军直接指挥。

晋冀豫边区作战主要由第一军进行。

冀南作战主要由第十二军进行。

同年9至11月期间，进行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以期将对敌封锁线向西推进。

除上述各项作战外，根据情况进行西安作战（即五号作战——攻占西安、延安和洛阳）。

三、以治安第一为原则，军事方面的肃正讨伐，应与建设方面的行政、经济、文教等措施以及治安强化运动、新民会、合作社等民众工作密切配合，使军、政、民成为一体，而把各种行动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活动。

四、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鉴于华北应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

的基地，应采取紧急措施，特别重视确保治安、提高人民生活、加强地方自救、解决粮食问题、稳定金融经济。

五、促使中国方面的军队、官吏、民众自觉地认识到对肃正建设的责任，同时要启发诱导他们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活动。

另外，3月23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接见驻京记者团，就肃正建设的业绩和1942年度主要措施作了说明。在他的说明中，对政治经济等建设方面的问题所谈如下：

去年是困难的一年，就象大水灾过后的救灾工作一样。希望本年度将是把各项工作加以组织系统化，使华北全区空前发展的一年。为此应统一进行五个建设项目。

- 一、要求中国官民独立自主地积极进行活动。
- 二、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行政力量。
- 三、努力开发和振兴重要国防资源。
- 四、保证粮食自给自足，彻底实行对敌经济封锁。
- 五、力求扩大和巩固联银券流通范围。

华北方面军在新年度中采取的措施，特别注重于治安肃正工作，在进一步加强对敌压迫的同时，推进五个建设项目的措施。倾注日华双方的全部力量开始一面战斗一面建设的大进军。我认为这样治安当可稳如盘石，华北才能真正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

4月27、28两日，华北方面军召集所属兵团长开会，贯彻年度肃正建设计划的精神。但是，27日中国派遣军突然下达密令，命派遣兵力参加华中的大规模作战（浙赣作战），于是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

各兵团的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第一军的计划大纲 方面军的各兵团根据前项方面军的计划，结合各自负责地区的特点，分别制定了自已的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第一军适应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调出，以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改编，自3月初制定了本计划，于3月21、22两日在与年度计划有关的参谋长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并且作了必要的指示。计划的内容不详，为参考起见，从军司令部情况报告中，将1942年第一期计划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一、我军以消灭敌对势力作为山西省肃正建设计划的主要目标，将军、政、会、民等机关的措施密切配合加以推动，力求迅速而扎实地进行建设。

为了消灭敌对势力，我军的方针是：对中央军除连续进行讨伐外，并要寻找机会集中兵力进行机动灵活的歼灭战；对共军则是彻底地不间断地进行肃正讨伐。

对于在晋冀豫边区建成华北共军主要根据地的第十八集团军和第一二九师，以及在太行山南部地区活动的中央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和第二十七军，自5月中旬到7月下旬连续进行作战，将共军根据地设施的大半予以摧毁，并粉碎中央军。

二、在各种建设措施方面，根据日华基本条约的精神，协助盟邦中华民国促进治安行政的开展，特别是中国的内政，使其独立自主，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日华一体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做出贡献，努力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坚持低物价政策，设法保证驻军的现地自给自足，减轻国库负担，逐渐取得成果。另外，对于一般人民生活，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直接受到灾害的民

众的救济工作，要予以特别关注。制定粮食紧急措施，力求满足需要，以安定民心，使愿为大东亚战争尽力的新中国显著地活动起来，而更加推动日华提携的积极性。

三、对山西军加强历来的谋略工作（中略）。安平村谈判破裂后，经中央批准，向阎锡山发出通告，决定废除5月17日已签署的协定。同时，为了改变阎锡山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促其反省，歼灭一部分山西军，或迫使他们投降，并加强经济封锁。

第三十六师团的计划 第一军直属部队第三十六师团于4月15日制定了“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第一，方针；第二，纲要；第三，关于肃正讨伐事项；第四，关于情报事项；第五，关于建设各种措施（有关政治、经济、交通、通讯等事项）；第六，关于宣传启蒙教育事项（思想战）。从各种措施中可以看出这是经过一番创造性的考虑而使之系统化的。其方针部分中有这样一段：

“本师团以消灭共军第一二九师及中央军第二十七军，扩大治安区为方针。为此，本着治安第一的基本精神，在继续加强过去各项措施的同时，使一切措施都从属于加强治安扩大治安区范围的目的，特别要促使中国方面各机关独立自主地参加这项工作，共同协作，分工负责，积极完成任务。肃正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类，按照一定的方针，分三期加强扶植，以推进和扩大治安地区范围。”

这个计划适应山西省东部的特点，特别认真地贯彻了第一军的意图。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设想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

太郎少将于8月24日曾向第一一〇师团长送交一份情况报告。从这份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该兵团对肃正建设计划的想法。独立混成第八兵团当时配属于第一一〇师团，长期以来担任石门地区的保卫任务，而于4月上旬调到顺德（今邢台——译注）地区驻防，接替了前任部队的任务。其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敌情

在管区内及其周围地方的敌军，是冀南军区新编第四、第七、第九旅和太行军区新编第五、第十、第十一旅等各部队的部分兵力，总共约有2,250人左右。本兵团接防后，不断进行肃正讨伐，敌军的战斗力显著下降，其动态也极消极。

平原地区属于冀南军区，在威县（顺德以东约60公里）南部邻接县境附近，有新编第四旅及冀南第四分区约500人游动。在管区以外的南宫（顺德以东80公里）、冀县（南宫以北约30公里）以及枣强（冀县东南约30公里）三县附近地区，有新编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其中一部分兵力有时侵入南宫县内。

在山岳地区，则有太行军区所属各旅和伪县政府系统的匪军，分散于各地。对我封锁线工作虽多有妨碍，但无联合行动。由于我军实行了彻底的封锁，敌物资缺乏，似陷困境。随着我军威令深入，管区内敌军的武装战斗已完全被我封住。因而管内之敌，有对县警备队等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采取谋略活动，及对亲日派采取暗杀等恐怖政策的趋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虽尚在某些地方蔓延，但随着侦察谍报工作的开展，逐渐实行检举。另外在我军威令深入的威县北部地区，共产党几无法进行工作，因此，7月中旬出现了大批归顺投降者。

二、肃正建设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为了使治安肃正建设得以空前

飞跃进展，本旅团于4月奉调来当地驻防后，始终遵照师团本年度计划的指示，自认为是按规定进度执行了任务。目前在管内封锁线地区内，基本上已无敌匪团残留，但有时发现敌人自管区外潜人的行动，因此随时对周围地区之敌进行讨伐。

从已确保治安的地方开始，逐渐把警备任务移交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皇军则将能集结的剩余兵力，利用原有设施，机动灵活继续进行肃正建设。为此，大致作了如下的指示：

1. 到8月底以前，将京汉路以东钜鹿（顺德县东北约50公里）、广宗（顺德县以东约55公里）以西一带地方建成治安区，兵力部署重点放在东部、南部和北部县境附近，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2. 到11月底以前，预定将京汉线以西直到原山地封锁线的一带地区建成治安区，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西部山地封锁线的南部和北部县境附近，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3. 到11月底以前，对威县、南宫、清河（顺德以东190公里）等县的敌人进行彻底扫荡，不允许敌人盘据在那里进行游击，内部警备基本上移交中国方面负责。

4. 到8月底以前，铁道警备除重要地段外，大部分地区移交中国方面负责。山地方面，在今年度内从必要的地方开始，逐渐将封锁线向外扩大，一面清除敌人的骚扰继续修筑工事，一面配合讨伐扩大我军威力范围。

三、治安军第一〇二集团与皇军共同处于分散部署状态。司令高德林及其所属军官，目前尚未发现有何不稳动向，可以认为是相当热诚地与我协力。这支治安军部队，从其经历来看，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而且还大有提高的余地。另外，这支部队的上层干部关心训练，工作积极，但在分散配置的情况下，也难望做得彻底，应经常考虑对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扶植。

中国方面各机关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除部分机关外，一般成绩良好。

各县警备队和警察等武装团体是皇军的一支辅助力量，在加

强治安方面虽取得相当成就，但其素质训练和装备尚有待大力改善。

乡村武装、保甲制度尤其是乡村自卫团的编制训练以及主要乡村的防御设施均已完成。在治安区内，已有不少地方在单独击退少数敌匪、迅速传递情报等方面不断取得良好成绩。

大乡制度正在顺利地推进中。

新民会逐渐积极开展活动，但尚须更加努力。尤其是在管区内日本职员缺少的情况下，应特别重视利用优秀的中国人，与有关机关取得联系，并给以指导。

四、教育训练

以精神修养为根本，尤应整伤军队纪律，在肃正讨伐的实践中进行教导。同时，对治安军也努力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以期锻炼成精锐强悍的军队。特别要千方百计提高军官的职能。通过各队队长及其下级的努力，在教育及检阅等方面大致可达到预期的要求。（下略）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方面军关于治安区的扩张及确立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精神的设想，正在各兵团的肃正建设中具体地表现出来。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尊重中国方面领导人的立场，努力扩大了他们所分担的责任。作为一例，摘录该旅团长1942年6月16日在顺德召开的县知事会议上的谈话如下：

一、治安的责任

管区内的治安，虽然是我的责任，但是诸位也必须担负本管区内的治安责任。特别是在兵团把已经确保治安的地区防务逐渐移交中国方面负责，而准备把剩余兵力调赴前线以期扩大治安区的情况下，诸位更应负起责任。

各位县知事都是治安负责人，要大力构筑惠民壕（即防护沟

——译注) 以及其它必要的防御设施, 并努力加强所属武装团体(县警察队、特务队以及保甲自卫团等)的训练, 以期奠定独立担当各自管区治安的基础。当然武器的充足是重要条件, 但其根本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人心, 就是说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周密的训练。

二、剔抉地下工作

最近敌人的地下工作更加巧妙多变, 其工作重点集中于对我阵营进行中伤、离间, 以及策动武装团体的叛乱等活动, 必须加强戒备。

然而, 要识破敌人的谋略或地下工作, 同属一个民族的诸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诸位绝不可安于现状, 必须督厉部下, 千方百计揭露摧毁此等敌人的工作, 并进而打入敌方阵营开展工作, 使之崩溃。当前临近青纱帐起之际, 敌人的行动将日趋活跃, 要防止火烧眉毛的紧急情况发生, 鉴于过去的教训, 希望各位努力。

三、关于加强经济封锁问题

经济封锁措施是方面军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但就管界内的现状来看, 在封锁的措施和机构方面, 有不少地方尚待改进和提高。

兵团要使当地部队专心致志努力加强封锁, 并逐渐提高封锁效果, 但在执行这一工作中, 中国方面各位官民所负责的部门关系极为重大。

鉴于实行经济封锁的重要性, 各位必须与当地部队长保持密切联系, 希迅速采取对策, 以保证绝对安全, 不给敌人以丝毫可乘之机。

三、华北方面军的警备阵营

新师团的编制和战斗序列的变更

在陆军中央关于1942年1月末兵备的设想中, 指出要根

据“1942年度时局兵备纲要方案”（后改称“军容刷新计划”），随着南方作战的进展，有计划地在南方、中国、朝鲜以及满洲新设置警备师团，逐步整顿野战师团，并设法实现对苏战备的现代化计划。按此计划，中国派遣军要以六个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改编成六个师团。只要情况无变化，大致在7月前后，调三个长期驻华师团和其它特种部队回日本，一个驻南方师团来中国。

新编制的师团是以独立混成旅团（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为基干）和三个后备步兵大队为基干，配备以适合治安警备的轻便装备，再加上两个旅团（各四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师团直属部队编成的。华北方面军有关方面，根据2月2日军令第八号，下令编成第五十九师团和第六十九师团。

注：第五十九师团（代号“衣”）是以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为基干，再加上步兵第五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大队），步兵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五、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一大队），以及第五十九师团的工兵队、通信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和病马厂等，于4月10日编成的。

第六十九师团（代号“胜”）是以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为基干，再加上步兵第五十九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大队），步兵第六十旅团（独立步兵第八十六、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〇大队）以及第六十九师团直属的工兵队、通信队、辎重队、野战医院、病马厂于4月10日编成的。

两个师团的编制定额，兵员各为11,982名。其中各旅团兵员定额为5,096名，独立步兵大队为1,274名（由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一个步兵炮中队所组成），军中文职人员定额为45名。但是根据不同时期，实际定员人数也有差异。此外，还有编外人员，其增减变动很大。例如第六十九师团，5月末（括弧内的数字

表示 8 月末的数字) 有军中文职人员 583 名 (704 名), 特聘的日满华人嘱托及常备的雇佣人员 132 名 (112 名) 临时雇佣人员 842 名 (364 名)。

此外, 当时驻华北独立混成旅团是由司令部、五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旅团直属的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所组成。旅团的编制定额为 4,967 名。其中独立步兵大队为 810 名 (1943 年 12 月 10 日为 850 人, 1945 年 2 月 1 日改为 1549 人)。

4 月 10 日, 根据大陆命第六百一十三号, 下达新的战斗序列命令。按命令规定, 上述两个师团自编制完成时起, 编入第十二军和第一军战斗序列, 分别接替了济南附近和山西省中部西部的防卫任务。同时, 迄今为止直属于方面军的第三十五师团 (配属骑兵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及汽车第三十六联队仍按原来配置隶属于第十二军。第一军所属的第四十一师团 (驻山西省) 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 (正从华中汉口移动中), 向冀中地区移动, 作为方面军的直辖部队 (隶属转移时间规定为 20 日零时)。

另外, 4 月 16 日, 根据军令陆第三十四号, 第一一〇师团改为三三制的编制, 同师团的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司令部改编为第一一〇师团的步兵团司令部, 步兵第一〇八旅团改为新编的第七十一步兵团司令部 (5 月 7 日改编完成)。

5 月 30 日, 根据大陆命第六百四十号, 命令第七十一步兵团司令部及步兵第一四〇联队, 合并编入新编第七十一师团。

自此, 第一一〇师团则由师团以及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一一〇、第一三九、第一六三联队、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

联队、骑兵大队、师团通信队、兵器勤务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所组成。编制定员达14,784名。

方面军的兵团部署

在1942年度，方面军企图以最快速度恢复河北省的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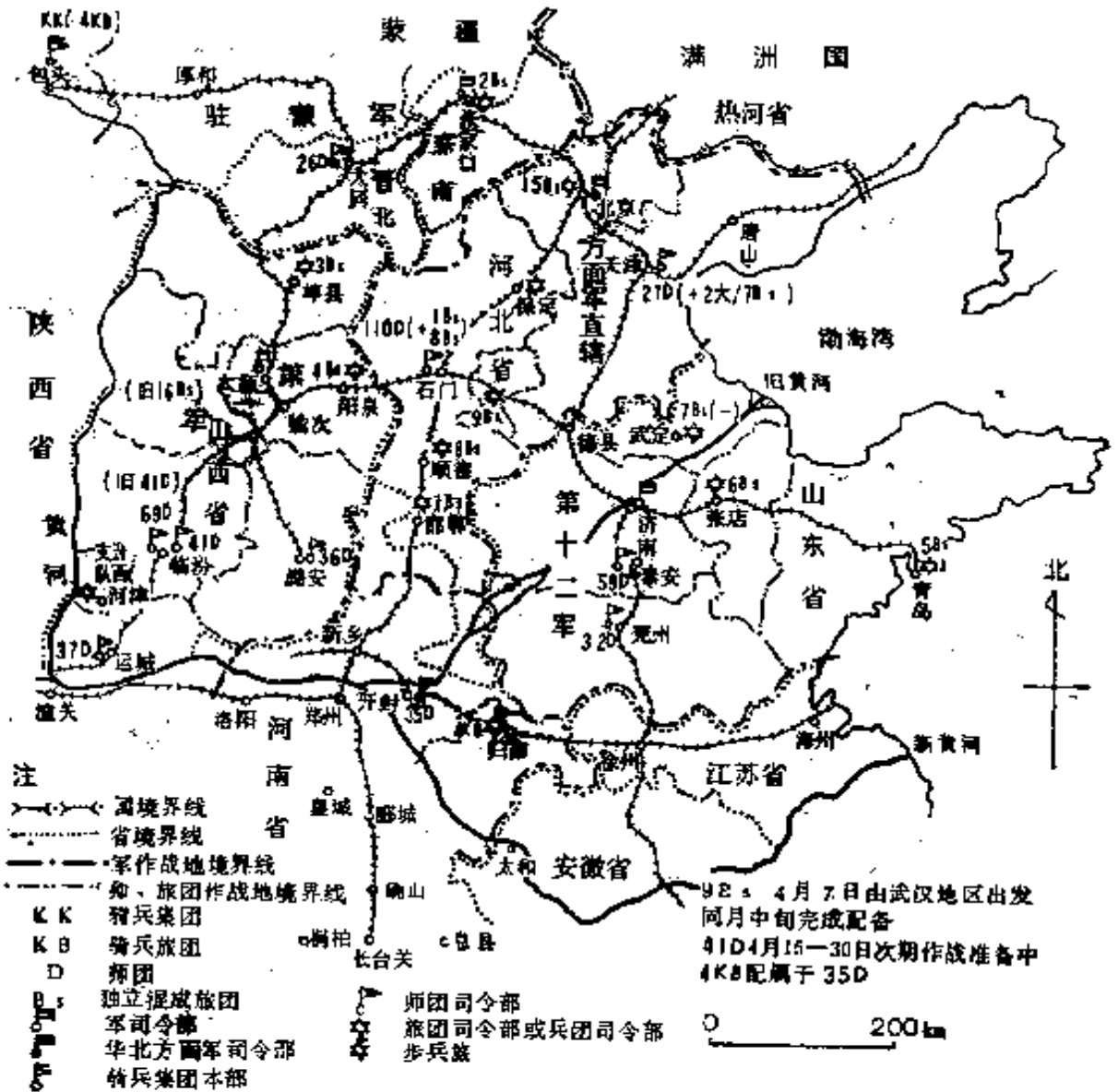


图1.华北方面军兵团部署要图
(1942年4月21日)

安，令从武汉地区返回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为止派出的）及担任山西省内治安警备的第四十一师团移驻冀中地区，并在增加兵力的同时缩小了方面军直辖地区。

此外，由于第十二军在1942年初将苏淮地区让给了第十三军，遂将山东省北部和河南省北部划入其作战地区，并使之担当第一线对敌作战任务。

第一军将两个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复员或调往其它方面，或代以新编的一个师团，结果削减了一个师团兵力。

方面军4月下旬初的兵团部署情况，参照插图。

当时的方面军司令部主要成员及隶属和指挥下的各兵团长如下：

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参谋长 安达二十三中将

参谋副长 有末精三少将

参谋：

（第一课） 德永鹿之助大佐，岛贯武治中佐，大井确一中佐，小野秀雄少佐，李健公少佐。

（第二课） 晴气庆胤中佐，横山幸雄少佐，山崎重三郎少佐，茂川秀和中佐（兼）。

（第三课） 广濑四郎大佐，西野恒夫中佐，宫原健雄中佐，安倍邦夫少佐。

（第四课） 西村乙嗣大佐，片山二良中佐，中村祐次少佐，塚本政登士少佐。

第一军：

军司令官	岩松义雄中将
(军参谋长)	花谷正少将
第三十六师团长	井关仞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长	长野祐一郎中将
第六十九师团长	井上贞卫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	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	津田美武少将

第十二军

军司令官	土桥一次中将
(军参谋长)	河野悦次郎少将
第三十二师团长	井出铁藏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长	重田德松中将
第五十九师团长	柳川梯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长	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长	盘井虎次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	林芳太郎少将
骑兵第四旅团长	佐久间为人少将

驻蒙军：

军司令官	七田一郎中将
(军参谋长)	稻村丰二郎少将
第二十六师团长	柴山兼四郎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	真野五郎少将
骑兵集团长	西原一策中将

方面军直辖兵团

第二十七师团长	原田熊吉中将
第四十一师团长	清水规矩中将
第一一〇师团长	饭沼守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	铃木贞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	吉田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长	池之上贤吉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田中勤少将

四、华北各种主要措施的实施概况

在此着重叙述华北的经济建设情况。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只谈谈有关治安强化运动及对伯工作。关于肃正作战问题则另作叙述。

大力推动经济建设

华北的资源地位及开发的设想 方面军参谋部根据1941年1月规划的“华北资源三十年国土开发计划”，委托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对华北资源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于1942年9月编成《华北资源要览》。在要览中适应东亚共荣圈的扩大，就华北资源地位和开发问题，做了以下的叙述：

华北资源价值的概括总结

一、观察现在展望未来，华北有许多确实可靠而且蕴藏量很大的资源。除劳动力以外，主要是煤炭，其次是盐、石灰石，白钨矿，萤石，铝矾土、页岩以及棉花、羊毛、皮革等。铁的资源现在虽不能抱有很大希望，但未经调查的部分很多，食物资源的自给亦无太大困难。森林资源现在比较缺少，但可与水利事业同时发展。

二、煤炭，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不仅是东亚共荣圈的唯一最大的供应基地，而且可作为集中于渤海沿岸的炼铁用煤，结合利

用南方各地、华北、满洲的铁矿石，在这里可以设置重工业基地。另外，煤炭加工工业或利用煤炭的工业，如煤炭的液化及化肥工业等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三、盐是仅次于煤炭的重要资源。开发包括满洲及渤海沿岸、青岛、海州一带的盐田，足以建立制碱工业的基础。这对于振兴以制碱工业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四、如果同时利用丰富的煤炭发电和水利发电，完全可能以华北资源来发展轻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窑业。

五、棉花、麻、羊毛、羊皮等衣着原料，通过增产和原料供应地区的扩大，为了日满华的自给自足，使华北成为原料供应基地，是不困难的。

六、农产品原料和衣着原料之间，虽然有互相争地的关系，但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和施肥等措施，也不难达到华北地区自给自足的目的。另外还可以从南方各地以及满洲、华中等地得到粮食供应。

七、黄海、渤海湾沿岸，用做渔场极有前途，可以预期将来的渔业会有很大发展。

八、华北矿产工业，一般说来还不发达，其技术尚很落后。因而利用丰富的燃料、动力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开发基础原料部门和发展以消费资料为中心的轻工业是有希望的。

九、彻底贯彻执行黄河以及五大水系的治水和水利计划，除可直接培育养护森林资源外，对农业可以防止水患，便利灌溉，对工矿业则可提供廉价丰富的动力资源，并可期待航运的发展。

（中间部分删去）

华北今日已不再是欧美的殖民地，现在正与日满共同经营着统一的经济，其资源的开发得以委之于最善于利用者之手。因此，华北的潜在资源是非常大的。此外，华北的资源与南方其他共荣圈内的资源并不重复，所以说向南方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华北资源的利用。（中间部分删略。）南方地区长期沦为欧美殖民地，经济一直向畸形发展，变成了欧美的资本市场，原料供应

地和商品市场，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体制。因此，今后该地区的经济再建设，要依赖日本的经济力量，提高重化学工业的技术水平是最大的关键。

华北对日满经济来说，是原料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但是，在同第三国断绝了贸易关系的今天，华北在与南方共荣圈进行资源交流的同时，由华北提供的物资也将把纯原料改变为成品、半成品，从南方运进粮食和铁矿砂等，这样就有可能建立纺织、炼铁工业基地。

大力推进重点措施 华北的经济建设，在完成大东亚战争中的方针是“迅速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以保障民生，努力减轻日本经营华北的负担，尽量提供战争需要的资源。”为了推行以强有力的战时经济体制开发重要资源，执行金融货币对策和粮食对策，以及确保和加强运输力等主要措施，当前亟须具有“创造性”的施策。其概况如下：

1. 开发重要资源

华北的重要资源有煤炭、棉花和盐等。

日本经济，重工业的发展程度及技术水平比较工业低得多，而且原料缺乏。必须摆脱此种弱点，迅速确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体制。因此，迫切需要数量与质量兼优的华北煤炭（估计其埋藏量有二千亿吨以上，约为日本的十倍，并出产炼钢所必需的焦炭）。为此，对煤炭的开发和增加运输非常重视，认为是建立大东亚经济体制的根本。例如主要煤矿中的开滦煤矿，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即被日本方面接收，在军管下强行运营，对日本的供应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是华北的棉花，由于从第三国输入棉花的途径已被完全断绝，它成了日本纺织业所必需的重要来源。另外，由南方各地购进必要物资需以棉纱布匹等交换，因此，对华北棉花的需要就

越发增大了。在棉花生产部门方面，主要有华北棉产改进会、中央农事试验场担当指导和奖励工作，努力进行棉种改良、种子分配和打井工作等等。特别是在主要产棉区山东及京汉路沿线地区，则以当地驻军及有关机关为中心，设置了棉花增产实行委员会，积极指导棉花生产。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预计本年度可增产五成。另外，在收购部门方面，由华北棉花协会实行统购制，积极促进收购工作。

盐和棉花的情况相同，由于红海沿岸和美国等远海盐的来源断绝，开战后必须改用近海盐，而中国的盐产，华北占其大半。因此，努力加强了盐田地带的治安和增产增运工作。

对其它如铁矿（蕴藏量估计有三亿吨，质量优良）钨、矾土、页岩、云母、萤石等重要矿产品，以及麻、烟叶等经济作物，也都采取了开发和增产的措施。

2. 金融通货对策

历来，英美和重庆系统的银行，均靠旧法币进行活动，象在金融自由市场上那样捣乱，以妨害华北金融统制的体制。但在接收和掌握了这些银行之后，初步完成了以联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统治华北金融的体制。

其次，整顿和扩充金融机关，根据金融取缔规章，进行指导和扶持，以联银为中心，将其所管辖的中国、交通两银行以及中国方面的银号、钱庄等，予以整顿合并。此外，为了从金融方面推进华北自给自足体制的确立，努力动员民族资本，吸收游资，并根据日元与中国货币等价的原则维持联银券的币值。

此外，物价对策虽属重要问题，但过去由于各种情况，未能采用强有力的抑制政策。然而在开战后，物价却得以保持暂时的稳定，至1942年始出现上涨趋势，因而采取了紧急抑制政策。6月10日公布了“华北紧急物价对策纲要”。此外并采取了调整配给机构、促进物资的出售、加强限制消费等措施，以期确立日华两国人民生活安定的基础。

3. 粮食对策

关于促进粮食自给自足体制的紧急措施，前面已经说过。增设二十万眼灌溉用井的工作，各地均取得意外的好成绩。在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及改进种植方法等方面，努力领导了重要肥料的特别分配、改善种子的消毒、普及药品消毒以及充实农业技术指导员等工作。因此，尽管当年气候不佳，平原地带的 水稻生长尚属良好，全区的农作物预料可以获得平年的收成。

为了促进各地粮食上市，灵活地对价格进行操纵，积极开展合作社的活动，排除来自敌方的骚扰，确保支援物资的流入，设法获得敌区的粮食资源。此外，并尽一切努力从满洲、华中及华南、朝鲜等地运进粮食。

彻底实行配给制度和限制消费，虽有很大困难，但逐步取得了一定成效。

4. 确保和增强运输力量

在陆路交通方面，华北交通株式会社（1939年4月创办，1942年3月时的资本总额约达四亿日元，日华籍从业人员已增加到十一万人左右）除综合经营铁路、汽车以及内河航运事业外，并作为附带事业通过警务和爱路工作以确保治安，对开发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铁道营业总长度达6,053公里（其中事变后新铺设869公里），汽车路线总长度约1,300公里，内河航运路线已达3,848公里，运输量显著提高。

海上交通的港口，则有秦皇岛、塘沽、青岛、连云港、天津等，运输能力大约为800万吨，为了顺利完成对日满的输出任务，现在采取紧急措施，以增强码头设备。

5. 长期准备的措施

考虑到华北经济在东亚共荣圈的地位，为了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除计划新设大炼钢厂和新设硫酸氨工厂以提供增产粮食必需的大量廉价肥料之外，并于6月9日召开了经济文化综合研究机关“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成立大会。该研究所为财团法人，以促进大东亚建设和增进民族福利为目的成立的，财团资金为200万日元（日华各出一半资金），理事长为实业总署督办王荫泰，副理

事长为北京开发调查局局长伊藤道雄，另有理事10人，干事1人，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森冈臯中将（预备役）任研究所顾问。（该中将于1942年10月任华北贸易总联合会会长）

此外，方面军自己的兵站措施，也因采取了现地自给（武器、被服以及卫生器材的制造），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节约消费、后方设施适应长期驻屯形势等措施，缩减了由日本国内的补充，逐渐收到了效果。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军、政、会、民一体化运动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3月展开第一次运动以来，已经进行过三次军、政、会、民一体的国民运动，取得了相当成果。此次为自3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开始，为期约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运动的目标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此次运动以过去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所收获的综合成果为基准，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以新民会为实现运动的核心力量，方面军和兴亚院联络部予以合作，大力动员全体民众，特别要促进警备队的积极行动、民众的组织化和武装训练与保甲训练等。

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日军开始了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即从4月1日开始向冀东进行的肃正作战和相继在冀南、冀中和晋冀豫边区进行的肃正作战。另外，自3月以来在各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肃正讨伐。这些作战与治安强化运动形成一体，极力扩大治安地区。中国治安军在日军的支援下也一直

担当讨伐和治安工作，现已发展成为能够单独负担起某一地区的警备任务。

一般说来，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战取得辉煌胜利，提高了敬畏日本的心理，加强了官民对治安肃正的决心和信心。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人也参加了运动。特别是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到各方面视察访问，并给予指导和鼓励，各道尹、县长都亲临第一线，带头活动起来。因此，民众也参加了与讨伐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以及对共封锁壕的筑造工事和剿共自卫战斗等，在各地甚至出现了奋不顾身的行动，运动非常火炽。

治安强化运动如此继续到6月中旬。其综合成果虽不明显，但运动达到高潮的5月8日，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长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跃进中的华北建设”的讲话。讲话中明确阐述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及成果。

中共方面的记录 这次运动对中共是一次巨大的压力，中共方面的记录，有如下叙述：

1942年，在华日军为了响应在走投无路局面下“要建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要求，把华北广大地区做为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全面开展了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这意味着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牢固团结战斗的华北抗日军民和解放区进行激烈的攻击。

当发起“治安强化运动”时，日军将整个华北划分为三类地区，分别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对策。这三类地区是“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

对“治安区”，日军以“清乡”政策为主，来清除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的根本和影响。即以发展和加强傀儡政权，实行并

村，利用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来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统治和掠夺。

对“准治安区”，则专门以所谓“蚕食政策”为主的方针。为了对抗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一方面对居民以“通敌”罪名相威胁，另一方面则拉拢腐败的卖国分子做为亲信，两种方法同时并用。强迫居民“欢迎皇军”、“维持治安”，强制住在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居民迁到“治安区”，制造无人区，而使八路军在该地区无法进行活动。并在该地区星罗棋布地修起隔断壕、地堡、岗楼，实行严密的封锁。

对“非治安区”，则以极野蛮的“扫荡”为主。在这里，为了使解放区人民经常处于粮食物资非常缺乏的状态，并使之产生悲惨、绝望的败战情绪，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对上述三类地区，使“清乡”、“蚕食”、“扫荡”三种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破坏解放区，歼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企图执行“确保华北”的最高命令。面对这种激烈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国的抗战军民不得不继续进行极为艰巨的战斗。（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对伯工作(对阎锡山工作)

据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它方面的影响很大。陆军省部、兴亚院以及中国派遣军对之颇为重视，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

注1：关于工作内容，只有指定的首脑人物了解，在陆军省内部也只限于少数有关人员知道。关于对工作可能性的判断，各级司令部以

及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显著差异。从谋略工作的特点看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注2：对伯工作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在工作初期与日军进行联系时，称阎锡山为伯父，因此就以“伯”字作为阎锡山的代称，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中将命名为对伯工作。（据原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谈。）

注3：日本方面称阎锡山直接统率的军队为“山西军”，而阎则称为“晋绥军”。正式名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军。

此外，负责该工作的为华北方面军，实际执行该工作的第一军，特别是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灵活运用他们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然而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同时以此向中外进行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12月19日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的训示。）

1941年9月11日双方缔结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10月27日又缔结了停战协定细则。日本方面为了加速事态的进展，建议召开首脑会议，并要求阎锡山发表独立宣言，以表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对此，阎锡山虽基本同意，但声称须在接到按协定第一阶段规定交付的军费、武器后，再发表宣言，而未允日方要求，以致拖延了时日。

当时山西军拥有十几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另一方面不断受到中共方面的蚕食，对日军则采取避其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因此，当时在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一旦

发表独立宣言，将立即遭到重庆军的打击，为全军招来危险。同时，阎锡山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日华合作，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的战斗力。但在日本方面，不能判明那是阎的真意，还是用以保身的谋略。此外，由于日方在协定上为了拉拢阎锡山含混其词地说了些大话，因而阎对于火速实行协定感到不安，而且是有困难的。

此外，第一军首脑和阎锡山方面的联络、谈判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此时阎锡山在太原的办事处（在此工作的有阎的妹夫梁延武及齐凤周、刘吉甫、曲宪南等）就设在茂川公馆（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参谋茂川秀和中佐的事务所）的邻近地方与阎锡山总部所在地克滩坡（吉县西北的河畔）之间，除不断以无线电报联络外，并常有使者往来。为了使阎返回山西，特任命阎的旧部苏体仁为山西省省长，这对该工作具有深刻的关系。此外，第一军的有关兵团（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均与各该守备地区的山西军保持着联系。

大东亚战争刚一爆发，第一军司令官就主张举行双方首脑会谈。他指出：“形势迫切要求本项工作尽早成功，希望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即使在各项治安建设工作中可能招致种种障碍，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推动本项工作。”同时他还亲自说服阎锡山，向阎拍发电报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但是，阎锡山仍然宣称，在履行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从晋绥军内部情况以及全军所处

的环境看来，有极大困难。未允日方电报的要求。

12月底，第一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于是决定今后对阎采取强硬态度。1942年1月，第一军在与阎谈判的同时，开始研究对其进行武力压迫的工作。1月24日，向方面军上报了“陕西省进攻作战计划”方案。该方案的设想是向西安附近进军，击败重庆军后，完成对山西军的包围。但是，当时方面军正在研究压迫重庆军的“西安洛阳作战”方案，在实施此方案时即可考虑对阎行使武力，于是指示第一军暂时应以谈判为主进行工作。

然而，25日，军司令官接见阎锡山代表梁上椿（梁延武之叔父）后，确信对阎锡山的上述判断无误，遂进一步研究了突然袭击阎锡山总部克滩坡计划、歼灭山西军作战及该军瓦解后治安维持计划等，并把这些计划与合作成功后的具体措施，一并设法传给阎锡山知道。

2月，第一军为了在山西全省进行肃正讨伐，未对阎锡山全面展开工作。

注1：2月26日，杉山参谋总长在奏复天皇垂询时说：“对伯工作今后直到4、5月为止，将继续采取强硬态度，然后再看局势发展的情况，说不定要诉诸武力。”

注2：为了促进对伯工作，方面军加紧筹建山西产业股份公司，以统一接管已解除军事管制的山西各主要企业公司。（山西产业股份公司于3月31日创立）

注3：3月1日梁延武面见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之后曾说：“重庆当局已详知协定内容，但不立即讨阎，而采取严密监视的方针。”

注4：当时，日本方面对阎锡山的性格曾做如下评论：“有自私自利打

算，但优柔寡断”，或者是“慎重”，“小心谨慎”，“老奸巨滑不吃亏的家伙”，“难以揣度的人物”等等。

到3月份，第一军司令官为了推动对伯工作，决定同时使用武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即由各有关兵团展开威压行动和进行炮击，以迫使阎锡山下决心，看对方的反应，逐渐增加压力。此次军事行动称之为“对晋作战”或“B号作战”。第一军首脑认为这次行动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第一军司令官召见从北京回来的梁上椿和梁延武，提出最后方案并尽量说服他们。梁等对于传达这个方案感到为难，但终于16日出发去克滩坡。第一军配合梁的行动，于19日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各兵团在各自的守卫地区对山西军进行了扫荡，并对河津以北黄河对岸的重庆军阵地进行炮击，以便切断它与山西军的联系。

此次示威行动，似乎给了山西军意外的刺激。于是第一军于24日召见驻太原的阎锡山联络员，面交正式书面通知：“以4月4日为限期，要求做出承诺与否的回答。”并口头传达了如超过限期，所签协定即行废除之意。25日，第一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此次为了减轻对山西军的直接刺激，主要炮击了黄河重要渡口附近的重庆军。当天，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等由克滩坡出发前来联系，于27日到达太原。

28日，双方主要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果，第一军做出判断：“阎尚未下决心合作，因惧怕日军进行的佯攻，为缓兵计派赵前来，而赵并未带来具体的谈判条件。因此，第一军必须按既定日程实行。”但是，4月2日遵照方面军司

令官的指示，将废除已签订协定的日期延期到4月中旬。5日第一军下达了B号作战延期的命令。

此外，3月底，从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各调出步兵一个大队，增派到汾阳前方，汾西支队（第三十六步兵团长佐久间盛一少将指挥的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已向稷山地区集结完毕。（汾西支队是第一军直属专门对“伯”的部队，于3月13日下令编成。）

其后，第一军对赵承绶采取了怀柔政策，赵于8日返回克滩坡。9日，阎锡山来电拒绝会见。

对此，第一军于10日发出废除已签订协定的预告，17日发出“谈判结束，采取自由行动”的通告，同时加强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20日，对山西军进行了炮击。

在此以前，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于15日与中央及中国派遣军共同调整部署之后，通知第一军“希望暂缓发出废除已签订协定的正式通告”。接着于23日又发出电报指示：“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军司令官负责进行，对交涉进展切勿过于急躁，应等待今秋全面谋略取得进展的时机。”

然而，这时山西省长苏体仁从中进行斡旋，25日给阎锡山拍出了“苏体仁关于会见的个人提案”的电报，27日阎锡山复电大意表示同意苏的个人提案。于是，双方谈判又重新开始。28日军司令官在北京研究了对策，结果决定以苏体仁省长个人提案为基础，与阎锡山举行会晤，并确定了促使阎锡山迅速发表独立宣言的方针。在29日的谈判中决定了以下事项：（一）5月5日在安平村（乡宁以西，山西军控制的地区）会见；（二）撤销双方一切通告；（三）解除对山西

军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四）山西军恢复停战协定时的状态等等。

5月4日，岩松军司令官、安达方面军参谋长、花谷参谋长一行来到了岭上（河津以北30公里，日军的最前线）。

5日，因雨会见延期。6日期待已久的岩松和阎锡山的会见在安平村窑洞里举行了。最初，会谈是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就合作的基本概念，毫无问题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以基本协定为基础的谅解事项，却未达成预期的妥协，17时50分会谈终于破裂。

注：关于会见的结果，在“畑元帅日志”中写道：“会谈十之八九不会顺利，此乃意料中事。”在“第一军参谋友近大佐业务日志”中同样记载：“会谈破裂，正如我方之所预料”。

5月12日，方面军参谋长和第一军参谋长在南京报告了会谈的情况，并同时研究了今后的对伯工作。于是做出判断：“此次会见，可以肯定阎锡山不会回到蒋介石方面，他对日苏关系的进展极为关心，暂时将继续采取观望的态度。”为此，向中央汇报了今后的指导方案，主张施加更大压力，促使他做出决断。经中央批准的方案如下：

第一、方针

对伯工作今后的指导方针，应坚持我方严肃态度和适应机宜的各种策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伯”迫于现实，痛感焦虑，终于不得不放弃年来的梦想，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屈服，与我进行合作。

第二、要领

一、适时通告废除基本协定。

- 二、日军在表面上要坚持不以“伯”为对手的态度。
- 三、加强对山西军的经济封锁，并迫使驻汾南的第三四军等撤退到汾北山区等，以加强对“伯”的压迫。根据情况，解除该部队的武装，以及分化瓦解山西军的部分队伍。
- 四、如“伯”提出请求，应相机行事，经批准后可以重新签订切实可行的合作协定。

5月17日，方面军司令官通告阎锡山：废除基本协定，采取自由行动。

在会谈破裂之后，第一军立即对山西军施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和严厉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各个部队进行了分化瓦解及怀柔工作。同时将安平村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在陕西方面散发，以离间阎蒋的关系。

到6月份，军司令官制定了歼灭山西军中枢的作战计划，于7日上报方面军。方面军的意见，对山西军应采取温和态度加以怀柔，以便在预定今秋进行的西安作战时，使之孤立。因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结果该计划只限于研究的范围。

注1：关于“方面军计划的秋季西安作战”请参阅后述的“五号作战准备”项目。

注2：据说军司令官对阎锡山进行怀柔工作不抱希望，可能考虑改以苏体仁为主进行山西建设工作。

为了分化瓦解山西军，第六十九师团对局部地区的攻击也以7月15日为期暂行停止。在此项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军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努力予以教育训练，目的是要使之从事瓦解山西军和驻地内的

剿共工作。1942年以来，经方面军批准，剿共军归山西省长指挥。

此后，曾有阎锡山方面的重新合作的活动，以及第一军准备再次歼灭山西军的计划等等，但在两者之间逐渐出现妥协气氛，决定通过部分合作的积累，逐渐达到全面合作，改变了工作方法。首先，采取经济合作的具体措施，自1943年春季双方开始了物资交易。1944年1月，作为剿共和征粮的措施，由山西军四个师移驻浮山、安泽地区。同年秋季，阎锡山派其亲信、得力干将朱绶光常驻太原。由此可见阎锡山有意准备返回山西。尔后双方均无积极的企图，但继续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至于停战前夕的工作，容后叙述。

参考：

曾任第一军参谋的笹井宽一大佐关于对伯工作回忆如下：

日本方面由于采取了短兵相见的作法，对伯工作虽终归失败，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从阎锡山的立场看来，可以说达到了善保其身的目的。假如他归顺了日军，必将受到背后的重庆第八战区军的攻击，很明显，中共方面的蚕食工作也将加剧。阎锡山是一面观察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日本的实力，一面忧虑着逐渐被赤化的山西，慎重而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又，据曾任第一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的回忆如下：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五、华北全区的长期肃正作战

在这一年度前半期，以冀中、冀南、冀东、晋冀豫边区的四大肃正作战为中心，在华北整个地区，连续不断地展开了剿共战。在详述各主要剿共战之前，先从4月间敌我一般的动向开始叙述。

四月中的敌我情势

方面军的作战设想 华北方面军在2月的参谋长会议上传达了“1942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同时提出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其设想的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地区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

为此，在冀东地区，由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初开始进行“冀东一号作战”；在冀南地区由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从4月末开始进行“十二号作战”；在冀西地区，由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从4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行肃正作战。上述各地区作战的用意是要使敌人误认为例行的春季讨伐，并且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和第一军执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对作为重点的冀中地区的作战，其新的战斗序列由方面军直属的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原有

的第二十七师团和一一〇师团的部分兵力参加。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5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

关于选定冀中地区为主要作战目标的由来，当时的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后任中佐）曾叙述如下：

在研究制定年度计划时，对于前一年的主要作战目标应定为共军，还是重庆军，曾有争论。但本年度在选定主要作战目标上，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至于是在讨论以哪一地区的中共势力为主要对象的问题上，曾进行过多方研究，结果选定了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

此外，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这样，在4月份，一面进行准备5月的冀中作战，一面在冀东、山东、冀南、旧黄河畔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正作战。同时，并有日华军官民一体开展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整个华北地区，实行了连续不断的肃正讨伐作战。

4月份双方交战次数达1,354次，敌方参战兵力有225,437人，敌人遗弃尸体14,363具，俘虏16,492人，归顺或投降的有29,288人，另外缴获大量武器资材，战果很大。

当前敌人的动向 根据“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4月份我军面临的敌人其主要动向，如下所述：

重庆的注意力完全被“缅甸”方面的战况所吸引，因而在中国大陆上的抗日军事活动不免呈现消极。重庆的正规军因改编迟延，放弃了3月份的局部攻势，而代之以发动全面的游击战和加强特务战。在3月底和4月上旬，蒋介石曾两次下令，以破坏我方建设，牵制我军兵力，诱导被占领区民众的抗日热情为目的，由各地编制混成队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性袭击，使游击队与之进行策应。因此，自20日以后，在蒙疆方面发生了爆破铁路、投掷炸药和放火等七次事件；到月底，在各地发生了数次敌特务战嫌疑的起火事件。但敌人此次活动无甚大进展而告结束。

共军依然以政治攻势和保卫春耕为重点，其内部似在本着精兵简政的精神致力于加强整顿工作。同时，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进行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

各方面共军的动向如下：

一、晋察冀边区

将原来的平西军区改称为第十一分区，平北分区改称为第十二分区，冀东分区改称为第十三分区，均改编直属于聂荣臻的冀西军区，并将冀察热挺进军司令萧克调到聂荣臻部下任副司令。

冀东共军，因受原田兵团（第二十七师团）攻击丧失了根据地，率其主力部队逃入满洲国境内。

冀西、冀中军区一方面因受我方进攻，不断苦思对策，一方面加强了政治攻势，积极破坏我治安强化运动。

二、晋冀鲁豫边区

4月15日，太岳地区共军以全部主力，对驻在浮山附近的山西军（阎锡山军）发动了攻击，由于我方当地部队的援救，被迫放弃了攻击企图，撤退到沁河河畔，却又企图向中条山脉方面发展，逐渐展开强有力的进攻。

太行军区刘伯承料到我方将对该区进行扫荡，正在积极准备各种反扫荡。

4月底，冀南军区由于仁集团（第十二军）的第十二号作战，在武城附近和威县以南地区受到了急袭包围，军区和新编第七师、第四旅的主力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损失很多得力干部，正如军区的自我批评所说，由于准备上的缺点为敌所乘，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三、山东方面

山东共军与于学忠的斗争，迄无宁日，而且内部统一也有困难，如主观主义、党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均难以克服。

国共关系，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何变化，但重庆对延安所怀戒心却日益加深。重庆军事委员会下令要警惕中共本年度的中心工作——企图潜入重庆军政各机关、学校、农村、军队、警察、工厂等，从内部进行破坏。蒋介石也命令要警惕中共使很多有敌旧关系的人员潜入重庆军内部企图扩大其党组织。

两军在地方上的冲突，除山东仍频繁发生外，新四军似有重新侵入豫东的迹象，以及中条山区残存的重庆系统行政组织和游击队正在逐渐为太岳共军所蚕食。除此以外，无大变化。

关于苏联利用西北“公路”将援蒋物资运进中国的状况，4月份未获确实情报。

重庆失掉西南“公路”后，指望向西北寻求“汽油”的补给，特派翁文灏到兰州将甘肃省经营的油田置于重庆直接管辖之下，并使之调查尚未开发的油田。此外，为了经由西北运进苏联和近东的外国石油，而努力设法增强运输能力。

抽调部分兵力进行浙赣作战 此时太平洋方面的主要作战大体上告一段落。4月18日，突然发生了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空袭东京及其它地方后回到华中方面的事件。据大本营判断，“敌军利用中国大陆空袭日本，今后将日益增

多”，于是立即准备对策。4月30日命令中国派遣军毁灭浙江省方面的敌各主要航空基地（丽水、衢州、玉山等）（浙江作战即卅号作战，后改称浙赣作战）。

浙赣作战的设想是由第十三军从杭州方面发动攻击，同时第十一军从南昌方面予以策应。

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秘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5月中旬抽出下述各部队（小部队、后方有关部队省略不记），调往华中方面。

一、第二十二师团主力部队（师团长井出铁藏中将）

二、小鹫江混成旅团（旅团长为第二十六步兵团长小鹫江邦雄少将。从第二十六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抽调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

三、步兵一四〇联队（联队长青木政尚大佐，该联队因改编，已脱离第一一〇师团，正准备调往满洲）。

四、其它，坦克第十二联队主力、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的部分兵力等。

此外，6月下旬，方面军由于接到增兵的命令，在冀中作战告一段落后，又增派了奈良支队（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长奈良正彦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

5月15日，浙江作战开始了。作战进行得很顺利，作战规模

也随之扩大，向打通浙赣线发展。参加兵力比原订计划增加了，占领期限也延长了。方面军派出的各部队由8月19日开始调回，返还原地时已是9月下旬。

下面以冀中作战为主题叙述华北方面军的主要肃正作战情况。

第二次冀南作战（十二号作战）

（4月29日——5月15日）

一般敌情 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附近，有冀南及冀鲁豫两军区的共军盘据，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且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特别是它的地下工作有显著的进展，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蒋系高树勋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自今春以来重庆色彩更加浓厚，对我方的治安工作虽有不少妨害，但自孙良诚归顺以后，其势力有所削弱，与共军继续冲突，勉强保持着地盘。

第十二军的作战准备 方面军在新年度计划中归纳其作战设想为：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应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策应第一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摧毁敌资源根据地。根据方面军的计划，第十二军开始进行准备工作。截至4月28日傍晚，部署各参加作战部队集结到下述地点，定于29日拂晓即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译注），向敌盘据的中心地区发动全面的攻击。

林支队（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林芳太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五

个大队为基干) 部署在武城以北龙华附近, 吉田支队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吉田峰太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 部署在武城以西垂杨村附近, 铃木支队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铃木贞次少将所指挥的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 部署在曲周附近, 重田兵团 (第三十五师团长重田德松中将所指挥的北川支队及佐久间支队为基干) 部署在濮阳附近。

上述兵力部署, 是第十二军在28日接到秘令调第三十二师团去华中时紧急变更的。即原来部署由第三十二师团长 (井山铁藏中将) 指挥师团主力和北川、佐久间支队, 改由第三十五师团长指挥该两支队。并决定由第三十二师团的惠藤讨伐队 (队长步兵第二百十二联队长惠藤第四郎大佐) 和当地警备队予以协助。因此, 盘据在东平湖西侧的共军就脱离攻击目标了。

第十二军特别注意彻底隐蔽其企图, 极力以假计划、假命令、散布流言等, 欺骗敌人, 真实命令一概限用口头传达。同时对各级指挥官、参谋实行集中教育, 对以分散退避为主的敌人, 研究搜索捕捉的办法等, 为此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作战经过概要 各部队在尽量离开敌人远的地方进行准备工作, 于日落后轻装迅速移动, 29日拂晓, 对敌各根据地同时发动了突然袭击。

林、吉田、铃木各支队巧妙地搜索所在地的敌军主力, 并给以毁灭性的打击。尔后于5月3日到6日 (林支队于15日) 对敌根据地一带地方, 进行了严密的扫荡讨伐。三个支队的战果, 总计: 共军遗尸2,200具, 俘虏780人。

高树勋军已向东南方逃走，因此，进入到濮县附近的重田兵团立即追击，并在各处予以击溃。特别是佐久间支队，发挥了机动优势，远远追击竟至越过陇海线，击溃了高树勋军的主力。在此期间，北川支队又返回濮县西南地区，在该地区一直讨伐肃正到15日。重田兵团取得的成果：高树勋军遗尸4,127具，俘虏2,350人。

日军的伤亡，在整个作战期间共计死46人，伤152人。

此次作战的特点是，使共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使驻扎在冀南的蒋系军根据地受到毁灭性打击。作战成功的原因有：

（一）彻底隐蔽了作战企图；（二）事先研究了有关作战事项；（三）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防止敌人乘隙逃跑）；（四）以轻快的移动构成包围圈；（五）临时编成骑兵中队和汽车中队，并有效地运用这些部队；（六）利用黄尘进行突然急袭。

在此次作战期间及其以后，积极进行了敌性地区的治安工作（主要是扩充中国方面的行政组织，组织警备队和保甲制度，构筑隔断壕）。但是，在6月前后，中共方面的地下工作有开始活跃的迹象。这主要是由于第三十二师团调往南方，减轻了作战成果的压力所致。

重庆方面的记录 在这次作战中，高树勋很快识破日军的企图，让日军进入濮阳扑了空，随即采取了从四面围歼的方针。战斗极为激烈，予敌军以沉重打击。但因我方损失也过大，因此一面迎战，一面将部队转移河南和安徽地区。高树勋总部（司令部）于6月29日到达涡阳（徐州西南160公里），掌握了后续各部队之后，开始进行整训。在此两月期间，交战五十余次，敌方

死四千人，我方除团长四人战死外，伤九千余人。

中共方面的记录 敌人的“四·二九大扫荡”使冀南平原的军民受到了从未曾有的严峻考验。从此“铁壁合围”、“治安强化运动”及“特务自首政策”的凶恶气焰日益高涨。然而冀南地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针对此形势缺乏严密的警戒心，在政策指导上也犯了错误。误解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结果未进行充分的迎击，或者甚至放弃了武装斗争。此外，不仅对敌占区内的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甚至也忽视了加强根据地的工作。因而当受到敌人攻击时，正规军被动地向根据地收缩，终于脱离了广大游击区的群众游击战，而根据地内部也很快陷入了退缩和混乱状态。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根据地面积缩小到五分之三，平原抗战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党组织近半数遭到破坏，党员人数由四万人减少到二万一千人。不少县、区的抗日政府，根本解体了。陷于敌人强力控制下的村政权已变成“两面政权”，资助了敌人。正规军减少了一半，剩下一万余人，游击队十之八九已经溃散。武器损失甚重，步枪损失约5,000支。党政军民、区级连级以上的干部损失达4,000—5,000人。其中包括第四分区司令、政治主任、政治委员，第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七旅政治部主任，第五分区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青年纵队团长，第七百七十一团政治委员，第三分区政治委员，第六分区司令、副司令等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其他地方得力干部多人在内。

由于敌人在冀南平原彻底实行封锁隔离计划，完全改变了根据地的性质。敌人的气焰嚣张，而群众抗日活动已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人心混乱、苦闷，根据地已面临严重危机。

但是，冀南区党委的五月会议，是扭转冀南形势的关键，同时开始了根据地的重建工作。五月会议检讨了过去工作的教训，批判了右倾退缩思想，决议根据新的斗争方针，坚决进行积极的战斗，以打开局面。同时做好准备，无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也要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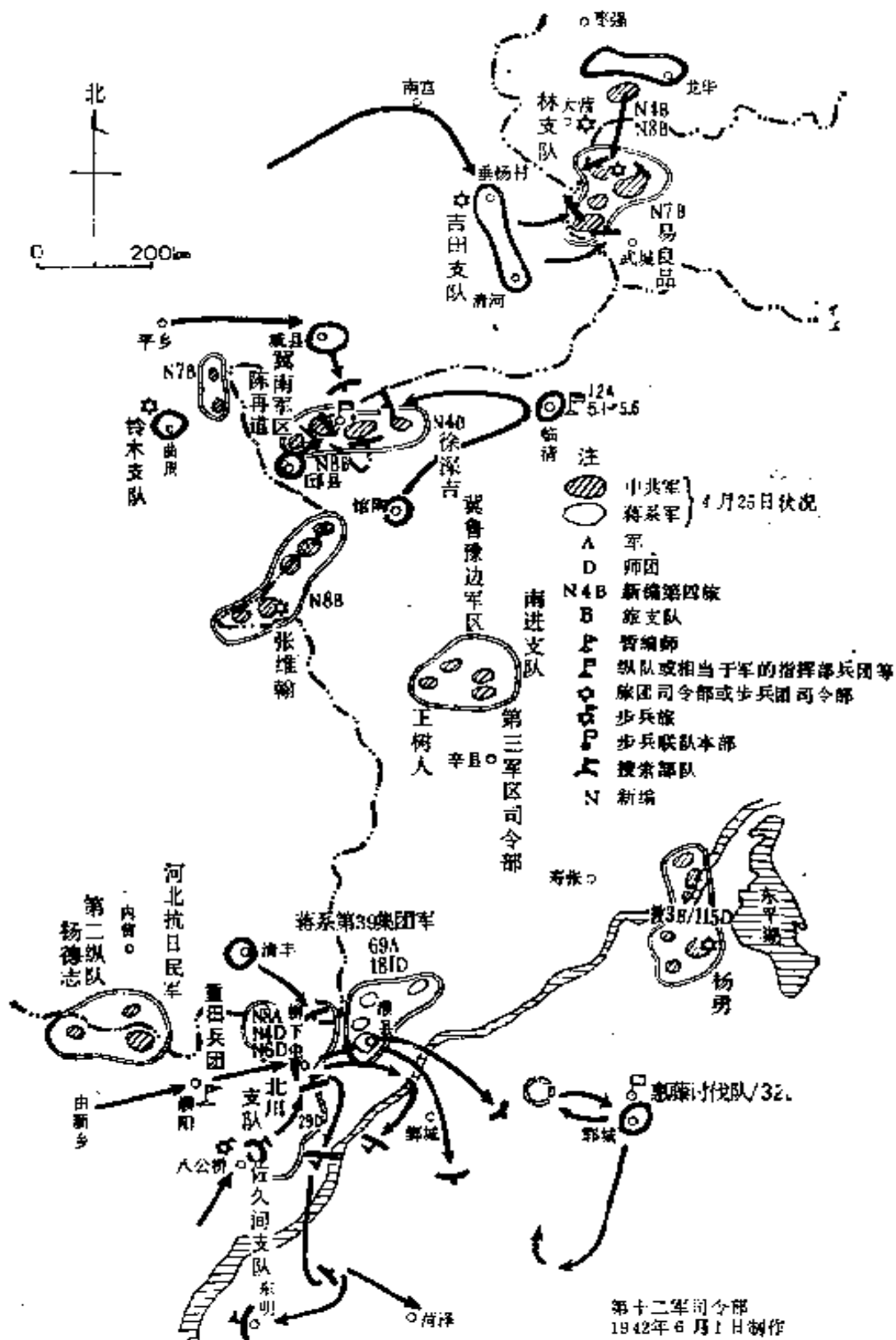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次冀南作战 (前期) 经过要图
1942年4月29日 ~ 5月2日

冀南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5月4日）和“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6月22日），坚决而全面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冀中作战（三号作战）

（5月1日—6月20日）

作战地的一般情况 所谓冀中，即在地理概念上将河北区划为冀东、冀西、冀北（平北）、冀南及所围绕的中央部分等五个地区，该中央平原地区就叫做冀中（而中共方面在军事、行政区划上是把京汉、津浦、石德、北宁几条铁路线所包围的地界叫做冀中区）。

此次作战地区是在冀中南部地区。根据方面军第二课调查整理（3月下旬）的资料，该地的状况如下：

第一，从军事要地地理上看到的作战地状况

一、作战地区包括安国、饶阳、安平、深县、深泽、献县、武强、武邑、肃宁、博野、衡水、束鹿、晋县、无极等县，总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80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300人（这在华北人口密度上也是较高的，必须考虑估计其可能动员的地方武装兵力），地势一般平坦，为村落散布的大平原。

二、道路多为凹形道，非治安区的车行道路遭到破坏，敌人筑有交通壕联络着各村落，对敌我双方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三、主要河流有子牙河、滏阳河、漳沱河，潞龙河等。这些河都是流向东北，只限指定地点准许渡河，但在5~6月间，水量缺乏时，即不成障碍。非治安区内设有敌人的秘密渡口。

四、农作物有高粱、小麦、玉蜀黍、小米、棉花等，高粱的耕种面积占四分之三，尤以无极附近为最多。5月下旬，这种高

秆作物还不到0.7米高，对射击虽然有些妨碍，但部队的了望和通行并无不便。

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

第二 敌情

一、冀中军区，不仅是晋察冀全部边区，特别是北部太行山区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地，并且担负着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运进各种物资的重要任务。本地区共有兵力14,000余人，其编制详见附表。该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分别由各分区司令统一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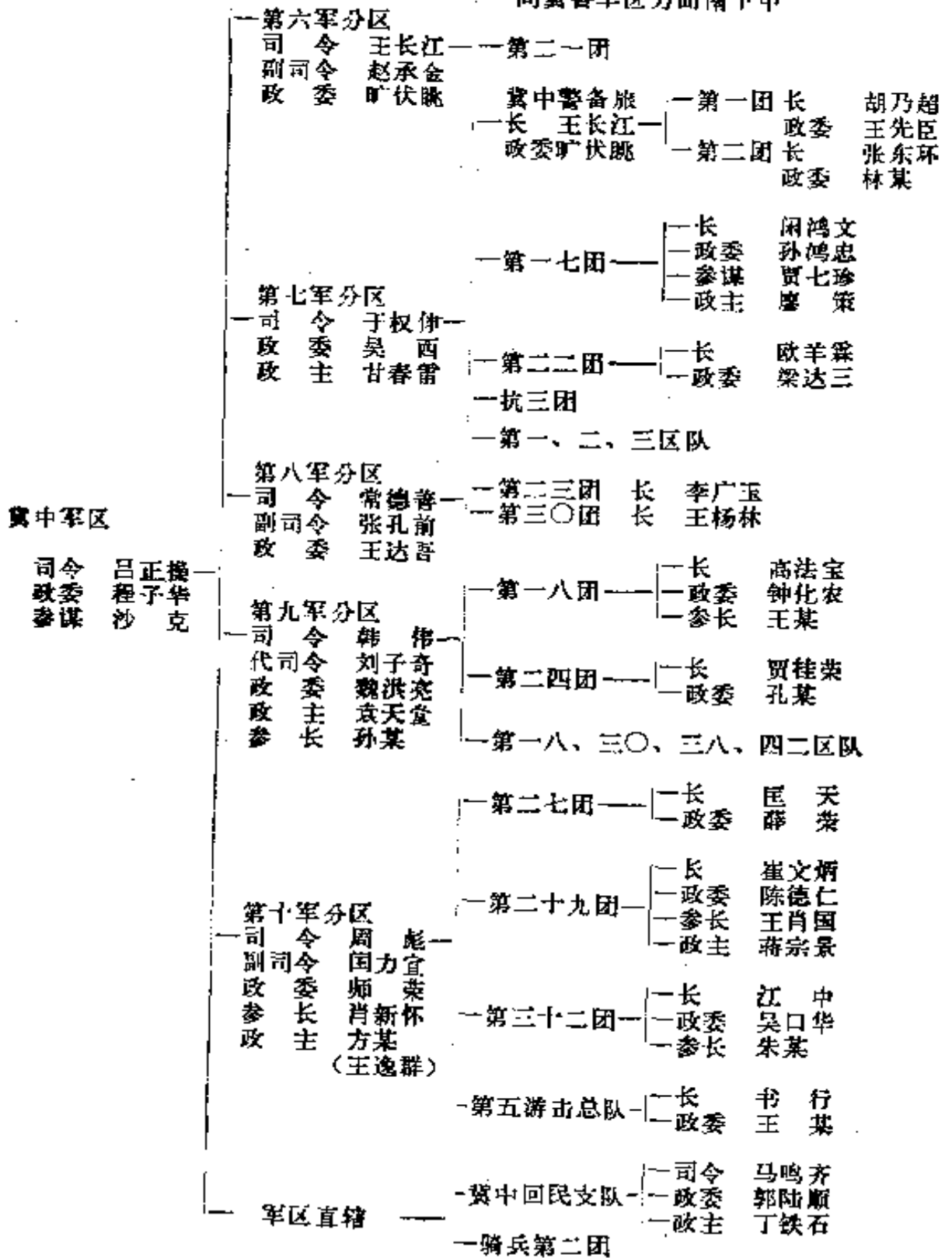
二、正规军一般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各个营通常部署在所属分区内行动，但有时也向分区以外移动。每团拥有兵力1,000~1,500人，按三三制编成，拥有步枪700—1,000支，轻机枪10—20挺，重机枪4—6挺，迫击炮2—4门，每人携带子弹30—50发。

一般战斗员的抗日意识似乎很高，但其思想基础薄弱，只坚信党的宣传，似有恐日倾向（中略）。

民众武装力量，大致分为两种：（一）半脱产的民兵，（二）不脱产，专门负责保卫家乡的自卫队。前者以青年抗敌先锋队、基于游击队形式编成区队，积极配合正规军参加游击战或除奸工作，或作为推动地方行政的力量。其战斗力虽比正规军低，但因与群众保有直接联系，在动员群众工作上起很大作用。后者纯属群众自卫组织，原则上青壮年男女均为自卫队员，并分为青抗先、基干队及一般自卫队，这些自卫队在县、镇、村分别设有支队、大队或中队等各级指挥部，按行政区划建立指挥系统。有关军事行动则由正规军团长指挥或直接隶属于军分区司令。此种武装比游击队更为软弱，仅十分之一的人员有步枪或手枪。但是，他们担负着情报活动、救护伤病员、运送物资、补充正规军、空室清野等极为重要的任务。他们的武装和党组织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应当看到匪区的全体民众都是怀有敌意的，因此单凭宣抚

冀中军区编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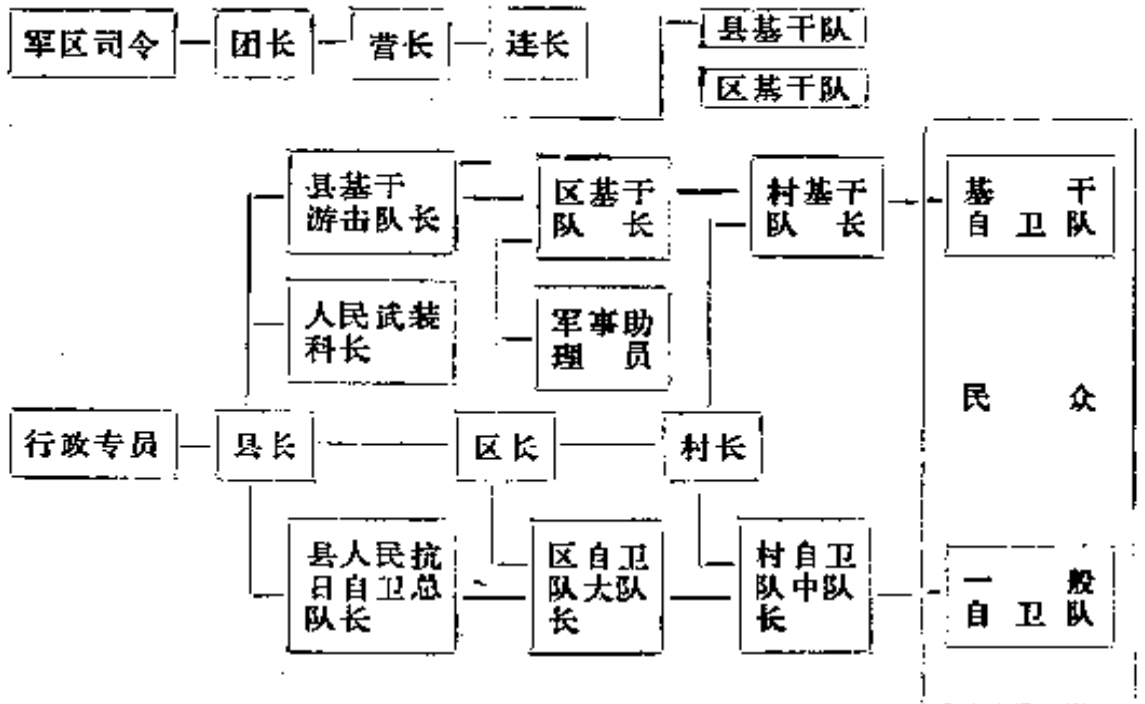
— 第一六团在前分区司令赵承金指挥下
向冀鲁军区方面南下中



工作来分离匪与民是很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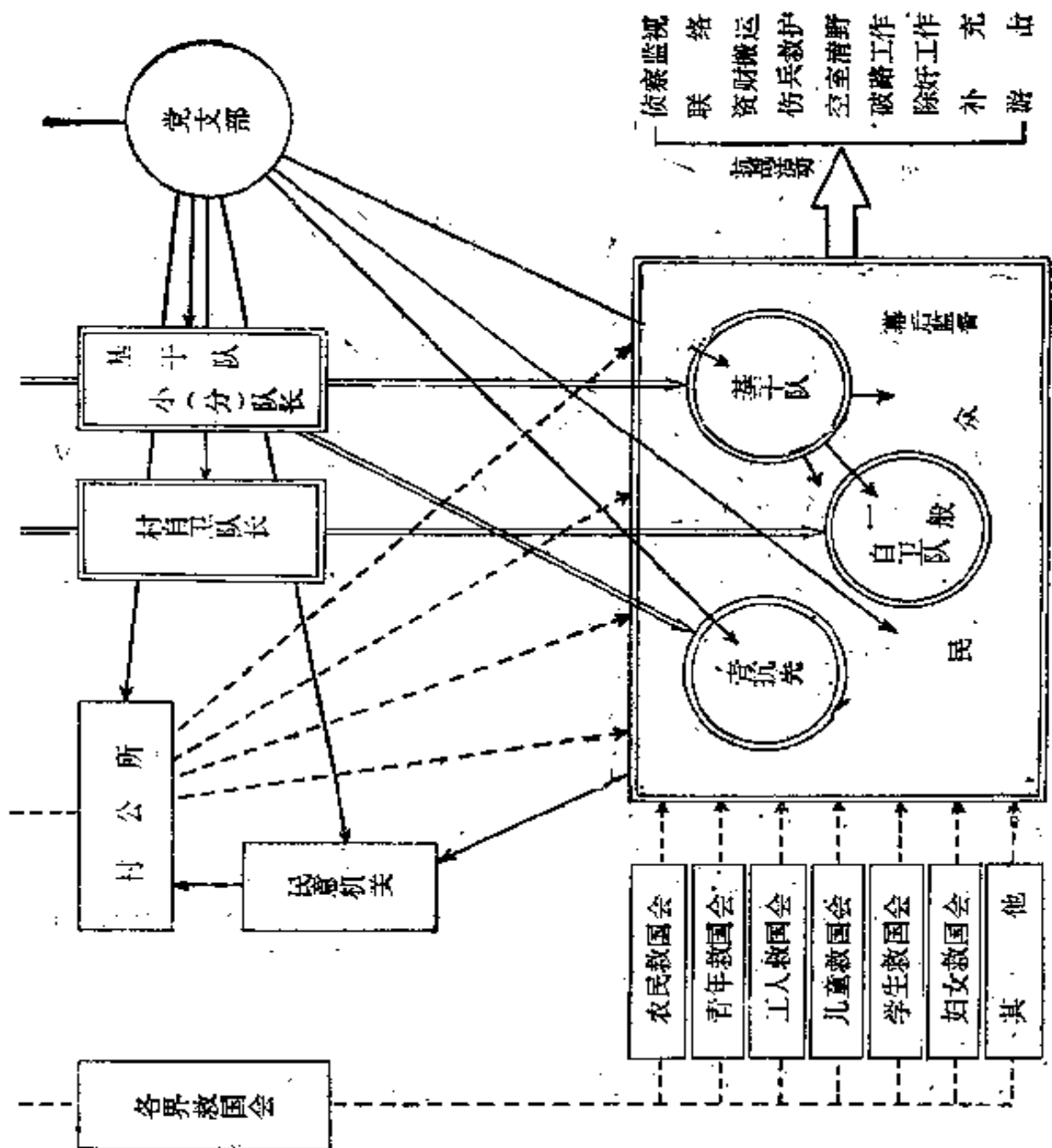
备考：企图把冀中军区部队改变为野战军、地方军，野战军（改称第三纵队）是将特定的团编成野战团，然后再将二至三个野战团编成一个野战旅。地方军则是以团为基干队，至于其它部队改编为地区队，详细情况不明。

民众武装组织系统图



民众和自卫队的人数，因地区不同很难一概而论。根据对冀中的几个村的调查，居民中有十分之一参加了自卫队，另外还有十分之一参加了积极的敌性活动的基干队。关于其组织和活动状况，参看附图。

三、本军区不仅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而且能为太行地区根据地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武器和被服的原料以及精密武器等军需品，并担负为基干部队补充人员的工作。同时又仰仗来自太行区根据地补充整训完了的兵员和制成的武器、被服。运输物资经常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护送部队。军区后方供给处设在定县西北约



中共的民众武装活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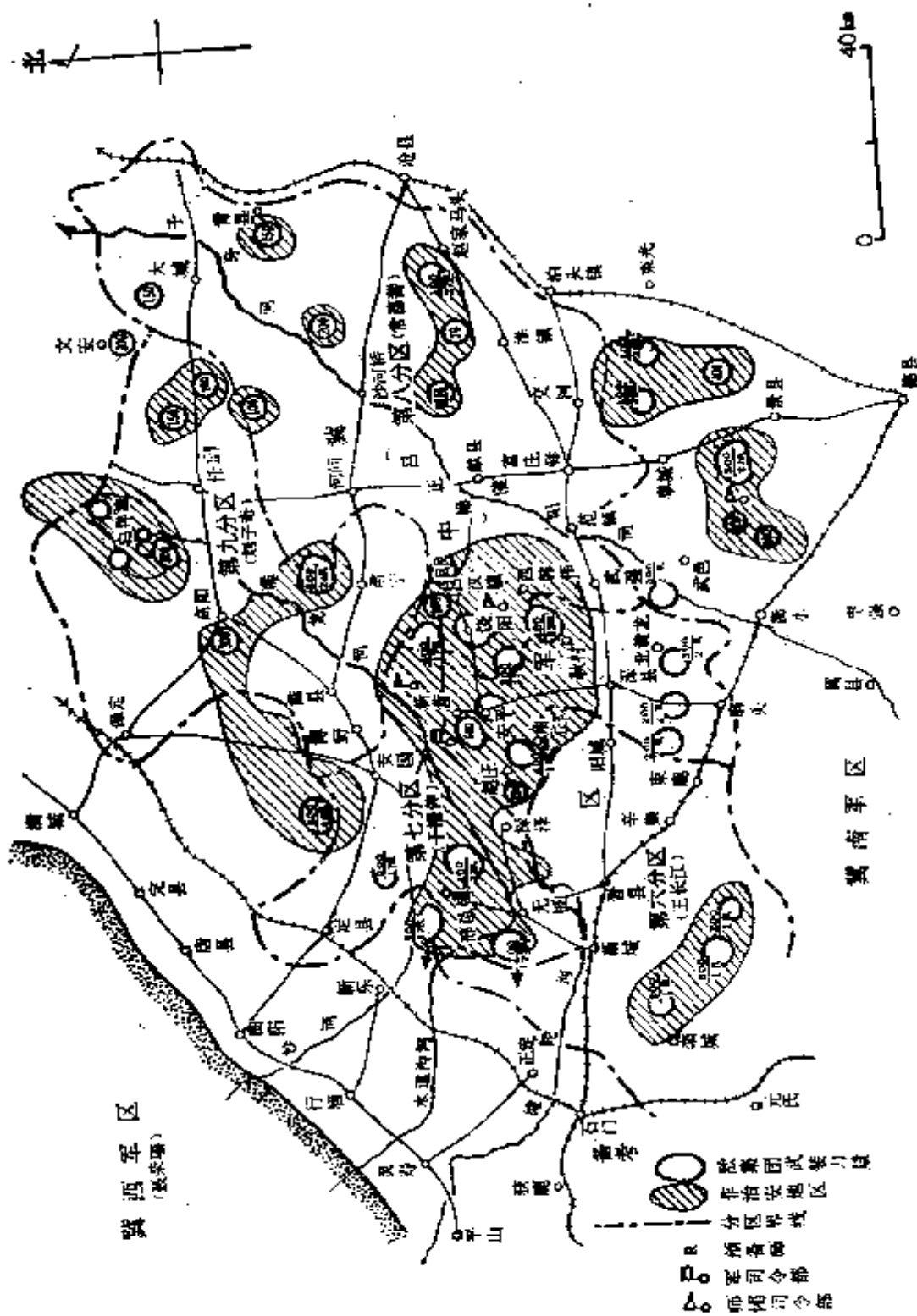


图3. 冀中地区敌情要图 (1942年3月中旬)

25公里的情醒。

四、冀中共军根据中央的一般方针，尽量避免与我方发生正面冲突，以图扩大势力、加强组织。对外则以宣传为重点的政治攻势与我方相对抗；对内则加强支援春耕的工作，以便把握民心 and 增产其所需要的粮食。

根据最近（3月中旬）的动向，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正向石德路以北津沱河以西一带地方集结，现已确实查明该地有军区司令部和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大致可判明的还有第八、第九军分区司令部，此外还可能有第十军分区司令部。估计共有第七军分区主力部队和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部分兵力的基干部队七千人，民兵约一万人。

敌担心我方发动讨伐，时刻保持警戒状态。如下达的关于春季反扫荡具体事项的决议所指示，部队和司令部要经常在小范围内进行移动。目前，有迹象表明第八军分区部队和回民支队向白洋淀东南转移，第九军分区部队又返回保定以南地区。

五、政治机构及其工作内容，逐渐脱出了军政的范围，而独立自成系统，同时要由军事的威压转变为以各种政治的措施为主。因此，为了消除本地区的敌对势力，不仅要依靠武力，而且必须投入强大的政治力量。行政区划大致要与军分区一致，特别是伪县政府作为地方行政的中心，统一管辖伪区长、伪村长。因此，必须注意，除消灭军事势力的设施外，同时还要消灭伪县政府。

六、冀中地区敌性势力的主要特征

（一）为了避开我方的武力和政治力量，以少数基干部队为支柱，有党组织渗透行政组织的小规模红色政权分布在广泛的地区内。

（二）为了弥补基干队数量上的不足，在保持生产力的同时，加强群众的武装力量和广泛动员群众。

（三）为了弥补分散存在的小规模红色地区的脆弱性，并且便于物资交流、人员移动和取得联络，各红色地区相互间进行点

线工作（设立据点和交通线）。

上述（一）项的特点是，尽管我方武装扫荡目标指向敌方基干部队，但在广泛地区分散存在的小股兵力是很难捕捉的。而且要摧毁这些基干队无需动用大兵力，必须隐蔽作战意图，予以突然急袭。

上述（二）的特点是，我方剿灭的对象虽为此等武装，但由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与生产完全结合在一起，致使匪民难分，而且由于其依靠动员民众成立的联防组织，使我方难以进行远距离的包围奇袭。

上述（三）的特点是，在邻接的非治安区中间，隔有治安地带，其中村民或中国方面的团体在表面上做出协助我方的态度，暗地里却进行资敌工作，致使我方人员、物资的移动以及切断敌人的联络都很困难。

从上述情况来看，该地区显然是中共方面党政军民结成一体进行组织活动的巩固的根据地。

注：中共方面所用“点线工作”一语，是指对大城市、铁路等进行谍报、谋略、扰乱经济等秘密工作而言。当时在北方局北方分局点线工作委员会下设有城市委员会（北京、唐山、天津）和路线委员会（塘沽、山海关），在济南、青岛还设有点线委员会特派员。

作战准备 方面军各主任参谋于三、四月间对作战企图严格保密，同时进行了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工作。此次作战由于特别重视了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攻势，参谋副长有末精三少将于4月中旬让有关政务军官在保定附近进行了现地研究。

关于情报搜集工作，自3月以来，对以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除特种情报班外，并设置了谍报班（窃听班及方向探测班），对通讯状况进行了调查。据此侦悉各

军司令部变动无常，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敌部队是否确实在作战地区以内，乃是方面军所最为关心的情况，但其动静并不明确。4月26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

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概要如下：

一、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参加作战部队与配合作战部队

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的主力（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的步兵约二个大队，第一一〇师团白泷部队（第一一〇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步兵四个大队为基干），配属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支队（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二十九大队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

配合作战部队：

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设在保定，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注：第四十一师团的编制由师团司令部和步兵团司令部、步兵第二百三十七到二百三十九联队、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兵种的第四

十一联队,以及师团的通信队、武器勤务队、卫生队、第一、第二野战医院、病马厂所组成。编制定员规定为13,836人,实际人数,包括编制内的兵员人数和军队的文职人员总共达17,055人。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编制由旅团司令部、独立步兵第三十六到第四十大队以及旅团的通信队、炮兵队、工作队所组成,编制定员为4,963人。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5月1日开始约10天)

白泷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滹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带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今邢台一译注)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5月11日开始约5天)

第四十一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川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5月16日前后开始约25天)

前一阶段(约10天)划出作战地区,反复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15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姿态,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

在此以前,各参战兵团早已开始了作战准备,兹就其主要工作加以叙述。

冀中地区,历来属于第一一〇师团的负责地区(冀中东半部则属于第二十七师团),进行了如下的治安肃正工作,

但为此次作战，变更了配备，并实行了特别训练。

（一）增强警备设施 加强各部队分驻地据点的设施，特别加强了碉堡工事。为了使少数留守部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通过筑城工事以弥补其兵力不足的弱点。为了掩护铁路和主要交通道路，将其两侧的隔断壕（治安壕、惠民壕）加以延长。到2月末，此种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3,900公里，碉堡工事约达1,300座。

（二）加强经济封锁 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由石墙和碉堡构成，石墙高2米，底厚约1米），用来隔断连接冀西与冀东的补给路线（构筑封锁线的工作量，以井陘地区中队所承担的正面封锁线约90公里为例，施工实用70日，共需10万人）。

一方面，在封锁线以内，彻底推行了治安肃正工作，特别是自1940年以来，在石门地区实行了模范地区工作，取得了治安模范地区的好成绩。

（三）揭发检举工作 为了杜绝中共方面顽强的地下工作，大力开展了侦缉破获敌对分子的工作。特别是进入1942年以后，根据宪兵队的计划和指导，对俘虏中的优秀分子进行特殊的教育，使之积极地从事特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至4月期间，被检举揭发出来的敌对分子约达6,500人。

（四）治安地区内的警备 日军出动后，为了交接警备任务，尽力加强中国方面的警备队和自卫团的教育培养工作，特别加强了各村自卫团联合行动的训练。

（五）不断的讨伐 各部队在各自的警备地区连续不断地进行了讨伐。从1月到4月，师团范围内的交战次数达2,025次。敌遗尸10,191具，俘虏6,462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军需品。

（六）改变编制及部署 师团为了改为三三制及做好冀中作战的准备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逐步变更了部署。

在师团的指挥下担任石德和石太路沿线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被调南下至顺德附近，接替了转调其它方面的步兵第一

○八旅团司令部及步兵第一四〇联队的警备任务。与此同时，新划归方面军直辖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分驻于石德路沿线地区（10个县），步兵第一三九联队移驻石太路沿线地区（7个县）由第一一〇步兵团长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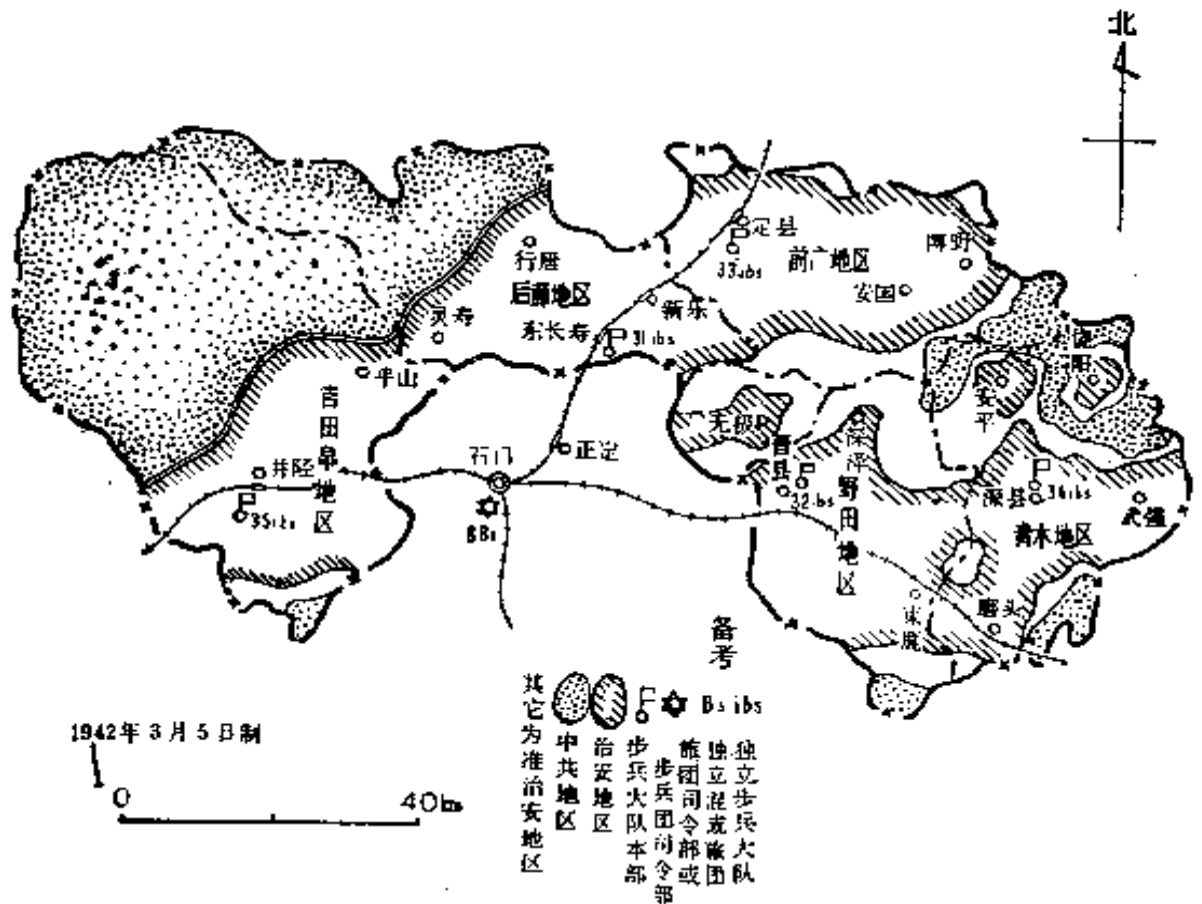


图4.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部署及管内治安状况图

（七）冀中作战准备

1. 由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抽出的部队编成为白泷部队（部队长，步兵第一一〇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各步兵大队均特设有自行车部队）。
2. 留守部队的警备部署
3. 为了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于4月25、26日在保定西北山地对冀西地区进行了讨伐作战。

自4月中旬以后，第四十一师团付出很大力量，研究训

练和编制装备以及对共军作战的方法。

(一) 撒网战法 师团在山地剿共战和对重庆军战斗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经验。但是，在大平原上对共军作战，尚无比等经验，因此，研究了以“撒网方式”作为接触敌人的基本队形，并进行了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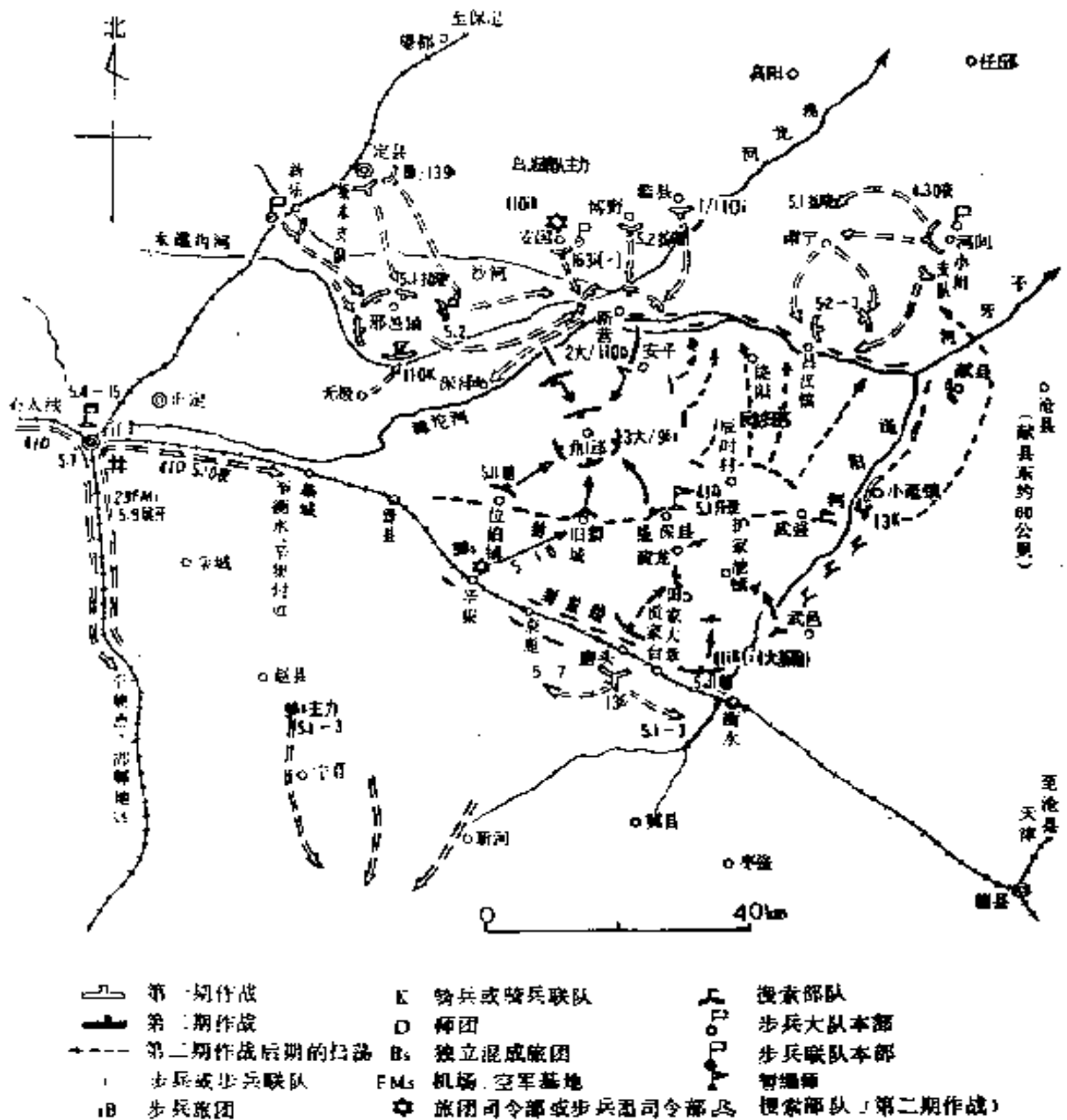


图5. 冀中作战经过要图

这种方式的队形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500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二) 部队的机动力 每个大队均编有20名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也可将这些小队分属于中队，用以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的退路（方面军从天津征用自行车，然后分配给各兵团，马匹主要是利用各部队缴获的马）。

(三) 特务工作队 此种工作队是从山西时期为了进行民众工作，特别在联队中设置的。在冀中地区，则在当地各兵团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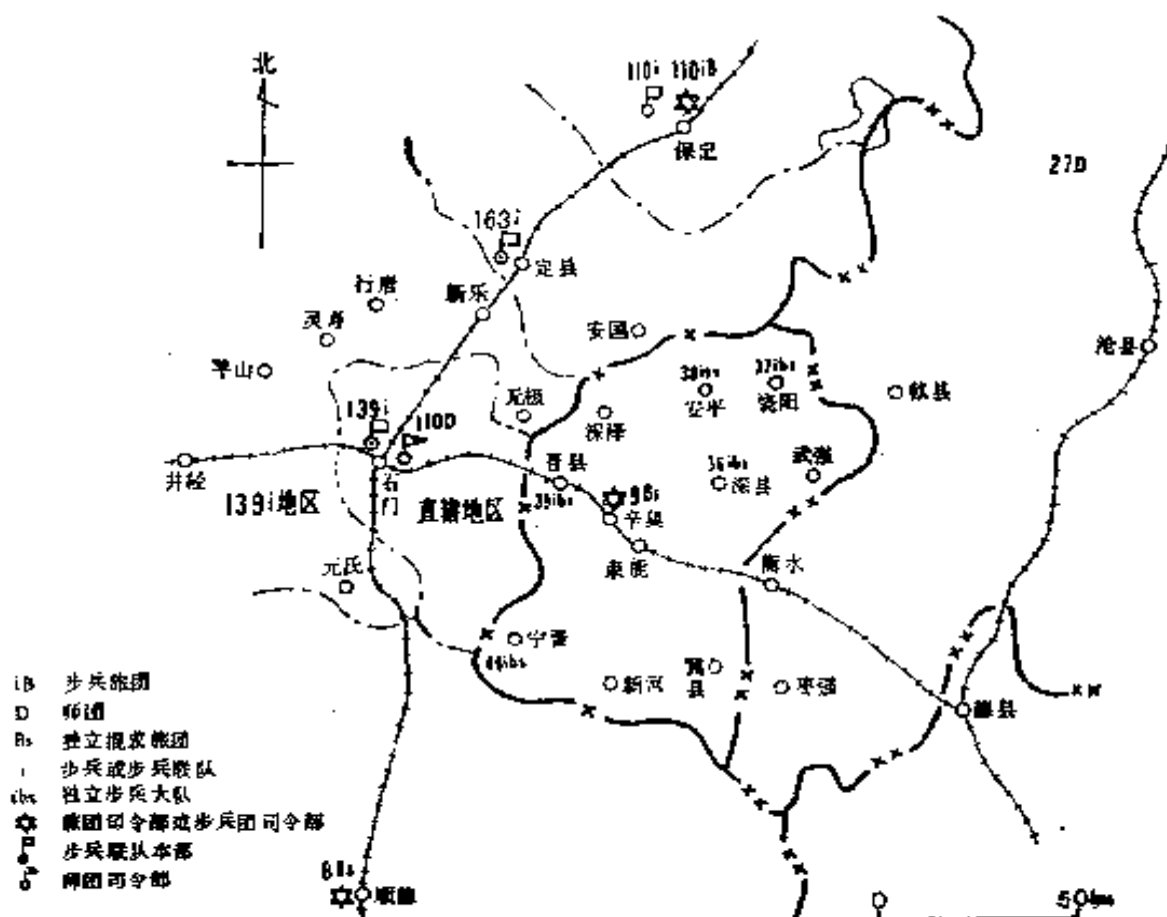


图 6 冀中地区兵团部署图 (1942年4月末)

备了与宪兵队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的政治工作班。

作战经过的概要 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一期作战（5月1日——5月10日） 小川部队在作战开始前，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地带，同时利用其一部分，把献县、小范镇间的滏阳河做为阻截线，以防止敌人东逃。4月30日，主力部队于日落后开始行动，5月1日突然袭击了肃宁以北地区的敌人，接着于5月2日又攻击了滹沱河北岸地区的敌人。敌人很快地分散开，换上了便衣，3日进行扫荡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白泲部队（配属坂本支队）于5月1日包围袭击了滹龙河，木道沟河北岸地区各处之敌，2日攻击了安平北面地区之敌，但敌人主力向东方及南方逃跑了。一部分敌人伪装分散潜伏下来。因此于3日将兵力推进到滹沱河北岸地区（邢邑镇、深泽、新营附近），分散部署兵力进行了扫荡。

在此期间，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增加了山崎部队（骑兵第十三联队）的配属，随着冀南作战的进展，击溃了有可能向北或向东推进的石德路南面地区的敌人。就此防止了敌人脱逃，同时也保护了石德路。

5月4日到9日，小川部队以河间、肃宁为据点，对子牙河、滹沱河北岸地区进行了扫荡；白泲部队如上所述对所

在地区进行了扫荡；加岛部队（骑兵第一一〇大队，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对无极附近进行了扫荡。上述各部队，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精密扫荡”，除了努力搜捕和歼灭伪装分散潜伏的或游动的敌武装力量外，并摧毁敌军军事设施，搜查隐藏的武器，严格甄别匪民，检举、逮捕敌军指挥官和党的干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中共方面似乎预料到日军要进行此次作战。在作战开始之前，我方即已破译过吕正操司令部命令警戒的电报。另外，于4月26日午夜，共军约2,000余人乘我军准备冀西作战警备兵力减少之机，向高阳东南渡河点蠡县、博野、安国各县城进行了袭击。此外，在此次作战开始之后，驻冀西的聂荣臻即命令所属各部队进行反击，第一军分区（杨成武）在易县西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第一一〇师团除加强了对冀中和冀西的封锁外，同时在情报和补给方面协助进行作战。

方面军早就在石门设置了情报所，5月4日又在该地设置了战斗司令所。

5月7日，第二十七师团以紧急电报提出了具体意见。其内容为：“综合各情报判断，三角地带内敌之主力，正在陆续向东北方地区逃避移动中。因此，方面军应变更作战计

划，调第四十一师团到天津方面，将敌军包围在子牙河、任邱、河间地区，予以歼灭。”

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角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其理由如下：

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特别是最近为防备日军的讨伐，加紧了根据地地下工事的建筑。

二、从对民众工作来看，不能设想共军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特别是在已经形成根据地的地方，使之空室清野，为了将来的生存打算，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三、即使正规军暂时逃避，而本地的军队、分区的军队和民兵还存在，而且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的不断移动，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方面军司令官也同意上述意见。然而由于担心敌人主力的北上或东进，为了防止起见，当天夜里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漳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参加第二期作战的第四十一师团，自5月初开始利用铁路输送部队，但为了欺骗敌人，先从石门顺京汉路南下移动到邯郸，然后调转过来做好进入石德路沿线的准备。5月10日在深县设置了师团战斗司令所。担任封锁任务的第一一〇师团，为了阻截敌人向西方山区逃走，也派出兵力增援白泷部队，予以配合。

第二期作战（5月11日——5月15日） 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决定从5月11日开始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的设想是：“使白泷、小川部队及骑兵第十三联队（山崎部队）从深泽南方封锁滹沱河下游和从衡水封锁滏阳河下游之线，同时使第四十一师团于10日夜利用石德路急速将兵力运送到辛集、衡水之间，从11日拂晓，首先歼灭深县东南方地区的敌军，相继歼灭安平西南方地区的敌军，以及深县、安平县以东地区的敌军。”为了进行此次作战，池上部队（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坂本支队、白泷部队的步兵二个大队）及小川、山崎两部队，统由第四十一师团指挥。

5月11日拂晓，奥村部队（第四十一步兵团长奥村半二少将指挥的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从沿石德路的展开线出发，对深县东南地区的敌军，池上部队对安平西南地区的敌军分别予以双重包围并进行了攻击。然而共军已经伪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

随后，师团于12、13日，又命该两部队对武强至安平的道路的东北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14、15日又为每个部队划出

地域，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进行了扫荡，同时命令小川部队和山崎部队搜索并攻击逃到滹沱河北岸地区的敌人。

第二期作战于15日结束。根据各部队的报告，敌人遗尸2,299具，俘虏9,525人，缴获甚多，予敌以沉重打击。

第三期前一阶段作战（5月16日——25日）此次作战地区仅限于冀中军区核心地带。中共方面则尽力确保该地，而将兵力分散潜伏下来，试图进行顽强的抵抗。因此，方面军为各部队规定了以下的负责地区，部署密集兵力进行扫荡。

第四十一师团负责扫荡滹沱河、滏阳河和石德路间的三角地带，白洸、小川部队则以连结高阳、饶阳一线为界，负责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的敌人。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师团极力搜索估计逃往任邱（白洋淀东南地区）的敌集团，设法以突然袭击歼灭之。

16日以后，各部队反复进行了负责地区内的“精密扫荡”，并进行严密彻底的剔抉，陆续取得战果。地区内的敌人，巧妙地运用离合集散的手法，千方百计地潜伏下来，逃避扫荡。

一方面，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一一〇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袭击。

在三角地带，由于对深县至武强道路以北地区进行了扫荡，敌人逐渐被压缩到深县东南地区。

20日前后，由于大体上已能掌握了情况，于是调第四十一师团主力，从23日起对该地区敌人开始了攻击。敌人的行动灵活敏捷，最初很难捕获，但在各处也有遭遇战，或者依据村庄进行顽强抵抗的敌人。在24日的扫荡中，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第三期后一阶段作战（5月26日——6月20日）方面军鉴于三角地带内尚有残敌继续游动潜伏，同时外围的敌人与之配合活动，于是自5月26日开始约以15天时间，主要剿灭沧县、高阳、望都一线以南的冀中地区的残存敌军势力，特别是清除三角地带内的根据地设施，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以期贯彻作战的目的。

为此，使白泷、小川两部队回归原建制，重新使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参加此次作战，并命令第四十一师团（池上部队配属不变）自26日起担任真渤特别行政区（渤海道及真定道东部）的警备。

各兵团由于频繁进行扫荡，节节取得战果，敌方呈现明显颓势，敌军离开根据地到处游动，现已可判断敌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因此，方面军于6月4日将后一阶段作战从11日又延长10天，企图彻底进行肃正作战，促进建设工作。

在此次扫荡战中，虽未能捕获敌人的指挥中枢，但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均使敌受到严重损失。第四十一师团以石德路以南地区为重点进行了扫荡，于6月11日~13日期间在枣强附近击溃了冀南军区部队，取得了敌军遗尸172具的战果。其后回师石德路以北地区继续进行扫荡。

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搜索警备区内逃窜的残

敌，不断进行了扫荡，同时极力设法扩大治安区。

当时步兵第一百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一千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一百六十三联队第十一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参加此次战斗的我方兵力为日军中队长以下55名、中国警备队28名，无战死者，伤者8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也取得了战果。6月12日在威县以北地区，搜索到估计有敌军司令吕正操所在的部队，并将其击溃。

在此次作战期间，中国方面的军民也协同作战，特别是在15日那天，真定道道尹率领一市十县的400名警备队，积极地参加了无极附近的讨伐，取得了成果。

参考一

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

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讨伐，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称，有一营共军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

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此后，该地区的治安迅速好转，邻接地区也受到了良好影响。

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另外，为了执行冀中作战，大队变更了部署，于当年4月由曲阳县移驻于此。负责的警备地区的面积约达350平方公里，并以每4至8公里为一警备单位，分别部署各分队驻守，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堡垒，各堡垒之间以汽车公路连接起来，随时随地均可移动兵力。与此同时，在大队和各中队设置侦察班，负责调查共军地下组织，并设法利用民众组织，搜集和迅速传递情报。

参考二

方面军本想用朱占魁在冀中进行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脱。朱为原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于1941年11月连同其卫兵被第一一〇师团俘获。方面军召见了，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二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后师团立即发出通缉朱占魁的命令，但朱终于跑掉。使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冀中（三号）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于6月20日宣告结束。方面军向大本营作了如下的报告：

冀中军区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除在白洋淀、文安地区，尚有稍为有力的集团匪在游动外，在三号作战区内仅有少数残匪（至多不过100人）。此次作战主要战果如下：

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

交战次数286次，敌方兵力58,338名。

主要缴获：山炮5门、迫击炮209门、重机7挺、轻机59挺、步枪9,101支、掷弹筒22支、自动步枪179支、自行车794辆、电话机97台。

摧毁设施：武器库58座、被服库48座、粮秣库16座、其他(从略)。

我方损失：

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

上述敌方损失，如按作战时期区分来看，随着作战的进展，战果有显著扩大，其大部分战果是由于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所获得的。一旦军民的结合被破坏，敌方有组织的情报网出现破绽时，共军的混乱情况即将如实地暴露出来。

本次作战的意见和教训 综合整理参战者的意见，其概要如下：

一、关于共军的战法

(一) 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而且由于熟悉地理情况，利用凹形道路，岔道和隐蔽的小道等，能够神出鬼没，巧妙地离合集散。

(二) 对日军经常回避战斗，情况不利时，则将武器藏在地下或洞窟中，化装便衣，很难与群众区分识别。但在意外遭遇或追及时，其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

(三) 火力装备虽然居于劣势，但携带有很多小型无线电报机，结合使用民兵、居民的通讯，通讯联络工作十分出色。

(四) 共军的平原地带的抵抗据点，煞费苦心地修筑了各种地下设施。例如在每家炕底下修筑地下室，互相连通一气，甚至有的炕下地下室通过地道与村外秘密联络点相连接，有时村庄之

间也设置联络用的暗道。地下室的规模不一，有大有小，一般能收容一百数十名兵员，还有能隐藏、储存一部分军需品的地下室。地道入口多隐蔽在寺院、庙宇、废井、堆肥小屋、堤坝、仓房、森林中，很难发现。此外，田地等的洼道、山坡等地方还设置了很多潜伏用的洞穴。

二、关于作战实施要领

要隐蔽我方的作战企图和通过严密的情报收集进行奇袭；要让讨伐部队有机动性并使分散的部队能以迅速指挥联络，特别是使各级指挥官在意外遭遇战时能独立应付；要做好侦察、剿扶、分离匪民的准备工作以对付善于进行地下工作、采取群众游击战术的敌人；要反复进行急促果敢而彻底的攻击；排除地雷、破除围墙、发现和挖掘地道，必须配备具有专门技术的部队。这些都是参战者的共同意见。

此外，第一一〇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就此次作战，讲述如下：

（一）此次作战所以取得很大成果，主要原因是增强了讨伐兵力，分离匪民工作的进展，以及中国方面的积极协力。

（二）我作战主体兵力，是新近到来对共军作战经验少的兵团，但此次作战的目标是推进治安工作，倘为现地兵团增加兵力，使之支持作战，或可取得更大的效果。

（三）象一阵风似的讨伐，并不能捕获敌人。不如从一开始就编成多数轻快机动的讨伐队，分别部署在作战地区内各要点待命，利用各警备队现有的侦察谍报和联络网，一旦接得敌情报告，立即出动，采取反复合击的“居座战术”（泡蘑菇战术。——译注）。

（四）高度分散部署的各级部队的指挥官，手中要掌握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如果能随时动用，或可收到大的成果。

在无敌情时，可以推进治安工作，不论有无作战情况，都必须深入贯彻对民众的施策。

（五）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

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

此外，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中佐对此次作战也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冀中作战，是日军对共军作战当中，在政略、战略上可以说是改进得最完善的作战，也是华北方面军努力的结晶。

通过此次作战摧毁了冀中军区，这对西面山岳地区的冀西军区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一年内共军的实力衰退了。

关于上述第一一〇师团参谋长提出的（一）（二）（三）（四）项意见，该师团在冀中作战计划阶段曾经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但方面军由于考虑到下述的理由未予采纳。

（一）第一一〇师团以京汉路沿线为根据地，第二十七师团以津浦路沿线为根据地，而冀中军区则盘据在该两师团的威力难以达到的中间地区，而上述两兵团虽配属有1—2个独立混成旅团，但因占据地域广阔，已无力在该地区扩大肃正工作的成果。而且在师团的能力方面，在其指挥下不宜增加更多的兵力。

（二）冀中地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根深蒂固的。首先以猛烈的攻击迫使敌人离开根据地，并在其党、政、军、民中间打进楔子破坏其团结，然后将该地区改建为真渤特别行政区，分散部署两个精锐兵团。经过长期努力，以建立我方的军、政、会、民的组织。当然要以分散部署兵力实行居座（泡蘑菇）战术以及贯彻治安工作为重点。

（三）对于民众工作，在政治、经济、思想、宣传等方面的措施，固属重要，但民众要依靠能保护他们生命和保障他们生活的强有力者。以压倒共军为基础，治安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方面军一贯的方针是大力推行积极的讨伐作战，而使治安工作与之密切结合。当时轻视讨伐作战的重要性，而专心致力于治安工作的意见也相当多，但至1942年对共军施策所取得的进展看来，方面军所采取方针的正确已得到证实。

三、作战前必须进行特别训练和教育

治安战是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战斗，特别是各小部队在高度的分散行动中，各级指挥官的独断是很必要的。因此，在作战准备期间，至少要对于干部进行有关与中共作战的实际训练，但不是泛泛的训练，而必须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训练。特别是对于从外地调来的部队，事先必须给以充分教育，使之了解作战地的地志、敌军及居民的动向以及历来的治安肃正状况等。山西省山岳地区的共军与盘据于平原的共军，无论在战法、地下组织以及民众工作等所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充分运用过去在该地区担任过警备部队的知识和经验，是必要而且有利的。

作战结束后的治安肃正工作 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

9月15日，第四十一师团将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纳入其指挥之下，承受了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的渤海道大部分及真定道一部分的警备任务，担负起巩固“真渤特别行政区”的防卫任务。

此时，在枣强附近的冀南军区的共军正在活动，治安情况很坏。因此，遵照方面军的指示，从9月12日至24日进行了“真渤特别行政区南境协同作战”，对枣强附近进行扫荡肃正作战。

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四十一、第五十九、第一一〇各师

团及独立混成第七、第八两旅团的一部分兵力。

紧密结合上述军事行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5月下旬真定道东部与渤海道合并，随后又将山东省德县也合并进来，设置了“真渤特别行政区”。

真渤特别行政区管辖内共有二十三个县，行政公署设于德县，由功绩昭著的冀东滦县县长雷恒成任行政区公署长官。对县政府以下人员的选拔也特别慎重，努力推行了以剿共为主，重视加强民生的崭新行政。

在此以前即4月29日，于德县设立了特务机关（机关长本间诚中佐），与在沧县的天津特务机关办事处保持联系，担任着新行政区的内部指导。（该特别行政区的设置一直保留到1943年8月。）

冀中的共军主力虽遭到沉重打击，逃避到冀西山区，但在平原地区留下各县基干队和党的地下组织坚守着牢固的地盘，以图恢复其势力。第四十一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当时为少佐）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敌人对我方的武力扫荡，以逃避为主，力求保存实力，伺机进行袭击或伏击。另一方面，派地下党员秘密潜入新民会、新政府各机关、铁路局及学校等，从中争取同志，并故意制造贪污受贿等事件，借以破坏新政府的威信，以离间民心。或者在学校教育中，一面讲授新民教科书，一面极端巧妙而顽固地宣传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等。更有甚者，向我岗楼上的日军散发传单或用扩音器进行反战工作。

因此，我方除不断进行讨伐和政治建设外，同时由对共工作班揭发检举潜入分子，和进行分离匪民的工作，并通过宣抚班的活动，开展启蒙新民运动。但是，我方要想扩大所占据的“点和

线”周围的势力圈，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当时为中佐）就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曾叙述如下：

鉴于此次对共军作战的经验，于9月召集所属全体中队长实行集中教育，并就共军的战法、对共情报尤其是侦察谍报活动、扫荡及剔抉要领、通讯联络方法等进行了现地教育。更于11月下旬结合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举办了夜间剔抉周，在各大队长领导下，各中队以几个班的兵力编成特别剔抉队（以军官为队长，全员穿便衣，包括中国人），全地区在同时进行了肃正工作。由于效果很好，因而又延期两周，其总成果超过了三号作战。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然而，治安良好地区，是否仍然是那些部队驻地及主要交通道路两旁附近地区？对此，在邻近的枣强担任过警备的步兵第二百三十七联队第二大队长渊上好治少佐的回忆如下：

（一）到9月以后县内的治安尚未恢复，在枣强西南地区行动的小部队或小队、分队的驻地不断受到袭击。

（二）配属于肃（原文如此——译注）少将指挥的反共警备队，其主要任务为收集情报，因逐渐受到压迫，被困在县城内难以行动。11月21日夜間，肃部队受到共军袭击，经日军出兵救援，才将敌人击退。当时大队长去德县参加部队长会议，县知事及肃少将也不在枣强，被敌军钻了空子。

下面再举一例。

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就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南省境相接壤的武城附近的实际警备情况，叙述如下：

我们大队（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与独立步兵第二十八大队同时配属于第二十七师团，在冀中作战期间担任河北省景县、故城及枣强地区的警备。作战结束后又返回旅团，奉命担任山东省禹城、平原、恩县、高唐、夏津及武城六个县的警备，6月28日将旧警备地区移交给第四十一师团，而移驻新防地，大队部设在禹城。

第一中队新担任武城和恩县（面积共约1,500平方公里）的警备，中队长今枝荣作中尉鉴于管辖区内的治安情况，将恩县警备委由县警备队负责，中队主力派往治安最坏的武城县，将兵力重点部署于武城、武官寨及十二里庄三处。当时武城县警备队拥有兵力约530人，分驻到各个据点。

我的小队驻在十二里庄（距中队长驻地武官寨9公里、距武城7公里、距大队部最远约80公里）。此地前任警备队曾受到共军地道战的攻击，损失重大，是个很成问题的地方。受到冀中、冀南作战相当打击的共军，仍无一定短期停留之处，而乘日军警备的空隙进行活动，特别是沿县境交界的地带都成了他们游动的道路。估计他们在重整兵力之后，可能进行相当强烈的反击。每晚对我通讯线路和道路进行破坏，对我方的小部队也进行过伏击。中队长不断带队讨伐和示威，很少呆在防地。

十二里庄是一个位于平坦开阔大平原的田地中的小村庄。原驻防部队虽已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但未完工。该阵地村庄南面，是三个每边长50米的菱形阵地连结而成的三角形（边长约300米）砖结构。这是为了可以容纳日军、县警备队及自卫团而紧急修建的。因此，我们警备队暂时住于村庄北面的旧兵营。阵地设施简陋，很多地方已经损坏，据判断该阵地对来自村庄方向的袭击，显出了防御上的弱点。

7月中旬连日降雨，高粱长势茂盛，秆长已超过身高。虽然

指示过将阵地附近的高杆作物砍倒，但恐招致民众反感而未执行。7月27日午夜，潜伏在高粱地的敌大部队突然发动了攻击（据以后调查，敌方的连长和参谋一级的人员曾混进修补阵地工程的劳工中进行过侦察，同时在当夜已将附近村庄的狗予以处置，防止了狗叫）。我小队，通常由三个分队、一个机枪分队组成，共计31名。但都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且有战斗经验的士兵，故能很快就从危险的屋里跑出，登上房顶应战。敌我相隔十几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的手榴弹象下雨似的投来，我军冒着弹雨集中火力猛烈扫射，但敌兵有如海潮反复向我方反扑。激战持续了六个小时，直到天亮敌人才逐渐开始撤退。我军立即向高粱地追击，但未能捕获敌人。这时，冲破了敌人伏击的中队主力和远处的邻接中队及大队主力的援军相继赶到。（县警备队约有80名，在教会东邻兵营内配合应战，战死数名。）

判断来袭之敌为新编第七旅的兵力约800名，袭击我中队主力的兵力约600名，袭击武城方面的兵力约600名，总共2,000名，我小队打死打伤敌人估计达300余名。我军战死1名，伤数名。这次战斗对敌人的影响颇大。其后，各驻地再未受到敌人的强烈袭击。随着治安的恢复，部队又进一步实行了高度分散部署。

回忆当时情况有如下感想：（一）我军官兵非常优秀。特别是独立分哨长，除指挥部下外，并与民众接触，且与随时都可能哗变的中国军警同居一处，十分辛劳。（二）我等非常关心民心的动向，特别注意凡是民众厌恶的事绝对不做。同样共军也贯彻这种方针，从未听到共军做过坏事。（三）作为下级指挥官的独立队长，其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全队的生命，责任非常重大，同时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中共方面的状况 根据中共方面的记录，经过此次作战

及其后的肃正工作，冀中的中共势力显然受到了很大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的叙述：

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是日本侵略军在1942年一年间所实行七十五次扫荡中最残酷的一次。日军认为冀中是八路军的后勤补给基地，花费了一年工夫进行准备工作，布置了据点和稠密的公路网，施展了“张网捕鱼”的毒计或采取“纵横合击”、“展转剔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军主力。

为了此次“扫荡”，日军动员了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再加上从全河北抽调的“傀儡军”总共调动了十万大军。敌军头子冈村宁次亲临第一线指挥，挥舞杀人的血刀，由平汉、北宁、津浦及石德四条铁路向冀中地区六百万军民进行了袭击。他们蹂躏冀中八千个村庄和六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威吓抗日人民，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主力。扫荡作战由5月1日开始继续了两个月之久。

针对这次扫荡战，吕正操将军指挥的冀中部队，收集精确的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摆脱了敌人的围攻，跳到敌后的铁路、公路及城市附近，实行突然袭击，首先使敌人陷于混乱状态，随后连同其救护部队一齐击退。

当敌人实行全面清剿时，我军主力从战略观点出发，向冀西山地、白洋淀、冀南方面等外围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

这时遗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该地坚持抵抗，与地方游击队及民兵配合进行离合集散运动，以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战术，击溃了大量的敌人。

另外，我方想出了地下战术。这种战术完全是由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军在这次激烈的反扫荡、反清扫的作战中，在险恶的情况下，取得了多次辉煌的战绩。例如，5月13日敌加道大队长（可能是骑兵第一一〇大队长加岛中佐之误）率领500名步骑兵并带着伪道尹及伪县长八名到无极附近视察占领地，我军以二个连的

兵力，在城外八华里的小吕进行了伏击。伪道尹当场击毙，加道大队长负伤，骑兵中队长以下180余人被击毙于麦田之中。这次战斗仅仅进行了45分钟。

另外，6月9日拂晓，我军二个连在深泽东北15华里宋庄做好伏击准备。数日之前，在宋庄东南的白庄激战中，敌人蒙受颇大的损失，死伤400余人，晋藤联队长战死（可能是菅泽大队长之误）。因此，新任冀渤特别区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为了去现地巡视调查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9日早晨亲自率领约300名警卫队去白庄。旅团长一行来到宋庄东北我阵地前约30米处，我军同时发射密集火力，在旅团长的近前爆炸了一枚掷弹筒弹，炸碎了他的头部。警卫的骑兵队及视察团全部战死。（以上据原书注解系出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经核对，与该书所载有很大出入，现按日文原著译出，希读者注意——译注）

此外，关于民兵的战斗情况，中共方面有如下的记载：

日本侵略军采用“为渊驱鱼”的战法，占领了冀中平原之后，为了确保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万里的汽车道路和1,500个碉堡，形成所谓的“到处都有公路，抬头可见岗楼”的状态。为了进行血腥的镇压，敌人杀戮逮捕几万群众，在广阔的大平原上，“没有不穿孝服的村庄，到处一片哭声”，怨声载道，但是，我们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正值敌人大规模修建碉堡，到处成立治安维持会时，我们游击队和一部分村干部又返回村来继续活动，仅用几夜的时间，便把分散的民兵集合起来了，刨出埋藏的武器，干掉与敌人勾结的特务和汉奸，捣毁了“治安维持会”。然后配合当地党的地区委员会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团结了广大群众展开地道战，以抵抗敌人的“包围”和“讨伐”，在抗敌胜利过程中，在该地区坚持了严峻艰苦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野心。（译注同前）

冀东作战（一号作战）

一号第一期作战（4月1日—6月10日）冀东道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北部防卫地区，截至3月份该区的治安肃正情况，上面已经讲过了。

根据方面军的指示，新年度刚刚开始，师团就以彻底肃正冀东共军根据地及其地下组织为目的，于3月下旬抽调中部、南部地区兵力，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把作战部队分为两个讨伐队，即松井讨伐队和田浦讨伐队。松井讨伐队（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长松井真二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另外也指挥中国治安军第二、第四集团以及后来的第七集团）主要担任对玉田、遵化两县及丰润县西半部的讨伐肃正工作；田浦讨伐队（中国驻屯军步一联队长田浦竹治大佐指挥的步兵二个大队为基干）主要担任对丰润县东半部、滦县南部及迁安县的讨伐肃正工作。

当时共军以遵化、玉田、丰润、迁安的山岳地带为根据地，组成小股游击队出没于各地。

从4月1日以后，该两讨伐队开始搜索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破坏窑洞（用以潜伏兵员，制造和贮藏兵器、被服）、地道，侦察搜索中共方面的行政机关及党组织。

冈村方面军司令官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4月6日赴唐山，视察了师团战斗司令部、治安军行营、驻丰润的田浦部队本部及驻鸦鸿桥的松井部队本部等，并予以鼓励。

由于此次作战，共军第十二、第十三团损失很大，从5

月中旬前后逐渐越过长城线逃入满洲国境内。因此，师团于6月上旬大致结束了第一期作战，尔后转入对该地区的肃正警备工作。

此外，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为了彻底歼灭潜伏在冀东邻接的蓟县、密云、三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派出特别工作队继续进行果敢巧妙的剔抉工作。

注：为了在冀东道进行肃正工作，一部分关东军（几个大队）奉命配属于华北方面军，然后分别归属于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指挥，主要参加了沿长城线山岳地带的肃正讨伐，其具体行动不详。根据6月1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一百七十号，关东军派出了一部分兵力；又根据11月7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三百三十三号，关东军撤回了这一部分兵力。

此外，当时热河省属于关东军防卫军所属的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是安藤忠一郎少将，由三个大队组成，编制定员2,416名，驻守于承德、古北口、青龙）担任警备。但是，由于兵力少，必要时需从其它方面增援或派遣讨伐队。

参加此次作战的松井讨伐队的行动概要如下：

讨伐队本部设于鸦鸿桥，日野原大队（本部设于朱官屯）担任北半部的警备；伊藤大队（本部设于新军屯）担任南半部的警备，分别负责进行地区内的扫荡。讨伐队的主力从4月9日在南部平原地区进行剔抉。

17日将剔抉地区推进到北部山地，实行了彻底搜索，4月22日及5月4日日野大队（大队长日野原松市大尉）剔抉搜索了鲁家峪附近的洞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5月中、下旬，松本大队（旧伊藤大队）也于玉田地区的洞窟取得战果，由于我军实行严峻的剔抉搜索，共军主力逃入了满洲国境内。

配合上述扫荡并大力开展了宣传宣抚工作，以及县政改革指

导工作，因而治安得到了显著的恢复。

此外，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中将（当时为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长）的回忆如下：

铁厂镇周围地形复杂，故搜索敌人颇为困难。而且共军斗志旺盛，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后卫部队，一直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或者巧妙地利用洞窟（在鲁家峪附近经过改造的燧石采掘场旧址，可隐藏很多人）进行了抵抗。由于我军进行讨伐，到5月底治安状况曾一度平稳下来，但至6月底前后，又出现了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及埋设地雷等情况。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及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

一号第二期作战（8月11日——9月上旬） 6月10日变更了军队部署，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奉调配属于北部防卫地区队，接替松井讨伐队的防务，松井讨伐队被调回师团防卫地区。

随着兵力部署的变更，减少了对敌的压力，因此一度逃入满洲国境内的共军，又重新回到冀东，力图重建地方基干队，其行动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由于屡次袭击了中国治安军，因此，北部防卫地区队大力开展了讨伐战。但是，7月4日在遵化县，日军一个中队，8月4日又有两个小队与数十倍的敌人交战，终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因此，师团从8月中旬开始转入第二期作战，以期进行彻底的肃正。方面军也同意，并从其它方面抽调兵力，加强了实力。根据《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史》记载第二期作战情况如下：

联队将主力留在中部防卫地区，仍然执行警备任务，联队长调集了已经配属于北部防卫地区队的田中大队、联队直辖部队的

主力、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的中谷大队、第一一〇师团的大江大队、驻蒙军的面高坦克联队、山炮兵联队的高桥中队、汽车队及一部分宪兵队编成松井讨伐队，由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少将指挥，并指挥中国治安军，负责执行遵化县及玉田县大部的肃正任务。

联队长于8月11日进驻冀东道统辖上述各部队，首先派田中大队负责继续进行玉田地区的肃正建设，13日主力部队开始行动，开进遵化平原地区，极力设法搜索歼灭敌人。敌正规军主力逃往管辖区以外，其余部分各伪县基干队四散在各地潜伏下来。因此，从8月17日将各主力大队分散部署，对平安城平地、长城南侧地带及遵化平地进行扫荡，并灵活运用机动主力进行果敢的攻击。

东侧邻接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也同样在其警备地区内一日不停地继续进行活动。此外，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也从8月17日到9月27日对蓟县方面展开肃正作战，以后并持续进行各项肃正工作。

第二十七师团继续作战，从9月中旬进入“一号后期作战”，其经过情况将另行叙述。

总之，中共以该地区为其通往满洲的道路，极力设法扩大其势力。因而对此种形势，方面军也是不容忽视的。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及一二九师仍盘据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太行山脉南部的陵川、林县附近为重庆中央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及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华北保持的重庆方面的唯一据点，彼等专心致力于保存实力。在其北部地区因与共军争夺地盘正闹矛盾。

作战准备 第一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但是，如前所述，第一军的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九旅团已被抽调出去，4月29日又奉命将步兵二个大队、山炮三个大队及工兵一个联队派往华中第十三军。因此，就必须使第一军隶属下各兵团的主力参加此次作战。然而，根据对伯工作及警备地区内的治安状况的变化，恐怕不得不考虑缩短作战的期限。

各兵团为准备此次作战，采取了如下的编制，在战术上加以革新，并且实行了准备训练。

（一）以步兵大队为单位，编成支队。

（二）各支队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务工作队（进攻时担负挺进和搜索任务，在支队转移分散部署之后，担负搜捕敌人首领、剔抉地下组织以及扫荡村庄内部等任务）；俘虏工作队（处理居民和俘虏以及收集、调查情报）；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此等工作队。

（三）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

分别准备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约100名组成）。

（四）在第三十六师团关于作战准备的指示中，其编成装备有如下的规定：

1. 参加作战部队的编制：

步兵联队：联络本部、步兵三个大队、步兵炮中队（由配备联队炮二门编成）、通信队（五号无线报机5台、小型无线报机6台、电线20盘、电话机4台、对空联络班1个），均为乘马小队。

步兵大队：大队本部（对空联络班1个）、步兵三个中队（编制为80名时，分编成二个小队，各配有重掷弹筒4个、轻机4挺；编制为90名以上时，分成三个小队，各配有重掷弹筒4个、轻机6挺）、机枪中队（由重机4挺、大队炮1门编成）、作业小队（包括队长共约20名）、俘虏工作队（包括队长共10名，队长由下级军官担任，兵4、中国人5、翻译1）、特务工作队（队长以下约20名，以宪兵下级军官为队长，用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使用常设人员）、挺进杀人队（临时编成）以及行囊被服等。

山炮兵大队：由大队本部、山炮二个中队（每一中队配备山炮2门，另装备步枪若干）编成。

2. 参加作战部队的装备

弹药：以每种武器单个计算，步枪120发、轻机1,000发、重机3,000发、重掷弹筒40发、大队炮60发、四一式山炮100发、九四式山炮100发、除上述弹药外，步兵每人携带手榴弹2个，各大、中队配备必要的信号弹及发射烟雾筒。

粮秣：每人4天的粮食、每匹马4天的草料、行囊供3天用。

被服：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露安领取。

3. 其他

步兵中队的行囊，由大队集中解决，中队行动时，经常不配备马匹，作战时不使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因此，要从第二、第三大队抽调步兵一小队归联队直接调遣，留守警备兵力则由各中队四年老兵约20名、新增兵及教官、助教、助手及伤病号、锻炼兵（乙）班、各本部负责治安的军官等组成。

此外，各队应对作战企图极力保密，同时在石太路以北和京汉路以东地区进行侦察及肃正讨伐活动，设法欺骗敌人。

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期作战（5月15日—5月23日）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对在东峪村及沁河河谷马壁村附近的共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进行了扫荡，但敌人巧妙逃脱了。第三十六师团19日返回，一面扫荡浊漳河河畔，一面转入下一期作战。第六十九师团的参加部队继续在沁河河畔地域进行扫荡作战（步兵第六十旅团长太田藤太郎少将指挥步兵三个大队进行扫荡，截至月底，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师团原定在中条山脉东部地区进行讨伐，即“卜”号作战，但因对山西军作战而延期，改自26日实行）。

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部队第一一〇师团指挥下的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于18日以后逐渐开始行动，对涉县北方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三十六师团也于23日进至其西面及南面，从

而全军完成了对共军的包围圈。

第二期作战（5月24日—6月7日）第一军对共军的中枢部以具有纵深面的包围形势开始进攻，摧毁敌集团战斗力之后，遂在封锁线内分散部署兵力，预定在大约20天内实行彻底的扫荡剔抉工作，但根据全面情况，缩短期限为15天。

23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向各兵团发出电报，督励嘉勉第一线官兵继续奋战。

24日晨，各兵团同时由各出发线开始进攻。从第一天开始，在各地与大大小小的敌人部队发生冲突，反复多次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当时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有效地协助搜索敌情和对地面攻击。25日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搭乘直接协助作战的飞机进行了现地指导。26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第三十六师团正面的敌人已被击溃四散逃跑。

27日各兵团转入分散部署，随后进行了扫荡剔抉工作。在此期间，第三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联队长高木正实大佐）于26日突入梁沟，摧毁中共最大的武器库，缴获了大量的各种武器及器材等。此外，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联队长安达与助大佐）追击敌干部团，取得了相当战果。

从27日到29日各部队在各地俘虏或剔抉出100—200名敌人，逐渐扩大了战果。我军从空中对山里逃出的零星共军，散发了劝降传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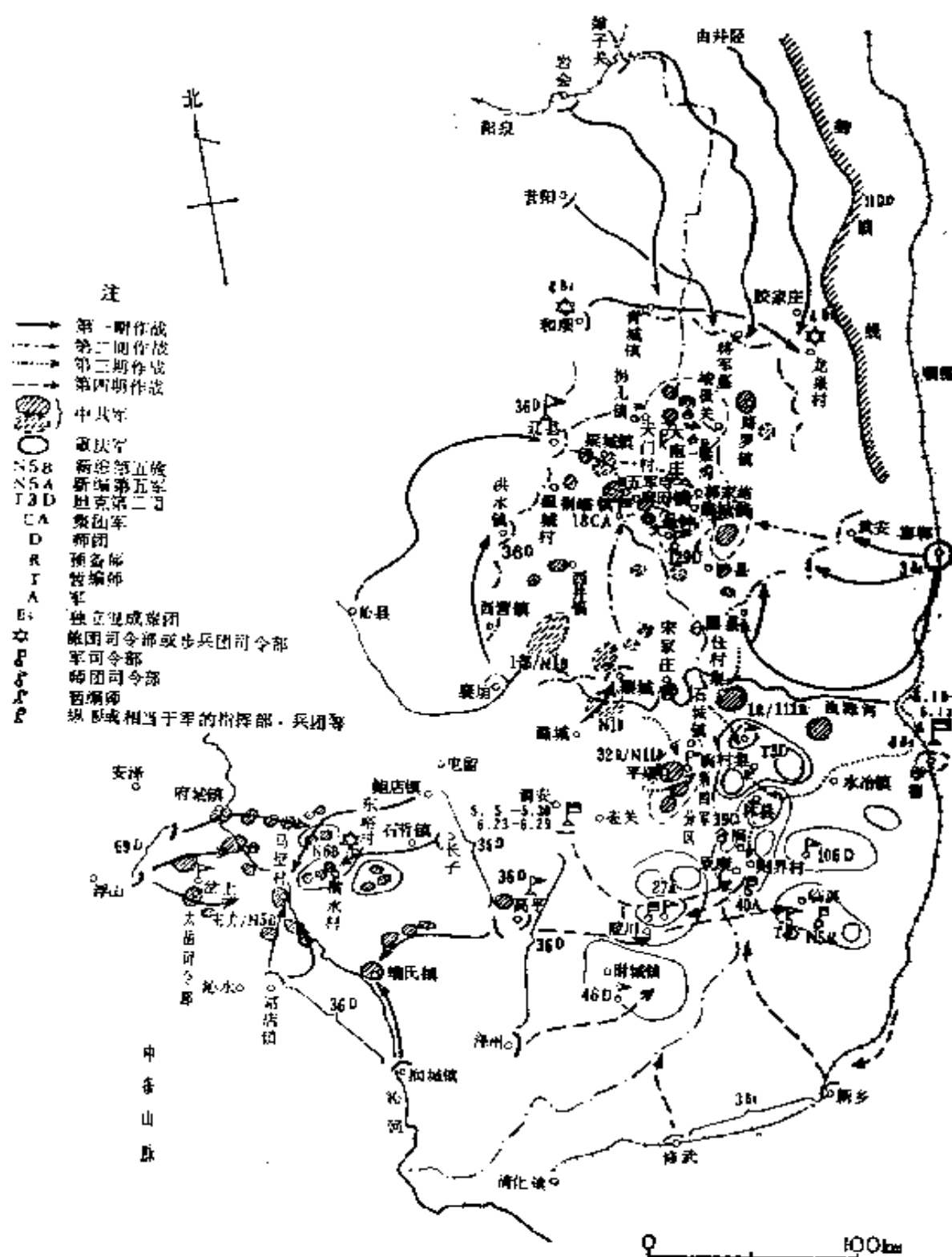


图7.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经过要图
(1942年5月15日—7月20日)

自30日以后，各部队以挺进部队为先锋，进一步对敌中心根据地发动神速果敢的进攻，尽力剔抉、扫荡敌对分子，特别是搜捕敌干部、毁灭敌根据地设施以及收集敌人的物资。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益子挺进队的灵活战斗。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1日，在主力进攻之前，先行潜入敌后，特别搜索驻在五军寺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24日黎明前，在郭家峪奇袭敌军军部，经过一场混战后，敌人被迫溃逃（以后判明在此次作战中，副军长彭德怀负伤、参谋长左权战死）。随后于30日晨，在天文村附近（拐儿镇东方4公里）袭击残敌并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等，屡建战功。

当时，在第三十五师团防区正面的重庆第一战区军，对驻在黄河南岸霸王城的我师团桥头堡阵地反复进行攻击，同时为了与山西省内重庆军取得联系，以黄河北岸沁河西侧的温县中心地区为桥头堡，继续活动。师团于6月秘密调动步兵第二百二十、第二百二十一联队向沁西地区移动，3日清晨急袭黄河北岸的敌人，并予以毁灭性的打击，随后在附近一带进行了彻底剔抉工作（即沁西地区肃正作战）。因此，黄河北岸的据点已被扫清，其与山西省内的联系也被切断，敌第一战区军只能派遣挺进纵队到我师团占据地区内进行扰乱。

第三期作战（6月8日—6月19日） 第一军决定暂缓

对山西军作战，先行击灭浊漳河南方的共军，乃于5月13日向各兵团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此次作战的设想是：命令第三十六师团从西方、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东北方、并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一部分兵力从东南方对平顺东方省境附近的共军构成封锁线，由6月10日逐步开始进攻。同时，并准备调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主力攻击林县附近的重庆军第四十军等。（变更为攻击第四十军计划的理由是，因为它妨碍击灭共军的作战；又据判断当时敌军的士气低落，正是击灭它的好机会，同时给第四旅团以立功机会。）

7日夜各兵团开始行动，10日发动进攻，当天在彰德设置了军战斗司令部。

第三十六师团攻击平顺附近的共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击任村集附近的共军，并分别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取得了相当的战果。然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虽然击破了林县、姚村集的重庆系敌部队，但敌暂编第三师凭借崔底（林县西北约12公里）附近天险，设置复郭阵地，坚持顽强抵抗。

旅团从13日奋力攻击，第三十六师团也派出一部分兵力（步兵第二百二十四联队第三大队长柿昇少佐指挥的部队）协助作战，15日占领该地，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大队长安尾正纲中佐）的山本中队（中队长山本好江大尉）通过巧妙勇敢的工作，俘虏包括敌师长在内的多数敌人。

随后旅团返转回来对林县南方地区发动了进攻，排除敌人的抵抗，18日占领了原康村盆地。第四十军主力似有向南

方及陵川方向退避的模样。

第一军依然在作战地区内对敌对分子进行剔抉扫荡，并继续摧毁根据地设施，同时接受第三十六师团的强烈要求，决定歼灭陵川附近的重庆军第二十七军。第一军于6月15日发布关于准备下一期作战的命令。

第四期作战（6月20日—7月20日）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于20日从原康盆地出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22日从新乡和修武北侧地区出发，分别向省境线挺进。第三十六师团在泽州、高平、潞安部署了作战准备之后，24日向第二十七军主力开始了攻击。因敌人迅速撤退，师团立即追击，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至临琪附近，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追击第二十七军军部，进入陵川附近。

第一军于7月上旬，命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先后返回原驻地。同时，第三十六师团至7月20日以前继续扫荡残敌、摧毁根据地设施。

步兵第二百二十三联队在继续扫荡原康盆地的残敌过程中，从30日到7月2日之间，猛攻则界村的敌复郭据点，遇到敌人极其顽强的抵抗，付出很大损失后占领了该地。

注：第一军通过多次肃正作战，取得了大的成果，特别是摧毁了大量的军事设施和军需品，打击了正在重建中的中共第十八集团军。然而在方法上，尚有需要检查批判之处。如军的统帅过于武断，对于与作战密切相关的治安工作及掌握民心方面缺乏办法。此外，对部队进行了不适合第一线实际情况的不合理的指挥，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而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

之利。

山东方面的作战

第二次鲁东作战（S号作战）（3月25日—4月15日）
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及海岸地带的共军和蒋系游击队的势力尚未壮大，但从年初以来渐趋活跃。遵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计划，第十二军在当地海军部队的配合下，对上述敌军进行围剿。为此，于2月底前后进行了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当时担任该广大地域的警备任务的是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

3月25日第十二军派出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内田银之助少将）、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旅团长盘井虎次郎少将）开始了扫荡作战。两旅团主力奉命迅速东进，击败了驻锯齿牙山、青山及招远根据地顽强抵抗的共军，于月底占领了该根据地。（以上为第一期作战）

尔后，到4月中旬为止，摧毁该根据地的设施，扫荡残敌。另一方面，在半岛东部地区，与当地警备队、海军部队相配合，扫荡了威海卫、文登及石岛附近的敌军。（第二期作战）

但是，由于地域广阔，不能给敌人以彻底的打击，日军撤走时，敌人又开始了活动。因此，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于5月21日开始以大约一周期间，又于7月7日以大约一周期间对鲁东中部共军进行了围剿。

除上述之外，由于共军山东纵队力图在各地扩大势力，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于6月上旬对鲁北（黄河河口）地区进行

了扫荡，第五十九师团（新编）也于6月初对新泰、莱芜东方山区（济南东南方约100公里）、随后从6月8日到12日对馆陶（济南西方约150公里）附近进行了扫荡。

注：锯齿牙山名副其实，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险峻山脉，正在建设指挥联络部、武器工厂、军需品仓库及医院等，将来是中共胶东军区最大的据点。

第三次鲁中作战（は号作战）（8月12日—8月15日）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的蒋系军盘据在山东省中部高山地带，经常受到日军的讨伐，并常常遭到共军的蚕食，不断发生部队投降日本方面的事件，其势力逐渐衰退。

第十二军在结束冀南作战之前，调出一部分兵力，从5月中旬开始对益都、沂水道东侧地区的于军发动了攻势（あ号作战）。于军遭受打击，日益陷于困境，加以共军的策动，于8月3日突然爆发了兵变。怀有不满情绪的第一一师包围了于学忠司令部。于学忠冒险突围后，于5日夜将叛变部队镇压下去。

第十二军为了乘于军内部分裂之机捕捉于学忠，调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发动了鲁中作战。两旅团于8月12日晚开始秘密快速前进，预定13日黎明前构成以坪头（莒县东方约30公里）为中心的半径数公里的包围网。但是，由于南部包围部队的行动迟缓，于学忠终于逃脱。我军立即对坪头南方地区实行了扫荡剔抉工作，虽予以重大的精神打击，但并未达到作战目的。

其后，我军进一步对于学忠的行动进行了侦察，8月20

日开始了第四次鲁中作战(九号作战，直到30日)。21日于唐王山(沂水东北约50公里)附近击败于军主力，搜索其司令部并进行了追击。在此次作战中，俘虏包括于军高级参谋在内达733名、遗尸1,861具。于学忠再次脱出，证实于学忠负了重伤。

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长田副正信大佐，曾担任诸城、莒县、日照地区警备，并参加过山东各地的讨伐作战，就其亲身体验叙述如下：

一、1942年是蒋系军势力减弱，中共军逐渐积蓄势力的时期。于学忠的司令部受到攻击，几乎被俘，在我军松一口气的时候，终于跑掉。蒋系匪军动摇甚大，4月有莫正民匪1,470名投降，6月有张步云匪3,000名、9月有张希贤匪、李永平匪要求投降。由于经费关系，难以接受，但从治安工作来考虑，又不能置之不顾，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二、共军固守在山岳偏僻地区的根据地，对日军不强行抵抗，而与蒋系军为争夺地盘进行着激烈斗争。其宣传工作极为巧妙，将非武装的居民培养成自己人，用以进行联络监视、收集情报等军事行动的辅助工作，不断地扩大其潜在势力。

三、山东省的山区，多为岩石秃山，在山顶上以前就筑有岗楼、石墙，敌人利用作为营寨，为我讨伐行动造成困难。

四、我大队官兵现役兵少，因此特别注意维持军纪，消除“三恶”，同时由于是进行特殊的对匪作战法，采取了边作战边教育的方法，以期提高训练效果。

蒙疆方面的作战及警备

中共势力对于蒙疆地区，是从山西省晋西北军区北上向阴山山脉内渗透；肖克指挥下的北上挺进军继续深入察南、

热河、河北省境的山区地带。

方面军为策应第二十七师团对冀东的作战，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为主力，并以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一部分兵力，从7月上旬以来，继续扫荡平北共军十二分区（龙门、赤城、延庆、昌平、怀来），摧毁其根据地，作战至8月底结束。（平北肃正作战）

此外，驻蒙军以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及骑兵集团的一部分兵力，从7月底以来，讨伐在厚和东北阴山山脉地区内活动的绥远游击队，并在该地区进行肃正工作，至9月2日结束（か号作战）。在此期间，骑兵集团主力渡过黄河向鄂尔多斯平原进攻，击败重庆第八战区新编第三十二师，制止其活动（6月5日—10日）。

平鲁地区的治安战 历来蒙疆地区在表面上看来，较华北其他方面的治安情况良好，并曾多次从这里抽调兵力到华北和华中方面作战。但是在这个地域内担任警备的各部队，并不是那么轻松，终日无休止地讨伐，同时还得煞费苦心进行肃正建设。

大青山的中共游击队 阴山山脉地区的讨伐也极为困难。在该地带曾追击过马占山，结果功亏一篑被他跑掉（马占山于满洲事变后，逃窜到黄河南岸鄂尔多斯建立起根据地，依附于重庆方面，企图伺机东山再起，并于1938年4月破坏京包线之后遁入阴山山脉地区。第二十六师团击败马占山，继续追击，企图割下马占山的首级，虽然歼灭其警卫连，但未能捉到马占山）。由于地域广阔，多属未开垦地，难得捉住敌人的机会。

另一方面，共军在该地的处境也极为困难。从下述记录中可以想见其艰苦的情况：

大青山(西部阴山山脉)地区是一片宽广无际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但敌人据点并不稀疏。飞机到处都可以降落，汽车能随意通过，骑兵更可任意行动。因此，使我军时刻都处于战备状态。在反“扫荡”期间，我军骑兵队不分昼夜行军和战斗。有的营半年不能脱衣睡觉。而且有的政委率领少数部队进行游击，连续十二小时没有下过马。骑士们提出口号是“马不离鞍，人不离枪”。我们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一夜之间行走一百多里，迂回一大圈出没于各处。因村庄稀少，有时需在山上露营，并且必须在大雨或大雪中继续行军和战斗，其艰难辛苦的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但大青山骑兵支队一天天扩大起来，使敌人感到越发难以对付。

骑士们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及道路，所以不需要群众当向导。这在沙漠作战中特别重要。支队副政治委员宇达志同志由乌兰花到晋西北的偏关地区，来回走过几次，从未迷过路。

1942年7月的反“扫荡”，是最艰苦的战斗。敌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前来进攻，高原的战况变化很快，敌人又不断移动，反复进行攻击。烧红的枪膛未凉就开始了下一次的战斗。但是，骑兵并未受到一点损失。

到了第七天战斗打响时，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骑兵队的行动仍很敏捷。这一天敌人合围了三层严密的封锁线，他们在高地上构筑阵地张开了大网。在天明的同时，敌人骑兵踏入刚刚成熟的绿色田野，身穿便衣的特务对各村一户不漏地搜索，群众东奔西逃。打破高原早晨的寂静，使这里立即陷于一片骚动混乱之中。

骑兵做好了绵密的突破包围计划，暗暗地钻出包围网的空隙，一阵暴风雨般的马蹄响声过后，骑兵们向地平线上的铁路线猛冲过去，铁道守备队大吃一惊，说是“八路从山上跳下来的，

从天降下来的”。敌人虽出动石黑部队（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但山上连骑兵队的影子也看不到。汉奸及斥候还在搜索期间，骑兵早已在雨中连续十四小时夜行军，避开敌人的耳目撤走了。不久，敌人察觉到骑兵的下落，围攻过来，骑兵又从山上不翼而飞到山下去了。敌人用汽车追来时，骑兵又回到山上，成为马和汽车展开捉迷藏的战斗。

骑兵队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茁壮地成长起来，最后被削弱的不是骑兵队而是敌人。（以上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原文核对。——译注）

夏季占领地区内治安概况 及肃正建设的成果 ——中共方面的政治攻势

占领地区内各种设施所受到的匪害（主要是中共游击队及特务工作人员进行的破坏和袭击等），由于春季实行了肃正作战及彻底的剔抉讨伐，进入夏季以来便显著的减少。6月份的匪害为420件，7月份减少到322件。而8月份的匪害件数增加到583件，但各次事件的规模很小，只限于局部地区的活动而已。9月又减少到484件，并略呈消沉状态。

根据方面军得到的情报，这是由于中共方面改变了战术的缘故。中共指令自“七七”事变纪念日起，以两个月期间展开政治攻势，将工作重点置于对中国新政府的武装团体及治安区、准治安地区民众的宣传。因此，虽仍采取历来破坏交通线以及利用小股部队进行袭击的方式，但以所谓“对伪军、伪组织工作”，对新政府军警小据点进行频繁的谋略袭击，暗杀亲日要人，毁谤和胁迫下级官吏，以及利用反战团

体对日军官民和朝鲜人进行思想谋略等，这是从未曾有的特殊情况。此外，“平原地区的重建工作”也因秋收迫近，正在极其顽固地进行活动。

针对以上各种动向，华北方面军做出判断：“对于中共的反攻准备工作和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的企图，以及处心积虑要打开现状的策动，仍需要加以戒备。”

如上所述，夏季中共方面的军事行动不甚活跃，在另一方面却显示了我方肃正建设的进展。9月30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以“华北军第二、四半期（第二季度）”为题发表了以下谈话：

第一、四半期（第一季度）方面军的肃正作战，是以河北省及其附近地域为重点，展开全华北从未曾有的彻底的歼灭战，进行了一次治安肃正总演习。在本期内，一方面继续积极作战，一方面大力扩大治安圈并加以巩固。由于采取适当的措施和高粱茂盛期的攻势作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本期的交战次数为3,180次（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1,843次），交战敌兵力429,119人（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40,220人），敌遗体113,861具，俘虏16,158人（下略）。

交战敌兵力和战果的比率都有提高，特别是投降兵颇多，达7,967人，达到去年同期的二倍。

（上面的数字是重庆军和共军的总数，其中关于中共军的数字不详）

此次肃正作战得到民众的协作，进展颇为顺利，敌战斗力显著下降。

另一方面，华北治安圈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正在稳步进展，由于协助作战的农民作出牺牲，提供义务劳动，在治安地区和非治安地区中间挖掘的隔断壕，总长达11,860公里，而且封锁敌匪活动的确

堡阵地超过7,700个，华北治安圈逐渐扩大起来。

方面军将确保治安作为根本问题，特别重视粮食及物价问题。本年度的小麦生产，虽然能保持常年的收成，但尚不能指望粮食自给，仍需输入南方大米或由日满两国予以补充。物价对策方面，也逐渐调整机构，其它措施也均顺利进行，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加强力量贯彻实行。

注：华北方面军对中共方面从7月开始的“政治攻势”有过于轻视之嫌。后来方面军纠正了此种认识，注意观察中共的抗战方针、策略，在制定1944年的“剿共方针”（方面军参谋部制定）中，曾有如下判断。（摘要）

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近几年来，我军对敌根据地进行歼灭性的讨伐，共军除保卫根据地活动之外，不容其采取大规模行动。

中共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从1942年以后迄今，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积极开展三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中共的反攻，决不是以军事为重点，而是采用政治谋略进行工作，以离间瓦解敌对政权和民众，到一定时期，使之从我方阵营内部起义，从外部则以中共兵力响应，以期采用中国自古以来的里应外合战术。

第三章 1942年度下半年的 治安肃正情况

一、整个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

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准备工作——

——从设想四川作战到准备工作的中止

在南方，5月7日攻克了喀雷西多尔要塞。在缅甸方面，到10日为止基本上也占领了全部主要地区，5月18日南方军已完成了既定的攻略作战。

但是，在这以前，4月18日美机首次空袭东京，给日本的战争及作战指导带来了很大影响。就是说，增加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关心，诸如对国土的防空，对苏联的警戒战备，使用陆军兵力参加南方作战占领区外围主要地区的攻略作战，以及摧毁被利用于空袭日本本土的中国大陆空军基地（即浙赣作战）和进攻四川的作战等。

中央统帅部已看出，按当时的形势发展下去，不可能解决中国事变。但又迫切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在大东亚战争结束之前，迅速使之得到解决。陆军上层人物很想把攻占重庆做为确立日本不败体制和促进结束战争的手段，但中坚阶层对

这一想法则较慎重，并对其效果抱怀疑态度。在中国派遣军中，除总司令官之外，似乎也都不太热心。只有华北方面军从过去就在研究对重庆压迫作战，一有机会就与中央联系，建议进行西安作战。

注：畑总司令官的积极态度是认为“用国民政府与重庆政权真正合作的办法来实现全面和平是不可能的。除采取政治、军事上的攻势外，没有其它解决事变的途径。”

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研究各种处理事变的方案后，认为“如听任重庆政权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美国的强力支援，恐将造成全中国的游击化，促进以中国内地和印度为基地的空中、陆地反攻的准备工作，以及抗日赤化工作在整个中国全面开展。因此，在确保占领地区的工作中，必须将确保适应长期战的资源地区放在第一位。进而有必要重新检讨对付美中联合作战的政策战略要点，以及确保重要交通线、航空、潜艇基地等问题。不能听任敌人战斗力的增强，必须以积极的武力行动做为主要对策。”

5月16日田边参谋次长来南京，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考虑在9月左右开始实行西安作战，然后根据情况于明年4月进行四川作战。希望在6月底以前制订出西安作战计划”。派遣军总司令官命令华北方面军进行此项研究工作。方面军于6月15日将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制订出该作战方案，由安达参谋长带往南京呈报。当天在总司令部进行探讨后，派遣军与方面军的有关人员立即前往东京，在参谋本部共同研究直到20日为止。

此后虽然中央统帅部、当地军方继续对作战计划进行了研究，但中央统帅部却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是因为不但要考

虑进行此项作战对国家机动力量的影响和对作战效果的怀疑，而且有必要对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做更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

在此期间，形势继续急遽变化。经过5月7日的珊瑚海海战、6月5日的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攻势已处于停滞状态。在陆军方面，正按照年度计划致力于部队的调整、充实北方战备、加强南方主要地区防卫力量等工作，以期确立长期不败的战略体制。但因德、意两国在北非的战况有所好转，日本又产生了日、德、意合作促使英国屈服的希望。因此，陆海军都很关心印度洋方面的作战情况，从6月下旬开始，对四川作战的研究工作也显示出很大热情。

7月9日参谋总部起草了“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准备纲要”，在陆海军部之间继续进行研究，但在物资供应、对苏战备问题上仍得不到解决，同时，对作战效果、影响等问题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

正当此时，美军于8月7日突然袭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了反攻。参谋本部也逐渐重视起这方面的战况，并不得不考虑在这种形势的重大影响下能否进行四川作战的问题，但是对此形势未必具有充分的认识。

8月25日，向天皇上奏起草的“根据目前形势陆军方面的作战准备”的文件中认为：

“鉴于1943年下半年以后英美，尤其是美军的战斗力将有明显增强，在考虑必须在此以前力争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达到战争目的时，1943年陆军作战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要以对华积极作战为

指导战争的最大目标。”

“对华积极作战的设想”，其内容大致如下：

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的主力，占领四川省的主要地区，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中国派遣军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另一部分兵力从宜昌方面向四川平地进攻，消灭敌中央军，攻占重庆及四川省主要地区。在此期间，应以最小限度的兵力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同时，应使武力作战与对重庆的政治谋略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方针，应在1943年春由一个方面军（以十二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为基干）从山西南部，另以一个军（以五个师团为基干）从宜昌方面开始进攻，各自击破当前之敌。方面军应确保西安平原地区并前进到广元（西安西南约350公里）附近；从宜昌方面出击的部队应前进到万县（宜昌西方约300公里）南北一线，各自做好以后作战的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发动攻势攻占重庆和成都，占领四川省主要地区。

在上述作战期间应以十五个师团、十四个混成旅团担任确保已占领地区的安全，并在必要的方面牵制敌军以利于进攻作战。

本作战使用的兵力以中国派遣军为主，并从国内、满洲及南方抽调部分兵力增强编制。

8月24日至26日，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的有关参谋对上述设想的详细计划、作战准备，特别是有关航空、兵站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

与准备工作的情况相反，在此期间整个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索罗门方面战况的激化，物资供应、船只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央统帅部的沉重压力，因而减少了决心作战的可能性。但统帅部仍考虑到实行作战时的需要，决定先开始部分作战准备工作。9月4日向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下

达了大陆指第一千二百五十二号“五号作战”(8月30日将四川作战改称五号作战——译注)准备纲要”(摘录)

一、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预定实行五号作战。目前先着手可能进行的作战准备工作。

二、自1942年9月着手进行本作战的部分准备工作。根据当年秋季前后的形势再决定是否实行上述作战。

如果实行上述作战，将在完成正式的准备工作的之后，预期于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

中国派遣军畑总司令官在听取河边总参谋长有关上述总长指示的报告后，在其日记中有以下记载：

虽尚需进一步观察国际形势发展，方能决定是否在10月下旬进攻重庆，但派遣军应指定专人立即着手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有关指令已经发出。四川作战乃是最后的手段，能否实行目前各占一半。(畑日记)

派遣军在9月9日召开了方面军和军的参谋长会议，下达了进行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力求积极进行准备。

大本营继上述指示之后，9月7日、14日又连续采取了从南方调给中国派遣军一部分兵力和拨给一部分军需品的措施。但瓜岛的战况日益恶化，9月中旬川口支队进攻失败，更使大本营感到忧虑，而北非的形势也无进展，印度洋、西亚方面的前途也开始趋于暗淡。22日大本营指示延缓拨交五号作战所用的军需品。10月20日又发出大命(大本营命令——译注)将五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军)调归第十七军。10月下旬第二师团对瓜岛机场的誓死攻击也终于失败，北非埃及的阿拉曼以及苏联斯大林格勒的战况也出现了德军不利的形势。

大本营于10月底决定，首先针对当前战争局势，将作战

焦点置于南太平洋方面，务求达到速战、速胜，并以此为重点。这是因为认识到这方面作战如何演变，将会决定战争胜败。11月7日联络会议决定的“世界形势分析”结论中谈到，“目前敌我战争形势的进展虽尚有利于轴心国家方面，但1943年下半年以后，敌我在物资上的国力悬殊将会增大”，“帝国必须在这一两年内排除万难，确立起自强不息的政略战略体制”，“与德、意两国协力，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制敌手段，随时随地消灭敌方的战斗力”，使英美丧失战斗意志，以达到我方的战争目的。

中国派遣军自从10月11日接到调出第五十一师团的秘令后，即觉察到五号作战已无希望。11月4日又接到参谋本部提出在1943年中止五号作战的意见，7日又接到以下通知：

- (一) 对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进行研究；
- (二) 今后对华作战在于确立最小限度的地面上及航空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 (三) 还要抽调、转调、改编驻华兵力。

然而东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况更加激化，11月26日又收到将第六师团转属第八方面军的命令，12月10日接到“中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大陆指第一千三百六十七号的指示。并得到通知：“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在1943年间中止进行。其它进攻性作战，在判明南方形势以前也应暂停。”

中国派遣军在12月17日召开了方面军及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有关中止进行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地区做为主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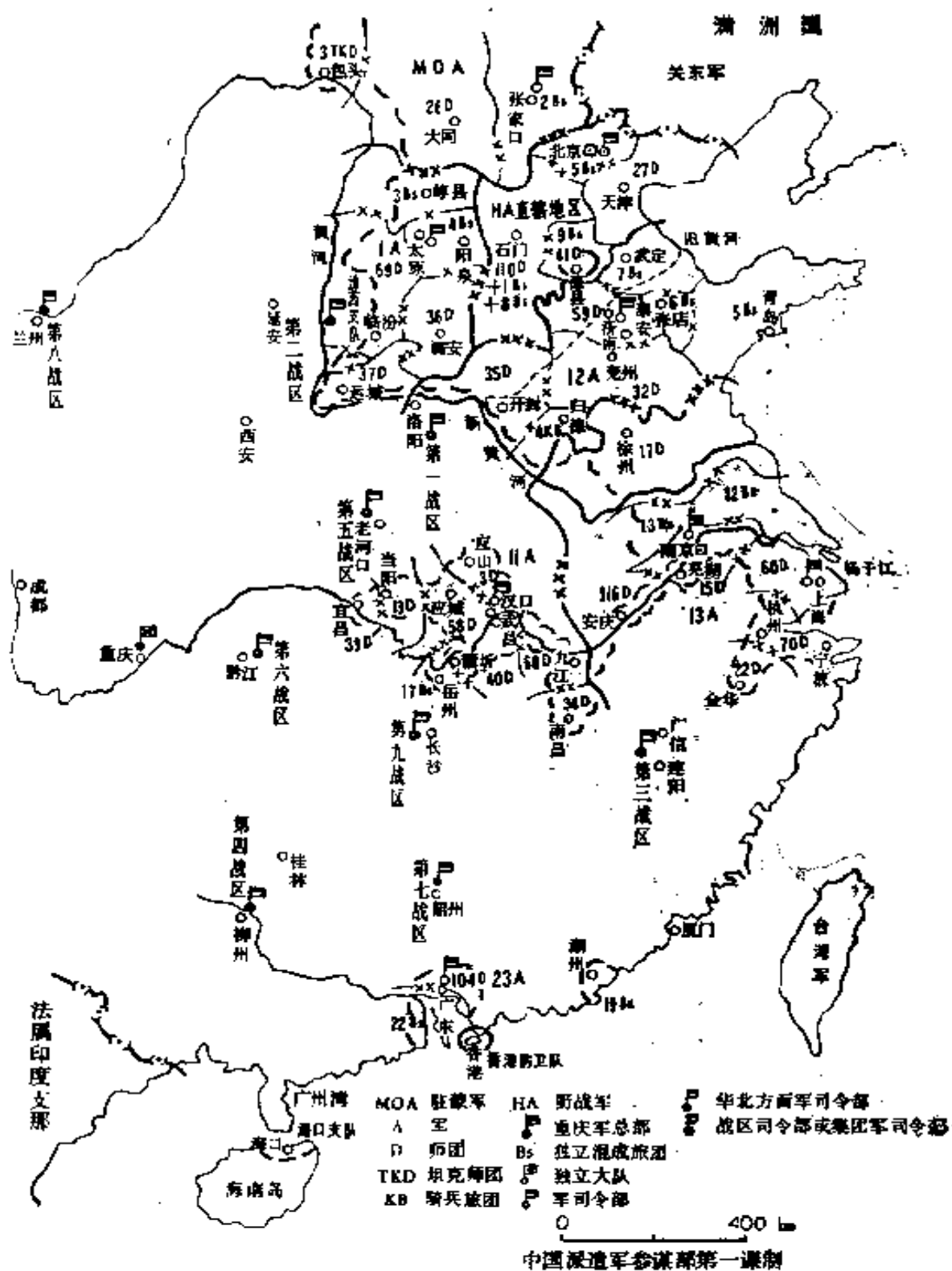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派遣军形势图 (1942年末当时)

如上所述，陆军统帅部、中国派遣军非常向往并决心推行的四川作战准备工作终于停止，中国方面战区又形成了全区持久战的局面。

二、华北方面敌情概况

重庆军概况

重庆政权所属陆军在9月份的兵力为步兵106个军299个师、骑兵6个军16个师，以及其他27个独立旅，共计约有500万人，这些兵力配备于11个战区等地担当防卫任务。在华北战场上，除在第一（29个师）、第二（24个师）、第八（45个师）、苏鲁（9个师）、冀察（7个师）各战区以及苏鲁豫皖边区（8个师）配置有正规军外，还拥有约20万人的游击队。其指导方针及要领如下：

作战方针

加强河防工事（黄河）确保目前防线，同时做好以后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并力求随时进入沦陷区袭击敌人，破坏敌人后方设施。

作战要领

一、设置强大的第二线兵团，积极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反攻。

二、保持和扩充游击兵力，不断扰乱敌军，破坏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设施。

三、加强对皖北、豫西、豫西北及晋东南的控制。

四、固守太行山脉、吕梁山脉的各个主要地点。

根据重庆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作战要领，华北各战区除不断努力加固阵地以防我军进攻、并侦察我方军情外，主要是从事整

训，未发现显著的军事活动。据“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记载其详情如下：

在第一战区霸王城前面之敌，除于9月17日至23日对我方阵地及渡河训练场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炮击外，正专心致力于整训和河防工作。第二战区依然被困于我方的严密封锁之中，正在积极收集粮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8月和9月期间停留于迪化（乌鲁木齐），似与重庆政府的新疆省中央化工作有密切关系，企图对西北地区推进军事行动。蒙疆的傅作义军虽未发现有特别的活动，但恐有与外蒙联系的企图，故需要加以注意。自5月份以来即准备再建的第十战区（陕西南部），似已于8月间建成，并以蒋介石为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该战区与重庆的西北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可看做是加强关中地区，以防备我军进攻作战的对策。此外，胡宗南军似已被指定为针对延安的防共部队。随着第八战区力量的向西北进展，第十战区似也有逐渐向西伸展的迹象，范汉杰部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部也于7月下旬移驻到解宁（西安西北约450公里）。

苏鲁战区由于8月兵变及我第十三军的鲁中作战，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一直忙于整编，但因丧失了大量高级干部以及与共军之间的不断摩擦，日益趋向衰落。

注：第十三战区组建的结果，并未设置新战区，而自1943年1月起，将陕西南部地区编入第一战区，第八战区则向西北方面扩大了其所担任的地区。

此时，西北问题已被日益重视。在华北方面军编制的资料中有如下叙述：

中国的西北，是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地方的总称，与蒙古、苏联的中亚部分领土、阿富汗、西藏、印度等相接壤。

总面积为165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各省中，所占面积最大，但据说人口只有350万~400万人。方面军不仅是对重庆，尤其是从对苏联、中共的角度出发，对西北问题也深为关心。

随着中国事变的爆发，开辟了经由成都——兰州——哈密——乌鲁木齐通往苏联的所谓西北通道。但与南方的通道相比，运进的援蒋物资不多。德、苏开战后，更加减少，逐渐失去了作用。及至1942年5月，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同时由于盟国方面重视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

重庆政府急急忙忙想要开辟中印新通道（天山南路），同时重视西北通道，而努力对之加强维护，为的是在继续抗战中，不单纯依靠外援，尽快确立自力抗战的体制，将西北建设成中央化的基地。也就是想要大大改变西北过去单纯充当输血路线的面貌。

因此，西北工作当前的重点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力量的渗透，发展经济，尤其是开采石油、钨等矿产。此外，为了确保输血路线，加强维护过去的西北通道和开辟中印空运新路线。

然而，该地区在民族、宗教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政治势力的情况从来就很复杂：陕西南部、甘肃省属于重庆势力范围；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的一部分属于中共势力范围；甘肃、青海的部分地区属于回教徒势力范围；新疆则处于苏联势力之下。因此，重庆政府首先开展了西北中央化工作。

从4月中旬前后，开始了政府要人对西北的视察，5月至7月，使西北通道上的回民军队移驻青海方面，而使中央军进驻西北通道沿线，以确保该路。同时，随着苏军从新疆省的撤退，使中央军第四十八师进驻乌鲁木齐。5月下旬，在西安召开的军事会议和第十战区的设置，可能都是与此关连的确立军事基础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有情报说进入8月份以后，在兰州设置了航空设施，9月间更证实了在兰州、西安经常驻有飞机。估计将来会进一步增强，并将有部分英美空军进驻该地。此外，在新疆省伊宁设有空军教导队，正在训练重轰炸机组人员。

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其他要人，自8月以来，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西北地区，发表谈话称：“对西北各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达很为感动，并对正在努力实现中央的计划（农工用地、测量、造林、户口调查、实行联保制等）表示满

意。”

参考：

围绕新疆省的中苏关系 在蒋介石的回忆录中有以下叙述：
“苏联在1933年拥立盛世才，开始了对新疆的侵略，1938年派遣正规军确立军事控制。1941年4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又准备推翻盛世才建立傀儡政权。同年8月我巡视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并派宋美龄、朱绍良前往迪化与盛世才协商维护领土主权、政权归还中央等问题。结果，盛世才也接受了中央的命令，表示服从。苏联在这以后仍迟迟不肯撤兵。中央军是在1943年6月进驻哈密。”（以上仅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中共及共军的状况

中共及共军自1942年“七七”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以来，开展了政治攻势，活动稍显活跃，至9月上旬大致似已结束。政治谋略、袭击事件逐渐减少。然而，最近在日军占领区内的宣传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逐渐加强了针对日本军官兵、日本人、朝鲜人的宣传活动，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除上述情况外，方面军观察到的有关9月间中共及共军的动向，在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资料中叙述如下：

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共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

一、晋察冀边区 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在冀东

方面，由于原田兵团（第二十七师团）开展的终期一号作战，敌完全放弃抵抗，一味转移。冀西方面，也因受毛利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打击，活动极为消极。

二、晋冀鲁豫边区 冀南军区虽力争重建平原根据地，但因中旬遭到阿部（第四十一师团）、林（第一百一十师团）两兵团的再次扫荡，未见有大的活动。中条、太岳两军区的情况也无变化。

三、山东共军 该共军与于学忠军继续发生摩擦，正在于军内部极力发展其势力。鲁西共军游击第三旅在下旬仁集团（第十二军）的“リ”号第一期作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四、晋绥陕甘宁边区 在政治攻势结束期，中共连续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及觉醒同盟的名义，命令开展对日军官兵和日本人进行反战、厌战、逃亡等引诱鼓励的宣传，并指示收集日本内地报纸、信件，或进行日军虐待残杀俘虏的宣传等工作。中共缺乏武力活动的实力，而使其宣传战活跃起来，对于此种动向，尤其是对日军宣传方法的新趋势，今后必须加以警戒。

参考：

关于对日本军的宣传工作 曾在延安从事对日宣传工作的野坂参三对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在苏联从事了九年的第三国际的工作后，1940年4月秘密进入延安。以后到1945年9月为止，我对日军进行反战和平的宣传以及组织反战同盟和教育俘虏等工作。

我到达延安后，隶属于八路军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希望，要我具体负责对日军进行政治工作指导。我开始着手于对日本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虽设有“日本问题研究室”，并有一些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人，但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我首先在八路军政治部出版了名为《敌国资料》的杂志，做为开展工作的基础。并以解放日报社论等形式发表各种论文。为了身分保密，使用中国姓名“林哲”，1943年末第三国际解散后，改以日本姓名“冈野

进”开始公开活动。此外，还把从前线各地数百名日军俘虏中挑选出来的人集中到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其目的不单是为了在当时进行宣传活动，而且要培养在战后重建日本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材。该校由我担任校长，于10月份开学。这种使军国主义者变为革命家的改造人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1942年6月28日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共产党的预备组织，当时还只设在延安，但以后准备扩大到整个华北。该组织的任务是为了早日制止战争，建设幸福的日本，主张变革现在日本的社会制度，要为此而斗争。

当年8月15日开始，在延安召集日军十八个师团的代表，举行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华北的“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26日举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会，于29日闭幕。

当时在日本人反战团体中有反战同盟和觉醒同盟两个组织。前者的本部设在重庆，自1939年以后在华北地区逐渐组织扩大到八个支部；后者是1937年7月在山西南部由日军逃亡的三个共产主义者士兵杉木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夫等在华北最早组织起来的反战团体。

参加大会的代表，除少数自动投降者外，大部分都是俘虏，然而在校短期间内都变成了反战的斗士。“士兵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鼓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们奋起斗争，提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要求。只要是对军队生活不满的士兵，都欢迎参加。反战同盟则不仅要求改善军队生活，同时宣传要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其主要任务是要设法使日军撤退和崩溃。因此，参加者必须是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有为反战而斗争的坚强意志的人。在此联合会上讨论并采用了“华北联合工作会方针书”。其内容虽很多，但主要以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为中心做了详细说明。以后在各支部设立了“日本军队研究会”，特别利用士兵大会提出的要求书积极地展开了工作。

以下的口号均以歌谣形式表达出来：

一、揭露讨伐作战中的苦处：

- (一) 要增加行军中的休息！
- (二) 不准毆打掉队的！
- (三) 不要光在马背上打盹，要体会士兵的苦处！
- (四) 早些宿营让大伙休息！

二、揭露对长官的不满：

- (一) 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
- (二) 不准牺牲士兵争取战功！
- (三) 进级评功要公正！
- (四) 士兵当炮灰，军官得勋章！
- (五) 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

三、加深思乡心情：

- (一) 要保证家属的生活！
- (二) 给参军两年以上的士兵三个月的休假！
- (三) 亲人们望眼欲穿等你回来！
- (四) 亲人希望的不是勋章而是你的笑脸！
- (五) 保重身体，快乐的故乡在等着你！
- (六) 迎接骨灰盒的母亲，只有掉眼泪！

四、煽动悲观气氛：

- (一) 回国后还会征召入伍！
- (二) 战争延长，生命缩短！
- (三) 当几年兵才能回去！？

五、使日本兵反省其烧、杀、抢等罪行：

- (一) 烧光了房子烧不掉抗日！
- (二) 杀戮无辜的平民能得到和平吗！？

六、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

- (一) 我们决不杀俘虏，会象接待弟兄一样接待你们！
- (二) 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给与兄弟般的待遇！
- (三) 战友们！我们在八路军里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用

日本兵个人或原××部队同人的名义）

反战同盟作的诗：

冰冷的夜晚，倒霉的战争，回国去吧！别再打仗了，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去！

华北方面军注意到上述各种活动对于华北军、官、民心理上的影响，不断地加强了警戒。至1943年秋季，反战同盟的活动更加活跃，而其实际情况也已清楚了。

小康状态的国共关系

方面军的“战时月报资料（9月份）”就国共关系叙述如下：

在确保西北通道和开发该地区的问题上，中共、重庆都异常关心，都企图使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不致立即形成双方的冲突，问题留到将来再说。当前出现的妥协态度，美苏的调停起了很大作用。在方面军编制的资料中有以下记载：

西北方面的国共关系一度极为紧张。5月上旬朱绍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对围攻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部署，但随后因重庆急于实现西北中央化，为了调整国共关系曾由两党代表进行会谈，但意见未能一致。为此又企图依靠美苏合作以求得解决，虽一再与美苏等国大使会商，但未能实现重庆所希望的调解，国共之间依然处于乌云笼罩的状况。

此外，在“方面军战时月报（8月份）”中，也有以下记载：

7月末，在美苏合作进行西北军事建设的前提下，为了调整国共关系，由美苏两国大使馆派出代表团前往延安进行斡旋。中共尽管在表面上采取接近重庆的态度，但重庆对中共警戒是极为严重的。

正如以上所载，在国共关系方面除了要求考虑双方内部情况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苏的政策。就是说，

在中共方面，主要是正在尽最大努力对日军压力造成的困境进行重建工作；而重庆方面也为了从盟国，尤其是从美国获得最大限度的援助，不单是对西北问题，甚至对很多重要问题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因而对中共也不能采取强硬的态度了。赴美求援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带回美国的意图表示：“美国希望国共关系能迅速得到调整，建议国共两党统一步调进行抗战。”对此，接近蒋介石的董显光曾说：

当时美国国民的政治倾向，意外地对毛泽东抱有好感。因为他们相信苏联是真心实意地在与盟国合作，认为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合作是可能的，所以是极其亲苏的。在1941年派亲中共反蒋介石的欧文·拉铁摩尔去给蒋介石当政治顾问。美国通过顾问、特使或施加其它各种压力，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强行要求国共及其它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政府。

蒋介石根据多年的经验，对共产党的阴谋并没有产生错觉。然而在与日军作战期间没有以武力解决共军的余力。而且由于重庆那些好心而无知的美国顾问们主张“如果蒋介石同毛泽东妥协，美国的援助将更增多”，因此不得不考虑有效的政治解决。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制造军事纠纷的同时，在政治上却假装保持协作关系。以精明谨慎的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驻于重庆，与美苏代表等亲密接触，成为诱导他们反蒋介石的阴谋中心。

三、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警备情况

作战、警备概况

战斗序列的变更和警备体制 9月末的方面军警备体制，除了原驻山西省的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因新担当河北省真渤特别行政区的警备任务而有所变更外，其它均无变化。

12月，根据年度革新阵容计划，改变了编制和适应南方作战急需调出了兵团。即：遵照12月19日的大陆命第七百二十五号，（一）驻蒙军属下（过去配属于第十二军）的骑兵第四旅团，随着骑兵集团的改编转入第十二军属下；（二）新编坦克第三师团编入驻蒙军属下（接替骑兵集团所担任的警备地区）。转属的时间为12月25日零时。

12月23日，根据大陆命第七百二十八号，命令第四十一师团编入第八方面军（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译注）。因而真渤特别行政区的警备任务，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东北部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的警备，由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分担。

此外，第一军于1943年1月底，使河津地区的汾西支队复归于第三十六师团，缩小了该地区的占领范围，由第三十七师团担任警备，其它地区由第六十九师团担任警备。

在华北的防卫上，防空逐渐成了新的问题。

10月21日17时30分前后，开滦煤矿受到了B24型重轰炸机的奇袭。损失虽然轻微，但我方冲击很大。（据美军战史称，该轰炸机队是由印度的基地起飞，以成都为加油站而北上的。以此种方式攻击黄河以北，还是第一次。其目标为煤矿的电源和水泵，但未能破坏目的物。）华北方面军自4月东京遭受空袭以来，力图整備防空体制，正在将一部分重要物资材料进行疏散和移入地下，并在10月1日公布了“华北防空规定”。由于此次空袭，要大力加强重要地点的防空能力，积极贯彻防空思想工作。

作战、讨伐 方面军过去曾渴望进行西安作战，6月间

得知中央的内部意图后，认真研究了作战计划，并积极组织了教育训练。9月接到进行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后，于4日、5日连续在北京召开了参谋长会议，加紧进行准备，但到12月份，因整个形势的变化，中止了准备工作，又致力于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了。在方面军年度计划中预定于9至11月间对晋察冀边区实行肃正作战，以配合冀中作战推进封锁线。但由于京津地区，特别是冀东道的治安恶化，因而缩小规模改为实行阜平周围的剿共作战，同时在方面军的领导下进行冀东一号终期（第三期）作战。

在此次作战中，由各方面抽出兵力加强了第二十七师团，于9月17日至11月15日，一日不停地进行了长时期的肃正剔抉。

本年秋季肃正作战的特点是所谓的“治强战”。这一作战成为从10月8日起进行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华军、官、民形成一体，在华北各地，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在9月中、下旬开始的作战，是整个战役的前哨战，其规模较大的肃正作战列举如下：

（一）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二）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ソ”号作战，9月27日至10月5日），是由第十二军对山东共军教导第三旅的作战，也称“第二期鲁西旧黄河河畔剿共作战”。

（三）阜平周围剿共作战（9月27日至10月5日）是由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对盘据在阜平一带的晋察

冀边区冀西军区第六团主力及第四团的一部分进行的扫荡战。

（四）第一军的“治强战”，是由第一军自10月10日以来对中条山脉内的蒋介石系统游击队和太行山脉南部的共军根据地进行的扫荡战，10月20日到11月底期间又遵照军的命令开展了“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

其中主要的作战有：（1）第六十九师团对沁源附近薄一波的部下太岳军区独立第一师及决死第一纵队的扫荡战；（2）在太行山南部的第三十六师团对辽县南方的蟠龙镇及襄垣地区的决死第三纵队和新编第五旅的战斗；（3）在石太路以南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对辽县西北地区的新编第十旅进行的剿灭战；（4）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五台山地区及崞县西南地区的扫荡战等。

各兵团在“治强战”以后继续积极进行讨伐，军又在12月11日至19日再次进行了全山西剿共作战，取得了战果。

（五）第十二军的“治强战”在鲁中方面，从10月10日到20日，对益都东南山区及北部平原地区，以及博山西南山区地带，进行了对国共两方军队的扫荡。

然后第十二军又于10月27日至11月11日期间，在鲁中、鲁南进行了对国共两军的讨伐。即在第一期作战中，于沂蒙山岳地带（沂水西北方）追击山东纵队司令部（张经武）及第一旅（王建安）的主力，予以打击。接着又在第二期作战中转到沂水北部地区，自11月2日开始对蒋系的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及山东纵队第四旅进行攻击。自7日起转入第三期作战，对博山东南地区的敌军进行了扫荡。上述作战又称为“鲁中鲁南讨国共作战”。

山东半岛的扫荡，是从11月19日开始进行了一个月的“第三次鲁东作战”（“と”号）。

（六）其它“治强战” 在河南省，由第三十五师团对新乡西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在冀中，由第四十一、第一一〇师团从9月中旬到12月底对白洋淀东南，尤其是河间附近，进行了最为活跃的肃正作战。在冀南，自12月中旬以来对巨鹿、武安、清丰各地进行“共军剿决战”，取得了效果。

上述各项作战中的五号作战准备工作、一号作战、“ソ”号作战及“と”号作战的详细介绍如下：

五号作战准备工作

方面军早就在计划、准备进行西安作战，并渴望其实现。但根据中央要相机进行四川作战的意图，于5月下旬对过去的计划加以修正，6月15日上报总军。内容是由中央派两个师团前来增援，自10月中旬开始以六个师团的基干部队共约七十七个大队实行攻击，并考虑到将来的四川作战，准备进占到巴山山脉中的广元。当时，方面军的总兵力为步兵约一百三十八个大队，其中准备留下三分之二的八十九个大队用以确保占领地区，但在初期想使用十个大队策应作战。至于西安方面敌方的力量，估计为胡宗南军及可能增援的部队共约四十六个师，兵力约三十万人。

17日在参谋本部与当地军有关人员共同研究了这一方案。当时，田中第一部长透露内部意见说，“最好在10月中旬开始行动，在7月中旬发出命令。为此要在6月末或7月初以前作出决定”。于10月中旬发起作战，从季节上看是本年的最后时期，很明显需要三个月的准备期。

根据这一意见，方面军在等待着7月中旬发出的命令，同时积极进行着作战准备。安达参谋长以下各幕僚除研究击灭西安附近之敌的方案外，并亲自飞往秦岭、巴山上空进行了空中侦察，为克服困难地形，使长途突进取得成功费尽了苦心。最成问题的是渡过黄河和突破山岳地带。然而，以后由于不知道中央的确实意图，并且为了确保华北治安不能延误

讨伐作战，为此在繁忙的待命期间，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及新占领地区肃正建设计划，训练了预定担任作战的部队，以及进行必要地区的侦察和后方兵站的准备工作。7月、8月的状况如下：

一、教育训练

（一）7月初以两天的时间对步兵兵团长、独立混成旅团长进行了渡河作战集中教育，（二）对步兵大队长的山地战、渡河战教育（每次十一天，共进行了三次），（三）对步兵联队通讯队长（十一天）、师团及军通讯队长（十二天）的教育，（四）对炮兵大队长的教育（每次十天，共进行了两次），（五）在蚌埠附近对工兵队的渡河基干人员（从各兵团抽调一千三百人）进行了约一个月的训练。

二、情报机关编制作战资料

（一）制作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二）摄制新黄河附近的航空照片，（三）派遣间谍潜入敌后的准备工作（从开封沿陇海路），（四）对黄河、秦岭地区进行统计的观察。

三、有关后方事项

（一）修筑汽车公路（沿同蒲路南段及由新乡经由黄河北岸至同蒲路地区的集中路线，预定于9月末完成），（二）加固同蒲路南段（轮转材料的改轨作业与增加运行列车），（三）在运城打凿供水用井。

方面军由于准备事项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复杂，而且中央的决心尚未确定，作战意图又需保密，以及占领地区内的治安肃正等原因，以致不能进行充分的准备，为此甚感焦虑。但在9月3日接到五号作战进行部分的作战准备的指示后，又对计划仔细加以检讨，根据现地侦察、兵棋演习等重新进行了研究。同时各兵团也以渡河、山地作战为重点进行

了训练。全部工兵部队的渡河训练、各兵团的地空联络教育也都于9月中进行完毕。10月份进行了炮兵汽车部队的有关教育及各兵种联合演习。

对方面军此种积极态度，在10月上旬大本营参谋视察了方面军作战准备状况后，在报告中说：“认为当地军的意见很切实，实行计划是可能的。”

注：预定以第一军为进攻作战主力部队，在8月间新接任的军司令官吉本贞一中将的热心指导下，排除万难进行了准备，每个月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训练。在12月份还进行了十天的高山地区行军演习。

根据12月10日的总长指示，1943年的本作战宣告中止。当地军，尤其是第一军大为泄气。但是，考虑到根据形势变化，将来仍有实行四川作战或西安作战的可能，因而继续进行搜集情报和兵棋演习等研究工作。

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9月17日～11月15日）

冀东共军虽经我军不断肃正讨伐，仍力图恢复势力，继续进行活动。为了彻底予以剿灭，使冀东道一举成为治安区，方面军以第二十七师团的主力担当此任。

第二十七师团于29日将渤海道的警备任务移交第四十一师团，将原驻于该地区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转用于冀东道，作为东部地区队，使担任津海道警备任务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主力仍留驻于该地区，并使联队本部移动到

冀东西部地区，指挥由方面军配属的各个部队及其它部队作为西部地区队，以第一联队为中部地区队，以步兵约十一个大队的兵力，开始了终期作战。

各地区队分散部署兵力，并取得当地居民协力，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同时大力开展了以下各项治安工作：

（一）大力开展宣抚工作，扩大居民的保甲自卫组织。

（二）剔抉共军的潜伏分子、地下组织和秘密交通线。

（三）构筑隔断壕、碉堡、城寨等以防止敌人侵入和移动（规模最大的隔断壕是为了封锁以铁厂镇为中心的根据地，完全包围了通到遵化、丰润、沙河镇、迁安西方地区，长约二百公里）。

（四）设置无人区，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在长城内侧由乌兰峪（遵化以西约三十公里）到建昌（迁安以北约二十公里）附近，使宽约四公里、长约一百公里的带状地区成为无人区，将原有的村庄迁并到别处。

终期作战基本上于11月15日结束，以后移交新配备的部队，肃正建设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12月中旬。本次作战的军事上的战果：敌方遗尸2,337具、俘虏14,479人、投降者612人。我方的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

在同一时期，关东军的部分部队在长城线北侧地区进行肃正作战，担任燕京道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进行了蓟县方面的肃正作战（至9月27日，以后继续进行了扫荡）。

有关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在本作战中的情况，在该联队的“联队史”中叙述如下：

本联队由日野原大尉指挥下的第二、第三大队及其它部队作为津海道地区队，担任警备，联队长(松井真二大佐)以在冀东的田中大队、第一百一十师团的吉田大队、第十二军的乙守大队等部队编成冀东西部地区队，并指挥治安军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担任玉田、遵化、兴隆各县及丰润县以北大部地区的肃正工作。

联队长于9月17日进驻遵化县城内，掌握各个部队。将地区队的肃正重点指向本地区的北半部和丰润县西南方还乡河沿线地区(中略)，并将治安军配属于各大队，使各个部队担任各自地区的肃正作战任务。为此，共军的第十二、第十三团三次转移到地区以外，各县的基干队潜伏于毛山沟、平安城平原、还乡河沿线地区。因此，地区队把各大队分散配置于各个主要地点，按照计划要求居民协力，全力以赴在纵横主要线路上构筑隔断壕、棚舍以防敌人的入侵和移动，并架设通讯网、新建汽车公路以利于我方的联络和兵力的调动；同时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重建居民组织；此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招降工作，设感化院予以收容，以教育感化的办法使之转变。在此期间故意不进行大规模剿杀，以便随时揭发检举潜伏下来的敌人、地下组织及秘密联络交通线。同时，对地区内难以维持治安的村庄，令居民暂时搬家，使之成为无人村。为了隔断与满洲国的出入，规定沿长城线宽四公里的带状地区为无人区，采取收购农作物并保障今后生活的手段使居民迁出。

如上所述，在规定的11月6日期限之前，完成了师团计划的和地区队自己计划的工事以及其它措施。构筑了隔断壕245公里、其它封锁线工事74公里，共计319公里；棚舍132个、碉堡3个、城寨18个、关卡2个、共计155个。此项工事共用52天，作业人员达到1,957,000人次。并新架电话线258公里，维修153公里，共计411公里；新建汽车公路83公里，补修392公里，共计475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1,235户、6,454人；暂时无入村二十八村、2,342户、12,036人。

完成上述工事、设施后，11月8日在遵化、玉田县城内进行了盘察搜索；11日起又用三天时间，在全地区同时进行了全面的盘察搜索，而将感化院收容的大部分人予以释放。这样，完成了地区内的肃正任务，取得了招抚的效果。于是，11月15日变更了军队区划，将西部地区队的警备任务移交于新任地区队长铃木少将，各队都复归原建制，从联队调来的兵力仍回津海地区。

曾任北部地区队队长的铃木启久少将（后升中将）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第二期作战后，虽然看不到大型匪团的流动，但地下组织都增强了，其活动更加隐蔽。

8月下旬，方面军为了使八路控制区与现政权控制区彻底隔绝，下达了修建在地图上标出的隔断线的指示，但该指示完全忽视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地区队根据该指示构筑了一连串的壕沟和岗楼，力图阻止八路军的移动和物资的流通。在此项工事中，动员民众共达六十万人次以上，给农作物的收割带来很大损失。此事成为中共方面宣传工作的重点，致使青年不断逃亡。

方面军又命令在沿长城线八路军根据地的地带设置无人区。于是，地区队以武力强迫居民搬出。居民对此特别怨恨，因而被八路军用以宣传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

9月的终期作战开始以来，除上述措施外，并在同时施行严厉剔抉、加强保甲制度、频繁讨伐、经济封锁等措施。然而即使到11月末，在认为治安最好的唐山附近，也还有袭击煤矿方面人员的事件发生。对地下活动的封锁是极为困难的。

参考：（有关秘密结社的一些情况）

对永清县红枪会叛乱的镇压和安抚 在中国农村的自卫机能方面，自古就有村庄内部自然产生的民团、乡团、公安团、保卫团、自卫团等名称的保卫组织（保甲制度是政府为了维持治安而设的行政上的辅助机关，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此种民众出于自卫

愿望的组织，有时会结合宗教信仰发展成为各种的秘密结社组织。由于民国以来的动乱，在华北也出现了红枪会、白旗会、红旗会、黄沙会等十五个以上的各种结社（在城市中，因利害关系而结成的青帮、红帮等）。清末曾经威振四方的大刀会、义和团，其根源出于对清朝的反抗和排外思想，而红枪会等结社则是由于对土匪实行自卫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以后又以反抗军队的暴行为主，并带有反抗政府横征暴敛、征用民夫的自卫团体的性质，但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土匪和军队。

中国事变爆发后，各地此种秘密结社对待日军、共军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既有亲日的，也有经过共产党说服而亲共的。但他们的自卫意识极为强烈，一般不会主动地采取敌对行动，也不会进行积极的协作。

第一一〇师团于1940年9月13日下达的“确立加强保甲制度计划”中，对于“自卫组织与各种秘密结社之间的关系”说明如下：

中国的秘密结社大致可分为青帮、红帮、理门三派。虽然称为某某会，但大都是上述三派的分支。秘密结社的成员虽有善恶之分，但均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拥有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他们虽不参与政治事务，但对维持社会安宁极为关心，因而在治安工作方面采取怀柔态度，并了解他们的等级辈分如“大、通、悟、学（青帮的辈分——译注），很好地按其身分给以尊敬，即可对之进行利用。由于他们不断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顺从他们的意志，任从他们在保甲内实行自卫，即可使之成为有力而牢固的自卫团。对于非秘密结社的回教徒，也可采取同样手段加以操纵。

再由“中国驻屯军第二联队史”中，摘要介绍有关红枪会情况如下：

1942年秋季以来，河北省先天道总会所属永清县红枪会和中国方面县政府所属武装团体之间发生争执。地区队以该红枪会为拥有数万县民的宗教信仰团体，基本上服从我军，而我军正尽力对之进行劝诱工作，故对争执双方进行了调解。1943年1月，纠纷曾一度解决，但在3月间再次发生冲突，对维持治安的我方永清县警备队进行了抵抗，3月18日终于发生了国分见习士官等人的伤亡事件。

师团的意见要坚决予以讨伐，但地区队采取的方针，仍然是尽可能不以武力平定，但要彻底追究责任，消除祸根，使之今后成为与我方协作的有力组织，在万一不服从时再断然予以武力镇压。3月21日，地区队将主力集结于永清县，同时派津海道尹李少微对永清县、河北省先天道总会会长江洪涛对红枪会，分别告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并劝说红枪会投降。当时南部地区的红枪会虽应允投降，但北部地区的红枪会却抱怀疑态度，不肯立即投降，反而在各地集结武装，而且判明已向永定河附近的共军东进纵队求援。因此，为了防止叛乱扩大，必须抢先平定其激进分子，乃于22日突然袭击其集结地点前仲和及其它两个村庄，解除他们的武装，逮捕了会长张恒芝，并让张命令全体会员投降。只有孟家园子的会匪拒绝投降，不得已以武力使之降伏。

以后采取不用武力的方式收缴了全县各红枪会的武器，并开始对县方所属的不良武装团体进行了整顿，大体已告平定。在29日留下部分部队处理善后，但由于这是中国方面的内部问题，故于4月9日将处理善后工作移交津海道中国方面机关，并释放了已投降的张恒芝。

以下叙述若干有关红枪会的片断事例：

在山东省北部武定道的德平、临邑、商河附近有红枪会系统的匪军约八千人，事变后一度改编为国府军，但由于中共方面在其内部进行工作而赤化，变成鲁北地区游击队。后因我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对之进行工作，于1941年春投降日本方面，变成皇协军

部队。1943年春季前后日军警备部队为了集结兵力开始撤退时，该部队再次倒向中共。1944年3月由日军对该部队内部进行了整顿。该部队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一直与日军保持联系，并维持该地区附近的治安。”

河北省南部地区是中共势力比较易于渗透的地方。1943年8月10日前后，在濮阳、清丰、东明各县边境一带红枪会的武装纷纷兴起，与盘据当地的共军河北抗日民军封丘县基干队之间，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小规模战斗。据当时报纸报道：“在中共地区内很少见到群众武装斗争的事，此次斗争可以认为是群众对长期压迫反感的爆发。”

山西省南部绛县附近，红枪会系统的武装团体在事变初期约有两万人，该团体不属于国府、中共任何一方，而由地方自治团体征收某种程度的税金，用以维持当地治安。该团体虽存存在于一般社会之外，但其内部很有秩序，也很团结。日军进驻以来，对之进行长时期的劝降工作，结果以红枪会会长为绛县县长，形成了乡土自卫红枪会。以后在附近的乡村也产生了同样的机构，作为乡土自卫红枪会的下层组织，形成县行政组织的坚强支柱。

关于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附近的秘密结社情况，在当地特务机关的调查报告中有如下叙述：（1942年2月特机月报）

（一）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在大部分县中设有分会。本地区区内约有会员一万人，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会员中多数是道县公署官吏、军队和警察署的人员以及商人等。至目前为止，除参加献金、慰问、追悼会等外，未见大的活动。目前正在筹备分会组织准备开始积极活动。因该会有相当知名的人士参加，对今后的动向需要大加注意。

（二）乾坤道（会员约七百人）

（三）三教圣道会（会员五十四人）、同善社（会员约一百五十人）

（二）、（三）是要振兴道德的稳健团体，特务机关做为“秘

密结社”看待。

总之，此等秘密结社虽是局部地区治安对策的对象，或者有彼我互相利用之处，但方面军似乎并不认为是全盘施策之一而加以重视。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5”号作战）

（9月27日～10月5日）

敌情 盘据东平湖西方鲁西地区一带的共军，除经过1939年6月第十二军的作战及1941年1月第三十二师团的讨伐外，未受过大的打击。特别是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几年来在鲁西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地盘。当我方压力加强时即退散潜伏，压力减弱时即行活动，不断袭击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从准治安区夺取粮秣，对民众进行政治工作。在同年5月的冀南作战时，因第三十二师团调往华中（参加浙赣作战），避免了我方的打击。该地区从7月份前后开始，企图进一步加强根据地，似正扩充兵力，特别是乘我第三十二师团地区警备力量空虚之际，大有加强活动的趋势。

现已判明中共正规军兵力约六千五百人，正在不断游动。

作战准备 第十二军根据年度肃正计划，早在进行彻底摧毁鲁西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在土桥军司令官亲自主持下，由兵团长以下主要干部参加进行了图上战术、兵棋教育、现场指挥等研究工作。各参加作战部队在作战企图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对共战法的训练。

本作战的设想为“军以约十个大队的步兵对范县附近（第一期作战）及东平湖西方（第二期作战）共军根据地采

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术使之彻底覆灭”。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石田支队（第三十二步兵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大熊支队（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三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轻装甲一个中队）、高原支队（骑兵第二十五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骑兵两个中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骑炮兵一个中队）。作战开始日期，预定为9月27日。

注：土桥军司令官根据过去的研究和冀南作战的经验，企图彻底普遍采用“完全包围的对共战法”。其所设想的机动行程，估算为：由“集结地”到“展开线”（形成包围圈）约四十公里（汽车的夜间运行距离），由“展开线”到“敌根据地”（目标中心点）约二十四公里（徒步白天攻击距离），展开正面每个分队的间隔定为三百至五百米，以此计算出包围圈的周长。在行动中要特别注意横向联络，各队应控制若干预备队。要编成政治工作班（由新民会支援）、特务工作班（由宪兵队支援），作为包围圈压缩后专门负责侦谍剔抉的部队。这是对付在大平原上善于四散逃避的共军所适用的特殊战法。但在地形、敌战斗力情况不同时，此法则难以适用。

第一期作战（9月27日至29日） 第十二军于9月25、26日，命大熊支队在东昌、莘县附近，石田支队在鄆城、巨野、济宁，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分别集结兵力，26日夜间运动兵力，27日拂晓以前到了预定的展开线。随后由控制线指挥各队前进，逐渐将包围圈压缩到中心地区（单堂）。

各队经过小型战斗，于16时以后攻进以单堂为中心的半径约三十公里的地区内。包围圈内的敌军几乎都身穿便衣、藏起武器、伪装难民逃走了，只有石田支队在旧范县附近与

一部分强有力的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击溃。以后各队在作战地区内进行了扫荡剔抉，直到29日为止。

第二期作战（9月30日至10月5日） 第一期作战完成后，留下部分兵力在范县附近扫荡，各队主力伪装要返回原驻地的姿态，大熊支队在东吕附近、石田支队在巨野附近、高原支队在郓城附近，秘密进行了下次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在东平湖西侧仍潜伏有约两千五百名共军。

各队于10月1日夜间秘密开始行动，2日晨在预定的包围线上展开，随即向东平湖西岸同时压缩进攻。敌方似乎并未料到我方的攻击，力图撤退和化装便衣，一部分强有力的部队与大熊支队进行交战被击溃。各队将敌主力压缩到我方的第三次包围圈内，自18时开始猛烈攻击，歼灭敌之大部。

战场一带1日夜间下了长时间的暴雨，各部队行动困难，但仍极力搜索和扫荡敌人。10月5日大致达到预期目的，结束了战斗。

在此期间，由县警备队及石田支队炮兵队在东平湖东侧构成阻击线，担任防止敌军逃脱和捕捉俘虏任务，并对东平湖中的岛屿和湖岸进行了扫荡，扣留了民船。第六直协飞行队在指挥联络、侦察敌情方面进行了特别有效的协作。

作战效果及其后的状况 在上述两期作战中，交战的敌方总兵力约有7,360人，其中敌遗尸1,252具、俘虏1,250人。我方战死9人、伤72人。这与过去进行的对共战相比，效果极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如上所述，由于我方采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法”，使当面共军未能积极集中兵力进行突破，因而我方得以较薄

的包围网进行压缩。但从我方来看，还有必要进一步做好加强横向联络、隐蔽作战企图和轻快运动的演习和训练，以及匪民分离和收容运送俘虏的准备工作。

在我方搜索剔抉敌人之时，敌军教导第三旅约两千人分散化装西去，逃往井店镇根据地（濮阳县西方约七十五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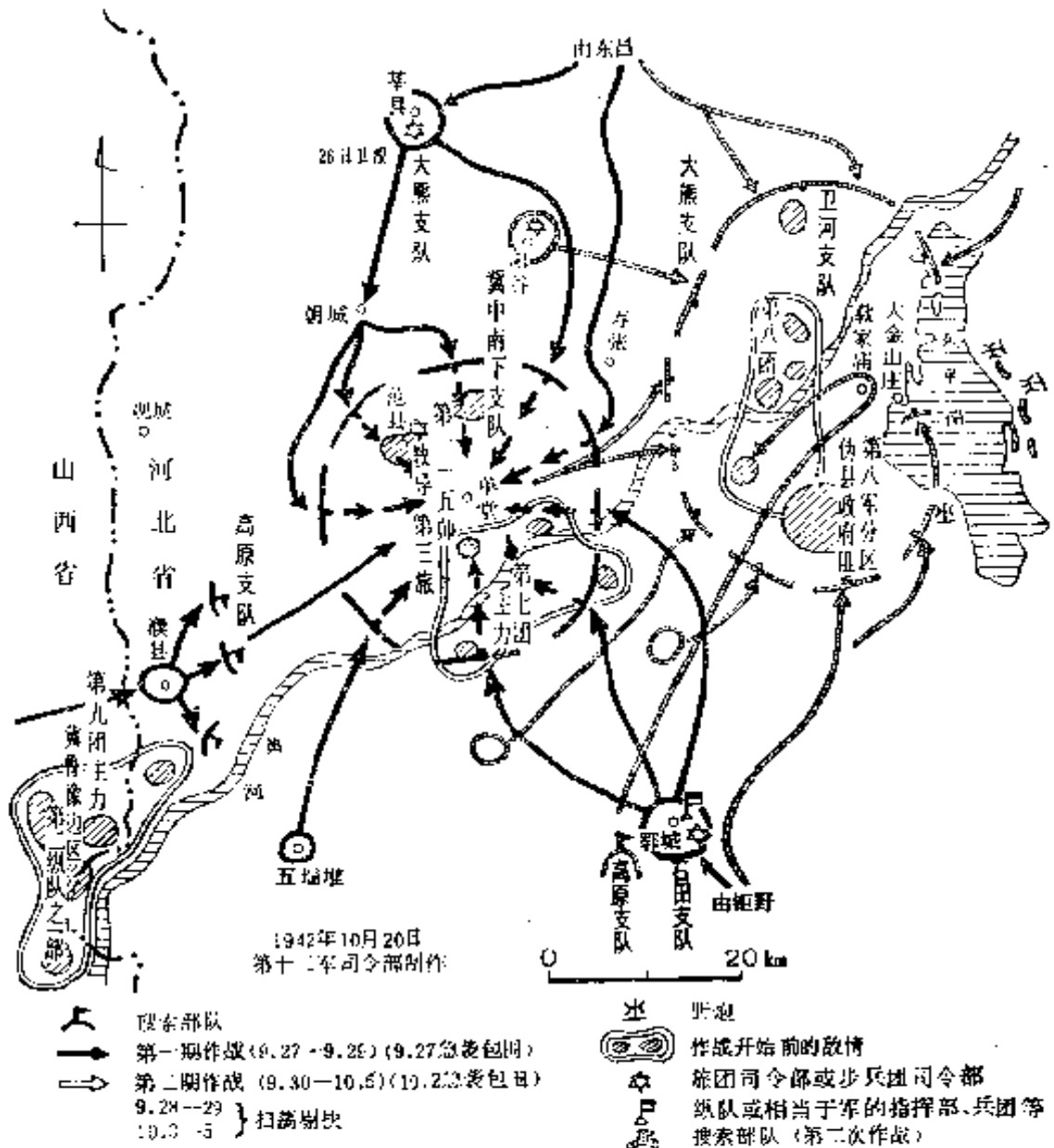


图9.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引号作战)经过概要图
(1942年9月27日—10月5日)

里，河北、河南省境附近）。

井店镇根据地虽经我军一再讨伐，近来仍逐渐增强扩大，正在与山西方面联系，并对滑县（濮县西南约八十公里）南部方面积极进行工作。为此，我方部署于该方面的特殊工作队和中国军逐渐受到了威胁。

第三十五师团为了迅速摧毁上述根据地，以便于推进豫北地区的治安肃正建设，于10月31日拂晓突袭了井店镇，随后在该地附近进行了扫荡剔抉。

第三次鲁东作战（“と”号作战）

（11月19日至12月29日）

第十二军进行此次作战的目的，是要歼灭以山东纵队第五旅及其第五支队为基干的胶东军区的共军，恢复山东半岛一带的治安，尤其是确保青岛、芝罘（烟台——译注）间的道路。参加的部队有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和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的部分兵力。

作战地区的地形与鲁西的平原地区完全不同，多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并且三面临海。因而该军采取了从西向东推进隔断网，将敌军压缩歼灭于半岛东部的战法，并与海军约定对沿岸进行严密的警戒。

第一期（11月19日至29日） 参加作战的部队大体上沿青岛至芝罘道路一线构成隔断网向东推进。敌军在锯齿牙山及其他山岳据点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但在平原地区几乎是未经交战即行退避。

第二期（11月31日至12月12日） 于牟平南北一线构成

隔断网，将活动于文登、荣成地区的东海区游击队及各县政卫队，包围压缩到半岛的尽头。自作战开始到12月8日的战果是：敌遗尸1,183具、俘虏8,675人。

第三期（12月13日至29日）各部队反转西进，一部分由海路运送以切断敌军背后，一方面主要在芝罘、青岛道路以西的平度、掖县、招远附近追击山东纵队第五旅、西海区游击队，自22日起在各地进行了扫荡，取得了相当的战果。

本次作战期间，军司令官将战斗司令所设于青岛，一度前进到芝罘、牟平指挥战斗。

参加过此次作战的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叙述所见如下：

一、鲁东与鲁西平原完全不同，对兵力说来地区广大，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

二、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处敌人突围出去。

三、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

四、交战主要是在第三期，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

四、推行治安建设各项措施的概况

1942年夏秋之际，我方的肃正建设达到最高潮，中共及重庆方面均陷困境，使人感到华北治安战似乎已进展到收效阶段。

这就是：方面军自春季肃正作战以来，为了大力推行与治安战相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建设措施，逐渐新

设或扩充了各地的特务机关以图扩大、巩固治安圈。

同时，华北政务委员会自10月8日起开展约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实际行动。在日华军、官、民的密切配合下，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该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会也力图改善其基本性质，于10月下旬确定了新纲领和运动方针，期望发展为中国人自己的团体和开展反共和平运动的国民组织。

方面军也将对敌经济封锁作为治安肃正建设的重要对策和作战行动的重要部分，比过去加倍地增强了该方面的工作。为此，不仅在主要的作战行动中，而且利用中、小型讨伐的战果，扩充全华北地区的封锁机构，发动日华军、官、民与之协力，使敌人陷于困境。以下就各该措施予以详述。

加强特务机关与扩大、巩固治安圈

方面军根据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为使肃正作战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措施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了对省和道的政务指导，要在充实现有特务机关的同时，在各个道公署所在地新设特务机关。如前所述，在进行冀东、冀中作战时，于4月下旬在唐山（冀东道）、德县（真渤特别行政区）新设了特务机关。在山西省，由于兵团的调出及改编，将汾阳特务机关改为临汾特务机关的出張所（派出分支机构——译注）。山东省有十个道（青岛为特别市），但在省特务机关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机关。因此，9月份在济宁（后迁兖州）、益都（后迁张店）新设了特务机关。但从以往的情况来看，

在不同时期，兵团的防卫地区不一定和道的行政区相一致，有时会使兵团司令部与道公署、特务机关相隔离，因而在相互关系上产生了种种问题。

各个特务机关按照方面军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即促进开发重要国防资源、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及对敌经济封锁体制，推进中国行政机关和民众的主动积极活动，并结合肃正讨伐、治安强化运动等扩大治安圈，推进开发建设各种措施，以期巩固治安圈。

1942年9月份，省及各地特务机关的部署情况如下（括弧内分别为机关所在地及机关长姓名）：

河北省（保定）特务机关（铃木繁二少将）
石门特务机关（加岛武大佐）
顺德特务机关（野田道大佐）
邯郸特务机关（冈田与作中佐）
德县特务机关（本间诚中佐）
唐山特务机关（堤雄平大佐）
北京特别市特务机关（包括燕京道）（松崎直人少将）
天津特别市特务机关（雨宫巽少将）
山西省（太原）特务机关（石野芳男少将）
潞安（上党道）特务机关（深见幸次中佐）
运城特务机关（宇田川富藏中佐）
临汾特务机关（关根淳一郎中佐）
阳泉特务机关（千叶一良中佐）
雁门（崞县）特务机关（恩田忠录中佐）
山东省（济南）特务机关（大桥熊雄少将）
芝罘特务机关（泷寺保三郎大佐）
济宁特务机关（林千代治中佐）

益都特务机关（藤井幸吉中佐）
河南省（开封）特务机关（大泽侃次郎大佐）
新乡特务机关（河野又四郎中佐）
归德特务机关（近藤加明中佐）

参考：

特务机关的编制并不一致，例如山西省潞安特务机关的编制，在1942年3月时，有专任机关长及辅佐官的现役军官各一名，机关人员有下士官兵八名、文职人员三十二名（嘱托九名、雇员十一名、佣人九名、临时佣人三名）、另外有兼任的宪兵、会计、兵技、兽医、兵科的军官各一名、军医两名，合计四十九名，组成总务、政治、经济、文化、通信等各班。

按照特务机关编制的方针，机关长应由专任军官充任，但也有如第一军及其所属兵团，或第十二军那样，在某一时期由参谋长或参谋兼任机关长的情形。

有很多地方在特务机关内配属有领事馆的警察，办理有关日本侨民的事务。

有的地方为道、县的联络员配备财政、警务辅佐官。联络员及联络员辅佐官均为军的无薪金嘱托。

各地特务机关及联络员受其兵团长和上级特务机关双重指挥和管理。为了业务上的便利，在军内每月举行一次特务机关长会议，在方面军内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全体特务机关长会议。在特务机关内部则随时进行联系或开会。

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各特务机关采取的对策和活动情况也各有特点。下面举几个在工作上具有特色的特务机关的例子：

山西省特务机关 1942年4月，第一军司令部为了部内业务的顺利进行，废除了参谋部的二课制，并改组了省特务机关。即：由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兼任机关长，军参谋土田

穰中佐兼任总务课长。原来的机关长植山英武大佐改任次长（政治课长为米花宇太吉中佐、经济课长为田边新之中佐，全体机关人员有很大变动），企图做到军事、政治、经济的统一和计划与实施的一贯性。但由于产生了政务指导过分从属于军队的弊病。8月22日再度改变机构，任命专任机关长，又恢复了原来的体制。

上述参谋长兼任机关长问题，与企图加紧推进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为中心的山西省开发工作有密切关系。该会社关系到军管工厂的准备发还和随着对伯工作的进展由阎锡山接收的问题，因此，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至3月31日会社举行了成立大会，资金三千万日元，以交齐全部股金的日本法人资格，于4月1日开始营业。该会社将过去委托日本十三个企业修复和经营的山西驻军管理下的三十六个工厂合并，计划进行统一经营。新会社股金的交纳。以上述十三个企业向其原来经营工厂的投资额为基础，不足部分由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贷款。该会社经营多方面的业务涉及五十多种，是一个有关保持军需民需比率均衡的开发和生产企业。然而，新会社不但要考虑扩充振兴重工业部门对大东亚建设做出贡献，同时还要考虑生产省内需要的物资，作为低物价政策基础。社长由大仓产业的太田文雄担任，干部大部分由各有关企业的代表担任。9月10日太田社长因病辞职后，由河本大作（预备役大佐）继任，大大发挥了才能（总务部长为天野信彦、重工业部长为高桥铁造、轻工业部长为和田逸郎、经理部长为早川次郎）。自此，会社的经营开始走上了轨道。创办一年后获得利润达一百五十万日元。1943年4

月20日解除了军事管制，移交中国方面，由山西省经营。

注：阎锡山在事变前，为了山西省自立开始了以1934年为第一年度的“山西省政建设十年计划”，该计划以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为主。企业为全省公营，并特别设立了统一管理工矿业建设的“西北实业公司”统一经营十四个工厂，另外还有十二个单独经营的企业。事变后，日军予以军管。另外又新设立了十个工厂。

省特务机关通过顾问部（最高顾问为甲斐政治）对省的行政进行幕后指导，并与各地特务机关的活动密切联系，使省政深入贯彻于各道（雁门、冀宁、河东、上党等道）。上党道是在1941年从河东道、冀宁道各划出一部分地区合并新设的。

各地特务机关大体上设于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与兵团的军事行动同时并举，对道、县行政机关、新民会、合作社等进行幕后指导，推进各种建设措施。但因有些地区行政区划和兵团所担任的警备区域不一致，多少有些不便。例如第六十九师团担任了河东道地区的一部分警备任务，因而临汾特务机关即将冀宁道所担任的部分作为“指导地区”，而将河东道的部分地区作为“准指导地区”。这样，河东道尹要受临汾、运城两特务机关的指导。

潞安（上党道）特务机关 该特务机关根据第三十六师团的肃正建设计划努力扩大治安圈。尤其是对模范地区长治县的建设下了很大力量。年度初特务机关调查的上党道内县政贯彻执行情况如下（括弧内是长治县的情况）：

地区内全部村数 4,626个

联络村	2,498个	占全部村数的 54%(93.8%)
保甲村	1,891个	占全部村数的 41%(86.8%)
纳税村	2,246个	占全部村数的 48%(93.8%)
平均恢复率		占全部村数的 47.7%(91.7%)

注：1941年6月末时，华北的县政贯彻率平均为67%，模范地区是84%。因而上党道在长治县的建设虽有进展，但从全道看来，治安并不好。

居民的回归率为79%，尚处于有待复兴的状态，回归人口情况如下：

	事变前情况	回归数
户数	333,832户	231,836户
人口	1,712,145人	1,352,951人

根据上述状况，潞安特务机关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 增强道公署的机能，力求推动中国方面职员之主动积极活动，设立以道、县公署干部为主的“道政会议”，加强道尹的责任感（一般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为老年人居多，缺乏活动能力）。

(二) 在县财政方面，大部分县以借款来弥补开支，基础不稳定。因主要税收为旧赋，故治安圈的大小直接决定县财政收入的好坏。因此，要努力设法使军、官、民形成一体，巩固和扩大治安圈以及整顿地籍帐册工作。

(三) 为了发展农业，除在我军支援下，在东潞沿线有计划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打井行动外，并指导合作社采取了增产小麦、种子消毒、改善施肥等措施，以迅速增加粮食生产。因此食粮问题大体上稳定下来。但因从太原运进的一般物资不足，物价有逐渐上升的倾向，对此，采取了物资统制、促进物资上市交易并组织加强各种组合（合作社——译注）等措施，努力维持适当

的价格。

(四) 联合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旧法币的币值比率，在各县不同。在治安地区是一比五至七，在非治安地区联银券的币值逐渐下降。因而通过没收法币工作制止法币流通，尽力消灭法币的流通价值。

(五) 努力加强警备队、警察队的防御设施，管制夜间通行，进行清乡讨伐以肃清管辖地区的潜伏敌匪。为此，在教习所对警官进行了再教育，特别要提高保甲、警察的工作能力。警备队针对敌人利用警备地区的空隙进行地下活动的情况，计划对现有队员进行再训练并增加人员。

(六) 为了加强以保甲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卫团的武装力量（命名为先锋队）和扩大其组织，由新民会对自卫团干部及青年进行训练。

(七) 为了对抗敌方的政治攻势，使中国方面的情报宣传更加活跃起来，增加了该工作的经费，指导他们进行活动，以分化敌方与民众的关系，鼓动厌战情绪，使敌人向我方投降。此外，尽量使潞安山西新报（发行份数为3,250份）的三分之二流入敌区进行宣传，并将各县发行的各种小报合并于该报，促进对一般民众及对敌宣传工作。

山东省特务机关 山东省的治安建设工作在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领导下，军参谋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原省特务机关长）、省特务机关长大桥熊雄少将和山东省长唐仰杜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而中国方面各机关的活动也是积极的。1942年9月，根据在各兵团司令部驻地设置特务机关的方针，设立了益都、济宁特务机关（但第三十二师团司令部在兖州、道公署在济宁）以图道、县行政的贯彻。（军的防卫地区延伸到河南省北部，也担任着该省的治安建设任务。青岛特别市属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張所管辖。）

曾任第十二军高级参谋（兼政务主任）的折田正男大佐回忆当时山东省的政务指导情况如下：

（一）治安建设工作继续上一年度，重点集中于安定民生、改善治安、开发并取得国防资源以及对敌经济封锁等方面，并特别注意引导中国各机关积极主动的活动。对于盘据省中部山岳地带的敌军，结合讨伐警备工作，尽量切断其通往河南省的西方补给联络交通线。

（二）大力向日本运送煤、盐等国防资源，同时为了收集敌方地区出产的水银、铜、钨等物资，在陇海路沿线用盐和棉花作为回头货以吸收那些物资。并努力招募了满洲所需要的华工。

（三）在剿共工作方面，要求军、官、民形成一体，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民众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国方面县长以下官吏的活动很不理想，加以指导县公署、新民会、合作社的日本人及朝鲜翻译的无能，工作没有成效。甚至由于他们干了坏事，或因日军下级部队中有些人对中国方面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反而对日华亲善起了有害作用。因此，实际上即使表面上治安良好的地方，内里也有与敌我双方相通的农民。

（四）为了整顿军队对民众的纪律，提出“不准烧、不准杀、不准抢”口号，特别要求贯彻到各部队的基层彻底加以实行。但在作战讨伐之际，也出现了毁灭敌方根据地内的村庄，或为构筑道路、封锁沟侵占了良民的土地、征用民伕等等情形，这些虽然是不得已的事，却成了招致民怨的原因。同时，我讨伐部队从敌方地区撤退后，对曾与我方协力的居民会有不利，但又难以做到长期驻守，这些都阻碍了我方获取民心的工作。

新乡特务机关 在河南省北部省特务机关设在开封，并在豫东道东部（骑兵第四旅团地区）的归德、（今商丘一带——译注）、豫北道（黄河以北第三十五师团地区）的新乡设置了支部。新乡特务机关长河野义四郎大佐（当时是中

佐)是在中国工作过十五年的中国通。关于豫北的状况,他曾作如下叙述:

(一)特务机关的工作重点,根据地点、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例如北京特务机关以指导政治、文化为重点,天津则以经济,济南以农业生产为重点。从时期的变化来看,新乡特务机关工作重点在1941年为农村开发,1942年为获取物资和招降工作,1943年为治安工作,尤其是饥荒对策,1944年则以对投降部队及警备队的指导为重点。在什么时期应做什么工作是根据兵团长的方针和特务机关长对形势的判断而决定的。由于是在异国作战地区的行政,在工作方法上尤须思想灵活随机应变以达到目的。但从日本国内来的官僚却多以低效率的机关化的方式进行工作。

(二)在我军占领下,得到优秀的当地领导人非常困难。在新乡特务机关负责地区的二十四个县中,有二十个县的县知事是事变后从满洲来的。这些外来的知事虽然有工作热情和办事能力,但与民众不能融洽。当地出身的知事虽然熟悉地方情况并与居民有联系,但多缺乏工作能力。这是特务机关长进行幕后指导最感困难的事。

(三)在反共工作上,我方的理论模糊不清,又提不出具体的实践办法,加以民族、语言、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弱点以及日军的统治欲、高人一头的思想等等情况,反而被中共所利用。

(四)日军占据的地方不过是点和线的“骨头架”,特务机关指导中国军、官、民扩大治安地区,要给骨头贴上肉。为此,比较可靠并有实力的是县警备队,其次是有乡土感情、早已形成组织的保甲自卫团。那些不想再战而投降的部队软弱无力,即使强令他们进攻中共地区,只能落个向敌人缴械而归的结局。

(五)招降工作由当地部队进行,特务机关负责支援和接收。投降过来的部队是对讨伐、警备都无用的“食客”,简直是沉重的负担。

(六)确保粮食是每年都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民历来遭受大

规模旱灾、蝗灾、水灾三重苦难。在饥荒的年头各地有很多人离开农村，大部分往江苏省、一部分往山西省逃荒，直到第二年春天为止。特务机关采取从其它省份买进杂粮，以及开发清河县水田地带（引水工程）、利用粮食平衡仓库等办法勉强进行救济。

（七）其它：诸如采取谋略从敌方取得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使用的弹药，在濮阳、滑县等敌方地区收买棉花、粮食、收集铁路用的枕木（以盐交换）、“引黄济卫”工程、爱路工作、维持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纪律等等。

特务机关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但多是一时难见成效的。

石门特务机关 京汉路沿线地区自事变初期即由第一一〇师团担任警备。历任师团长（桑木崇明、饭沼守、林芳太郎等中将）均特别努力按照一贯方针推动肃正建设工作。因而石门附近的模范地区工作进展很快，至1942年底将该地区的警备工作全部移交中国方面。

唐山特务机关 冀东道在事变初期曾在唐山设有特务机关，以后又被撤消。1942年春季，因治安急遽恶化，又重新建立了唐山特务机关。曾任该特务机关长的提雄平大佐有如下叙述：

（一）到任后，首先要求中国方面撤换了失去民众信任的道尹以下主要干部，坚决肃清贪官污吏以期改变治安和行政面貌。

（二）为了对抗中共方面灵活巧妙的民众工作，在唐山设立青年训练所，从道内选拔优秀青年进行了三个月的特别训练后，组织以他们为领导的青年工作队，使之在当地积极展开活动。

（三）中共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制造对日本的民族反感，并对中国武装团体、官吏职员发出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号召，鼓励他们中立，并进行怀柔工作促使内应。因此，我方也加强了宣传报道工作，不断使民众了解具体事实，特别努力防

止敌方利用日华间的辐辏。

（四）煤矿虽为方面军直接管理的企业，当地特务机关也在治安警备、维持产煤量方面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因而始终未发生过事故。

（五）在冀东作战时，曾进行了构筑隔断壕、设置无人区、新建和维修汽车公路和警备通讯设施等工作，特务机关在动员劳力、保障生活需要等方面也进行了协助。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張所 青岛出張所在所长（海军军官，当时在职的是绪方真记海军少将，在职期间为1941年8月20日至1942年11月1日）之下设有官房长（海军军官）、政务班（陆军军官）、经济班（大藏省官员）和文化班（海军军官，后为外务省官员）等，由内阁各省派出官员担当实际业务。事变初期，围绕青岛市的管辖问题曾在陆海军之间有过争执。出張所在两者之间极力进行协调，并将旧青岛与即墨、胶州县合并，设立了青岛特别市，担负了对该市的行政领导工作。青岛市的警备任务由中国方面警察及领事馆警察承担。旧市外的崂山区由海军，即墨、胶州区由陆军分别负责支援。

本地区遭受战祸较少，秩序迅速得到恢复，对英美权益的接收工作进行得也很平稳。该地区民众一般尚属亲日，对市政持合作态度。但即墨区的治安一向较差。1942年5月下旬，合并于共军第六旅的姜立川部队频繁活动，与重庆系统游击匪部的矛盾激化，而在青纱帐时期大小匪团也日益活跃起来。为此，在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支援下，中国方面的警备队进行了积极的讨伐，治安状况基本改善。

在市政方面，在市公署中自市长以下有一批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人材，工作可望取得成绩。因此，日本方面只在根本问题上进行幕后指导。在商业交易方面，由于6月份实行了华北紧急物价对策，一般呈现停滞状态，但统税局的收入在7月份却达到了最高额。主要是因为彻底实行了统制经济和大量烟叶上市的缘故。在合作社关系方面，指导了增产甘薯、养鸡、鼓励施肥等工作，并努力使物资购进、配给工作顺利进行。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总管华北工矿企业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在不同于特务机关等部门的岗位上对确保、扩大治安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作为参考附记如下：

该组织是在1938年11月以资金三亿五千万日元创办的国策会社，是对华长期作战的支柱。其任务是向重要生产事业各部类的有关公司（子公司）进行投资贷款，以促进华北经济的开发，并对各公司的经营进行统一调整。投资贷款的对象为：（一）交通、运输、港口，（二）通讯，（三）发电供电，（四）矿产，（五）盐的加工、贩卖、利用，（六）其它为了促进经济开发特别需要加以统一调整的事业。该会社纯属控股公司，迄今为止是以不直接参与事业经营为原则的。

1942年11月7日，会社成立四周年之际，津岛寿一总裁曾对记者团就会社的事业状况做了如下介绍：

（一）本年春季，由于修改会社法，得到了增加资金八千万日元和由会社自己经营事业的许可。因而经营了有关物资材料的采购、配给业务，在物资调整方面取得了效果。

(二) 对有关事业的投资贷款总额达到十一亿零七百万日元，在这一年期间增加了三亿八千万。充分显示了在加强已有事业发展的同时，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和对日供应方面取得了超过预算数量的成绩。

(三) 为了适应重要产业的发展，对交通、发电供电事业等也进行了扩充、增建。尤其是塘沽新港的部分建成，扩大了出口能力，并把山东省内的电业部门也统一合并到华北电业，形成了电业系统的一元化。

(四) 投资、贷款的增加与山西产业、华北氮肥两会社的新建有关。山西产业形成了山西省军事管理工厂的综合体，华北氮肥是为增加华北农业生产提供廉价丰富的硫酸肥料的来源。

这样的投资贷款会社已达到三十二个，具备了能以妥善适应新形势的体制。

(五) 根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上决定的大东亚圈内工农产业的根本方针，对增产煤炭、盐、棉花以及炼钢、化学工业、人造石油、制铝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以期完成增加对日出口、扭转依靠日本国内的局面。

华北、蒙疆的政治情况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情况 政务委员会屡次发表声明：“大东亚战争已日益显示出是资源战、生产战的性质。华北作为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也越发增加其重要性。为此，必须以充实友邦日本的国防力量，采取战时所必需的经济对策，尤其是迅速开发国防需要的地下资源，确保治安，加快增产以粮食为主的农作物做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在10月19日省市市长会议及12月8日的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发表。）并努力加以贯彻执行。

由于物价问题最为紧迫，政府改组了“华北物资对策委员会”以期适当实行增产、收购、统制物价等措施，在民间也于9月份成立了“华北中央物价协力会议”，作为推进这一工作的主体。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改组 联合自治政府于8月31日再次推选德王为第二届政府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政务院院长为吴鹤龄、参议府议长为卓特巴札普。主席在9月1日的就职仪式上说：“本邦与日满两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以全力协助兴亚大业。”号召全区五百万民众一致努力。（主席强烈希望蒙古独立，经常自称“蒙古邦”。对此问题，政府最高顾问大桥忠一与军方的关系不够协调。9月3日大桥顾问辞职，同时改变了政府机构，废除了最高顾问制。）

政府为了统一整顿行政机构并提高其工作效率，自1943年1月1日起设置了“宣化省”和“大同省”。联合政府原由察南政厅、晋北政厅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组成，此次将察南、晋北两个政厅改组为宣化、大同两省，五个盟公署也改为由中央直辖，以此谋求加强中央的统治力量、精简机构和行政的一贯性。

新民会的活动

现状与将来 新民会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以该运动的共同目标“乡村自卫”为重点，通过武装民众、训练保甲等工作，大力开展新民会的活动。新民会的活动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8月22日，新

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预备役中将）就新民会的现状与将来做了如下叙述（在东京对日本记者团的谈话）：

新民会与满洲的协和会不同，具有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华北各地目前尚有很多由共军及蒋系残党设置的难以发现的据点破坏我们的工作。日军正在逐一进行讨伐，在讨伐后新民会立即进入，努力做到使该地区不再成为彼等之巢穴。今后的方针是使新民会进一步向共军控制地区采取攻势，以加强我方地盘。为此，先决条件是要有优秀的前线活动家，但遗憾的是日华双方都缺乏这样的人材。目前的紧急任务是培养和重新训练出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材。

到目前为止，新民会已与军方及兴亚院联系，进行了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0月起将实行第五次的运动。该运动对巩固扩大治安地区、对敌经济封锁均有相当效果，现正陆续出现蒋系来降的部队。新民会正在加强现有的保甲制度，以此为基础整备乡村的自卫体制。山西省以前组织过武装自卫团体“先锋队”，颇有成效。目前正仿效此办法，对乡村的优秀人材进行训练并予以武装，在各地编成名为“新民突击队”的组织。

在进行武力工作的同时，也正在努力争取和组织乡村中的知识阶层。

现在约有三百五十万会员，将来准备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但当前的方针仍然是采取精锐主义，努力训练人员和巩固组织。为此，除在北京西郊建立中央训练所外，并准备建立地方训练所，不但要培训新的人员，对现有会员也要进行再训练。

新民会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一体的关系，有着象日本的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结合一起的性质，以此求得民意的沟通。

华北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中的日本人作为新民会员处于顾问的地位。然而此等日系会员不应对政治上的每项工作都一一参与，而要以最高顾问为中心集结到一起，做到即使不说话也能取得华系人员的信赖，一有机会就进行指导。

在扩充加强新民会的组织方面，必须注意通过生活福利进行诱导。此外，要与合作社、工会、医疗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做到全华北的新民化。希望这样来使新民会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组织。

通过新纲领 10月27日，在王揖唐会长主持下，于北京召开了为期四天的新民会1943年度全体联合协议会。南京方面为了谋求华中、华北的融洽，汪主席以及褚民谊外交部长、林柏生宣传部长、梅思平实业部长、鲍文越陆军部长等也出席参加了会议。会上修改了1937年新民会成立以来的纲领，通过了以下的新纲领和运动基本方针。期望对新民会的面貌进行一次大的革新。

新 纲 领

- 一、发扬新民精神、
- 二、实行和平反共、
- 三、完成国民组织、
- 四、团结东亚民族、
- 五、建设世界新秩序。

运动的基本方针（喻熙杰事务总长的说明）

（一）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已经从理论信念到达了实践阶段。新民会必须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众进行建设新中国的国民运动的任务。这是新民会的历史性使命，新民会是新国民组织的指导团体。

（二）建设新中国的障碍是共产主义、英美的自由主义、封建的残余三者，新民会负有领导民众除掉这些障碍的重大任务。

（三）发扬中国国家民族意识是建设新中国、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基本要求。新民会应以此作为统一国民信念的基础，致力于国家建设。

（四）新民会坚持政、会表里一体的精神进行领导，实行“众议统裁”的新政治体制，清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创造革新的文化。

（五）新民会发动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加强华北参战体制，

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

(六) 新民会以整顿扩充分会、外围团体、青少年团三个组织,以建立新国民组织为工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以确立国民总动员体制作为运动的目标。

会长王揖唐特别对新纲领中的“和平反共”做了解释,他说:“我们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和平反共就是中国第三势力的斗争路线。”主张大力予以实践。

新民会按照上述指导方针参加了与肃正讨伐密切联系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关于成为悬案的推进新中国的核心组织——华北新民青少年团问题,自10月1日起,对现有的青少年团进行了整编,在各地建立了组织,1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建团大会。

新民会并努力联系和支援其它团体,协助它们扩大基层组织,对华北劳工协会,根据“新民会确立劳务动员体制纲要”实行了劳务动员,期使有关劳工、劳务业务正规化。

在对外关系方面,与日本的“兴亚同盟”合作,致力于两国国民的相互联系。

注:“兴亚同盟”是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于1941年7月组成,1942年5月改组,总裁为林銑十郎大将。在日本国内和海外进行兴亚思想的普及运动,并举办兴亚事业以及进行研究工作。

1942年12月24日,新民会建会五周年之际,该会顾问宋介叙述了新民会建立以来的经过及其发展状况,他呼吁“消除派系党派观念,以建会当初那样的团结和意志来发扬新民

精神”。并说：“现在分会数已达13,490个（为前年的38倍）、会员达3,643,199人（为前年的5.4倍），本年6月起的增加比数为分会9%、会员增加了29%，这表明了本会内容的充实。”

注：随着组织的扩大与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派系党派、丧失了清新活泼的风气，这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官办团体更是如此。然而1942年的新民会，在战争期间，可算士气最为高涨的时期。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

实施纲要 华北方面军和华北政务委员会鉴于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对确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华北新体制所取得的效果，为了扩大本年春季以来剿共战争的战果，进一步扩大、巩固治安圈，决定自10月8日天皇诏书发表日开始，用两个月的时间，大力开展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与日华军警进行的肃正讨伐相配合，比上次更大规模地对华北中国民众及四十万日本侨民进行总动员，以“灭共”为主，及“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改善生活”等为目标，进行军、官、会、民总动员以促进华北的建设工作。

此次运动没有关于中国方面计划的材料。由方面军编制了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对策综合实践的实施纲要，于8月6日通报所属各兵团及中国方面有关机关，开始进行准备。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

第一 方针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继承已往运动的精神，以期逐渐扩大战果，同时应特别注意与军事工作相配合的文化工作，并且要使目标及施策的内容与民众生活相结合，以促进和加强其主动的活动，以日华军、政、会、民真正上下一体的总体力量，开展讲求伦理的国民运动，使治安强化达到空前飞跃的时期。

为此，运动的范围应根据下列标语加以改正，针对运动地区的特点和运动对象的类别，适当地加以运用。

我们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清思想！我们要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我们要改善生活，安定民生！

第二 实行时期

实行时期为，自10月8日至12月10日。在初期约两周时间内与末期的夏防运动（针对7月以来共军夏季政治攻势的肃正建设运动）同时进行，以扩大其成果。自12月2日至8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第三 指导要领

一、本次运动仍然坚持由中国方面自动发起的宗旨，特别强调要求各机关领导人真正做到阵前指挥。在本次运动中暂不明确提出“解放大东亚新国民运动”（以新民精神为基础的兴亚运动和新民运动是华北的长期性运动，但本运动是新民运动在大东亚战争中的重点工作。另外，华中的新国民运动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的名称，但要为准备开始该运动进行指导。

二、在华的日本人应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实际行动对中国方面起模范作用，并以真挚的态度投入运动。要特别强调养成自我整肃的作风，并严格要求各界领导阶层率先示范以确立当地的翼赞体制。

三、在本运动的各个部门，大力开展以青少年男女为主要对象的运动。为此，除特别要对各级学校进行积极的工作外，并要

灵活运用宗教团体及社会教育设施的教化宣传力量。

四、运动期间的宣传教育要领应根据附件的计划进行，同时应尽量发挥日华各机关的现有能力，尤其要灵活运用从少年到少年、从妇女到妇女、从农民到农民的各阶层所特有的心理上的感染力。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6月份在北京设立了“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并在各省、市设立了常设支部以推行剿共和确保治安的对策。

实施概况及其效果 中国方面自华北政务委员长以下，省长、道尹、县知事以及各团体领导人都率先带头促使运动的进展，致力于“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

另一方面，华北方面军在秋寒的山野上开展了激烈的肃正作战，同时，军、政、会、民打成一片推行各项工作，以期摧毁敌方抗战力量并完全杜绝敌方的收粮工作。

对此，中共方面在军事上始终采取游击战术，力求保存实力，同时在中共地区实行了经济反封锁，潜入我方进行破坏户籍调查和以宣传谋略等方法瓦解我方阵营的工作。

这样，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宣告结束。12月10日王揖唐委员长发表讲话说：“本次运动已成功地在预定期间结束，但今后仍须继续实践以期运动的彻底。”由于痛感有防止青年思想共产主义化的必要，16日让华北防共委员会准备设立“启新院”，决定从第二年起开始启蒙教育运动。

另一方面，华北方面军当局也于12月11日发表了谈话，指出“此次治安强化运动已收到伟大成果，华北的肃正建设

工作确立了新的前进基础”。并发表本次日华共同剿共战（当时称为第五次治强战）的情况如下：

河北方面 第五次治强战以治安圈的扩大、巩固为重点。自9月27日起开始前哨战，对河北的红色据点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军进行攻击，在河北省太行山脉北部山岳地带开展了大扫荡战，占据了敌方指挥部所在地阜平。在共军冀东军区进行了彻底扫荡、剔抉和建设工作，在冀东全体民众的协力下构筑了隔断壕、碉堡和岗楼，加快了消灭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是政治组织的工作。在共军的粮食补给地区的冀中，继续进行了不断的肃正讨伐，打破敌方的政治攻势，使我方行政的贯彻得以空前提高。

此外，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自卫团等，参加了对石德路南方地区及白洋淀附近残存共军巢穴的扫荡，取得了切断中共运粮通道的成果。

山东方面 山东省的日华两军协同作战，9月下旬首先剿灭了活动于鲁北地区章邱北方附近的蒋系保安第二旅约一千人。在9月末开始的第二期鲁西旧黄河畔剿共作战（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中，奇袭了教导第三旅主力。在鲁中地区，10月中旬击溃了临朐（益都南方）东北地区的蒋系匪部及益都北方的徐向前部下山东纵队第三旅。于10月下旬开始的鲁南肃正作战中，于沂水西南的山岳地带追击山东纵队司令部，并扫荡其根据地。

这一系列连续进行的作战以及有民众参加的治强战，给予蒋共两阵营以大的打击，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出现了山东纵队第十二旅张希贤部队两千人等，总计一万五千人的投降。

山西方面 在山岳地带的治强战遍及整个山西，首先于10月上旬击溃了盘据中条山脉的蒋系晋南游击队。在11月的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中，扫荡了太行山脉中部地区的共军第一二九师、晋西北地区的第一一五师。

五、对敌经济封锁

概 况

根据1940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采取了适应大规模持久战的有力对策，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2月下达了“长期战现地政略指导”，其中规定“努力加强对敌区的封锁，并力求在占领区和敌区之间进行有效而合理的隔断”、“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在占领区内部要确保我军当地给养，同时要增强生产能力，以期充实我国防必须物资和安定民生，巩固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

1941年6月11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命令“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大陆命第五百零一号）。同年12月3日更明确指示要以“加强对敌封锁、摧垮敌方继续作战企图”作为基本任务（大陆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使之成为我军总兵站基地的同时，使敌方陷于贫苦的困境。

华北方面军在此以前，随着治安肃正对策的正规化，早已建立了对占领区内外敌人的封锁体制。1941年以后，确立经济封锁体制的对策也逐渐完备。尤其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除使敌方不能再依靠第三国权益进行突破经济封锁工作和利用东海面上的对外航线外，经过几次摧毁敌方根据地的作战，对敌方抗战经济力量的封锁效果也逐渐增大。但是，随着敌区的穷困日益加剧，敌方反封锁和经济谋略也更加灵

活巧妙。相反，我方的封锁机构和封锁行动也有若干不足之处，从地区、局部看来，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直到1942年秋季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中国方面各领导机关的活动、地方基层的执行情况、民众的协力等，还有必要加强指导和监督。

兹将到1942年底前后的情况叙述如下：

经济封锁的执行情况

1942年夏季华北地区我方设置的封锁线主要为（一）对占领区外围敌区的隔断线，（二）对占领区内中共根据地的隔断地带，（三）在城市周围、铁道水路、交通重要地点的物资流通限制线。其中（一）由方面军进行计划、统制，（二）、（三）主要由各兵团实行。

方面军直接进行指导的封锁线，其情况如下：

（一）对太行山脉内共军根据地及黄河、新黄河、涡河右岸的外围之敌的封锁线，除河南省豫西地区的一部分外，大体都已完成。

（二）对太行山脉内共军的封锁线是由一连串有一定间隔的警备队小据点构成的隔断线（其中包括隔断壕、隔断石墙、断崖及沿隔断线的警备道路），在各个据点之间配置中国的武装团体形成监视线，并进行巡察、讨伐。在山地的据点阵地则按鱼鳞形配置成二线、三线。

（三）在河防封锁地带，按一定间隔构筑坚固的碉堡，特别是在河南省平原地带，碉堡直接配置在河岸上，修筑工程已完成一半。

各兵团进行的封锁线工作，在不同地区进度也不一样。

由于封锁线是随治安状况的进展而逐渐推进的，故封锁线的整备状况也不一致，但设置适当的隔断地带逐步压迫敌人扩大治安圈，推进了封锁线工作。

注：封锁线推进计划之一例：

在推进封锁线工作时采取的方法是：（一）由日华军官警对隔断壕外的准治安地区进行讨伐和治安工作，划分地区按阶段逐次加强治安，建立多数联络村（向我方提供情报的村庄），（二）在预定封锁线的各主要地点设立棚舍，然后修筑警备道路（供巡逻部队行动之用）、通信线和隔断壕，（三）根据情况与友邻部队协作，用隔断壕及碉堡对敌方根据地地进行包围，并对在地区内游动的敌方部队反复进行袭击。

隔断线的构筑方法是，在平原地区不能利用自然障碍时，要筑宽约六米、深约四米的阻绝壕，在难以挖掘的山岳地带，设置由自然障碍或石墙构成的隔断墙，并配置火力、进行巡逻，以防止人、马、车辆等从指定入口以外的地方通过。

在山西省五台山附近和冀东道的沿长城线地区，有些地方设置了广大的无人区。

在铁路、水路及主要道路的交叉地点和城市的出入口设置检查所，并派流动检查班进行巡逻，以监视和杜绝向敌区流出物资。

对城内物资大力实行物资上市的措施及配给统制，以阻止剩余物资的流出；并动员各机关尽力从敌区获取物资，积极采取行动，摧毁敌方的生产机构。

方面军内部担任实行这些对敌经济封锁工作的机构，是

根据1941年制定的“华北对敌经济封锁大纲”组成的。其大体情况如下：

(一) 日军方面以特务机关为主（在接近非治安地区为警备部队）统一领导宪兵队、领事馆警察，并指导中国各机关的经济封锁活动。

(二) 中国方面以县为执行单位，由县的各机关，即县警察（流动的经济警察，固定的物资检查所，流动的物资检查所）、县物资对策委员会（由县长任委员长、县首席参事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县公署的科长、各民间团体代表、军队宪兵队的代表组成，实行对指定品种物资的搬出搬进的许可制。目的在于使治安地区内部的物资交流畅通和阻止物资流入敌区）、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等以及新民会、合作社、爱路各团体、部外武装团体（如华北交通警备队）负责执行。

注：第一军特别设置了“山西省经济警察本部（由军参谋长兼任本部长）”实行了严格的经济管理。

下面是从方面军参谋部8月份编制的“经济封锁月报”中摘录有关各地区实行封锁的特殊事项。

(一) 第二十七师团管辖区(津海道地区) 将各驻屯队作为封锁据点，在重要地点设置固定检查班，对敌主要补给路线派流动检查班随同讨伐队行动，随时出动检查，并尽力收缴敌方企图反封锁而聚集的物资等，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进行封锁。在冀中敌区正在与第四十一师团一起共同构筑县境壕沟。

从封锁线外可向我方自由运进物资，但向敌方地区运出时，除指定地点外，一律加以禁止。

(二) 第一一〇师团管辖区(石门、冀中、冀西地区) 平原地区方面大部分都是治安地区或准治安地区。因此，严禁有利于敌人的物资流出，但对农产品等的自由交流采取欢迎态度更为有利。即要使封锁线形成阻止匪团流动和利敌物资流出的监察点。

山地方面为敌方地区，必须使封锁线成为断绝居民交通及一切物资流出的界线。因此，师团特将重点指向山地方面，并努力推进。山地封锁线大体上是由分散部署在最前线的兵力点连接形成的。京汉路两侧的封锁壕形成第二道封锁线，防止物资由平原地区向山地方面流出。

（三）仁集团（第十二军——译注）管理区（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及河南地区）第十二军及所属各兵团为了确立封锁体制，进行了频繁的讨伐作战，或重新进驻兵力，逐步全面压缩封锁线，并向各个兵团拨交特别资金，在讨伐作战的同时，不间断地对封锁地区内物资，实行没收或强制收购。在整个管辖区内对正值收获期的农作物由收集班实行收购，并努力防止封锁物资的流出。特别要采取确保盐的增产、渤海湾沿岸的警戒以及河流航运船只的批准制等措施，以加强管理。在河南地区由中国各机关进行了宣传宣抚工作，以期争取民心，对不服从者使用武力予以驱逐，以阻止物资流出。但仍有很多尚需努力的地方。

（四）乙集团（第一军——译注）管理区（山西地区）

第一军经济封锁的重点指向共军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晋西北军区以及山西军的晋南地区。为了掌握省内居民的经济实况和查办违犯各项经济对策的行为，由宪兵队编成巡回经济警察班，并制订“山西省物资流动取缔纲要”，在特务机关主管下，统制主要物资的省外运出运入及在省内的流动，坚持低物价政策以谋求省内居民的福利、增大军的自给能力，加强对敌经济封锁。

（五）戊集团（驻蒙军——译注）管辖区（蒙疆地区）

本区经济封锁工作是在驻蒙军的指导下由政府担任的，重点指向中共地区。封锁第一线为最前线的各个警察队连接成的包围封锁地带。此外，对各主要城市及车站的物资移动、集散进行统制监视。在封锁第一线的枢纽地点设置警察队的据点，在各据点的间隙进行流动检查。同时，极力破坏敌人的道路；使民众经由主要道路通行。虽然采取了此等措施，但未达到预期效果。因

此，正在指导政府，应使行政力量贯彻到封锁地带的各个街、镇、乡，结合整顿基层配给机构，以期完成封锁任务。

物资配给、物价、货币流通的情况

治安地区内的主要物资配给制度，由于实行的日期短，中国方面官署对制度的运用尚不熟练，因运输困难造成物资的积压，户籍调查工作未完成，基层机关缺乏收购资金，一般民众对统制经济的不理解，以及单纯追求利益等等原因，很快达到所期望的目的是困难的。

配给机构，各城市虽在监督机关指导下组成了各种统制配给组织，但由于日系、华系配给机构是两个系统，而华系配给组织尚不完善，以致配给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各县是在物资对策委员会指导下，由新民会、合作社、各区公署、指定商店、各乡保甲进行配给的。不但要对机构进行整顿，对其职能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指导。

其次，在华北由于受到大东亚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抢购风潮以及华中采取旧法币对策引起物价暴涨的影响，物价出现急剧上涨的倾向。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于6月9日作出了“华北物价紧急对策纲要”的决定（内容为：整编和确立物资配给机构、规定适当的价格、确立综合性的供需计划、制订金融对策、降低生产费用和中间费用，对生活必需工业进行援助等），采取了广泛的物价控制政策。自6月以后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与此相反，敌方地区的物价上涨幅度和我方地区内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易县境内，以1941年11月底的物价指数为一

百时，在1942年8月末的指数如下：

	我方地区内	敌方地区内
高粱	141	647
盐	131	833

此外，在华北、蒙疆地区流通的货币，在我方有联银券、蒙疆券两种，在敌方地区有旧法币、中共系银行券（晋察冀边区券、冀南票、北海票、西北农民券、河南农工银行券、合作社流通票、伪造票等）以及各种杂券。联银券在1938年发行额为两亿元，由于治安圈的扩大和经济工作的进展，逐步扩大了流通范围，1942年8月底的发行额达九亿七千万元。但联银券的流通是同以武力为支柱确立治安相并行的，而在敌占区及部分接近敌方的地区仍有敌方的货币流通。此外，近年来联银券的迅速膨胀，不仅由于我方治安地区的扩大，物价上涨也是一个基本因素。

边区券等中共系货币，估计流通额约在数千万元左右，主要在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及京汉路以西、山西省境附近使用。其它旧法币估计约有三亿元。

随着大东亚战争的进展，联银券的信用价值有所上升，反之，旧法币及边区券等的价值则是一直下降。其交换比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差别很大，8月末每一元联银券对旧法币的交换比价大致如下：（边区券比旧法币的价值高）

在河北省为二至五元，山东省为五至六元，河南省为三至四元，山西省为三至六元（在蒙疆地区，对每百元蒙疆券的比价是

联银券六〇至七〇元、边区券一二〇至一三〇元、旧法币五〇〇元）。

从敌区获取物资

方面军除在我方势力范围内努力收集物资和增加生产外，同时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金融活动。

经济谋略的手段有：（一）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敌方货币进行采购。（二）运出不必需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敌方吸收我方必需品或敌方抗战必需物资。（三）利用敌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的采购。其中，以回头物资的流出曾吸收了相当大量的农产品，但随着敌方反封锁等对抗工作的加强，上述谋略工作也逐渐困难起来。因而从准治安地区收购土产品时，也大有必要采取武力并用的办法，对收集货物的机关进行支援和保护。在非治安地区收集物资，尤其是收集粮食、棉花等物资时，要受到敌方很大阻碍，因此必须密切配合作战、讨伐行动进行。过去对共军根据地进行的肃正作战，在破坏扰乱敌方的抗战经济组织、夺取培养抗战力量的资源方面取得了成效。特别是本年度春季肃正作战形成了积极的经济封锁，说明武力战就是经济战。如前所述，在冀中作战中丧失了经济基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北部太行山脉地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是很明显的。但是，中共的生存力极为坚韧，因此不仅要摧毁其经济中枢

地区，还必须破坏其所有的辅助性经济地区。各部队利用作战、讨伐的时机，极力破坏敌方的生产设施、运输工具以及被服粮秣仓库，缴获或收购我方必需物资及使敌贫困的物资。此时的重要问题在于争取民心，必须进行政治工作使敌方民众脱离或疏远中共的领导。

中共方面的经济反封锁

中共方面随着物资的缺乏，逐渐采取了对抗措施。为了粉碎“日军的以战养战方针”（中共方面的说法），努力开展以确立自给自足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其经济反封锁的手段有：（一）统制输出入贸易。（二）确保土产物资。（三）从我方引进物资。（四）破坏我方设施、妨碍交通通讯等。关于其实行状况在“经济封锁月报”中有如下叙述：

一、中共的经济工作

中共的最终目的虽为全面实行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但现阶段则采取过渡性的权宜办法，正在实行首先培育共军并使一般民众参加抗日战争加强战时体制的政策。同时以严格的统制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用“统一累进税”或“减租减息”压制大地主、高利贷，以图进行农业革命。

下面列举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情况，说明最近的经济工作的趋势。

由于我方的不断肃正和连年歉收，北岳区的抗战经济濒于破产，特别是因冀中作战，使之丧失了兵站基地，抗战经济遭到打击，以致陷入如他们所说的“既无后方也无前方，只能潜入包围圈，改变形式进入敌人后方进行活动”的地步。为此，敌方正由

过去的以军政为重点改变为以经济为重点，企图打开目前的困境。在经济工作中，号召“对敌经济斗争”，专门制订了从我方治安地区获取物资的具体方法，企图在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同时，进行长期的开发根据地生产事业以及增加生产。

中共研究利用我方经济封锁和配给制度、低价收购农产品等产生的矛盾、漏洞（人民隐藏物资、黑市交易、商人的谋利心理），企图扰乱我方经济、阻碍我方获取物资，并正在全面进行调整、增强、新设领导和执行机构，努力提高成效。对此应予以注意。他们的办法是：在边区、专区、县各级的党组织中设立“经济委员会”，制订对敌经济工作的方针、计划、手段等等，并将原有的贸易管理局、工矿管理局合并为“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此项工作，工商管理局长并经营“公营商店”作为经济斗争的别动队，从事对内外贸易和物资调整等实际活动。为达到此目的，将“合作社”也纳入其领导之下，统一了进行对内物资调整工作的机构。从而有计划地从雁北、晋东北地区收购杂粮运往京汉、石太沿线地区，并从该地区取得棉花，在北岳区织成土布，做为交换物品运往雁北、晋东北地区，利用此种需求关系，进行北岳区的经济建设，同时，顽强打入我方商人中间，以夺取治安地区的物资。对此必须有所警戒。

二、领导机构及其活动

（一）经济委员会 表面上为单纯决定经济工作方针、对策的委员会，但实际则是由各机关的党员代表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负责监视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其领导方针是对民众团体，特别是农会，以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藉口，设“劳动英雄”称号，鼓励各种增产竞赛。

（二）工商管理局 这是与各级经济委员会形成一体的工作实施机关，在法令政策方面对公营商店、公私合营商店、工厂、合作社进行领导和监督。

（三）合作社 合作社的任务是扩充利用资源的生产组织，调整地区内的物资。但根据情况，也要促进运输事业的发展。

将村合作社的小组组织与救济、生产、运输的组织结合到一起，贷给救济资金，使之从隔断壕、封锁线外大量吸收棉花，组织纺织生产，以冀西的土布交换蒙疆的粮食。政府贷放的救济资金用于工具原料产品的运输费用。（据晋察冀边区第四区农民合作社简章规定：“合作社是经济战线上的堡垒，是对敌作战的支柱”。）

（四）公营商店 负责对外贸易、管理市场、调查敌方经济动态。在各专区设有总店，由工商管理局长兼任经理。商店的主要任务为“管理市场”。市场为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地，因而不仅利用封锁线外的商人大量获取军民所必需的物资，同时得以提高边区货币的信用，团结群众，在对敌贸易上处于主动的地位（中略）。关于市场管理方法有如下指示：（一）对于在敌人控制下的游击地区及新蚕食地区的市场，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加以摧毁。如采取任何方法也无效时，则应利用游击区及新蚕食地区的部分空隙地带组织早市、晚市、流动市场，以集合群众进行交易。（二）一方面要掌握市场经纪人，在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利用经济力量调节物资的需求，稳定物价，并同政府税收机关保持联系，共同负起管理责任。（三）在掌握市场时要首先掌握该市场的重要物资。

开展“商店工作”，要在游击区物色有信用的商人做为干部使之吸收群众。即首先用投资或谋利的方法和游击区商人共同营业，然后逐渐对之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其抗日思想觉悟，最后使之参加此项工作。（设立名为采办处的谋略性贸易机关，采办员多以店员身分住于店内。）从事商店工作的人员应经常注意身分保密，专心致力于商店的“点线工作”，按照工作计划开设公营商店（点线工作的所谓点上的工作，是指以人为中心，或利用商店、仓库等，有计划地进行吸收物资和输出土产的情报工作。线上的工作是指以运输组织在游击区搬运货物出入的工作）。在工作薄弱地区及新开辟地区的工作，要注意给群众以充分的经济利益，使之与我方合作，然后再逐渐给予政治任务。

应将军、政、民各项工作统一起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

搬运货物突破封锁线有各种困难，因而采用“蚂蚁搬泰山”的方法，即根据多年的经验，将货物分成零星小件，发动民众以肩扛，独轮车推，小量地分批搬运，或利用邮件和日方的公共汽车运送。对于比较大量的物资，则在难以挖壕的地点、警备线的弱点或买通检查所的监视人员，以驮载、大车、独轮车、自行车、船只进行搬运。

(五) 贸易局（在未设工商管理局的地区）是“有组织的对外贸易机关”，拥有由边区贸易局直到区贸易分局的上下系统。其目的在于谋求军用民需物资供需的圆满和控制物价。其活动情况为：

(一) 从管辖地区内的各村庄按市价的八、九成价格收购各种物资交到各管辖分局。(二) 分局使指定的商人运到我方的治安地区或准治安地区出售，以卖得的货款购进日用品、杂货等必需品。将取得的物资由分局一律上交总局。(三) 总局将该物资主要分配给各军政机关，剩余部分出售给一般民众。(四) 在治安地区盗用我方的良民证以城市附近乡村的旅店、商店为据点，利用村民小量地购进物资。其搬运手段巧妙，如隐藏在粪桶里或利用妇女儿童逃避我方的监视。

(六) 交通站 是秘密通信联络机关，同时也是办理运输事务的机构。交通站的工作重点是保证抗战物资的流通，但也进行流动物资的运输以及对之取缔和监视。从边区一级到村级交通站，有严格的上下系统关系。

三、贸易工作的重点 对内是自由贸易，对外虽然名义上是统制贸易，但实际上是军用民需的命脉，而且重点在于获取决定各种物价基准的粮食，借以充实己方的粮食和破坏我方的粮食政策。因此，游击区也可称为敌方掠夺物资的对象地区。中共开展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攻势，其目的是要在群众中造成对我方收集粮食工作不予协作的气氛以及使联银券贬值。（以下略）

四、货币斗争 游击区的统一累进税，是强行以联银券征收的。目的在于吸收大量的联银券，用以进行谋略性的大量高价收

买我方地区的物资，使民众对联银券产生戒心，促使民众不与我方协作，或对不能阻止我方收购的地区故意提高物价，造成我方收买的困难。（以下略）

中共方面在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确立自立的经济体制的同时，并开展了巧妙的突破封锁线工作。根据各兵团没收的物资判断，向敌方流出的物资数量是相当大的。

注：据以后调查，“北岳区的贸易额在1942年达到了约三亿五千万日元。由于加强了经济斗争，贸易工作又活跃起来，约在三十个地点设立了公营商店，掌握了各地市场进行内外贸易，仅1943年1至3月份，实际贸易额似已达到一亿二千万日元”（剿共指南）。

1942年底以后，中共方面挽回了过去两年来的颓势，逐渐增强了力量，敌我之间的经济战日趋激烈。

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明确指出，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在于阻止战争必需物资流入敌方，以造成敌方战斗力的枯竭”，并努力促进中国方面积极主动予以协作。但是，封锁也带来了某些弊病。为此，“剿共指南”曾提出应注意事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对敌经济封锁工作，稍不注意就会阻碍临近封锁线地区的物资交流，很有可能造成有损民生的危险。因此，应尽一切手段对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进行教育指导，同时要特别注意向一般民众说明实行对敌经济封锁的必要性，使之充分理解，从而主动积极地与我协作。

（二）在封锁线上实行盘问搜查及没收处理非法违禁物资，主要可由中国方面担任，但鉴于多有滥用职权借口盘问搜查勒索金钱或接受贿赂默许违禁物资通过等情形，以致造成民心离叛或降低封锁线效果。对此必须经常予以严格监督。

由此可见，经济封锁政策反而产生了使我方苦恼的情形，在本来想要成为铁壁一般的封锁线上出现了很多漏洞。

中央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制订的政策，于1942年12月22日通过总长指示进行指导如下：

关于我军当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等工作，今后应按下列各项实行。

一、保证我方占领地区内重要国防资源便于开发，获得、并确保我军当地自给，协助我方获取占领地区外的军需物资工作。

二、在对敌封锁工作上，努力阻止我方占领地区内的军需物资流入敌区。

但不得因此阻碍我方占领地区内的物资交流。

该指示的意图主要是要求在最后一项“不得阻碍占领地区内的物资交流”前提下，实行对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中国，尤其是华中经济情况恶化的缘故。以米价为例，国民政府地区比重庆地区的价格还要高，在华北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的物资交流也不够通畅，以致造成价格差额增大。

六 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华军、官、民全力以赴的治安肃正，中共根据地受到压缩，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陷于极度贫困。在中共各种文献中一般叙述如下：

（一）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开展了扫荡、“三光政策”、思想战及特务工作的总力战。其扫荡方法有“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展转剔抉”等等，企图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这种连续进行的扫荡造成了未曾有过的严重局面，加上这一

时期华北各地区发生了天灾，由于饥荒，军民只得吃树叶草根，局势越发严重。

（二）1942年一年中，冀中平原的扫荡达到了最残酷的地步，更加上实行了治安强化运动等，使我方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三）日军在太行军区进行的“四·二九”、“六·一二”扫荡，规模大且彻底。我八路军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该战役中殉国。由于敌军的蚕食政策，更加上春季的大旱灾，粮食生产降低到三分之一，积储粮草枯竭，群众的贫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惨状。

（四）1942年是山东国民党（重庆方面）掀起反共高潮的一年。过去想暗中投敌以求自保的反共军，现在竟发展到纷纷公然投降日军，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共同消灭我军。我根据地因敌人扫荡及经济封锁，粮食极端困难。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土地政策，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以及生产自救（增产）等各项政策。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边区内各级行政、立法机关实行三三制，企图以此加强统一战线。三三制是在边区立法机关参议会的人员分配上，按中共党员、党外左翼人士及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通过选举选出的制度，是把中间阶层吸收进统一战线，以紧密联系群众的政策。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政权的性质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克服经济危机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边区”是实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行政地区，与重庆政府统治地区不同，是在性质不同的政权下实行另一种政治的地区。战后一个时期，

中共曾称之为“解放区”，经过发展，合并构成了新中国的基础。

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

为了保护中、贫农，提高他们的生产热情，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减少佃租降低贷款利息），力求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同时对于地主、富农采用交租交息政策（保证交纳佃租、利息）以团结他们使之抗日。由于削弱富农阶级及富农生产不利于边区经济，因而转变为凡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富农，采取与之协作的政策，1941年以后更加强调了这一政策。由于减租减息政策很难彻底实行，至1943年10月党内发出了“开展降低佃租运动”的指示。

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为了解决各个边区的财政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自1941年以来实行的政策。要求军队采取精锐主义提高素质，不盲目增加兵员。尽量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的同时，在军事方面扩大发展了适应作战地区情况的民众武装组织，大力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形成一体的人民游击战争。

例如冀鲁豫边区，为了扩充民众武装，在1941年前后公布了“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其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 总则

一、本队定名为冀鲁豫边区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二、本队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组织，凡在县政府法令规定的年龄内（年满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性公民及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公民）的公民均编入本组织。

本队在执行任务时受政府指挥，但组织的性质是群众自卫的武装团体。

三、本队的目的是以抗日人民武装的自卫力量保卫乡村抗日根据地、抗日政权、抗日团体等，并争取民众利益，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

四、本队的基本任务如下：

- （一）进行人民游击战争。
- （二）与抗日军队协同作战。
- （三）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五、本队为了执行基本任务建立下列各队：

（一）警备自卫队（简称自卫队）、（二）妇女自卫队、（三）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四）模范班、（五）公私企业团体内的工人自卫队。

（参加青抗先的为十六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男性、参加模范班的为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性。二十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男性根据本人志愿决定参加青抗先或模范班）。

六、青抗先与模范班统称“民兵”。

民兵为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因此以志愿参加为原则进行组织。任务比一般自卫队更大。即：农忙期从事生产，利用农闲期尽量进行训练，在有事之际参加战争，是武装自卫队的骨干。

七、警备自卫队执行下列各项具体工作：

- （一）抗日警戒、铲除汉奸、肃清密探。
- （二）破坏道路、围壁，实行空室清野。
- （三）传送情报。
- （四）救护伤病员、运送战斗器材、支援医院工作。

(五) 缝洗军衣(妇女自卫队)。

八、民兵队除一般自卫队的工作外，并执行下列工作：

(一) 配合军队参加战斗。

(二) 对敌人据点进行封锁警戒，保护地方政权的生产、财产。

(三) 封锁敌方交通线，进行游击活动。

(四) 侦察敌情。

(五) 援助、保护战时避难民众。

第二章(除以下各项外均略去)

十六、本队的编制及指挥系统如下：

(一) 县级大队部设正副大队长、教导员各一名(由县武装科长兼任大队长，在武装科合并办公)指挥领导全县自卫队。

(二) 各区设中队部，设正副中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区自卫队(区武装助理员兼任中队长、合并办公)。

(三) 在村庄多的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区与村之间设立中心村区队部，设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中心村的自卫队和基干自卫队。

(四) 以行政村为单位设分队部，设正副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村自卫队。

(五) 分队下设小队，小队下设班。小队及班均设正副队长、班长各一名。以五至十五人组成一班，以二至五个班组成一个小队，以二至五个小队编成一个分队。

三十六、在敌占区的自卫队组织，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可利用各种隐蔽方法。

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译略)

生产自救运动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首先以粮食、被服的自给自足为目标，力求全面发展根据地内的农、工、商、运输业的

生产。为此，“在中央统一、分散经营”原则下，组织党、政府、军队、人民大众的一切劳动力，大力开展生产竞赛、表彰劳动英雄以及发展为大众服务的合作社等工作。军队也从1942年起，除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外，还担负起支援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劳动和对敌警戒的任务。

对当时的受灾民众，在“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口号下，进行了救济活动。这一生产运动到1944年以后，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并且在壕沟防卫线外的游击区，也开始了军民协力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4月也说：“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

以上是针对1941、1942年的困难，中共方面实行的对策概要。胡乔木也说：“由于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克服了困难，根据地更加巩固，从1943年起，又逐步扩大了。”（以上均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重建冀南根据地实况

以上是中共方面克服困难的全面情况。下面再举出冀南根据地重建的具体事例。冀南地区在4月底开始的日军的肃正作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从6月下旬左右，很快地进行了重建工作。在中共的资料中有如下叙述：

我们决定根据敌方势力强弱不同而形成的各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斗争形式的方针。

在敌方统治时间长、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例如平汉路沿线

地区等地，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重点放在秘密工作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伪军伪组织工作。与此同时，领导人民进行日常的合法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积蓄抗日力量。

在接近敌方主要交通线、重要据点但敌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则一面坚持秘密工作，一面团结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例如由干部及当地民兵打击敌方的特务活动，加强扩大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争取团结群众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和向伪军、伪政权内部进行渗透工作。

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实行革命政策，破坏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治安强化”的斗争，牵制和抵抗敌军的进攻，阻止其行动。

在我方游击根据地，推进武装建设，动员群众投入保卫人民日常利益的斗争，建立区村政权，加强群众游击战，进行改造环境工作。

以上各项措施均适应情况的演变进行，主要以党、政、军、民形成一体为根本。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判断敌情，把合法与非法斗争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

我冀南军民在敌人的4、5月份大扫荡后，按照“夏防计划”休整兵力，并利用植物生长茂盛期进行了秋季攻势的准备工作。

在以后的一年战斗中，使日军死伤四千余人，打死、打伤和俘虏伪军七千余人，缴获步枪五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完全弥补了春季作战中的损失。同时，平原地区军民开展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报复了敌方的“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为了对抗敌人的1942年秋季“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我方开展了“第六次政治攻势”，宣传了我方的“两年来的胜利总清算”，使敌人尤其是伪军产生了空前的动摇。

1942年11月至次年3月的五个月期间，开展了强有力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性的群众斗争，给伪军组织以决定性打击，使其士气大为低落。

平原地区军民乘敌方兵力不足、纪律松弛等空隙，进入敌人后方建立了小据点，把敌占区改造成了游击根据地。军区和区党委详细调查了敌方地区的情况，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工作，挑选与当地居民有联系的干部，组成了数十个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秘密潜入敌方占领区，说服当地有力人士，宣传抗日政策，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接着武装工作队和抗日政府工作队又对敌方特务、汉奸、有民愤的坏分子，由群众进行公审、抗日政府判决，对其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处以死刑，并要求其余的人反省悔过。同时，选择适当时机，对敌方的军事设施进行破坏，向群众显示我方的威力，掌握伪组织，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了对敌斗争。例如反对与敌人协作、反对出民伕、反对交纳棉花、反对纳税等等。这样，成功地建立了小根据地。对此，敌方根据确保占领区的方针，加紧实行了强制征壮丁、配给制度等措施，这样就必然与群众形成对立，因而我方的小根据地陆续不断地增加。

如上所述，在武装斗争支持下，或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工作与非合法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打击敌人的任何进攻、保护抗日力量的体制。

由于采取了上述方针和措施，冀南地区春季的混乱状态在6、7月间即已停止，8、9月间扭转了危局，10月以后扩大了游击区；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建立了小据点，逐渐缩小了敌方占领地区。

其次叙述一下“道沟”、“坑道”斗争情况。这种战斗方法是平原地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发明创造。

冀南平原没有山区那样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既少森林也无湖泊，是一望千里的平地。除在植物生长茂盛时期外，没有可隐蔽部队行动的东西。敌人在“四·二九大打荡”后，随时都可以对我方根据地村庄进行袭击。据统计，1942年冀南地区的交战次数为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为平均每天9次。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便于我军部队的活动和打破敌方的严密封锁、拖延和阻止敌军快速部队的行动，平原地区军民花费了极大的劳力，

改造了所有的道路，把大部分道路挖深修成了“道沟”。即把道路按可以通过牛车的标准，挖成五尺宽、三尺深的深沟，挖出的土堆积在沟的两侧做为人行小道。在与此道沟相隔一至二华里的地方再挖成同样的沟道，构成平行道路以便于往返通行。此等道沟纵横交错修成蜘蛛网形状，因而使我方可以通行无阻。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做为隐蔽掩护物体，便于分散退避，同时又可隐蔽地接近敌人。相反，道沟阻碍了敌军车辆部队和重武器的行动，敌军用填埋的办法行进时，则比我方步行的速度还要慢。

大规模地构筑道沟是在1940年开始的，但当时还很原始，在军事上的效果也不大。以后经过多次失败和试验，至1942年以后终于发明了这种有组织的新的道沟战法，加上建成了“坑道”和乡村堡垒，创造出了“地下战场”。

“坑道”也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改进的，最后形成组织得极为复杂的设施。各户都有自己的秘密洞穴，村内有通往各户的村坑道，此外还有连通各村的“干线坑道”。这是我军和游击队的藏身地方，也是面临优势敌人时的退避通道。这样就使我军能够神出鬼没地行动。尤其是坑道增加了我军和群众接触的机会，使群众得以勇敢地 and 敌人斗争。

冀南平原长达几万华里的“道沟”和“坑道阵地”，虽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打击和削弱了敌人，积蓄了革命力量并使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注同前）

七、向对华新政策的转变

关于设置大东亚省的问题

1942年2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要求尽快地集中发挥大东亚共荣圈的总体力量。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提出了在外务省之外，另设置一个带有内政性质的机构——大东亚省

的方案。新机构的使命为“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将共荣圈内的各种派出机关统一起来，对各项政治事务实行一元化的统一的速效的领导。”（东条首相谈话）大东亚省于11月1日正式成立，首任大东亚大臣为青木一男国务相（前国民政府顾问）。过去的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的东亚局和南洋局均合并于大东亚省。省内设有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等组织机构。根据大东亚省的官制，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内地、朝鲜、台湾、桦太除外）的各项政治事务（纯外交事务除外），保护在该地区内的帝国商务，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内居住的帝国臣民事务，以及有关移民、海外开发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的事务”，在这些事务范围内负责“指挥监督派驻大东亚地区的外交官和领事官”。

政府在9月1日做出设置大东亚省的决定后，就派驻各地的机构一元化问题，同有关方面继续进行协商。然而主要围绕派驻中国机关问题意见有分歧。陆军方面主张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而海军方面对之强烈反对，外务省则主张大、公使由文官担任。9月下旬，大、公使问题大体上按陆海军之间的妥协案确定下来。但在下层组织的特务机关、领事馆等的一元化问题依然未能解决。结果，只得以改编若干机构的形式，仍使这些机构继续并存。

根据10月1日制订的“大东亚省驻华机构及其运用”及10月20日的“陆海军共同研究”，确定特命全权大使及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由文官担任，驻北京、张家口的特命全权公使由原来的兴亚院联络部长官担任、总领事全部由文官担

任。各地机构的人员暂由原来的联络部、领事馆职员留任，但尽量使陆海军人员退出。特务机关暂时保留，但对其权限有明确规定，以防止与大东亚省派驻机关之间发生摩擦，并使特务机关将治安以外的事项移交给大东亚省派驻机构或中国方面。

大东亚省于11月1日发表了人事任命：重光葵大使留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陆军少将任驻张家口公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盐泽清宣陆军少将任驻北京公使，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任驻上海公使，原公使兼总领事堀内干城任驻南京公使。

然而，大东亚省派驻各地机关的组成与原来的设想不同，力量是很脆弱的。

国民政府的参战问题

本来，日本方面是采取“不让国民政府参战”的方针的，因为陆军统帅部持有在五号作战后的适当时机，以宽大的条件导致与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的设想，认为使无多大力量的国民政府参战而加深对立，是不适宜的。

然而到9月末，陆军统帅部看出五号作战可能延期，全面和平已无希望，因而倾向于让国民政府参战。

10月29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即：帝国同意国民政府的参战希望，使该政府尽早对英美宣战，以促进中国方面的对日协作，完成大东亚战争。

参战的时机应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在华敌产、调整日华关系及加强日华协作等工作取得成效后，另行决定。

该决定显示出在领导战争的首脑人物之间，已发觉过去只是存在于中国内地的重庆政权，现在已经与英美的反攻相呼应，成为一个战略环节，发挥了支撑反攻作战的作用，如不及早采取根本措施，将会产生巨大恶果。对此感到焦虑。

此时，爪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局趋势已成为大本营、政府的最大苦恼，五号作战的准备工作也不得不命令停止进行。此种形势的恶化也促进了对华政策的空前大转变。12月18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审议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采取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和“具体方案”以及“在国民政府参战之际应与该政府缔结的各项约定措施要领”。鉴于第一项议题“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内容关系重大，须由御前会议决定。

12月21日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摘译）：

方针

一、帝国以国民政府参战作为打开日华局面的一大转机，本着日华提携的基本精神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力求消除重庆的抗日依据，而与真正的新中国共同向完成战争目的前进。

二、注视世界战局的演变，要尽力赶在英美的反攻达到最高潮之前，夺得根据上项方针的对华各项施策的成效。

要领

一、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

(1) 帝国应尽量避免干涉国民政府，促使其自发的活动，(2) 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3) 本着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的精神尽快废除和调整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殊事态。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理与香港问题另行规定。(4) 为了提高国民政府的力量并体现其与日本的协力，考虑在适当时机修订日

华基本条约及附属约定等。

二、经济措施

(1) 当前经济措施主要是增加获得战争必需的物资，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取得急需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2) 实行经济措施时，尽量避免日本独占，同时，要利用华方官民的责任感和创造性，使之体现积极与日本协力的实效。

三、对重庆方案

(1) 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任何和平工作，如形势变化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行决定。(2) 要使国民政府顺应帝国的上述态度。

四、战略方策

帝国对华战略方策按既定方针不变。1943年1月4日的联络会议并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有关对华关系的宣传指导方针”积极开展宣传战，极力扩大其政治效果。

当地军方的意见及对华 处理根本方针的贯彻

对华新方针是在中央上层部门迅速制订出来的。既未在负责实际工作的人员中间进行充分的调整，也很少考虑当地军方的意见。当时中国派遣军就有“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做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的意见。中国派遣军畑总司令官在听取了派遣军参谋永井八津次大佐汇报中央的意图后，在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兼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12月16日向中央统帅部汇报国民政府的实际情况指出：国民政府很不可靠，如果不改变国民政府的性质，以其薄弱的力量，只能起阻碍我方作

战的作用，甚至有崩溃的危险。其党派没有核心，力图利用日本扩充维持自派势力。最近公馆派（汪兆铭夫人陈璧君一派）抬头，企图排除周佛海派，推行黑暗政治。财政收入减少，税吏道德败坏，财政濒于破产。为解决军的当地自给，强制收购国防物资，以致物价昂贵，民怨沸腾，民心离叛。

总之，驻华当地军几乎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派遣军所属各军早已就与中国方面同甘共苦，根据中国方面的力量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发挥日华总体力量进行治安肃正和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日华合作并不是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那样简单的事情。以为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就能争取民心，是完全不了解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实际情况的臆断。

为了贯彻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于12月24日召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以及各军参谋长到中央开会，由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做了解释和指示。陆军大臣谈到“根本方针的宗旨，要排除万难贯彻到基层彻底执行，特别要努力转变下级人员的思想。如果在执行中遇到阻碍，可采取人事上的措施，或按军纪予以处分。军纪的整肃、军队的威严为强行本方针的基础。军队应回到本来职能方面去，专心于作战的准备。倘以治安警备为借口干涉政治，军队将会堕落。国民政府虽有弱点，但过于干涉反而会削弱其政治力量。望与当地各机关密切联系共同努力。”最后传达了天皇在设置大东亚省时的讲话。参谋总长表示，要断然执行天皇的旨意，并解释说：“避免干涉，不等于完全放手不管，而是要军队处于后援地位予以推进的意思。”河边总参谋长答称决心尽全力执行方针。但随后在恳谈会上提出了以下要求：“此次大

转变对海军方面也要彻底贯彻；大东亚省派驻当地的机关仍与过去相同，性质上未见任何改变，需要改变成军队可以大规模移交的机构，目前的状态是难以指望的；另外，对彻底改变过去做法的要求是理解的，但在当地必须逐步扎扎实实地进行；目前粮食显著不足，派遣军鉴于去年的失败，今年正在予以改进，但局势极端紧迫；对于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和争取民心工作，还只是在财政物资上给以补助，希望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具体的经济对策”。

参考：

华北方面军山崎重三郎参谋回忆说：“新方针的宗旨做为一种理想是很好理解的。当地军方过去一直是在尽力加强新政权的政治力量。然而，当地兵团日夜忙于对付共军活跃的政治性的游击战，如果军方哪怕是在一时向纯军事领域后退一步，很明显，擅长政治工作的共军，其活动必将日益增强。此外，大东亚省驻当地机构，尤其是基层机构还很不完备，不仅在我军当地自给工作方面，而且在改善民生、开发和取得重要物资等经济措施的实行方面，仍然需要军方的积极努力。”

同时，畑总司令官在其日记中写道：“仅有的最后一策，成败虽属疑问，但既经御前会议决定，我等谨遵执行。”“南方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今后中国派遣军更须提供兵力和资源。”

1月9日国民政府发出了对美英宣战的布告，同时签订了“关于为完成战争日华合作共同宣言”和“关于退还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日华协定”。

八、新政策在华北的实行情况

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进行体制转变，预定在7月底完

成。在华北，大致以3月底以前做为准备阶段，以后为基本事项的实行阶段。

在此主要叙述准备阶段的状况。

华北方面军的新姿态

1942年12月24日，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两参谋长在大本营直接听取了“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宗旨的说明后，回到驻地。

华北方面军于12月26日召开了兵团长会议，1943年1月7日，又召开了各兵团参谋长及主管政务人员的会议，进行了贯彻。

会上冈村方面军司令官指示：“过去日本方面，尤其是一部分军队在行政、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无视中国方面的立场，挫伤其自主性的过火态度，应予改正。军队应按照新方针的宗旨回到军的本职岗位上来。但因当地实际情况复杂，必须根据各地情况，逐步实行，重要的是不使敌人有机可乘。”

1943年1月11日，方面军司令官发表了有关国民政府参战的谈话：“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在确保治安、开发重要国防资源等方面，对帝国进行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国民政府参战后，华北所负的责任将更加重。华北方面军在此时机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

参考：

各兵团、机关按照方面军的意见，大致在2月中旬以后开始逐渐实行新方针。以方面军直辖兵团为例，第二十七师团于2月23日制订了有关肃正建设的新要领，以图集中兵力。根据该要领，将过去高度分散部署的驻兵地点减少了三分之一，将一部分警备地区移交中国方面的治安军等。

新设陆军联络部撤销参谋部第四课 如前所述，在设置大东亚省驻各地的机构上存在种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特务机关的问题。如果使领事馆与特务机关并存，则会出现政令不一的弊病；如果撤销特务机关，力量薄弱的领事馆又难以做出成效。同时，继续保留特务机关又可能破坏基层工作的一元化。于是，将特务机关改名为“陆军联络部”，全面取消了过去对中国各行政机关的幕后指导，改为顾问式的“好意支援”。

根据2月26日华北派遣军当局的谈话，改变的要点为：

（一）特务机关的名称改为联络部；（二）担任有关作战警备事项的联络和调查工作；（三）撤消过去的县联络员。

各地特务机关在3月底以前逐渐改编成陆军联络部，但实际业务和组成人员暂时仍与过去相同。只有县联络员改变了身分，过去县联络员是以方面军嘱托的身分分配到各个特务机关工作的，在有些地方也兼任新民会的县参事。今后则全部改为以新民会参事的身分从侧面对中国方面进行援助。与此同时，在新民会方面也为了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而积极活动，调出了多数过去成为新民会核心力量的日系职员。

方面军参谋部于3月中旬撤销了过去主要担任政务的第四课。于是华北方面军对华北行政的干预领导也逐步取消

（日本方面的有关政务工作的业务交由大东亚省大使馆事务所、领事馆及省以上的中国政府顾问兼新民会顾问、省以下的陆军联络部等不同系统的各机关担任）。但正如事先所料，在基层具体实行时，仍存在种种困难。

参考：

畑总司令官于2月24、25日视察了济南、海州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对华新方针大部分已逐渐实行，开始整理人事工作。但在地方上军队参与的县政，大部分是有关保安队的事项，即应由军队直接担任的作战警备事项。如现在立即撤销县联络员，治安恐将恶化。为此已通知他们目前不能立即全面放手，暂时尚需进行好意的援助。向中国方面移交工作当然要努力进行，但对其效果没有信心。此外，当地的大东亚省机能尚未运用起来，旧外务省官吏存在怠慢、不认真等不良现象，前途甚属渺茫。例如华北由于实行了新方针，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

中国方面的参战体制

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月9日召开紧急常务委员会，决定了“决战五大目标”，即：集中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总体力量，加强国民组织，提高国防意识，开发和增运战时重要资源，加强农村的增产力量，爱护资源。

2月8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引退，由朱深接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陆续更换了一些省长、直辖市市长。为了调整物资供需和加强物价的统制，3月1日在“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下设了“食粮管理局”和“物资物价平衡资

金运用委员会”。

新民会也于1月20日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决定与汪兆铭领导的“东亚联盟”合作，在华北也实行新国民运动。在人事方面，会长王揖唐辞职，由朱深、喻熙杰继任正副会长。日本方面撤出大部分日系职员，将留下的日系职员归并到新民会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铃木美通预备役中将，12月27日由岩松义雄预备役中将继任。）

去年设立的华北综合调查所于1月23日在北京西郊建所，正式开始活动。该所为对华北建设基础的自然界、文化界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中枢机关。3月22日森冈阜（预备役中将）就任理事长。（方面军虽在政治、经济部门逐渐后退，但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仍占据重要职位。）

蒙疆政府3月25日召开了政府成立以来首次的地方长官会议（总力战体制会议），决定施政重点为：加强地方行政机构，开发、增产重要国防资源，整顿自卫机关，增强综合战斗力，提高国民的决战意识，贯彻地方行政和确保治安等，以期对日本作出贡献。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3月30日设立了决定并贯彻推进剿共方策的中心机构“华北剿共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政府、新民会、军方三位一体担当对共总力战的机关。在中央设总会，在各省、市、道、县设各级委员会，于4月7日公布了委员会基层组织大纲。过去担当对共施策的计划调查机关“防共委员会”及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导中枢“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都归并于该委员会。除由朱深兼任委员长，内务、治安两总署督办、政务厅长、新民会副会长兼任常务委员外，尚

有若干专任委员。在总会中设有总务、企划、传报三个处。各省、特别市、道、市、县委员会，由各级行政机关的长官担任主任委员，委员由各级军、政、会的代表和选拔适于担当对共总力战的人物担任。各乡、村委员会为直接担任剿共工作的最下层组织，通常由乡、村长任主任委员，但在设有治安军分驻所、警察分署的地方，则由军警长官负实行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8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臻中将（6月6日投降的荣子恒之父、曾任张作霖的参谋长）担任了华北剿共委员会总会专任委员。

中国方面对日本改变政策的反应 3月份由中国派遣军参谋调任大本营陆军部第十五课课长的松谷诚大佐，曾报告了中国方面官民对日本改变政策的反应情况。华北、蒙疆地区可能大致相同。

一、要中国人了解到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好处，恐怕要在今年秋季以后。现在的想法只是“日本感到困难了，才交还的”。

二、民众迫切希望得到粮食。至于盐等物资则认为对方真正需要，可以给他们。因物价高涨而感到困难的是食品及轻工业部门的日用品。

三、华北的共产党问题严重。铁路事故异常多起来。军队的当地自给也不充分，维持货币价值日益困难。

华北日军官兵的思想动向

中国事变初期，从军人、文职人员的通信、言论、行

动、匿名信及笔记等反映出来的思想动向，大部分都保持坚强的军人精神，具有进行长期战的热情。只有一部分官兵的通信需要加以注意，不能轻视其内心的潜在影响。

分析这些表面现象，有反军反战思想的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由于战场的特殊性而滋生的厌战、嫌弃、希望退伍思念家乡等情绪，性质不太严重。或是对于与军队有关的事件抱有各种疑问、不满的。这些不能认为是敌国方面及第三国的思想工作（抗日反日、反战反军、扰乱后方）造成的显著影响。但随着事变的长期延续，对上级不满，反对入伍，以及对军队的制度、生活、待遇不满等事件逐渐增加，以后又出现了败坏军纪甚至投敌的犯罪行为。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思想动向的特点是：（一）为了在军队内部组织共产党小组而进行的思想宣传、煽动事件，有所增加（在全军检举的案件，1941年是四件、1942年1月至9月是六件）；（二）离间军民关系、需要整肃军队的事件不断发生，1. 军人文职人员的蛮横暴行；2. 对供应军需、取得物资材料、收购军用地等问题处理不当；3. 生活用品分配不公或流出军外等不法行为；4. 其它为一般民众所非难的私人行动；（三）投敌罪行有增加倾向。

华北地区在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犯罪。到1941年发生了两件（兵一、文职人员一），1942年也发生了两件（兵二）。1943年由于战争的长期化、战局恶化以及敌方加强了策动，至11月止已发生十八件（准士官一、下士官一、兵十五、文职人员一），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而无意投敌、在逃亡过程中被敌方捕获或在战斗中负伤昏迷

被俘、事后又未努力逃脱归队的“事后投敌”占少数。

以上只是本人归队或由我方逮捕的案件数字。据估计，未逮捕、失踪、投敌嫌疑等的数字可能是相当大的。

大部分投敌者的原因是厌恶军队生活、害怕私刑或恐怕暴露罪行、或相信中共方面的优待俘虏的宣传，以及考虑到成了俘虏后再归队要受到严厉处罚等。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前就有共产主义思想而逃走的。

第四章 1943年度的治安战

在本年度中，华北方面军的使命是，应付1942年晚秋以来日趋严重的整个战局，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确保华北兵站基地的安定，向开发建设迈进，对支援战争应做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

为此，方面军自年初以来，为使对华处理根本方针速见成效，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系的政治经济等一切业务，移交中国方面自行管理，支持其确立自主的体制。同时，军队则力图转向专心致力于整顿军容、发扬武力的野战军体制。但是，当具体实行此种转变之际，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许多必须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实行治安战时，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措施，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但由于机构一元化的程度更加削弱，这就需要靠独特的见解与最大的努力了。

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象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然而，友邦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国势力，却仍难进展，方面军又将基干兵团抽出转用于其他方面，以致战斗力逐渐下降。华北治安殊堪忧虑。

本章将主要叙述华北方面军为应付此一严重局势所实行的作战警备以及编组华北特别警备队，设立模范剿共区等特

殊措施的情况。

一 关于华北方面军的全面施策

新年度的作战警备计划大纲

过去，方面军在制订“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时，总是包括作战、政务、经济各方面的内容。但1943年度，由于政策的转变，军事须与政治、经济分离，因而制定了作战警备计划。关于开发建设则另行制定计划。

关于方面军本年度作战警备计划的内容，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及有关人员的回忆，加以汇总整理概略如下：

（一）大体确保现有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要大力改善主要资源地区、城市交通线附近地区的治安。为此，应设法固定警备兵力，同时有计划地运用机动兵力。关于占领地区的肃正工作，在年度中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二）极力促进中国方面的活动，以减轻我军的负担，从而逐步集结兵力、适应形势的演变整備体制，努力提高战斗力。

（三）在1943年7月以前的作战指导，为迅速实行兵备整顿，正确、圆满地实行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使之不受阻碍，同时要以准备兵团抽出转用及今后作战为重点。

（四）铲除共军对我占领地区的阴谋活动，极为必要。随着对苏形势的日趋紧张，迫切需要迅速采取有效对策将其剿灭。特别是此次实行新方针，倘有不当，将予敌以可乘之机。因此，应采取如何对策要特别加以研究。

(五) 迅速加强、完善防空组织，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监视、侦察敌空军的状况。

(六) 尽量减少战斗力的消耗，同时加强军队就地自给的能力。

(七) 对敌封锁，应采取措施，努力杜绝我占领地区内战争必需物资的流出，但不能妨害我方地区内的物资交流。

注：上述第(四)项，可以看出派遣军、大本营加深了对共治安战的认识。方面军对共军的再起，给予极大的关注。方面军的大城户参谋长3月间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共军不仅阻碍华北，而且阻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摧残全体民众福利之敌。我军决心彻底剿灭华北建设的死敌共军。但是，中共以其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采取欺骗宣传、武力威胁和有麻醉性的政治施策，积极进行地下活动以争取民众。此次日军将治安地区的警备移交中国方面，决定控制强大的机动打击部队，一旦需用时，即将以此新的战斗力，坚决予以沉重打击。中共的溃灭，仅粉碎其武装力量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必须将中国方面的新政治力量，随着武力贯彻到赤化村去。”

1943年3月24日，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其原文已失，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其概要如下：

方针：方面军应贯彻野战军的特性，将作战警备的重点指向共军。应与中国方面的措施互相配合，以期消灭中共势力。此外，适应情况的需要，压制管区内蒋系军队或给予打击。

实施要领：各兵团专负责各自警备地区的安定，特别要促进中国方面自主的积极活动，以图加强其警备能力，确立其自主的体势。此外，要与我方的肃正讨伐及健全特务组织相结合，以期削弱中共在我占领的重要地区内的势力。

确保警备地区的安定，要特别重视铁路及主要交通沿线地

区、主要城市及主要资源地区。

警备体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由原来的高度分散部署，迅速逐步集结兵力，尽量保持灵活机动的战斗力。

为此，除必不得已的情况外，应尽力集中分队以下的分驻，大致在年底前后，尽可能改变成小队单位以上的分驻体制。

1943年度方面军准备进行的主要肃正作战如下：

冀西春季作战 由第一一〇师团计划实施。

冀西秋季作战 由华北方面军计划实施。

冀东秋季作战 由第二十七师团计划实施。

各军担任地区内的肃正作战，特别是第一军的太行山区，第十二军的鲁西、鲁南地区的剿共作战，须彻底实行之。

为了说明集中兵力的实行情况，现将“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警备及训练要领”摘要介绍如下：

实行兵力的集中，要做好周密准备工作，注意不要引起治安的动摇，为此，以中国方面自己的力量承担剿共警备的地区要逐步扩大。同时，我军应经常在必要时期、必要地点，及时进行活动，作其后盾，以确保支援的成效。并且必须逐渐进行集中，隐蔽我军的企图。此外，集中的军队，要有机动能力，对担任警备的地区，积极实行肃正讨伐，使敌人无活动余地。

集中后立即与中国方面紧密联络，进行周密的监视、侦察，以掌握治安的真实情况，完全封锁敌人势力的渗透，防范其东山再起。

关于方面军1943年度对敌经济封锁的指导重点不知其详。但第六十二师团的“对敌经济封锁要领”，具有如下的特点，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方面军的全面措施。

一、封锁的对象不是所有一般物资生产丰富的敌匪地区，而是只限于真正必要的重要地区。

二、封锁线一定要注意防止阻碍我占领地区内物资的正常交流。要排除由于各警备地区或各县的区域性封锁形成的经济障碍。健全配给、收买机构，以期正当进行运用。

三、军队实行的经济封锁措施限定于封锁线上，并分别监督封锁线上的中国机关。

在封锁线后方的我占领地区内，与封锁有关的各项措施，由大东亚省当地机关及中国方面各机关负责实行。

四、封锁线上的盘问检查及对违法物资的没收、处理，主要由中国方面的警察、保安队及其它武装团体实施。新民会与合作社动员其直接指挥下的机关、团体，进行封锁活动。保甲自卫团应互相密切联系，协助防止物资外流。民众应防止发生违法行为，迅速提供情报。

五、关于物资的出入，应视省内的需要进行控制，其多余的物资公平地输出于外省，以使物资统制合理化，并阻止战争必需物资对敌外流。

六、逐步推进封锁线，努力占有敌地区内的物资生产地区，并与大东亚省当地机关密切联系，灵活运用中国方面的作用和意见，以获取敌方物资，尤应努力收集我军就地自给的物资。

七、为了使获取省内敌方物资的工作统一而有计划地进行，由第一军、太原总领事馆、山西省公署组成的协议委员会作为其领导机关。

八、各部队对敌地区实行作战讨伐之际，必须组成物资获取机关（包括中国方面）并使之随同行动。

在封锁线前方的日军驻扎地，不仅是讨伐据点，同时也是获取敌地区物资的据点，根据情况，使日军及中国方面的机关向敌区挺进，努力获取其物资。

笔者注：从以上可以看出，与上年度相比，在限制军队的参与的同时，正努力活跃整个占领区的物资交流。

关于进攻作战的研究

1943年度的对华作战，中央的基本方针是：尽量增加所需要的空军兵力，实行积极的空军作战，地面部队尽可能集结兵力进行治安战，以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但是，中国派遣军接受了“继续压制敌人，力图粉碎敌继续作战的企图”的基本任务。为完成此任务，派遣军并不要求始终实行持久战略，而是强烈希望果断实行与政治策略大转变紧密结合的战略措施。中央与当地军队之间的意见经过多方调整的结果，于2月27日，中央通知派遣军，要求对实行下述作战进行研究。（概要）

一、秋季以后，如整个情况允许，为确立有利的战略态势，对京汉路南段（新乡——汉口间）实行作战。但鉴于华北的重要性，绝不允许因本作战而使共产势力活跃。

二、根据敌空军势力的增强及其活动等情况，估计敌方有对帝国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的企图。不得已时，关于对华处理方面，在特别有利的情形下，即整个形势尤其北方的局势如能允许，适时实施五十号（西安作战）作战。

此外，关于占领地区的肃正工作，要通过整个年度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并要求作好对苏作战的准备。

其中，华北方面军强烈希望实行五十号作战。特别重视占领西安附近的地区。占领了该地区后，可使空军处于优势地位、切断西北道路，北方作战发生时，能起分割苏、中的作用。但是，在整个局势上，该作战的实行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方面军于1943年上半年，利用前年实施的五号作战准备

成果，对其一部分继续进行了作战研究。

兵备的整顿

陆军中央于2月底将关于中国派遣军1943年度的兵备整顿及其使用的意图传达到当地军队，大致如下：（仅摘录有关华北事项）

一、大体上至5月底完成五个警备师团（其中华北两个师团）的编制。

二、第二十七师团至6月底集结于天津附近，7、8月间转用于满洲。

三、第三十六师团至6月末集结于京津地区，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的隶属下，进行必要的训练，并随时供大本营调遣使用。

四、大体上在1943年底前，应使约两三个师团，能以迅速转用于其它方面。（这些师团考虑是徐州的第十七师团、兖州的第三十二师团和武汉地区的一个师团）

五、除以上兵团外，预定向北方转用的兵团，将于近期下达指示。

六、在华兵团从5月左右，改编整顿为以下三种：（1）装备完善的师团（预定转用的兵团）。（2）减少炮兵部队的师团。（3）原来的治安（警备）师团（炮兵、机动力量小）。整编后多余的炮兵补充新设师团。

七、新设兵团的部署，虽与肃正计划相关连，但希望尽量考虑到便于预定集结兵团的行动和教育训练。

八、制定新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整備及指导纲要”。

随后方面军在3月的参谋长集会上，进一步使新年度作战警备纲要具体化，同时准备兵备整顿，并根据5月1日发布的军令甲第三十六号开始进行临时编制（修改编制）。5

月20日，召集所属兵团长集会；7月1日邀请新编兵团长，举行所属团队长集会，听取各地状况的汇报。同时对各项措施的实行、警备部署的变更等作了指导。

这样，对兵团抽出后的空额，以修改编制所多出的人员，给予补充。但因装备未有改变，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方面军以及各兵团，均不得不用很大力量就地制造武器、资材，以及尽量在使用方面设法充分发挥其效力。

兵团长的阵容如下：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
参谋长	大城户三治中将
第一军司令官	吉本贞一中将
参谋长	花谷正少将
第三十六师团长	冈本保之中将
第三十七师团长	长野佑一郎中将
第六十九师团长	井上贞卫中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	毛利末广少将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	中岛德太郎少将
第十二军司令官	喜多诚一中将
参谋长	寺垣忠雄少将
第三十二师团长	石井嘉穗中将
第三十五师团长	坂西一良中将
第五十九师团长	细川忠康中将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长	内田银之助少将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长	奥村半二少将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	秋山义隆少将
骑兵第四旅团长	小原一明少将
驻蒙军司令官	七田一郎中将

(5月28日改任上月良夫中将)

参谋长	矢野政雄少将
第二十六师团长	佐伯文郎中将
坦克第三师团长	西原一策中将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	松浦丰一少将

方面军直辖

第二十七师团长	竹下义晴中将
第一一〇师团长	林芳太郎中将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	小松崎力雄少将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	吉田峰太郎少将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长	岩永汪少将

（6月9日改任两宫巽少将）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	田中信男少将
------------	--------

注：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在一一〇师团的指挥之下。

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官	三浦三郎少将
------------	--------

5月1日，按照军令陆甲第三十六号，下令编成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及独立山炮第五联队、独立工兵第三十八联队、华北教化队，同日按照大陆命第七百八十三号，将第六十二师团编成后编入第一军，其他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中。

第六十二师团（文字代号“石”）

该师团是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第六旅团为基干，并转用一部分在华部队的兵力于6月30日在山西省及山东省的原旅团警备地区分别编成的。新编的部队为第六十二师团司令部（师团长、本乡义夫中将，参谋长、上野真臣中佐，后升大佐）、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中岛德太郎少将）、独立步兵第十一至十四大队，步兵第六十四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奥村半二少

将)、独立步兵第十五、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大队、第六十二师团工兵队、通讯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及病马厂。(师团定员为11,676名,独立步兵大队为1,233名,由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一个步兵炮中队组成。)编成后,师团司令部设于榆次。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司令部在阳泉)于6月30日基本上接替了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地区的警备。步兵第六十四旅团自山东向山西南部移动后(司令部在潞安),于7月20日接替了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师团担任地区的面积大致相当于四国(日本地名——译注)的两倍,地区内铁路约500余公里。部队以铁路沿线为重点,分驻于188处。

第六十三师团(文字代号“阵”)

该师团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混成第六旅团的一部为基干和在日本内地编成的各部队,于6月30日在北京附近编成。新编的部队为第六十三师团司令部(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参谋长、佐藤贞二中佐、后升大佐)、步兵第六十六旅团司令部(旅团长、田中信男少将)、独立步兵第七十七至七十九、第一百三十七大队、步兵第六十七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柳勇少将)、独立步兵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八十、第八十一大队、第六十三师团工兵队、通讯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及病马厂。(编制定员与第六十二师团同。)

师团编成后,师团司令部、步兵第六十七旅团司令部设于北京,步兵第六十六旅团司令部设于保定,接替了一直由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担任的北京特别市、燕京道,以及保定道、渤海道西北部、津海道西部地区的警备任务。(该地区内的驻屯地原分散部署于144处,此次将其整理为96处。)

注:野副师团长5月16日到达北京后,听取了各种情况,他在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

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为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深感必须加强新编部队的团结，振作军纪风纪，特别是对中共地下活动的侦察和我方的治安工作，从一开始就应彻底进行。因此，对巡视的各部队，作了训示，只是拚命打击不行，唯有揭发、消灭敌对分子与爱护良民同时并举，才是圣战的宗旨。”这些话表明了当时的治安状况，甚至在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附近地区也是相当严重的。

此外，当交接警备时，不仅要作好兵力配备，新来部队并应迅速掌握社会情况，与当地中国人搞好关系，继承情报谍报网，彻底防谍，互相协助物资、设施的移交等等，都是特别应该注意的重要事项。

兵力的集结训练与警备部署

中央有关预定从中国派遣军抽出兵团转用于其它方面的意图，已分别向当地军队作了传达。4月5日根据总长指示，指定了预定转用于北方的兵团。5月3日的大陆指第一千五百七号“中国派遣军兵力集结及训练要领”的第一项规定：“预定向北方转用的兵团，在不影响当地作战任务的情况下，应于1943年度末以前完成为对苏作战进行的必要训练”。第二项中的集结要领规定：

第二十七师团约在7月，于京津地区集结，准备向满洲方面转用。

第十七师团约在8月，于京津地区集结。

第三、第三十二、第三十六师团于1943年底，在原驻地附近集结。

随后，对每个师团指示训练的重点，其项目为：“对

坚固阵地的攻击”、“强渡大河”、“通过湿地”等。

以下略述与方面军有关系的兵团的集结和转用情况。

第十七师团

该师团一向担任苏淮地区的警备，5月1日根据大陆命第七百八十三号解除了其在第十三军的战斗序列，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中。其后逐渐进行兵力集结，当对苏作战训练开始时，又根据6月17日的大陆命第八百二号，重新编入中国派遣军(直属)战斗序列中。同时指示其在进行训练时要考虑到“热带作战”，这是由于南方形势的变化而紧急改变的。

尔后，师团便将警备任务移交给第六十五师团，为了准备向南方转进，于8月中旬在南京、上海附近集结。

第二十七师团

该师团在担任冀东、津海道地区警备的同时，并准备对苏作战训练，当时根据6月17日的大陆命第八百三号，解除了其在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编入关东军。因此，师团将该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独立混成第八旅团，7月下旬开始向满洲国锦州地区移动。

第三十六师团

该师团6月中旬以来，逐步准备移交防务，于7月20日，将山西省东南部的警备任务移交第六十二师团后，准备进行对苏作战的训练。但不久任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北方改向南方。

在此之前，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根据以往剿共作战的经验，于1943年5月编写了一本《肃正讨伐参考》的小册子，并以方面军参谋长的名义分发各部队，作为教育训练的参考资料，其目录如下：

第一、华北共军的特点及其战法；第二、一般讨伐的要领；第三、作战意图的保密；第四、情报的收集和审查；第五、警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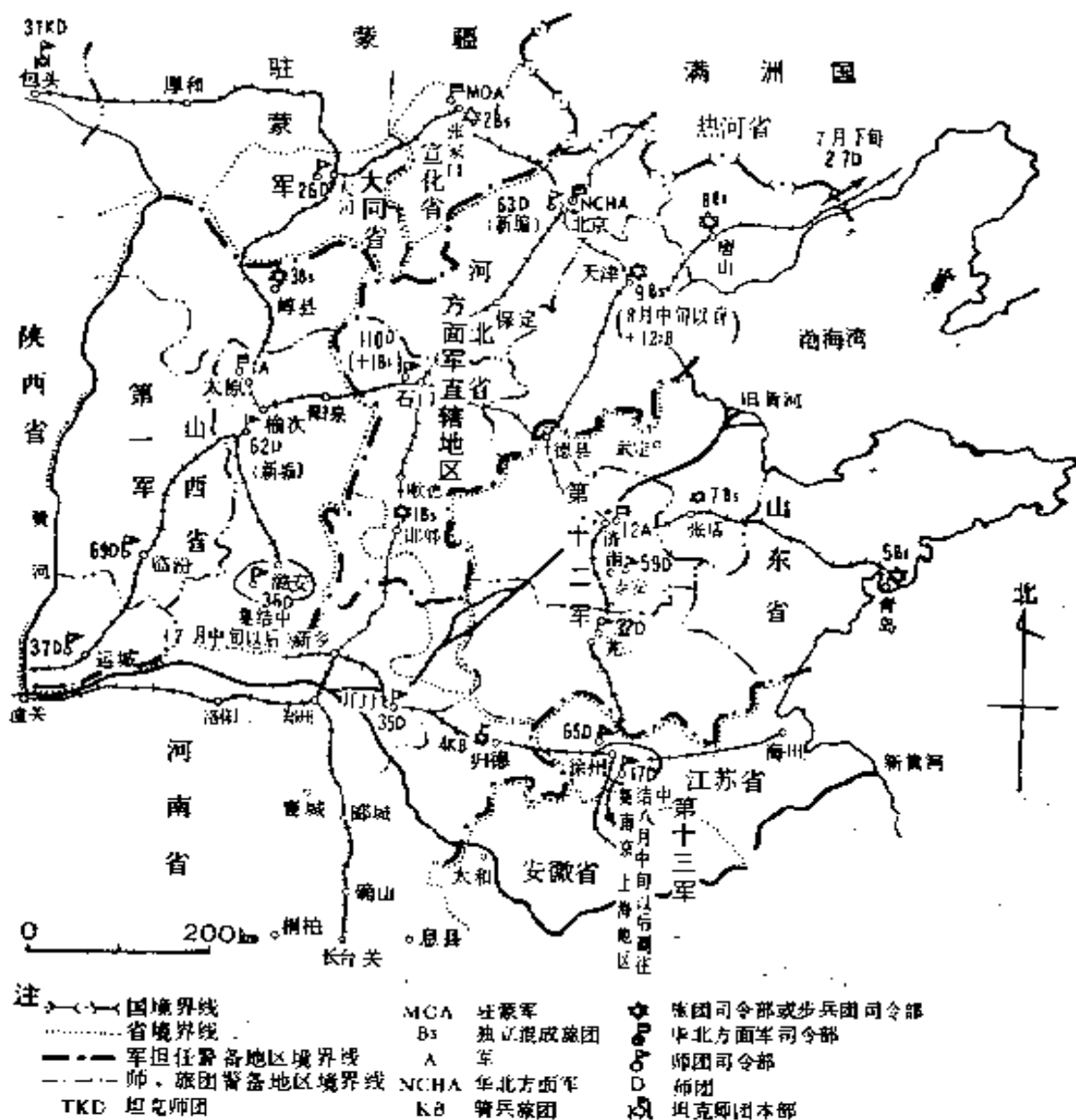


图10. 华北方面军警备形势图(1943年8月当时)

领，第六、指挥官，第七、通信联络。

本书是要向直接参与讨伐、警备、对抗共军游击战术的各级干部提供在战斗行动上的指南。由于人员的接替补充，以致毫无剿共作战经验的干部增多，以及中共方面势力扩大、战法进步等原因，因此期望借此克服固定不变的战斗指

挥法，实行适合于剿共作战特点的教育训练。

现将该书第五项“警备要领”叙述如下：

一、警备的一般要领是，占领要地，并加强其周围的防御设施，减少在一处所需的警备兵力，而在每个地区尽量直接掌握较多的兵力，根据周密的情报网获得敌情，先发制人，进行神速的讨伐，搜索敌人而歼灭之。

二、警备期间，力求严肃军纪，时间许可时，要进行教育训练。各警备队应明了守备地区内外的情况，努力做到军纪森严、恩威并举，特别要使民心安定，恢复其对日军的信赖，使居民能与日军协力，负起自卫的任务。

如能作到军纪严明，得到民众的信赖，敌可望风屈服。敌人判断军队价值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

三、警备部队要不断实行警备行军，其范围应遍及所担任警备的全部地区，以使每个村落无不瞻仰皇军威容，促使居民自动担任自卫。必须严禁仅仅固守于驻防设施，消极退缩不前。

四、防御设施，应有周密慎重的计划，要使所构筑的工事，虽遭优势敌人的攻击，亦得以确保无虞。为此，各上级指挥官必须亲临现地，进行具体指导。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如在没有城墙的县城或村落进行防御时，白白地占用多数兵力，不仅减少了讨伐或出击的兵力，且使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因此，可在县城或村落等外围或其一角，利用便于防御和出击的建筑物，构筑坚固的设备。其设备可用砖建筑碉堡等，附以掩体，并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以外的外围要点，设置有障碍物的支撑点。

五、如在有围墙的村落中，必须在外部重要地点，安排步哨或潜伏斥候。否则不仅对外部敌情不明，往往遭到敌人从一方面牵制而进行的袭击。

六、在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屋内宿营的部队必须准备两个以上的出入口，同时必须准备随时都能占领房顶的措施。

在市街上，有时敌人预先控制各个出口使我不能逃出；另外，时常遭到房顶上敌人投掷的手榴弹，蒙受多数伤亡。

七、接近墙壁所构筑的散兵壕，应隔开相当距离，以防避敌弹，尤其是手榴弹因墙壁弹回而遭受的伤害。离开墙壁困难时，需设置掩体。

八、对我守备地点的攻击，多数是在夜间进行，因此，要根据各种迹象，事先察知敌人的企图。

当敌人来袭时，应尽量将其引诱到阵前最近的距离，出其不意，以火力一举歼灭之。如过早开始射击，敌人往往即行撤退。另外，过早地出击，也会削弱歼敌的效果。

九、铁路的警备，不可只管固守铁道线路，而应积极讨伐附近的匪团。同时，还应在线路之外的要地，分驻一部分兵力，使匪团不得接近距离线路至少有一日路程以内的地带。

十、为了警备铁路，除以一部兵力警卫火车站和重要设备以及进行线路巡查外，必须掌握有力的机动部队，在线路两侧的外围地区积极进行讨伐。为此，有必要建立周密的情报网，并与铁路机关合作共同组成铁路爱护村。

十一、敌军破坏铁路时，经常采取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的手段，切勿上当。

破坏铁路，大多是在敌军领导下，强迫附近村民执行。因此，彻底搜查附近村落，逮捕不良分子及通敌者，同时指导村民，负责爱护铁路，至为必要。

十二、铁路经常被破坏的地点，多半是固定的。对这些地点，特别要增加巡察次数，采用不规则的巡察时间，并于日落以后，部署潜伏斥候，在铁道线路附近一定地区禁止通行，铁路沿线以外的危险地区也禁止夜间通行。利用此等方法有利于捕捉敌人。

十三、守备“碉堡”等分驻的小部队，特别要对敌人的谋略袭击提高警惕。不管多么忠实的中国人，对其使用如果完全信赖而无戒心，是危险的。

特别是守卫“碉堡”的分哨等，认为平安无事，擅自脱离武器，

甚至脱掉上衣，穿着木屐等，全然处于无警戒状态，也应深以为戒。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充实、整备

1943年3月6日，大本营陆军部根据2月27日的大命精神对中国派遣军，以大陆指第一四五四号下达了“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

原来，国民政府方面武装团体的培养，一直是按照1941年1月30日大陆指第八二四号文件实施的。其目的在于随着日华基本条约的签订，建设新国军和代替在华日军充实警备力量，从而协助我占领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当时其实力对日军只不过起到辅助的作用而已。

此次指示的特点是：（一）使其具有实力，能够单独担任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治安工作和肃正任务。为此，将政府直辖军队由原来的不足11万人，增加到约25万人。（二）从原来分别培养的方式，逐渐统一进行整备，特别是加强国民政府直辖的军事力量，作为贯彻执行政府政策的支柱。（三）协助日军作战仍然是今后的目标，但与过去相比，对其期望要求则更为迫切。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

第一、方针

一、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为了日华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和建设新秩序，首先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独立担任起治安的维持和肃正，以至将来能逐渐作到协助日军作战。

二、整备训练及使用的大纲等，实际上由日军统一掌握。

第二、指导要领

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是指国民政府直辖军队、华北治安军、蒙军及其它武装团体而言，分别隶属于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考虑到各地区的特点，将原有的武装团体进行整理、合并，同时，通过整顿或编成必要的新建团体，逐渐使其体系完善。

四、整备的数量，要考虑国民政府、地方行政机关等的财政状况、地区的特点和治安的状况等而决定。目前，暂定标准如下：

1. 正规军队

- 甲. 国民政府直辖军队 约25万以内
- 乙. 华北治安军 约10万以内
(包括剿共军等)
- 丙. 蒙军 约1万以内

2. 正规军以外的武装团体

考虑上述各条件，由各地方分别决定。

五、当前的编制，鉴于整备的目的，正规军队除特别规定者外，应以步兵为主，其装备可具有小口径火炮以下的武器。其它武装团体，以徒步为主，应避免编制过大。

六、航空部队，虽考虑将来防空战斗队的编成，但由于资材等关系，暂时不予增强。

七、在装备上所需要的武器和资材，主要依靠由日军交来的缴获物资解决，其它补充来源，虽尽量应由日本维持，但简单武器弹药制造修理补充机关，在中国方面负担范围内可以设置和经营。

八、日本与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间的关系，依各地区的特点而定。但关于作战警备上的重要事项，规定由日军指定的指挥官负责，实际上得以指挥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

九、为了维持治安，务使各团体的配备及行动等，符合日军所进行的作战或警备上的需要。

十、教育训练，以达到上述目的为目标，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主要进行干部教育。为此，在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务机关中，设置必要的教育机构。

十一、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指导机构，按以下原则进行工作：

属于国民政府的武装团体，根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或有关的军司令官的命令或指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及其所属机关等进行指导。

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武装团体，根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驻蒙军司令官的命令，由各该军所属的顾问、教官等进行指导。

十二、关于经费按以下规定实行：

1. 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所需的经费，应考虑团体的性质、所属等，原则上由中央政府或地方行政机关等中国方面支付。

2. 招降工作及其所需经费，应考虑地方实情和归顺部队的性质等，原则上应由中国方面适当支付。

中国方面在军事上，亦应执行华北、华中一体化的方针，通过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充实各武装团体，逐步整顿归顺部队，以图全军的组织化及提高其实力。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于1941年3月成立（委员长由政府主席兼任），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以及航空署，军政部、海军部属于行政院。1942年10月，在委员会内设立了陆军部、海军部，除特别设置了总参谋长外，大规模地进行了机构改革，加强了委员长的人事统帅权，同时充实了归顺将领的思想教育以及干部再教育的机构。1943年10月，新成立了“驻华北办事处”，使其处理在华北的国民政府直辖军队（华北绥靖

军除外)的军务。同年12月,再次改组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充实上层阵容的措施。

军队数量于1941年1月统计:正规军约为15万人,准正规军约为18万人,舰艇约为100艘。其后,增加了归顺部队。如1941年2月李长江、1942年4月孙良诚,先后参加了国民政府,在1943年内,1月有吴化文、5月有庞炳勋、孙殿英,6月有荣子恒等归顺。政府对此等归顺部队,进行整顿或再训练后,编入了正规军。此时政府军的总兵力约达25万。但是,以之代替日军,则相差尚远。

1944年4月的军事委员会及军组织系统如附表。

在华北,原来由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监督指挥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警察,方面军的军事顾问部担任指导和培训。1943年2月,机构进行改编,由内务总署统一指挥警察,在治安总署内新设宣导局,以加强对共思想工作。治安军至1941年底已编成五万二千人的部队,其后兵力未有增加。该军活动于警备、讨伐的第一线,并且正在努力加强团结和训练。准正规军约有二万人,根据归顺部队的情况,有所增减。随着国民政府的参战,为了对确保华北治安作出更大贡献,于1943年4月和10月,召开了绥靖军高级军官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11月又修改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以期简化行政,并迅速推行决战的各项措施。此时,由杜锡钧就任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人事为之一新。

注:军事顾问部长,继田岛彦太郎少将之后,由大桥熊雄少将(1943.6—1944.4)就任,野田哲大佐就任军事顾问部高级部员。顾问

部的部员、教官等实际人数约150名，除此之外，还有由中国方面聘请的教官数十名。中国方面强烈希望增加顾问部的人员和补充治安军的武器。

此外，为了确立地方治安，各县警备队曾有较大贡献。1943年5月底，华北政务委员会制定了“保安队条例”，警备队改称保安队，重新进行改编。过去县警备队由各省自行指挥，此后则统一由中央指挥，由内务署督办任保安总司令、各省长任保安司令、各道尹任保安指挥、各县长任县保安队长，在一元化的指挥下，全力以赴进行剿共。

二、华北方面军的春、夏季肃正作战

华北方面军年初以来，为了贯彻对华新方针的宗旨，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从新年度开始便着手整顿兵备、变更警备部署、对苏作战的准备、进攻作战的研究等等，并积极进行肃正作战。

在河北省冀西地区、南部太行山脉地区及山东省鲁中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作战。其它各兵团、警备队，为了管区内的治安肃正，曾不断地进行讨伐。特别是真渤特别行政区内由日华军警协力进行的扫荡战，在冀东以及平北（北京地区）地区内多次的肃正作战，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总结以上肃正作战的特点是：与盘踞在华北管界内重庆军的涣散和战斗力衰退的情况相反，中共的地下组织，却显著活跃起来。因此，为了剿灭中共势力，决不能满足于击溃其表面的势力，必须以其潜伏组织，特别是指挥中枢、秘密

设施为主要目标，实行搜索剔抉的战法。

现将主要肃正作战，即1943年春冀西作战、太行作战、四十号作战、1943年夏太行作战、第十二军管区内的作战，概述如下：

1943年春冀西作战（“は”号作战）

（4月18日～5月11日）

冀西地区状况 该地区位于冀西的太行山脉北部地带，为晋察冀边区军区的主要根据地，由第一至第五军分区所组成，是该边区的中心。根据截至4月上旬的情报，得知军区司令部（司令聂荣臻，据说曾兼任冀西军区司令）在平山县回口附近；第三军分区（司令黄永胜）以唐县史家庄附近为根据地，占有完县、唐县、阜平、曲阳各县；第四军分区（司令邓华）以平山县寨北附近为根据地，在行唐、灵寿、平山、井陘各县继续活动。此外，并判明在陈庄附近有抗日大学分校以及武器、粮秣、被服库等军事设施多处。

但是，其军事设施隐蔽分散较广，有的利用民宅或伪装成民宅，有的设置洞窟等等，并且能够迅速迁出转移，因而很难掌握其所在地。其军队的位置也同样难以确定。

地形大部分是由岩石构成的连绵不断的高地，很少有森林和耕地，物资也不丰富。

作战计划大纲 本作战是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在第一〇师团长的统一指挥下，以军分区司令部为目标，首先袭击第四军分区，继而袭击第三军分区。设法消灭该地带的共军（约一万五千人），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设施。作战计划

如下：

一、作战的时间及参加的兵力

第一期（4月19日——4月28日）步兵约十二个大队为基干。

第二期（4月29日——5月10日）步兵约十六个大队。

二、作战指导要领

第一期：以主力（约十个大队）从平山、灵寿方面，另一部（第一军的两个大队）从滹沱河上游地区，迅速开始急袭，占领陈庄附近根据地四周的要线，构成一严密的包围圈，断绝内外的一切交通。

继而投入有力的扫荡队，逐渐压缩包围圈，彻底实行扫荡剔抉作战。

第二期：以主力（约十二个大队）从完县、曲阳方面，另以一部（约四个大队）从涞源、灵邱方面进发，对军城附近的敌根据地构成包围圈，与第一期作战同样，实行扫荡剔抉作战。

注：当时的第一一〇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大佐回忆如下：

本作战指导方法，并不是单纯的分进合击，而是师团根据以往对共作战屡次失败的经验，重新研究出来的办法。这是从捕鲇鱼的方法得到的启示，在急流里捕捉鲇鱼，不能在投网后立即拉网，以免隐藏于石缝的鱼逃脱；要先从上面轰赶，藏起的鱼入网后再拉网才行。为此，必须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一）指定的目标要适合我方兵力。

（二）在作战准备期间，要严守秘密，更要发挥夜间轻快的机动力，迅速地、无间隙地构成包围阵地。

（三）担任扫荡剔抉的挺进队，要准备建立专门负责甄别民匪，挖掘隐藏物资的特别工作队等。

（四）为了隐蔽作战企图，要将大行李、小行李分别运送。另外，为了便利反复扫荡，要将补给站设置在包围圈内的中心地点。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期作战 4月18日夜，参加作战的各部队，一齐开始行动，击溃少数敌人后，至20日拂晓构成了以回口盆地为中心、直径约50公里的包围圈，随后投入挺进队，在包围圈内到处展开了果敢的扫荡战。至21日晚，将包围圈压缩到以红崖附近敌根据地为中心，半径约8公里的圈内，从22日拂晓开始总攻击。但敌主力于前夜早已分散逃逸，或改穿便衣，终于未能歼灭。至26日止，各部队继续寻找敌人，进行搜索剔抉，同时摧毁其军事设施。本作战期间，敌人遗尸518具，俘虏316人，我方死6人，伤42人。

第二期作战 4月30日傍晚，吉田支队（吉田少将指挥的步兵七个大队）从曲阳地区，白洸支队（白洸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从满城、完县地区，井手支队（井手大佐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从倒马关地区，分别开始行动。5月1日拂晓，在军城、北情醒、固城一线，构成包围圈，各支队派出一至二个挺进队（以一个大队为基干）向各目标突进，并在各地进行战斗。敌人从包围圈外向包围阵地猛烈攻击，以图解围。根据此种情况及俘虏的口供，可以判断，包围圈内有包括司令部在内的、相当强大的部队。各队实行扫荡剔抉作战至5月10日为止。由于地形险峻，影响了部队的快速机动，虽未能按预期目的捕捉到敌方大部队，但到5日为止判明敌遗尸560具，俘虏263人。

根据井手大佐在1943年6月4日第二十六师团团队长会议上关于本次作战的讲话，总结出如下的教训：

- （一）作战企图要严格保密，并要彻底熟悉夜间行动。
- （二）所有部队应对队员进行搜索和处理地雷的训练，并应

携带必要器材。

(三) 为了突破险峻地带，应准备麻绳、杖杆、备用马蹄铁等，并有必要对日本马进行训练。

(四) 应采取各种手段确保通讯联络无阻，并应携带备用无线电机。

(五) 无线电窃听、准备秘密侦察队亦属必要。

(六) 研究包围圈压缩方法，特别要考虑到在山岳地带互相联络和堵塞间隙的困难。

(七) 努力获得搬运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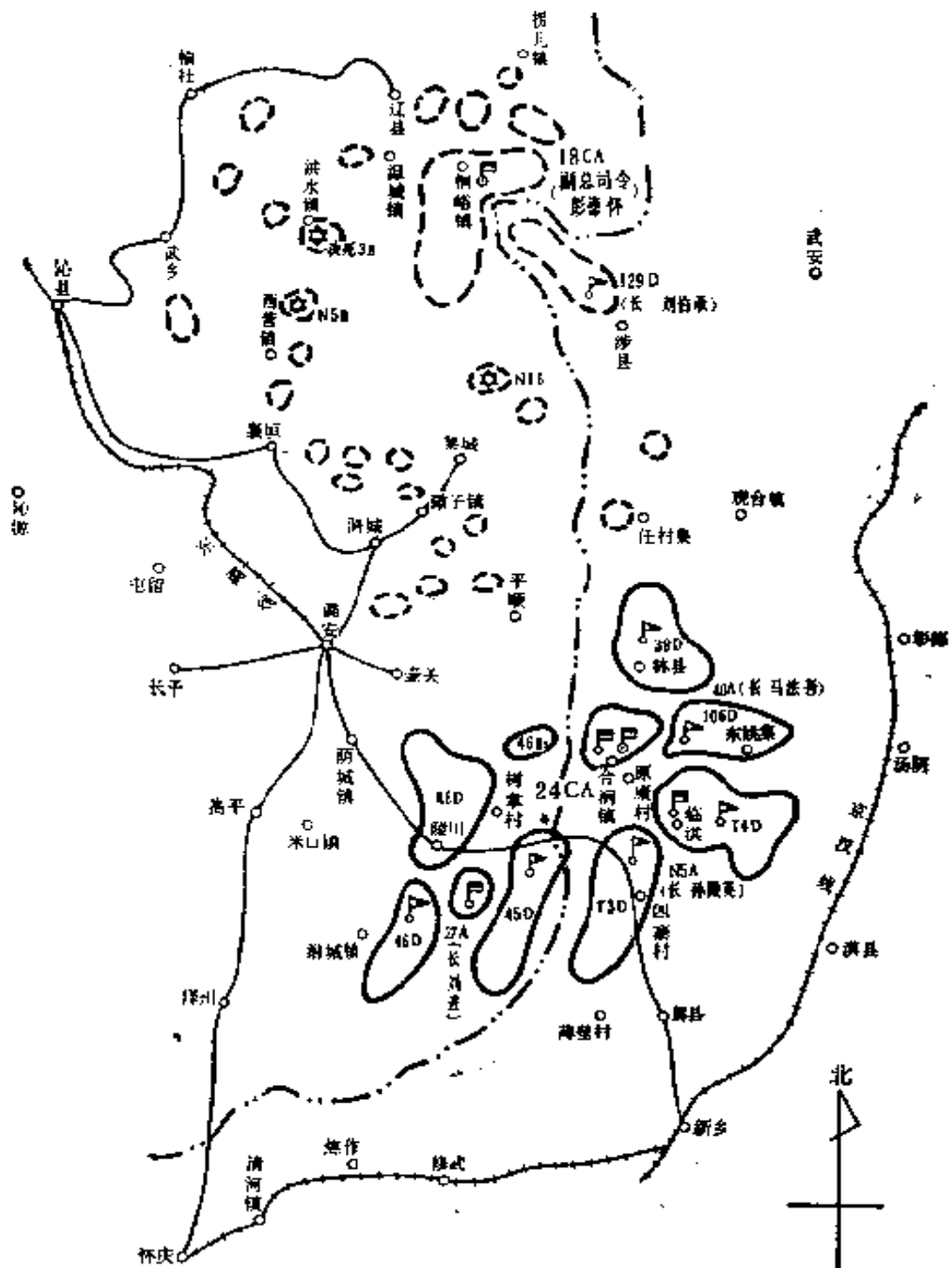
(八) 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

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掌握之下，退避、隐蔽极为容易。日军虽然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多次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敌部队的机会却极少。最大的效果就是摧毁敌人的根据地，这在物质及精神方面似给共军以很大损害。中共对此也采取了对抗措施，即在主要根据地以外，设立了许多秘密的预备根据地，力求减少损害。

1943年春太行作战（“㊦”号作战）

（4月20日——5月22日）

重庆军的状况 盘踞在太行山脉南部省境附近的第二十四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屡遭讨伐和经济封锁，战斗力显著下降，极为穷困。但在重庆中央的指挥下，于1943年初以来，增加了陵川附近的兵力（约8.2万），加强了阵地，对治安地区的扰乱以及征集粮秣等活动稍见活跃。在靠近北方中共势力的地带，始终与中共对立，继续进行暗斗。



注 三源口 魏川东方约32公里 A 军
 横水村 魏川东南方约17公里 B: 独立混成旅团
 九连岔 魏川东方约24公里 T30 坦克第三师团
 ○ 中共军 B 旅支队
 ○ 冀庆军 B 旅团司令兼威步兵团长司令部
 CA 集团军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D 师团 军司令部
 N1B 新编第一军团 师团司令部 R2D 预备第八师

出所 222战事详报

图 11. 太行山脉南部地区敌情要图
 (1943年4月初)

中共党和军的状况 太行军区的共军（司令由第一二九师长兼晋冀鲁豫边区军区司令刘伯承兼任）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华北共军指挥中枢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也设于此，由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司令朱德当时在延安）统率。该部虽屡遭日军扫荡，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现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同时继续对日华的军、官、民行使各种政治谋略，以及破坏小据点和通信交通线等。1942年6月以来，该部在重庆军第四十军势力逐渐衰弱的情况下，正在企图南下扩大地盘。

地形及居民的状况 共军和重庆军的根据地周围，均为险峻的山岳地带，并有很多地隙和断崖，因此，我方在道路以外行动异常困难。但对敌方来说，却便于破坏交通道路，并且适合其分散潜伏行动。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又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日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到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作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作战计划大纲 本作战根据第一军的提议，预定由军单独实行，但在向方面军申请过程中，逐渐扩大了作战规模，决定以第十二军一部兵力参加本作战。4月4日制订的第一军作战计划大纲，概要如下：

一、作战方针

4月20日开始作战，首先将晋东南地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急袭歼灭后，将兵力转向西北方，对涉县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

及第一二九师，进行扫荡剔抉，消除搅乱山西省的根源。

二、作战期间及作战兵力

第一期：4月20日——27日。第一军步兵约二十六个大队，第十二军步兵约八个大队。

第二期：4月28日——5月10日。第一军步兵约二十九个大队（山西剿共军约2,000名参加），第二〇六独立飞行队协助作战。

三、兵团部署概要：

第一期 约由十四个大队（以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为基干）从潞安及泽州（原为泽州府，今山西晋城附近——译注）正面，约用十二个大队（以第六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为基干）从京汉线方面的彰德、淇县之间地区，第十二军约八个大队（以第三十五师团为基干）从新乡及其西北地区，分别向林县、临淇附近进攻。

第二期 约用十个大队（以第三十六师团为基干）从潞城、襄垣、辽县方面，约用三个大队（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为基干）从林县北方地区，约用四个大队（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为基干）从武安方面，分别向涉县南方地区压缩包围圈，以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为基干的约十二个大队，在此期间，扫荡第一期作战地区，随后北上阻止共军向南方逃逸。

注：关于发动此次作战的原委：

1942年6月第一军在晋冀豫边区的肃正作战末期，曾对“宿敌”第二十四集团军进行作战，但未收到明显的成果。年初以来，该集团军力图挽回其势力，因而刺激了第一军；另外，五号作战准备中止后，为了振作第一军官兵的上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等，计划对第二十四集团军实行歼灭作战。

3月1日，制成作战计划草案，2日请求方面军批准。方面军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

期间，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第一军考虑方面军的意见，决定改变计划，以第十八集团军和第二十四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在第三十六师团抽出以前进行作战。于3月29日再次申请方面军批准。

方面军于3月31日傍晚通知第一军对作战时机予以延期，其理由是：（一）从4月下旬预定实行的冀西作战，要从第一军抽出兵力参加；（二）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目前进行中的兵团改编业务结束后，要接受从第十二军派出的增援兵力；（三）第三十六师团集结后，预计暂时仍需留于潞安地区等。

在此以前，第一军已于当天的参谋长会议上，预先秘密指示了作战准备命令，得到上述通知后，再向方面军申请强调希望按计划实行，终于在4月1日得到批准。其后，便与在石门、开封的邻接兵团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第三十五师团主力参加作战，并于3日与第十二军协商完了。

作战经过概要 第一军及参加作战的各兵团，于4月1日以后正式进行作战准备，从10日开始了集中运输工作。军司令官于15日在训示中提出要求 and 希望：“（一）发挥机动力，保持纵深的、面的包围形势；（二）迅速克服敌人所依恃的险峻地形；（三）采取各种手段确保通讯联络；（四）通过彻底的扫荡剔抉，消灭敌人战斗力。”

注：各兵团准备训练中的特殊事项：

（一）根据前一年的战斗训练，研究了新战法；（二）发挥夜间的机动力及处理地雷的训练；（三）向全体人员分发敌干部的照片。

第一期作战 4月20日，第一军按预定时间稍为提前，开始了攻击。

第三十六师团击溃正面之敌，越过省境，企图向临淇方向进攻，于20日午后，以主力从荫城镇、米山镇附近开始行动，克服险峻地形造成的困难，于21日晚，突破了树掌镇附近的阵地；另以一部从微子镇、壶关附近开始行动，驱逐共军，21日晚越过省境，进入林县西部地区。

第三十七师团，与第三十六师团同样企图向临淇方向进攻，20日午后，从附城镇附近开始前进，至21日晚，突破了陵川东南的横水附近阵地。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20日晚，从观台镇附近开始行动，经过任村集，于21日晚，进入林县附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汤阴地区，向东姚集方向，第六十九师团从淇县西部地区向临淇方向，分别开始了进击。另外，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五师团也从新怀路（新乡——怀庆间）（怀庆今河南沁阳——译注）沿线地区，向陵川、临淇一线进击。

第一军鉴于作战的顺利进展和根据特情（秘码破译）判明敌人的行动，于21日午夜，作了如下部署：“以主力在临淇西北合涧镇地区构成半径约为20公里的包围圈，同时以一部扫荡歼灭横水村附近的敌第二十七军。”

各兵团按照命令，至22日日落时，构成了包围圈，从23日晨开始逐渐压缩，搜索扫荡企图逃逸潜伏之敌，尽力搜索、捕获敌人干部。

第三十五师团早就劝其归顺的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于24日晨与部下一起，向横光支队投降。

在此期间，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搜索潜伏于横水村（陵川东南方约17公里）附近的第二十七军，继续进行了扫

荡。

26日夜，第一军决定延期转入第二期作战。至30日止，对陵川以东三郊口（陵川东约32公里）附近，彻底进行了扫荡。27日，将第三十七师团主力、米丸支队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转用于横水村附近。29日，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在陵川东部约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击溃了第二十四集团军及第四十军的两个司令部，但其首脑逃脱。另外，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对依靠东姚集的坚固阵地顽强抵抗之敌，在炮兵、工兵、空军等的强力协助下，进行攻击，29日占领了该地。第三十六师团主要对陵川东北地区之敌，第三十五、第六十九师团各主力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要对省境以东地区之敌，分别进行了搜索剔抉作战。

第二期作战 第一军在5月1日以后，对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残敌继续进行扫荡，同时为了准备攻击共军，责令各兵团向集结地北进。

5月5日，在本村旅团扫荡地区内的三郊口附近，通过第三十五师团的田中彻雄少尉（步兵第二二〇联队所属）极其勇敢机智的招降工作，终于使化装便衣潜伏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

注：田中少尉5月3日接受了诱降庞炳勋的命令后，便率领下士官等11人，并偕同以前归顺的孙殿英的秘书等，急奔四寨村，根据在当地收到的情报，弄清庞炳勋的驻地后，遂即潜入盘据在险峻山谷的敌营中，4日深夜与庞会面，经过说服，终于6日晚与庞同来新乡。6月12日，第十二军司令官授予田中少尉奖状。田中少尉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曾在满铁调查部工作，以后入伍。他在很早以前就专门从事对孙殿英的诱降工作。

军在第二期作战时，根据“5月6日开始进攻，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共军根据地，构成严密的包围形势后，逐渐压缩三层包围圈”的设想，向各兵团进行了部署。并指示按以下实施要领注意进行作战准备：（一）用步兵一个大队以下兵力的几个纵队，以涉县作为目标一齐突进；（二）各纵队令突击队提前半日出发先行挺进，另外，在各包围线上的要地留置一部兵力防止敌人逃脱；（三）进入第三包围线后，以此作为扫荡据点，剿灭其内部之敌；（四）进行扫荡时，夜间行动要作到机敏灵活，诱出潜伏之敌，利用中国方面的军警，努力获得隐藏物资。

根据截至5月5日的情报得悉，敌军司令部至4月29日仍在原来的位置未动，但似已作好逃跑的准备。另外，西营镇附近的军需品已搬入山中，并已埋藏地下。

第三十六师团为了确保本作战的成果，于5日下达了变更部分原警备部署的命令如下：

（一）将辽县的警备移交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二）5月底以后，令剿共军第一师（日军的一个步兵中队给予支援）进驻蟠龙镇（西营镇北约16公里）附近，使其担任确保铁矿资源地区及附近一带的肃正建设工作；（三）为了阻止太岳地区共军的南北移动，以一部兵力在沁源（潞安西北约80公里）至屯留（潞安西北约30公里）之间，构成切断线；（四）以联队长指挥的有力部队，牢固地占领陵川附近；（五）潞安陆军联络部长指导陵川附近的复兴建设；（六）利用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必要时使其担任特定地区的警备；（七）随着警备地区的扩大，改变原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尽量集中兵力（将分哨限于最小限度），随时出动游击，维持治安。

5月6日，按照第一军的预定，第三十六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武安东北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林县北部任村集附近，分别向涉县附近开始进攻。

作战顺利进展，各兵团逐渐压缩包围圈，神速、果敢连续进行攻击。9日以后，逐渐采取分散形势，至13日为止，搜索攻击逃避潜伏之敌，尽力获取敌人的物资。但是，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

在此期间，第三十七师团与第六十九师团主力共同扫荡了陵川以东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于9日结束。12日以后，除留置一部兵力外，其主力逐渐返回原驻地。

我军在14日以后，使第三十六师团转入警备体势，同时，以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合计步兵十三个大队为基干，对逃往松烟镇（辽县东北约30公里）附近的第十八集团军军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进行跟踪扫荡，但终被逃脱。16日，以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扫荡了榆社以北地区的共军新编第十旅。

这样，从4月20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5月31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9,913具，俘虏15,900人，投降者约58,000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日本方面的损失：战死227人，伤803人。

注：庞炳勋于5月9日声明参加汪兆铭的和平阵营，随后在14日，号召旧部官兵和民众停战。通过日军的猛攻及招降工作，其归顺投降者，一度约达74,000人，但其后，由于第二十七军进行工作，致使第四十军的态度呈现暧昧，故归顺投降者的数字有所减少。23日，庞炳勋、孙殿英编成和平剿共军（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24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任命庞、孙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重庆及中共方面的状况 重庆方面有关本作战的记录如下：

日军以各兵种联合兵力约5万余人，从各地分路于4月16日开始了全面包围攻击。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前沿据点，虽奋勇抵抗，但终被相继突破。集团军主力保有陵川以东地区，以机动态势迎击敌人，从18日起至24日，展开了猛烈的主力战斗。其后，我军在山区留置一部兵力，以主力向敌后挺进，对敌进行夹击，因而敌人在5月上旬，用一部固守重要据点，主力依次返回。我军乘此机会，于5月中旬，大举进行反攻，给敌人以极大的损害，并恢复了各据点。其后，新编第五军合并于第四十军，第四十军转入整训，第二十七军也恢复了旧地。

中共方面有如下记录：

敌人新采用的所谓“对华新政策”，是敌人一贯实行的“以华制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华北占领地区内，通过发动“新国民运动继续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战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1941年5—6月的中原会战）失败以后，其素质更加低劣，竟丧心病狂与敌人联合，采取反共政策，“视解放区为敌区，变日军占领区为自卫区”，企图依靠外力以图存。日军乘此机会，要求国民党军投降汪精卫，并发动“山东战役”及“1943年春、夏季的晋冀豫作战”，施加军事压力。而国民党军完全丧失民族意识，坠入敌人

圈套，大量投降敌人。从而使华北伪军竟达四十五万人之多，彼等用外国援助的武器，残害祖国的抗日人民，与我八路军对抗。

（以上均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四十号作战（5月24日—6月20日）

原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第四十军，响应庞炳勋的号召曾一度归顺，但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压力，突然改变态度，企图逐渐南下渡过黄河。另一方面，第二十七军为重庆直系军队，比其它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意志。该军一面对第三十五师团的招降佯作响应，一面随着日军返回原驻地，又纠合逃避潜伏各地的部队，以图恢复其战斗力。

对此，方面军一面仍然进行招降工作，一面于5月上旬，对第一、第十二军的一部重新进行了部署，以便对上述两军，尤其是第四十军的残部进行扫荡及阻止其南逃。

首先，第三十五师团于5月24日开始行动，将长谷川支队部署于黄河北岸，构成阻截线。27日，向临淇以西省界方面派遣了横光支队。第三十六师团责令佐久间部队与之策应，在陵川一带进行了扫荡。6月12日，横光支队、安达部队击溃了向济源西南地区南下的第四十军的第一〇六师。

6月底，随着日军的撤退，第四十军的残部返回临淇、合涧镇附近，苟延残喘，并在林县以南地区构成阻截线，以防共军南下。

1943年夏太行作战（“シ”号作战）

（7月10日—7月31日）

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预备

第八师等约3万人，巧妙地逃避了日军的扫荡，企图于6月南渡，但未能实现，遂向陵川以东、以南的省境山岳地带内进驻，企图重建根据地。

方面军于6月末，命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团主力进入新乡、怀庆、泽州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防止第二十七军逃脱，同时仍继续进行和平招降工作，但至7月上旬，突然决定立即解决该敌。

注：该决定是根据第一军“立即发动歼灭作战”的强烈要求而决定的。第一军认为“和平工作，已无希望，必须在第三十六师团转调以前，付诸实行”，因而早就秘密进行了准备。

当时，第二十七军长刘进，侦悉日军的集结状况后，于7月7日表明“彻底抗战”。对此，方面军部署兵力，进行了作战准备。

一、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五师团主力从新怀线（横光支队从薄壁镇，修武北面地区，长谷川支队从焦作、清化镇以北地区）方面，长岛支队从辉县、林县方面，于11日以后，及时向各省境开始进攻。

二、第一军以第三十六师团的主力在陵川附近，以一部在壶关、荫城镇附近，另以第三十七师团的一部在泽州、清化镇方面接触敌人，并作好攻击准备，于10日以后，随时开始行动。

三、参加作战各部队，要准备编成负责搜索敌军司令部的数个追击队或挺进突击队。

第一军的各兵团从10日晨开始了攻击。但如所料，未曾遭遇大股敌人。由于已进入敌人根据地附近，虽一兵一卒也不放过，进行了严密的搜索扫荡，以期彻底摧毁敌人势力。

13日，第三十六师团的吉野部队与第六十九师团的大津部队（大津重雄中佐指挥的独立步兵第八十四大队），猛追企图西逃的预备第八师，在端氏镇（高平西约30公里）以北，击溃该敌（大津部队在本战斗中，俘虏预备第八师长陈考强以下约250人）。但是，第二十七军主力，从作战开始数日前，即已分散潜伏，期于日军撤退后东山再起。

第十二军的各兵团，也于11日以后，向省境方面开始行动。另外，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于12日，急袭怀庆以南的黄河各渡河点。切断其与第一战区主力间的联络。

15日，进入第二期作战，第一、第十二军的各兵团在相互联系下，从陵川附近扫荡了省境地带，尤其对敌军长以上干部展开了积极的搜索。

24日，方面军将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及长岛支队纳入第三十五师团长的指挥，并责令新编成的第六十二师团的一部参加，以第三期作战的新部署，反复扫荡了残敌。因此，敌第二十七军的大部被击溃，军长刘进逃往黄河南岸。一部分残部，蛰伏于旧地盘附近，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估计敌人迅速恢复战斗力极为困难。据此，方面军在7月31日基本上结束了作战，尔后，由当地兵团继续扩大其成果。

截至7月底，敌遗尸1,371具，俘虏4,853人，日军死25人，伤84人。

此外，在本作战期间，第三十六师团的葛目部队曾扫荡了蹇龙镇附近，并进行了招回居民的工作。在北部地区，共军并无明显活动。但在陵川地区有很多中共工作人员潜入，

意图扶植代替第二十七军的势力。

注：河南省林县方面已有共军侵入积极进行赤化工作。8月中旬，林县、临淇遭到优势共军的攻击，庞炳勋曾夸称“共军好比老鼠，日军好象狗，不管狗多厉害，对于捕捉动作敏捷的老鼠，也无能为力。我可以象猫那样，巧妙地捕捉老鼠。”然而，临淇的皇协军部队（指庞等的伪军——译注），受到共军攻击后，立即崩溃退走。因此，第三十五师团从8月19日起约两周在林县附近进行了剿共作战。但晚秋以后，新乡以西，破坏交通、通讯线路以及恐怖活动等扰乱行为更加激烈。

第十二军管区内的肃正作战

在第十二军管区内，特别是在山东地区，由于日华协力肃正作战、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和实行经济封锁，打击了山东地区的共军及重庆方面鲁苏区的于学忠军。因此，于学忠内部厌战及希望和平的气氛高涨起来，加以共军的压力，陷于困境，从而借反共名义向日本投降者，逐渐增多。

日本方面早就对之进行工作的新编第四师长吴化文，于1943年1月18日率新编第四师及第一师约四万人，归顺了日本方面。国民政府同意使之编入国军，并任命吴化文为“和平建国山东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的部队，在以后曾积极协助日军作战。于4月中旬，攻击鲁苏战区的重庆军队周光烈的第五十一军、刘桂堂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位于山东中部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六旅团（旅团长奥村半二少将，配属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两个大队），从1月7日起，在寿光（益都东北方约30公里）附近，围歼了保安

第十五旅。随后于1月15日与第五十九师团协力在大王村（济南东北方约100公里）附近，包围袭击了清河军区的共军，给以歼灭性的打击。2月下旬，与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协力，讨伐了城项山（沂水东北方约55公里）附近，除俘虏了第一一三师长韩子恒、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数干部外，还歼灭了敌人抗战部队的大部。

重庆军的鲁苏战区军，在鲁中、鲁南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第十二军于4月以后，对之进行彻底追击战，5月14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和吴化文指挥的六个团，在新泰东部地区搜索到于学忠军部和第一一四师，俘虏和击毙敌人各1,000名左右，鲁苏战区之敌大为动摇。6月6日，该战区鲁南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率领部下约2万人，脱离抗战阵营归顺了和平阵营。（荣子恒为东北系将领，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步兵、工兵学校进修。其父荣臻，于6月10日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荣子恒由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军长。

如上所述，在此时期的作战，主要是对重庆施加了压力，招降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三、蒙疆方面的对苏作战准备

一向的作战设想

中央开始重视促进蒙疆方面对苏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是在1943年春季以后。

在这方面，向来的作战设想是：中国事变以前，“仅在

多伦派遣约一个师团左右的兵力与中国驻屯军配合，担任警戒”；但自1939年起“便由驻蒙军主要确保张北附近阴山山脉的要地，以掩护关东军的侧翼”，开始构筑部分野战阵地，以后逐年加强。

1941年“关东军特别演习”以后，经研究提出了如下设想：“为了策应关东军的辅助作战，以驻蒙军两个师团及蒙古军（五个师约为6,000人）确保正面的据点，通过机动防御以达到持久。此时，以一个旅团维持蒙疆地区的治安，根据情况对乌兰巴托方面采取攻势。”该设想已成为1942年度的计划。因此，促进了国境警备、情报收集、作战要地的调查等工作，并预定将原来的野战城堡改为钢骨混凝土的永久城堡。但是，由于五号作战的准备，大部分工事没有进展。

另外，驻蒙军在制订计划时，是以管区内的共军、西部的重庆第八战区军、北部的外蒙古及苏联军作为敌人，并且考虑到阴山山脉以北的广阔的大草原冬季的严寒等特殊地形和气象条件，这些都是制订计划的重要因素。

促进作战准备

大本营于1943年2月，制订了对苏作战年度计划草案。经进一步讨论并根据4月5日的总长指示，对派遣军作了指导（指示现无原文）。另外，于4月中旬，大本营曾发出通知：“希望确保多伦——张家口——包头，在与关东军取得联系后，也可以阿巴嘎作为主阵地。城堡、机场的整備等只限于应付急需，此外，则根据需要逐渐实施，避免刺激敌方。”

派遣军于4月29日制成方案，同时派遣主任参谋去蒙疆。他与当地驻军及关东军的有关人员，对驻蒙军修筑城堡及作战要领问题共同讨论后，5月4日向大本营作了报告，其概要如下：

一、为了进行持久作战，应广泛利用阴山山脉前方地带。为此，在各要地采用据点式的、坚固的城堡设施，使其具有独立性，城堡地带及兵力配备规模如下：（1）阿巴嘎，（2）苏尼特右旗，（3）百灵庙，以上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4）多伦，步兵五个大队为基干，（5）德化，步兵三个大队为基干，（6）平地泉，步兵一个大队，（7）包头，步兵两个大队，（8）张北，三个飞机场——四个战斗机队，轻重轰炸机各一队。

上記（4）、（5）要求对优势之敌能固守到数月；（6）是阻止部分苏军和重庆军队；（7）为分割上述两军的阵地。

二、阵地修筑城堡，对主要战斗机关，以能够经受5吨炸弹威力为标准，全部实行地下设备，为了节约钢筋混凝土，全部采用坑道式，其进行顺序为1943年收集筑城材料，（1）、（2）、（3）阵地在1944年内大致完成，1945年修补；（4）、（5）、（6）阵地，预定在1944年完成一部分，1945年全部完成。

三、为了进行机动防御和攻势作战，应整備道路。攻势方向，预定指向乌兰巴托。在1943年将多伦——阿巴嘎之间的道路改成通行车辆的道路。

上述报告，于5月6日经大本营研究后，决定把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阵地的兵力，保持在一个大队以下，并研究了筑城所需资材的收集、运输，以及作战部队的机械化等问题，从而促进了作战准备的迅速进行。

参考：

根据驻蒙军的调查，在当地生产的水泥、石灰、砖、木材

等，不能满足需要，钢铁及其它材料，需全部依靠输入。另外，可能征用的民间车辆，其装载能力仅能达到四万九千吨。

其它关于蒙疆方面的敌情判断，并无可靠资料。驻蒙军判断：“敌人主要战场是在海拉尔、阿尔山（锡林郭勒盟东北端的北部）方面。在我军正面之敌是以切断满洲与中国并占领京津重要地区为目的进行辅助作战。其使用兵力，首先为三个机械化师，另外，这方面的主要作战，估计是沿张家口——乌兰巴托道路地区，其一部特别是外蒙军可能游动出现在阿巴嘎——多伦及百灵庙——厚和方向”。

大本营对蒙疆方面的作战估计，认为“开战后一个月内，地面部队和飞机都不会太多。三个月后会有一师的兵力，恐无大的行动。六个月后，可能有两个师，在后方地区保有相当的预备力量，同时增加空军兵力，大肆破坏铁路。此时，可能与五原方面的重庆军队会合，逐渐向东方采取攻势。”

作战准备纲要的指示

7月15日，大本营关于蒙疆方面的作战准备，以大陆指第一五七四号文件，对派遣军下达了纲要。当时，因为对苏作战的全部计划尚未确定，所以在纲要中只明确指示了应该确保的地区，其重点在于迅速修筑必要的城堡及定出其它作战准备的标准。关于确保线的选定，主要是根据与关东军最左翼阵地林西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地形的特点而决定的。

蒙疆方面作战准备纲要

1943年7月15日

大本营陆军部

第一、要则

一、今后，蒙疆方面的作战准备，除根据1943年4月5日大

陆指第一四七八号大东亚战争1943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无原文）外，以本纲要为依据。

二、根据上项，每当实行作战准备时，要考虑整个形势确定各该年度的作战规模。

另外，鉴于帝国目前对北方国策的根本方针，要避免刺激苏方，逐渐从后方地区进行渗透，并注意隐匿我方意图。

第二、进行作战准备必须依据的作战要领

三、中国派遣军在蒙疆方面的作战要领，基本规定如下：

1. 作战目的

对外蒙苏军及重庆军队，应策划进行持久战，保卫蒙疆及华北要地，并使关东军易于作战。

2. 作战方针

(1) 对外蒙苏军及重庆军队，要确保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包头一线以南的要地，以便于持久作战，并使敌空军的行动困难。

(2) 必要时，牵制外蒙方面之敌，使关东军易于作战。

3. 作战指导大纲如下：

(1) 驻蒙军（两个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为基干）在阴山山脉以北地区进行作战，击溃外蒙苏军的进攻，以确保阿巴嘎、苏尼特右旗、百灵庙一线以南的要地，同时，尽一切手段，阻止敌空军基地的推进，使其难以行动。

在外蒙苏军主力向关东军方面进攻时，应及时以必要的兵力向蒙古东部进攻，尽量牵制较多的敌人，以利于关东军的作战。

对重庆军队，要确保包头方面的要地，抓住良机，予以各个击破。

(2) 适当时机，要转用在华空军的主力，与关东军空军部队协力，击破外蒙方面敌空军势力，使地面作战易于进行。

派遣军基于上述指示，于8月初，命令方面军严格注意，在不刺激苏联的情况下，实行对苏构筑防御工事的三年

计划。当时，作为地面作战兵力，除驻蒙军外，预定增援一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另外，为了确保满华联络要冲京津地区的安全，将抵抗线选定在多伦、德化、平地泉一线，为了极力阻止敌前沿空军基地的推进，在其前方地带，要特别重视机动防御。

驻蒙军在6月设置了由吉冈善四郎少将领导的“筑城部”，8月开始了构筑防御工事的教育及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太平洋战况的关系：建筑材料缺乏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预计还要抽出兵力，所以，大本营在10月中旬，下达指示：“本年度仅限于实施有关飞机场的设施，明年度以后再考虑整个情况，决定每年度的工事规模和要领。”派遣军得到中央的同意，于11月中旬作了如下布置：“改以阴山山脉作为主要抵抗线，尽量利用地形，策划持久作战，首先应以重要的航空设施作为重点。”

注：由于材料及劳力不足，防御工事进展困难。加以1944年3月决定抽出坦克第三师团，同年7月又决定抽出第二十六师团，因而变更了计划，放弃包头、厚和，而要在平地泉以东阴山山脉一带阻止苏军的进入，缩小了作战准备的规模。

情报部的设置

根据1943年7月22日军令第七十二号，于同年8月3日临时成立驻蒙军情报部，作为驻蒙军司令部的附属机关。该部以驻蒙军参谋长为部长，以其情报参谋及军官、下士官等为情报部员，均以兼职执行勤务。与此同时，各地特务机关也改编为情报部支部，进行情报、谍报、防特、谋略等活

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苏的情报工作。

注：此组织系驻蒙情报主任参谋中西满治郎中佐，研究了关东军情报部，而后建立的具有同样机能的小型组织。

至战争结束时的情报部长、情报支部长如下：

军情报部部长 先后为 矢野政雄少将、中川留雄少将。

厚和支部长 先后为 小仓达次少将、野村茂中佐。

大同支部长 为 铃木重种中佐。

包头支部长 先后为 稻森利助中佐、田中良武中佐。

德化支部长 先后为 永井浩一中佐、高浦仪作中佐、

幽经虎嵩大尉。

阿巴嘎支部长 先后为 牧野正臣中佐、竹原浩中佐。

备考：厚和支部长由军事最高顾问兼任，阿巴嘎支部归关东军情报部管辖，1944年9月27日，该支部长由驻蒙军情报部支部长兼任。

四、推行新政策引起的波澜

中国经济情势严重及其紧急对策

华北与华中的经济具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先就全面经济状况加以说明。

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要点，尽管要使中国方面以提高民生为目的，施行自主的积极的政治，但在实践中，其基层机构缺乏实力，政令不能贯彻；在日本方面，大使馆的力量也薄弱，事态的前途堪忧。对此，畑总司令官5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实行起来很不顺利，例如对于囤积造成的问题，全国商业统制组合的基层部门迟迟不能采取行动，一部分已经表现出悲观失望情绪。上海的海军部对陆军采取不合作的态

度，经济界人士静观情况的发展，有的吹出‘六个月以后再
看’的冷风，意思是说行不通时还要倒退回去。在大东亚省
内，大臣次官级、局长部长级、课长以下中坚干部之间，思
想互有矛盾。中坚干部有悲观情绪，认为前途困难重重。”

又如5月29日“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里载有中国派遣
军井户垣浚主计大佐对华中经济情况的说明：“对华新政策
彻底实现极其困难的缘因是，物价在一年之间猛涨两倍，帝
国虽以合理价格收购一些物资，但要受预算的限制。即便增
加预算，如果没有回头物资，物资收购依然困难，国民政府
正想采取二重价格政策。其实二重价格政策，总军已经用
过，但当时中国、大东亚省、当地官民，一致指责这一政策
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也是决定推行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原因。
政府关于军队在第一线实行的经济封锁，特别在对华新政策
的条文中，插入了‘不要妨碍国内的物资交流’的字句。
尽管如此，据说大东亚省迫于形势，仍要加强限制物资的输
入，这一情况也和过去军方施行的物资统制同样遭到了批
评。（中略）对华新政策，在经济部门是否会失败，现在作
出结论为时尚早，新政策目前总算已进入了具体实行的阶
段。”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有关我军的自给物资及对日输出物资的开发，如无军方
插手，工作就一筹莫展。这对当地驻军来说，其责任所在就
大成问题。对此，在5月下旬，由次长、次官下达了经陆、
海、大东亚三省协议的“对华获得物资要领”，与过去无
异，仍然要求军方给以积极的支持。该要领规定：

一、关于确保中国提供的对日输出物资，由大东亚省负责，在中国的陆海军，根据各地情况，予以大力支援。

二、我军当地自给物资，由军负责，但应尽量利用中国机关。为此大东亚省有关机关应直接负责对中国机关的扶植和指导，军应在警备运输方面积极予以协力。

此时中国，特别是华中的经济状况，极堪忧虑。从治安考虑也要由南方运进食粮，但因船舶不足未能实现。

5月，国民政府为了严惩囤积物资以操纵物价扰乱市场的行为，紧急制定并实行了“惩治囤积暂行条例”，加强了对物资收购机关的中枢部门“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监督和指示。此外，对持有美英系敌性货币者严加取缔。

针对此种紧迫情况，日本政府决定施行“对华紧急经济施策”。其方针如下：

面临决战阶段，由于各种关系，我国对依靠中国物资的要求愈来愈增大。相反，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由于物价暴涨，急速趋向崩溃的实际情况，日华双方应互相协力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迅速而坚决地防止中国经济的崩溃于未然，一方面维护供给帝国经济战力量的基础，同时使体现“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精神的经济政策付诸实施。

据此，在日华协力之下，实行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对中国市场的棉纱、棉布，以公正价格强制购买，并运用它作为获得紧急物资的回头物资。

二、以金块25吨为限，由日本运往华中、华北，为加强中国财政予以全面支持。

三、日华协力严格取缔囤积，强制控制物价，并限制资金的发放。

在以上各项外，取消日本官厅直接监督日华合办的公司，扩大国民政府的监督权，增加对各公司的中国方面的投资额，增添董事及职员等。有条件的部门大体要在7月底，其它一般要在本年底采取措施，实行真正以中国方面为主体的运营，以此确保中国对日本的积极协力。此外，苏淮特别区很早以来即成为华中、华北结为一体问题的一个悬案。该区在行政上从1942年初开始，已划归国民政府直辖，但在经济、货币以及所有收购、交通、通信、邮政事业等，仍由华北控制。日本方面，从1944年1月以后，为使国民政府名实相符地掌握实权，采取了各种措施。

随着清乡工作的进展，国民政府也将苏北各县移交江苏省政府，设江苏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并将苏北行营改为“苏北驻在绥靖公署”以期确立治安。

然而，由于储备券币值低，难以在该地区流通，至年底强制与联银券并用，但终究未能做到完全改用储备券。

有关上述政策施行状况，畑总司令官在日记中有下述记载：

8月10日 根据紧急经济措施有关收购棉布一节，迟迟不见实行。本日发表了有关该措施的各项规定，就要进入实行阶段，但上海经济界人士受英美的影响难以消除。有实力的人采取投机观望态度，估计政策的实行将遇到很大困难。

8月18日 国府依然软弱，因此，终至不能掌握上海。上海统制总会竟不承担军米的收购任务，真没办法！轴心国战势不利，更使上海人心不稳。

8月27日在上海的棉布收购工作，到最后阶段，国府仍无实

行诚意。

华北、蒙疆的经济政策

华北、蒙疆的经济，虽比华中稳定，但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方面军为了尽量减少从当地强行取得所需物资的弊害，在支援中国的原则下，费尽苦心，根据“剿共方针”向各兵团部队提出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注意事项：

对华物资的取得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各种大量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要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必要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这些物资。

四、对于要求中国供应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因此，不仅要彻底清除侦察资源地区附近的中共的策动及地下工作，同时加强各种措施，掌握民心，还必须大力援助有关收购、运输的警备工作。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

援。

六、在支持土产物资的收购时，要严禁利用皇军名义进行掠夺，要严格监督收购机关，使负担公平、收购价格合理，正确分配回头物资，注意尽量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杜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中间剥削，消除对民生的压迫，不给中共留有破坏我方政策的余地。

现地自给

一、军队为了实现现地自给自足，通过把握民心以博得其善意的积极协力，乃是根本问题。如果作法不当，压迫了民众生活，就会给中共以可乘之机。

二、自给物资中的大米、大麦、小麦、杂粮、棉花、蓖麻油、皮毛、牛、烟叶等，对民生有很大影响，原则上由大东亚省的当地机关，或通过该机关从中国方面的收购物资中取得。自给物资在当地筹措时，不仅要积极利用中国方面的收购机关，而且要尽可能在广泛地区进行收购，并要重视富有地区。特别要注意以各种适当方法，不使民生受到压迫。

三、收购价格，要参照一般市场价格，避免强迫，尽量定出公正价格，对农、畜产品并应注意尽可能使之自由经营。

四、在当地筹措物资时，凡在使用回头物资时，必须使供应的系统、时间、地点都有妥善安排，并严密注意，尽量杜绝中间环节出现侵吞冒领的恶劣行为。

五、由于作战警备上的需要，在征集劳力时，应尽量躲开农忙时期，要有周密的计划，不得使劳力有所浪费，在支付工资时，应注意避免中间环节，要直接发给民众。

对敌经济封锁

一、对敌经济封锁的目的是防止战争必需物资向敌方外流，促使敌方战斗力的削弱和枯竭。为此，必须使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予以协力。

二、对敌经济封锁，往往阻碍接近封锁区的物资交流，以致压迫民生。因此，应尽量采取办法，对中国方面有关机关进行启

发和指导，同时更应使民众了解对敌经济封锁的必要性，以促使其主动积极地协助我方进行封锁。

三、封锁线的盘查及对非法物资的扣押及处理等，当然主要由中国方面负责，但借口盘查，勒索财物或收取贿赂，默许运出物资，滥用职权致使民心背离，或减弱封锁的效果，凡此种种，必须经常进行严格的监督。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5月20日举行了华北各省、特别市长会议，对于当前迫切任务，即迅速收集粮食以安定民生和推进剿共方策两大问题的具体对策，进行了协商。尤其是为了制止春季以来继续上涨的粮食价格，要彻底实行“申报现存余粮和以公正价格收买余粮”布告的规定，并决定纠正各地区物价的不平衡现象和日华间公定价格水平的悬殊，以及严格取缔黑市等。

6月18日，新民会也决定对政府的粮食政策予以积极协力：（一）按公定价格贩卖粮食，（二）揭发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三）递减一般物价。以上三项立即付诸实施。

6月26日，由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了“扰乱华北经济统制紧急惩治条例”，对违反经济行为严加取缔。

6月21日，华北方面军也就支持中国方面粮食政策发表声明，表明了强硬的态度，并从6月下旬全面开始了检举活动。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的日记中写道：“6月21日，对囤积粮食及违反我军规定牟取暴利和榨取民众的日华经济界人物嫌疑犯约850人，断然予以逮捕，就连最大的公司的分

公司经理等也不宽贷。其中华人多为日本公司的走卒。”又据12月5日发表，共计判处了日、华人104人及商业事务所28处。对罪行严重的三井物产太原事务所，在9月17日命其停业回国。

7月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故，有关委员长的后任人选提名虽有问题，但终于决定由王克敏再次上台，5日王克敏就职。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历来的主要目标是：“（一）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二）确立自给自足的体制；（三）使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易更加圆滑”。为了推动此项工作，5月1日修改了贸易统制法，采取了加强输出统制、缓和输入限制的措施，力图推动经济流通的顺利进行。在7月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决定国防资源开发事业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

对违反经济取缔法的事件，与华北同样在5月8日由内务部、经理部联名发出布告，实行严格取缔。

参考：

有关政治、经济政策的意见书 为实现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中央和地方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在青年军官中间，曾有关要求果断实行各项新政策的呼声。

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担任政务工作的奈须要少佐、担任经济工作的田边新之少佐，对现状感到忧虑。他们曾分别提出意见书，但当时未被上级重视，至1945年，一度采用了其中部分的意见。

奈须少佐意见书的要点如下：

一、取消华北、蒙疆的特殊性，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

华北政务委员会，从临时政府时期，在思想上就与维新政府相对立，盲目自我陶醉，不顾自己无能，只能依靠日军的力量存在，是一个完全脱离民众的畸形政权。而且各委员都是过去的政治家，以伪装的、无诚意的亲日态度，欺骗军方和大使馆当局。必须首先清算扶植此种地方政权以实现联省自治的梦想。华北政务委员会应该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办事机构，蒙疆也是如此。

二、指导中国的核心势力，是充满民族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阶层，我们只有掌握其内心思想，才能掌握中国民心。

田边少佐的意见书要点如下：

一、恢复过去的经济机构和自治统制

以前所试行的种种官方统制均已失败。它分散和破坏了中国独特的自治统制机构，或者使之改变了形态。同业公会、商会、粮栈、钱铺，本来不是榨取机构，它是以地区的、血缘的相互扶助为基础的，因此，复活这些机构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收到统制经济的实际效果。

二、轻工业的自营及农村的工业化

使中国方面担任轻工业部门的工作，可以培养其经济力量，加强其政治力量，从而促进对日本的物资供应。为此，要重新研究敌产工厂，凡与进行战争无直接关系者，尽可能予以发还，以鼓励彼等企业的热情，这样作法是有利的。随着民营轻工业的发展，可以期望增加税收，丰富收购农产品的回头物资，从而促进收购，繁荣城市和农村的物资交流，充实经济力量。

中国是农业国，发展农业是当务之急。中国农村向来是只求一家糊口的消极生产情况，但今后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改良农耕方法，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生产力，考虑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及产品加工，或利用农闲时期进行多种经营。

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的扩大，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不平衡现象，就能得到调整。

三、华北、华中的经济调整

鉴于苏淮地区的经济调整的成效，应修订现行的物资交流限制，统一物价政策，调整汇兑交易，迅速促使在华北地区同时使用联银券和储备券。

华北、华中如实行货币调整，则不能保持日元与华币的等值交换，从而华北对日供应将不可能。但是，日元与华币等值的实质，尽管是以收购粮食价格为基础的对日输出物资的价格调整问题，但事实上只限于对粮食价格实行了统制，而大部分民众却生活在黑市价格之中。现在对日元和华币的等值问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现已到了统一合并时期。此种统一的会社，不能象以前那样涉及一切产业和经营部门，而应只限于与完成战争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例如专门承担铁道、通信、重工业等部门的经营。

四、加强对日本的物资供应

对日供应物资不容乐观的是，在生产上的经济基础存在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官僚的宗派主义，以致无论在内容上时期上都陷于敷衍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缺陷，除去重工业以外，先将一般生产交给中国方面经营，这种作法，将会收到综合效果。以公定价格制所实行的收购工作已明显地失败了。这项工作也交给中国方面承担，当可有效。虽然担心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但对这些问题反而容易处理。

五、大使馆的撤销和军需省的当地机关

大使馆已经堕落成为完全的事务衙门，既缺乏政治力量也无改善的希望。

其根本缺点是：对中国政治研究得不透，对当地情况认识不足，回避政治责任等。因此，各种措施不得要领，招致中国方面的轻视，它与总领事馆以下各机构相脱离，墨守成规，毫无进取思想。在缔结同盟条约的今天，大使馆已无存在的必要。大使馆的业务本来以有关日本人及物资问题为主，但有关物资问题，已成为新成立的军需省的当然业务。因此可撤销大使馆，而使军需

省的当地机关在军的支援下进行活动，同时恢复总领事馆的作用。

六、放宽敌地区的物资交流

现在的封锁、限制交易的方式，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由于敌区采取开放性的价格政策，反使我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敌人提供了良好机会。倘使中国实行自主经济，从敌我地区的物资数量、生产能力、购买力的关系来看，不仅能够限制物资的外流，而且还能有更多的物资从敌区流入治安区，这是毫无疑问的。

七、整顿在中国的日本人

华北四十万日本人，对华北来说大部分是无用的。应该只留下必要的有能力的人，如计划人员、技术人员等指导阶层，其他人员一律使之返回日本。无用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减少中国人的就业机会，其卑劣的生活态度招致中国人的嘲笑，妨害了日华的亲善关系。日本国内正在加强决战体制，为了对青少年的再训练，也有必要尽快使之回国。

八、断然飞跃革新的热情

飞跃不能期待于渐进主义者。以前的对华各种政策，其结果几乎都使对方怀疑和失望。这是每次提出新办法时，在真理和道义面前有所踌躇的原因。由于经济政策是促进政治、思想对策完成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有断然飞跃革新的热情。

清丰事件

5月29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根据生存者的回忆，事件的概要如下：

河北省冀南道以北为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的警备区，濮阳县以南为第三十五师团的警备区。当时共军在该地与山东省交界地区的农村已经根深蒂固，并且逐渐扩大势力。大名、成安县成为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南乐、清丰、内黄、观城、朝城县成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濮阳县为冀鲁豫

第四军分区的根据地。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为了实现新方针，进入5月份，逐渐集结分散驻守的小部队，放弃了距铁路沿线较远的清丰县。（根据治安良好地区的警备由中国方面负责的方针。）

在县联络员中间有不少人对于这一措施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对该地区有友好关系的中国人见死不救，对中国方面在心理上会有很大影响，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后退的表现。为此，道联络员川本说服邯郸陆军联络部长加藤次郎大佐，结果得到允许，只用中国方面的保安队夺回清丰县并确保该地。于是，由各县联络员领导从各县保安队中选拔的部队（主力是清丰、大名、南乐县的保安队），在南乐、大名集结，总兵力共4,800人，以之编成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5月23日开始进攻清丰县，很容易地攻占了该城。

此后中共也未反攻，恰好各县联络员齐集该地，为了鼓舞士气，决定在清丰县城内召开5月份的联络员例会。28日晚，联络部的代理部长名取正雄大尉、道公署的薛道尹，在大约三百人的教导队护卫下一同来到县城。29日道尹亲自部署了县城的警备，在原来警备队的旧址召开了联络员会议，讨论研究了收购粮、棉和清丰县的警备等问题。在会议当天，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坂大尉率一个护卫小队前来，通知全员要赶快由清丰县撤出。然而趾高气扬的联络员们反对撤走，会议继续开到黄昏。

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的袭击。保安队在城上布防时，县城已完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3时共军突破东关拥入城内，顿时，由各处抽调而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到第二天的夜里，离此最近的南村集日本警备队赶来时，只剩下日本人8名、保安队30多名，名取大尉、川本道联络员战死，薛道尹被俘。

敌日以后，加藤联络部长在旅团两个大队的支援下，经过三

天的时间，在清丰县城内外收敛了数百具尸体。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冀南道的保安队一蹶不振。此后南乐县城被袭击，松田联络员等战死，第二年大名县城又遭袭击，百田联络员战死。

清丰县事件，说明军事和行政调整的困难。日军是中国方面的后盾，中国方面为了确保和扩大治安圈，必须首先能达到不需要日本联络员指导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自主和实力。中国人本身也必须有这种要求。

五、华北方面军秋、冬两季的 肃正作战与治安特别施策

8、9月份的敌情与治安恶化的原因 ——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一进入1943年夏季，可以看出，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加以战局的影响，部分民心发生动摇。8月份的敌情，主要是中共的情况如下：（“北特警第一期作战的战斗详报”）

一、概况

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开展政治攻势和游击战争，极力加强和培养抗战力量，倾注全力确立抗战体制。对新政权则继续揭露其不正行为，袭击、绑架其人员，并继续进行民众工作，同时，加紧破坏我方重要战争资源设施地区及交通、通讯线路等。对共动向，不可等闲视之。蒋系方面，由于与我方多次作战和中共的飞跃发展，

其势力被逐渐驱逐，但最近似正企图利用国际局势挽回势力。因此，蒋系的特务工作，尤其在主要城市中显得异常活跃。对此情况以及中共方面的动向，必须严加戒备。

二、冀东及平北地区

在冀东，中共自 8 月份以来，在发展中撤销了原冀热区分区委员会，新设冀热特别区党委员会。在其领导下设立了第一至第五地区党委员会，各地区的党委员会，一般担任四个联合县委的领导。

从上述情况可以判明，党的上层组织大体首先组成，但下层组织仍在改组扩大的过程中，成为冀东中共的一个弱点。

冀东的中共行政组织，8 月份撤销了原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设了冀热边区行政公署，并在其领导下设立了第一至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每个专署大致管辖、领导四个联合县政府。最近，进一步实行单一县制，改编为管辖五个县。

冀东地区的共军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领导的第十三军分区的部队，在其党、政从晋察冀边区分出而独立发展时，为了建立军区，正在稳步进行扩大，并企图新编团队，大力开展参军工作。根据冀东中共后方支援力量极其强大的特点，可以判断出，中共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采取的是所谓军政统治的形式。

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同盟仍与中共共同行动，专门在日本军、官、民中制造反战、厌战思想，但未发现有其它积极动向。

三、冀鲁及山东地区

今年夏季，在 6 月份发生的以邢仁甫为中心的中共党的内讧问题，尚未完全结束，南北两派干部仍然继续进行暗斗。同时可以看出，正在深入进行所谓敌伪工作，并准备反攻我方的据点。此外，其宣传谋略工作随着国际战局的变化日趋激烈。

山东中共的行政组织，于 9 月中旬撤销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重新组成新的战时行政委员会。各级行政机关断然实行政组，竭尽全力进行精兵简政及反攻准备等工作。整个山东地区积极进行救济难民、增产运动、构筑交通壕、武装群众等各项

工作。

冀鲁地区的共军，预料到我方必将进行冬季作战，于是，竭力动员党、政、军所属各机关进行集结，准备形成以动员民众武装为首要任务的统一抗战体制。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进行谋略的袭击及反正工作，对蒋系匪团进行瓦解工作，坚持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及反特工作，并加强培养其战斗力。

在渤海地区，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极其活跃，利用讲话和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尽力酿成皇军官兵的反战厌战思想，同时，对部分非同盟人员进行教育训练。

山东地区的蒋系势力，受中共势力的逐步压迫，向中国方面机关伪装归顺，力图保持、增强其战斗力，并进行招兵、整训、改编等工作。趁国际战局的变化，以响应蒋系主力军进驻山东地区的意图。

在渤海地区，国共局部冲突屡次发生。在两者之间，争夺地盘、策划捕杀干部以及兵力转移等工作极为频繁，其关系逐渐恶化。

四、冀中、冀西地区

党的各机关，加强保密工作，彻底贯彻除奸恐怖政策，严禁居民出入治安地区，努力修筑特殊地道，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继续积极进行反扫荡宣传，确保抗战物资、资材，破坏我方行政机构等，并策划加强和培养抗战力量。

各行政机关，随着党和军队的活动，积极开展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及刷新基层行政干部。各部队共同进行扩军整训，加强培育地方武装。在最近，以集团的兵力活动于铁路沿线及各县城周围地区，企图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夺取县城，频繁袭击皇军分屯队和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

五、太原周围地区

中共党与军、政、民结成一体，积极开展争取新政权人员的工作，袭击武装团体，企图扩大党的势力。

各行政机关健全和加强群众武装组织，彻底实施增产工作，

并大力开展对中国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反正、除奸、征税征粮、获取并保护抗战物资材料等工作，努力加强培养抗战力量。

蒋系势力仍以兵农合一的政策为基础，努力进行建军工作。

六、民心的动向

随着国际局势微妙的演变，中共对中国方面进行各种策动，特别是对中国方面的机关，继续进行袭击、绑架、反正工作，以及使之采取两面的立场，同时开展袭击县城、破坏交通通讯线路等各种谋略活动。另外，对破坏重要的战争资源地区及设施的策动渐趋激化，其手段也更加巧妙、恶毒，加以当地皇军部分撤出，使敌势力逐渐侵入。因此，各县保安队、警备队士气普遍沮丧，民众对新政权的信赖降低，部分民心发生动摇。

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夏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 (一) 随着整个战局的恶化，由于日军精锐兵团的抽出、转用，以及兵团的改编和新建，警备兵力的频繁换防和装备物资的减少、士兵素质下降、士气不振等因素，以致战斗力减退，从而使中国政府、民众在精神上产生了动摇和叛离。
- (二) 对此，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
- (三) 日本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未能得到

很好的调整，军、政、民、会四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施策产生了裂痕并开始分裂。对此，华北特别警备队作了如下的观察：

自1月份中同参战以来，我方实行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意见与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中国方面职员的服务态度愈益消极保守，其政治力量不能与我方作战密切配合，给敌方以进行活动的空隙。加之接近敌地区的民众，由于经济反封锁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其两面性色彩更加浓厚，以致我方的治安圈逐渐缩小。本年7月以来，华北政务委员会虽然加强了粮食收购和控制物价等统制经济，但因敌方的反宣传及民众的两面性，致使物价暴涨、各项经济措施停滞不前，民心浮动，一般民众向往敌政权，加深了叛离的倾向，敌方秘密组织乘此机会逐渐积极深入地活动起来。

（四）其它方面，当时的有关人员举出以下各点：对于包括国共斗争在内的三方混战的治安战，缺乏明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在应以民众同情为基础的治安战中，由于偏重武力、过多地实行扫荡剔抉，以致民心背离；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

进入1943年下半年，由于日军集结兵力、变更警备部署，因而治安地区相应缩小，即在准治安地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在讨伐上，用一个中队以下的兵力难以积极行动的地区，有日渐增多的趋势。

秋、冬两季的肃正作战

作战的意义与实施概况 华北方面军企图尽可能在秋季，经过长时期有组织的肃正作战，摧毁共军的根据地。这是根据派遣军在8月份制定的“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的

指示，修改了的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

方面军计划的肃正作战如下：

一、冀西方面（“才”号作战）

对冀西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以第六十三师团、第一一〇师团、步兵第六十三旅团（属第六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二十六师团的各主力部队，于9月16日以后进攻，以期将其歼灭。

二、冀南地区（武号作战）

对冀南地区的共军，主要以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于9月20日以后，实行急袭歼灭作战。

三、冀东方面

对冀东地区，特别是满、华国境地区的共军，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新成立的华北特别警备队给予协助），于9月16日以后，与关东军相策应进行扫荡。

四、山西方面

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于9月26日以后对晋西北地区的共军，以该军主力于10月2日以后对太岳军区的共军，分别进行扫荡作战。

9月1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了所属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参谋长会议，对此次肃正作战进行了全面指导，同时命令进行必要的准备。会上，冈村方面军司令官作了如下训示：（前文略）

当兹战局严重，我一亿国民决心振奋爱国激情，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之际，确信方面军官兵亦必不负所望。

随着战局的严重化，方面军唯有更加努力提高战斗力，保持灵活机动性，以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安定后方，为将来的巨大进展做好准备。然而，目前共军乘中国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

渐趋激烈。最近，其领导民众的势力竟有增大的倾向，对此深感遗憾。方面军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

为此，在战略上虽有精心策划的措施，但作为我军的目标，则可归纳为以下两大要点：

其一，树立必须使敌慑服的皇军威力；其二，树立牢固掌握民心的森严的皇军威容。即只有做到使敌人“真正恐惧日军”，使民众“真正信赖日军”方可。再看战局的要求，实际是“时间”二字，即以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大智大勇，满足今日此时的要求，方能有助于今后的大决战。全军必须在充满瘴气和酷暑的战场上，不分昼夜，不论是进行殊死战斗或是担任肃正工作，都应誓死贯彻此次作战所期之目的。

注：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如方面军所认识的那样，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对此要求则比过去更为迫切，而且军已从政务方面撤出手来，专心致力于军事。因此，华北治安战的政治目的淡薄了。总而言之，作战目的在于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肃正作战和警备的任务也都归结于此。这样，民生、民意的倾向如何，将不问可知，今后的治安战将会更加困难。方面军报道部长在讲话中虽曾要求“在此次作战中，要与治安军协同作战；由保安队、自卫队确保地方治安；行政机关、新民会开展政治活动，取得一般民众的协助”等等，但其实现确是大成问题。

肃正作战的要领是以彻底摧毁中共党、军、政的根据地为重点，特别是扫荡剔抉其地下组织，破坏其各种设施（弹药、被服、粮秣等仓库、工厂、银行、行政机关等），通过彻底运出敌地区内的物资，以期使敌人势力枯竭。（10月18日方面军参谋长的状况报告。）

1943年秋季冀西作战（“才”号作战）

（9月16日—12月10日）

作战经过概要 方面军根据以下作战设想，于9月2日

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方面军于9月16日以后，预定以约两个月的时间，攻击冀西地区共军的主力（第三、第四军分区），并摧毁其根据地。

二、第六十三师团（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在9月16日日落后，使一部挺进队开始突进，急袭满城及唐县西北的敌中枢地区，牵制敌人，并于适当时机将其击溃，以后努力搜索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17日拂晓，在保定设战斗司令所。

三、第一一〇师团（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在16日日落后，使一部挺进队开始突进，急袭灵寿西北的敌中枢地区，牵制敌人，并于适当时机将其击溃，以后努力搜索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22日在灵寿设战斗司令所。

四、甲兵团（步兵第六十三旅团长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17日夜从盂县附近开始行动，搜索东北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16日在盂县设战斗司令所。

五、乙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17日晨从五台附近开始行动，搜索东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16日在东冶镇设战斗司令所。

六、丙兵团（第二十六师团长指挥的六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17日夜从灵邱、涞源附近开始行动，搜索南部省境方面的敌人根据地，以期击溃敌人并摧毁其根据地。于16日在广灵（灵邱北约35公里）设战斗司令所。

方面军于16日夜，按照既定的设想开始进攻。正面的敌人，一部分（约四个团）向山西省西北部方面移动，其主力竭力回避战斗。因此，第一期（至9月底）的战果极小，仅

毙敌381人，俘虏177人。

各兵团随着作战的长期化，乘敌人困惫之际，积极追击或扫荡剔抉。另外，还尽力研究了反用敌人的游击战法，因而从10月2日开始的第二期作战、23日开始的第三期作战中，都收到了相当的战果。中共在作战初期相当活跃的游击战、地雷战、特别是对我后方治安的扰乱，也处于低落的状态，甚至有一部分丧失斗志，归顺投降者有所增加。在此期间，摧毁了阜平附近的敌军政中枢各机关，同时还挖掘出隐藏在神仙山附近的很多抗战物资。

第三期作战延长了约一个月，彻底进行了扫荡，于12月10日结束。敌遗尸4,300具，俘虏2,600人，除摧毁设施1,660处外，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资材、杂粮等。

共军方面的记录 共军方面对本作战以“晋察冀北岳地区3个月的‘反扫荡’”为题，记述如下：

1943年敌人对我解放区的“扫荡”，较之前年更为频繁，各解放区一年至少要遭到三次大规模的扫荡，最多者可达十数次。

仅晋察冀北岳区的一个地区，在这一年里就遭到十二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是从9月16日开始，到12月15日结束，达三个月之久。敌人使用4万余的兵力，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实行了“毁灭性扫荡”。但是，不管敌人实行任何“扫荡”，而我方早已有了充分粉碎敌人扫荡的办法和力量。

我军区在各阶段作战中，对敌人的阴谋实行针锋相对的策略予以打击。作战开始的第一阶段，敌人采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占据了我方中心区的各要地，并实行分散进击，对重点地区反复进行了“扫荡”、搜索和破坏。我军集中适当的兵力，对分散之敌加以打击，迫使共停止分散“扫荡”计划，不得不集中兵力与我

抗。

第二阶段，敌人以滹沱河流域的生产地区为目标，驻屯有力的兵力，企图掠夺我们的稻谷。我军在河的两岸不断袭击敌人，并以民兵配合大部队，夺回稻谷，更大力支援群众的突击收割，变稻田为战场，使敌人吃不到大米。

第三阶段，我方以急袭合击为主。由于我方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已不存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敌人得不到任何便宜。特别是军队，做到了各种斗争方式的互相结合，即军队与民众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反“扫荡”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斗争与其它斗争相结合，依靠这样的结合斗争，保证了反“扫荡”的胜利。

特别是我主力部队与广大地区的民兵，始终密切配合，实行勇猛而不间断的战斗。在这三个月中，军队作战2,093次，民兵作战2,192次，两者的协力作战，情况非常良好。9月24日，行唐以北的华园、联庄两处之敌，企图合击我芦家庄。我芦家庄等七个村庄的游击小组，在行唐二区民兵营的指挥下，担任打击从华园来犯之敌。他们潜伏在二十余里之间，布置地雷阵，从房上用土枪、手榴弹与五百余名敌人战斗了一天，敌人仅能前进一、二里地，使敌人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合击地点。另一方面，我主力部队迅速歼灭了从联庄来犯之敌，从而完全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在军区腹地激战之际，我外线部队深入敌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内积极的活动，相继攻入保定、望都、浑源等城市，摧毁敌碉堡200余处，炸毁列车12列，坦克3辆，汽车540余辆，铁桥13座，并填埋和摧毁了封锁沟100余里、封锁墙16里。同时，密切配合反“扫荡”，开展了政治攻势。武工队进入敌占区内，到处进行活动，在保定城内敌军司令部门前和各地伪政府门前，贴上了我们的大布告，更在敌占区及游击区内，召开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使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发生动摇。另外，在反“扫荡”胜利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秋收、秋种、征收公粮以及救灾

工作。这虽是以军事为主的极其复杂而严峻的斗争，但终于获得了胜利。

大“扫荡”被击退了，来犯的四万多敌人中生还者三万余人，而且丢弃了无数的装备。我们虽然遭到烧、杀、掠夺，但晋察冀边区的军民，是绝对不可“征服”的，就连不幸落入敌人虎口的同胞，在敌人残酷的拷问下也没有屈服的。（以上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参考一 讨伐的一般要则

一、讨伐作战的要诀，在于奇袭和急袭敌人，在战场上将其捕捉歼灭。对无抗战意志之敌，按一般原则实行大规模的包围，往往会使敌人从间隙中逃逸，或在我完成包围之前即行分散逃避，以至于一无所获。

二、奇袭成功的要诀，在于周密的准备，迅速而准确地收集情报，防止泄露我方意图，以及部队迅速而隐蔽的行动等。敌人为了避免我军的奇袭，不仅充分利用其周密的谍报组织侦察我方的企图，并经常在我进攻之前，破坏道路和桥梁。因此，在使用汽车等机动装备时，应预先准备携带必要的抢修材料。

三、具有旺盛的士气和必胜信念的部队，即便是小部队，也能勇于攻击而消灭敌大部队。与此相反，对陷于消极被动的军队，敌人利用其弱点，则大肆活动，从而使我小部队束手无策。因此，各部队必须经常保持旺盛勇敢的进攻意志，决不使敌蔑视我军的战斗力。

四、军队在初战时，如能给敌以彻底打击，不仅对提高士气有极大效果，而且更能使敌人畏惧，可使其行动完全陷于消极状态。

五、固定不变的战法，对谍报组织积极为完备的敌人，尤其是对共军，应严戒使用。必须不断进行研究，提出异乎寻常的卓越战法，并适应当时的情况，发挥机动灵活的作用。

六、军队对待民众特别要有严肃的军纪，使驻在地周围的民

众真正了解皇军。同时，当民众受到敌军袭击时，要给予保护，使之信赖皇军。此外，将作为游击战基础的民众，与敌军分离开，这样才能迅速恢复治安。特别是民众对军队增强了信赖时，对收集敌方情报，有极大方便。因此，每当收到当地居民有关敌情的报告时，就立即实行讨伐，使其深深感到只有依靠皇军，才能保障自家的安全。

七、讨伐肃正的目的，不在于确保地盘，而是以捕捉歼灭敌人为重点，更应注意到，单纯的遗体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而缴获武器的数目，才是真正战果的重要依据。

八、在警备上部署的军队，实行肃正讨伐时多以小部队进行奇袭、急袭、强袭或遭遇战，各部队要针对此种情形集中力量进行训练。讨伐时如能利用汽车进行奇袭、急袭，自然最好。但通常很难满足这种需要，所以军队要靠行军进行快速的奇袭和急袭。因此必须努力进行培养行军能力的训练。

九、实行讨伐作战的部队，虽然是小部队，但不应作为大部队内的一个战术单位那样去行动，而应该采取象一个独立的大部队那样的行动原则，要经常以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独到的创见，通过大胆果敢的行动，采取包围迂回、佯动牵制、奇袭急袭等一切手段，使敌人难以捉摸，无法应付。

十、平时警备部队的适当部署，实际上是实行讨伐的基本阵势。占领要地，不仅要直接摧毁敌军根据地，而且要以之作为搜索、谍报等的据点，以便进行敌情的侦察和机动的准备，从而作到神速的机动讨伐。与此相反，实行分散部署而不经常进行积极的肃正讨伐，则无任何意义，却有分散兵力之弊，以致遭到敌人的蔑视。机动讨伐是肃正讨伐的实体，分散部署是准备肃正讨伐的据点。因此，要特别注意军队展开的态势。

十一、为了使机动讨伐兵力增大，应该尽可能减少部署固定的守备兵力。为此，部队应选定适当的部署地点，即选择自然防御力大的地点，尽量集结兵力，做好防御设施，从而节省自卫困

兵力或一般警备兵力，此点极为重要。驻在地村庄的直接自卫，尽量使中国方面的自卫团、保安队等去担任。

参考二（引自《扫荡剔抉共军根据地的参考》一书）

一、敌潜伏方法及对之搜索要点 敌潜伏方法虽逐渐巧妙，但不断注意其细微的征兆和动向，同时通过对俘虏及居民适当的讯问，即可搜索到敌人。现将搜索敌人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一）敌干部、伪县政府要人等，一般避开市镇或交通方便的大村，带领少数部下，潜伏在偏僻的农户之中，通常选择村边的房舍。

（二）敌情报员、工作人员等都持有良民证，即便在皇军驻地附近，也多公然装成良民活动。

（三）武装匪团在同一地点，最多停留一天，在我方空隙中间流动，白天通常分散活动，预先定好集合时间、地点等，准时集合，夜间则采取部队行动。

（四）敌遭我军攻击、扫荡、搜索，断定不能逃走时，通常即扮成农民，携带农具就地假装劳动，如不能伪装时，便潜入房内、仓库、草堆、沟渠等，或躺在炕上装成病人。居民怕有后患，通常不敢告发。

（五）在我部队实行夜袭和拂晓奇袭时，应及时派出密探、斥候等，潜入村庄从高处了望，以便易于发现敌人，如发现村内有灯光和喧闹之处，多半是敌人潜伏的房屋。

（六）敌人往往收买或强迫良民，以加入其户籍。还有潜入自治机关，充当职员或勤杂工，甚至还有有的就任乡保长等职。

（七）在县公所、公安局、自卫团、庙、学校、旅馆、村落附近的地隙、谷底、穴洞、民船以及房屋内的顶棚、井内、夹道等，往往有敌人伪装民众潜伏其中。

二、敌根据地设施的位置及设备要领

（一）敌人在平素就有计划地使群众作好“空室清野”的准备，一旦侦知日军要进行扫荡时，便及时将武器、被服、粮秣等各种物资，以巧妙的方法急藏在极难发现的地方或运到偏僻

的地方，迅速实行“空室清野”，以此避免我方的扫荡剔抉。

敌人占据的地方，即兵营、训练所、学校、医院或各级司令部、行政公署以及其它有重要设施的村庄等，必定隐藏有武器、被服、粮秣、药材、日用品等。但隐藏地点很少在明显的建筑物内，一般是避开村庄，选在山麓、谷地等往来不便的孤立房屋，或有两、三间房舍的荒废小村，或在离开村庄一定距离的田地以及森林、洞穴等处。

但在村庄外的隐藏地点附近，通常都有比较明显的目标作为标记，另外，在其附近有孩子、老人或病人等进行监视。

(二) 敌人在战斗中发生死亡时，让民兵、民伕收回战死者的武器，于战斗结束后交还。如收回和携带武器逃走有困难时，便责成附近的村长及有势力的人代为隐藏。遭到日军突然攻击，不能分散化装逃走时，便依靠附近的自卫团，或送往特定的村庄隐藏。

三、敌根据地设施的侦察要领

(一) 敌人潜伏及隐藏的方法，要贯彻到每一士兵，使之彻底掌握。

(二) 为了审讯俘虏及居民，必须有多数的翻译和优秀的侦探同行，让他们直接讯问；在战场上的审讯，要通过巧妙适当的方法，迅速进行审讯，使其自行招供。在释放时可带到其它地区作适当处理。敌人和附近居民是息息相通的，敌人巧妙的藏匿地点，居民是必定知道的。

(三) 检查可疑的假坟或梯田边端等地点时，每人应携带铁通条（直径1厘米，长1米）。

(四) 妥善部署扫荡搜索，要无遗漏地按计划实行。为此，要编成搜索班（轻装），明确指示任务和目标，即便在行军当中亦应随时进行搜索。

扫荡、搜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不论有无敌情，应经常对周围严加警戒，禁止单独行动。过去对此放松警戒，因而遭到敌人袭击或遭到挂雷、地雷、手榴弹等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为数不少。

(2) 对指定的村庄攻击后，是否立即实行扫荡搜索，要根据情况而定。但在攻击村庄时，首先应尽量搜捕俘虏或找出村庄内有权势的人，要指导宣抚怀柔等工作，设法使村民能自动前来报告隐藏地点。

(3) 攻击村庄后，将残留的村民全体集合在一处，首先进行服装检查，找出有权势的人物。然后根据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扫荡搜索。此时要让集合的村民在原地不动，仅携带提供情报的人到现场进行搜索。搜索时与保安队等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合作最为有利。另外，冲入村庄进行扫荡搜索时，一定要对屋内残留的村民（特别是男人），进行严密的服装检查，然后再行搜索。

(4) 利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协助，发挥其敏感性，效果极大，但不应使其单独行动。如无日军监视，往往会发生抢掠行为，这样会损害与扫荡有密切关系的宣抚、政治、经济工作。

(五) 为了发现隐藏的地点，除进行周密细致的搜索外，运用所谓第六感也很重要。（利用各种征兆的实例，笔者从略。）

四、民匪分离的要领

扎根于群众、善于掌握民心的共军，与一般民众很难辨别，尤其在敌人根据地内更为困难。现将以前实行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手段介绍如下：

(一) 长期有规律的生活是不易改掉的。因此，突然或连续使之操练军队的各种动作，就能区别出是否是军人。例如：

(1) 集合民众，连续进行“立正”、“稍息”动作，或在谈话和休息时，出其不意发出口令，根据其瞬间的动作，便可判明是一般群众还是共军。

(2) 凡是听到别人讲话，就马上起立或有站立习惯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士兵。

(3) 早晨突然吹起共军的起床号，根据其反应可以识破。

(二) 实行身体检查，根据其肌肉发达状况可以辨别。例如，共产党员的肌肉是平均发达的；而士兵则肩上有扛枪的鬃子，脚上也有鬃子；农民的腕部、挑担行商的肩部特别发达。

还有根据日晒程度来识别，即农民通常赤膊劳动，日晒较为严重，党员和士兵比农民皮肤稍白，尤其是脖子，日晒部分和无日晒部分区别很明显。然而，最近共党的工作人员与农民共同从事劳动，所以也经常日晒，手掌也有老茧，应加注意。

(三) 根据审讯及简单的谈话得以辨别。

(1) 讯问出生年月日，回答“公历某年”而不说民国年月日者，多数是党员。

(2) 党员对党外事项能够答辨，但转问有关党的事项时，则默不作声者居多。另外，讯问是否为党员时，党员多显示出兴奋态度，并强调不是党员的理由。

(3) 利用审讯、谈话等机会，给以纸烟和其它物品，试验其对物资的“共有观念”，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如给纸烟，往往分给他人，并且在吃饭时，有先让别人自己不争先的优点。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观念淡薄，有的向审讯官等人，不客气地索要纸烟。

(四) 根据检查服装的辨别方法

(1) 化装便衣人员的服装，不合身的居多，有的穿用一般农民所不穿用的袜子，还有的仅上身是便衣，而下身还是军用的等不谐调现象。

(2) 穿着便衣的人员，多数衣服不合体，也有脏的地方与一般群众的不同。另外，衣服上往往沾有不是当地的土。

(3) 被服一般为上等品，并且清洁，衣襟上的纽绊较多。

(五) 根据携带物品的辨别方法

(1) 仅靠良民证是不可完全相信的，特别是在敌地区内，敌人平时都有所准备，有良民证的反而多是可疑的人。可用放大镜检查其指纹，中国人一般不关心指纹的重要性，故借此可以辨明。

(2) 敌人尤其是工作人员，携带有自行车。

(3) 一般携带金钱较多，另外还携带有仁丹、牙粉等。

(六) 其它

(1) 在拘留所及其它俘虏收容所等地，安插自己人与新来的

匪民同住，秘密侦察其状况，是查出党员的有效方法。

(2) 在匪民混淆之中，频繁窥视审讯者的脸色，或偷看其眼光者，是党员的征兆。

(3) 打听儿童，辨明是否真正村民，或是某人的亲戚。可疑者如称某人为熟人时，可将可疑者和其熟人分开，个别讯问双方家属的情况，进行对证。

(4) 党员中有表示特别亲日态度的和表现恐怖的。

第一军的秋季肃正作战 第一军以主力在太岳军区，以一部在晋西北军区，分别进行了扫荡剔抉作战。

1943年秋季晋西北地区肃正作战（9月26日——11月上旬）第一军对盘据在兴县、岚县、临县附近的共军，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主力从宁武、崞县地区，以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从汾阳、离石道方面，进行了夹击作战的部署。该两部队于9月26日开始攻击。至11月上旬，扫荡了兴县附近及黄河沿岸的晋西北根据地一带，战果虽然不大，但切断了中共延安根据地通往华北、蒙疆地区的连络线，对其威胁是相当大的。

1943年秋季太岳地区肃正作战（“三”号作战）（10月2日——12月10日）第一军为了肃正以沁河流域为根据地、逐渐向中条山脉地区扩展势力的太岳军区的共军，以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六十九师团进行了作战。作战设想为从10月上旬起，以两个月的期间，分四期进行。第一期为构成包围圈（封锁线）；第二期为扫荡浮山（临汾东部约30公里）—长子（潞安西部约30公里）线的南北地区；第三期为扫荡翼城、沁水、端民镇、高平线以南及绛县、阳城、泽州线以北地区；第四期为扫荡至南部省境之间的敌人。

10月2日第三十七师团从运城地区向东，第六十九师团从临汾、霍县地区向东南，第六十二师团从长子、沁县地区向西南分别前进，构成包围圈。其后各兵团以一部，一面随时阻止敌人逃逸，一面以缓慢的速度逐渐南下，采取消灭敌人抗战力量的新战法——车轮战术，将敌人根据地全部摧毁。

第一军将战斗司令所向临汾推进，致力于没收敌军需物资和破坏根据地设施。

通过此次作战，使共军的活动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潮。

此外，与阎锡山交涉结果，使山西军三个师，移驻于日军肃正过的浮山、沁水、翼城地区（至1944年春，山西军移驻该地。此时，对伯工作随着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决定，在新的部分合作方式下，采取措施进行活动）。

冀东地区的秋、冬季肃正作战 冀东地区随着第二十七师团的转调满洲，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于1943年7月上旬从顺德地区移防，司令部设于唐山，各独立步兵大队分别部署在迁安、抚宁、遵化、丰润、滦县。下旬，接替了警备任务。（9月7日由竹内安寺少将为旅团长，代替了吉田峰太郎少将。）

旅团根据方面军的指示，9月16日以后，与关东军相呼应，开始对满华国境方面进行扫荡，同时为了讨伐在管区内活动的敌人，逐渐与华北特别警备队主力做好协力讨伐的准备，旅团已成为机动的讨伐部队。

10月中旬，旅团主力集中于喜峰口南部地区（滦河流域的长城线地区），与关东军及中国方面的治安军互相协力，

对该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继而对京山路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从12月上旬起至年底，与第六十三师团共同在热河省境方面继续进行了讨伐。

在此次肃正作战中，由于搜索敌部队困难，因而尽力摧毁其根据地设施及缴获其武器、资材。

另一方面担任津海道地区警备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与上述肃正作战相呼应，11月进行了“秋季十一号作战”，12月进行了“冬季十一号作战”，以期肃清管内之敌。

根据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判断：“冀东共军，自从1942年的一号作战以来，通过不断进行肃正剔抉，使其积极的游击行动变为消沉，但其地下活动却活跃起来。其对群众的工作及对中国方面行政机关和武装团体的工作，反而更有了进展。”

1944年初冀东剿共战的状况如下：

一进入1944年，中共方面以鲁家峪（遵化南25公里）山区根据地及丰、玉、宁（丰润、玉田、宁河）伪县政府地区的平原游击战为中心，继续展开积极活动。因此，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了粉碎敌人夺回遵化平原的企图，并击破丰、玉、宁地区敌武装力量和党政组织，从2月13日起至4月5日止，进行了冬季肃正作战。在此次作战中，击毙中共方面县长及主要干部，并破坏其组织，此后，敌游击活动暂趋平静。

1943年秋季鲁中作战（勇一号作战）（11月10日——12月9日）第十二军以摧毁张店南部山岳地带的共军山东军区司令王建安指挥下的第一、第二旅（旧山东纵队）及鲁中军分区（兵力约一万三千人）根据地为目的，11月10日开始作战。参加兵力以第三十二师团的五个大队，第五十九师团

的两个大队，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两个大队为基干。各部队以分进合击方式，在各地反复进行包围，但由于是山岳地带，难以捕捉敌人，摧毁其根据地设施后，于12月9日结束作战。在此次剿共作战中，对潜伏于沂蒙山（沂县西北约60公里）山寨的少数共军，使用了所有手段企图歼灭和招降，但敌人并不理睬，一直抵抗到底。

关于此次作战，中共方面的记述如下：

1943年内，敌人在山东全区所实行的“扫荡”达50次以上，在秋冬之间的一次，特别激烈。从11月初起，敌寇出动山东的全部兵力和大部分伪军，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对我山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但是，由于我军主力和民兵的奋战，敌人的大扫荡计划终被粉碎。山东军民进行此次反“扫荡”，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计划得周密和主动。通过军民的团结、战士的勇敢作战以及战术的巧妙，取得了辉煌战果，杀伤和俘虏山东伪军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夺回了相当于敌伪据点总数二十五分之一的城市和村庄。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沂蒙山的防卫战，敌人对该根据地的攻击相当激烈，在敌第十二军统率下，由石井第三十二师团长亲自指挥部队，并以炮兵队、航空中队、伪军团等协助，疯狂地进行攻击。然而，八路军官兵仅以少数的兵力固守达20天之久，充分发挥了英雄主义精神。使敌饱受痛苦后，我军踏过满山遍野的敌尸，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治安特别措施

中国方面的华北新建设运动

促进华北新建设 中国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日军的秋季肃正作战相呼应，极力推进治安建设。

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就任委员长后，于8月8日召开了首次华北省市市长会议，对于“华北新建设运动”进行了协商，通过了如下的“促进华北新建设指导纲要”的决议。

方针

一、阐明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真意，使全体国民彻底认识和理解，以新的热情尽到职责，从而完成华北的新建设。

二、政府加强粮食的收集、运输、分配等重要工作，保证民食，使华北建设工作全面的顺利进展。

三、运动实施日期，定为从8月9日起至10月30日止，华北政务委员会负指导监督的全部责任，各省市市长以下各级机关，要与日本军、官、民紧密联系，不讲空话，努力实践，在指导民众时，必须与唯一的国民组织新民会密切合作。

实施要领

贯彻政府粮食政策时，对于接近敌人的地区，在收获期要防止敌人的扰乱，并阻止粮食流入敌地区。

一、对政府的粮食统制，鉴于一般农民的无知，可能发生种种误解。要将其价格的决定，物资的配给，充分向农民解释清楚。

二、合作社、采运社两个收购团体，要充分协作，各地官厅应监督指导收购工作。

三、严格遵守公定的收买和贩卖价格，对囤积居奇，暴利出售等经济扰乱行为，要严加惩处。

四、鉴于各地常有不良官吏、警察、乡村保甲长等，在中间剥削民众，对此，要坚决予以处置。

五、产粮区的小麦，各地方长官应负责完成规定的缴纳数量，根据成绩的优劣，实行赏罚。

新民会的活动 新民会于8月9日召开大会，支持政府上述决议，同时开始了运动。特别是为使该会领导下的社

会、宗教、文化、思想等21个团体紧密团结，以促进新华北的建设，进行了准备工作。不久，声势逐渐高涨，9月9日成立了“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该组织总部设于北平，各地方均设支部，各民众团体均设反共工作团，专门从事秘密的反共活动——译注）。新民会更从12月26日起以五天时间召开了全体联合协议会，关于今后的运动方针，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运动方针

一、新民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对内通过新国民运动的实践，完成国民组织，对外以大亚细亚主义为目标，谋求东亚民族的团结。

二、将重点置于教民、保民、养民的措施上，促进确立民众的自治、自卫、自给，以发挥国民的全部力量。

三、在对共斗争上，集中军、政、官、民的全力，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以武力对武力，以图彻底根绝赤祸。

四、粮食问题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要积极开展增产救民运动，协助政府执行粮食政策，努力贯彻农业增产和低物价政策。对囤积居奇，黑市买卖等不法行为，要坚决给以打击。唤起农民增产热情，以求提高生产能力。

五、作为国民组织基础的分会运动，要努力加强其组织，充实丰富其实际的内容，以求得国民组织的统一。

六、将青少年运动，向城市及农村各阶层进一步贯彻下去。

此外，山西省政府于10月22日组成“山西省急进建设团”，也叫做“产业建设军”，以此克服劳动力不足、确保粮食和获得资材等方面的困难，期望能大量增加生产，同时也注意到中国青年阶层的身心锻炼。规定17至40岁的男人均有服务的义务，被选拔的常备队员，服务期间为三年，预备

队员在必要时动员他们从事重要物资的增产和获得工作。

设剿共重点地区——直辖行政区 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剿共体制，于1943年秋首先选定北京以南淮治安区的要地霸县、永清、安次（以上属津海道）及固安（燕京道）等四县为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万），以原山东省沂州道尹曹若山为行政公署主任，公署设于永清县城。华北方面军应政务委员会的请求，于10月上旬特命担任警备的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富昌德中将）对该地区进行清剿及幕后指导，并监督指挥参加清剿的治安军。11月8日师团下达了剿共命令，23、24日以步兵第六十七旅团为主一齐出动，解除了各不良团体的武装。

随着地区内行政措施的贯彻，民众加强了团结，中共方面的游击队及特工人员难以活动，治安得到改善，已不需要在外围警备的日军的军事援助了。地区内的生产、税收等均逐渐取得成绩，至1944年6月左右人口约增加20万人。

与此同时，华北政务委员会计划在冀东道（辖11县，面积约二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约四百五十万）设直辖行政区。但因本地区共军势力非常强大，不能施行民政，乃由治安军采取军政方式，于1944年7月于唐山建立行政区公署，以姜凤飞中将为行政公署主任兼冀东绥靖公署主任。在日军支援下，治安军以十个团分别部署于各县，期以军政统一的战时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工作。然而，本地区治安情况恶劣，讨伐作战全无宁日，行政机关及民众组织一如既往未见刷新。结果，对民众采取的措施终于未能贯彻执行。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建立及初期作战

编成的经过 1943年9月，在华北编成了以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为主要任务、具有特殊专门能力的部队“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下简称北特警）。1944年6月又行改编，增加了兵力。至战争结束时为止，北特警一直积极进行着对共作战，其成果虽功过各半，但在战争末期的剿共作战中，认为是有特别存在必要的。

1943年8月24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八十一号，下达了改变华北派遣宪兵队的编制及组织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命令，北特警于9月20日编成。

华北宪兵队原来总人数约为2,600人，由队司令部及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开封、临汾、太原、石门、张家口九个宪兵队和教习队所组成。经此次改编，压缩为总数约970人的北京、济南、太原、张家口四个宪兵队。

继而于10月12日根据大陆命第八六二号将“北特警”编入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并下达了“在华北方面对敌人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进行侦察、摧毁等秘密战斗”的基本任务。

据此，华北方面军布置：“北特警与当地兵团协力，以主力在冀东地区附近，以有力的一部在河北省北部（冀东地区除外），另以一部在河北省周围要地及重要国防资源设施地区和主要城市，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同时并应准备以后对其它地区的作战。”

北特警编成装备的概要 在编制上的特点是拥有单独的

对共调查班、科学侦探班、特别侦探队及临时特别情报队等特殊部队，并具有进行剔抉及小规模游击战的机能。

司令部及各大队本部，为了综合复杂多端的各种业务，实行强有力的统制，因而配备多数人员，主要职位由宪兵科军官及下士官（班长）担任。

北特警各大队、中队可以分开使用，各中队都具备实行侦察剔抉的机能。

装备除特殊器材、通讯器材外，以自卫及轻便武器为主，具有游击战斗能力。

中共的秘密战法 北特警司令部于作战开始时，对中共方面的秘密战法，曾作如下观察：

1943年度，中共的战略方针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加强抗日游击战的群众化”及“广泛开展民主运动和生产运动”两点。

一、中共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重视政治攻势而不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1943年初，北方分局所发表的关于1943年度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五项工作：（一）普遍加强群众性的游击战；（二）实现民主政治；（三）继续开展并彻底贯彻群众运动；（四）加强群众教育；（五）政治攻势的经常化，此外在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关于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提出了包括以下十项政策的方针：（一）加强对敌斗争；（二）彻底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实行三三制；（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以上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二、中共抗日战争的战术特点。

（一）军事

（1）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

工作重点在于广泛开展群众的组织工作，并提高其质量；加强正规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游击战能力；经常进行群众备战教育，加强以民兵及一般群众为基础的游击战，特别要加强游击战的群众化。以军事从属于政治任务为原则，军事行动要与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及地方党、政、民密切联系，要在他们的协助下为当地群众利益进行活动，强调避免单独行动。

(2) 游击战的统一领导指挥

由于采取分散游动的方式，难以做到全面统一指挥，为此，除一般战略事项外，游击战以县为单位实行统一指挥。此外，在机构上采取县长兼大队长、县武装科长兼副大队长的方法，在党的（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游击战。

(3) 彻底实行精兵简政

从前年开始实行的精兵简政，虽大致完成，但还不够彻底，现正进行下级机关的整顿。由于实行精兵简政而多余的人员，随着游击战的地方化，需要加强基层干部的力量，将他们派往重点地区，担任基层干部。

(4) 游击战术的巧妙化

除设法提高游击战的一般战术能力外，特别重视对孤立的保安队、绥靖军等华方武装团体进行各个击破；以连为单位机动运用少数兵力实行分散的游击战；广泛开展地道战；大力进行破坏道路、桥梁、通讯线路的交通战；加强依靠民兵及群众的谍报组织；开展有民兵配合的夜间袭击；地雷战的群众化；加强封锁政策等等，使游击战术逐渐走向巧妙化。（以下译略）

进驻警备区 9月20日，北特警组织完成，同时下达了特警作命第一号命令，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大意如下：

第一大队主要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协力，担任侦察剔抉滦河以西铁南（北宁铁路南侧）地区的敌人秘密组织及其活动。以军队划分而组成的第一至第五特别侦谍队，分别在北京、天津两特

别市及开滦、井陘、枣庄各煤矿展开活动，侦察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第二至第五大队，在天津进行教育训练，准备以后的作战。

据此，第一大队及第一至第五特别侦探队，在9月中旬各自进驻指定地区，确立了侦察的基础。后于10月上旬发现以收集情报为主的敌有力部队，以冀东东部地区为中心，对冀东、京津、满洲各地积极展开秘密活动。为此，乃于10月4日新编成了第六特别侦探队，部署在山海关，使之侦察上述敌人的行动，掌握其全面情况。

在天津的第二至第五大队，从9月22日起，经过一个月必要的作战教育训练，做好作战准备。在此期间，北特警司令官为了提高中队长以及主要负责人剿共特务战的能力，进行了干部集中教育。这项教育的重点，则是掌握中共党政军的实际情况和剿共作战的规范，加强团结和纪律（特别注意对民众的军纪，监督当地雇用人员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避免妨碍中国方面行政等情况），以及侦察剔抉战斗的要领等。对一般队员，全都进行华语教育，并通过演习进行术科训练、盘查检查、化装、尾随、暗中监视、剔抉行动、甄别匪民、搜查审问、听取谍报、小规模战斗等方面的教育。

10月15日，在上述工作准备完毕之前，根据10月12日方面军的命令，对下列各部队下达了任务。

一、第一大队配合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作战，先以1943年底为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二、第二大队（缺第四、第五中队）以1944年4月为期，先将重点指向盐山、乐陵各县，与第十二军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配

合，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分别以临清县及博兴县为中心，收集该地方的情报，并且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山东分局的情报。

三、第三大队配合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暂以1943年12月底为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四、第四大队以1944年4月为期，先将重点指向安国、饶阳、无极附近，与第一一〇师团及第六十三师团配合，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以南宫县为中心，收集该地方及拒马河以南石门以北的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情报，并且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北方局的情报。

五、第五大队以1944年4月为期，将重点指向藁县、平谷、三河附近，配合第六十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同时在怀来附近部署约一个中队，在宣化附近部署约一个分队。在此期间，收集拒马河以北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情报。

六、第二大队第四中队以1944年4月为期，将重点指向固安附近，配合当地有关部队，侦察摧毁敌人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七、第二大队第五中队以1944年4月为期，将主力置于太原附近地区，与第一军配合，各以一部侦察摧毁敌人在阳泉、汾阳附近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并迅速准备收集有关太原分局的情报。

华北特别警备队宣传实施计划（节译）

第四、实施宣传的手段

十四、要重视具体的宣传内容和形式。

十五、不公开的方法。

（一）建立秘密宣传组织

（二）由秘密宣传员煽动民众和个人

（三）由秘密宣传员传递信件或散发宣传品

十六、公开方法

（一）免费医疗

华北特别警备队收集情报的实施要领表

(1943年10月15日华北特别警备司令部)

(表中“伪”字均指抗日民主政府——译注)

部队名	区 别 地区	情报 收集 地区	应收集情报内容概要				为了以后 作战应收 集的情报
			一般情报收集项目	时期	各地区的特殊情 报收集项目概要	时期	
第 一 大 队	冀 东 东 部	一、 命 令 担 任 地 区 及 其 附 近 地 区	<p>一、党</p> <p>1. 党的领导系统、组织及中枢机关的所在地及其活动情况</p> <p>2. 党的动向及其现在和将来的企图。</p> <p>3. 有关政治攻势的事项</p> <p>4. 有关谍报、宣传、谋略机关等事项。</p> <p>5. 对民众宣传事项</p> <p>6. 有关对特别警备队的对抗战略事项</p> <p>二、军</p> <p>1. 有关军的组织、装备、战法动向等事项</p> <p>2. 有关军的活动状况</p> <p>3. 有关军的盘据地区及游动</p>	进驻担任地区以后立即开始行动	<p>一、下列各县伪县政府及县委的组织、编制、企图、动向、活动状况。</p> <p>滦芦、昌乐、边芦抚昌、青抚临绥凌</p> <p>二、临榆县内的中共领导关系的状况</p> <p>三、中共对冀东特别是铁南地区的企图、动向</p> <p>四、随着冀热边区行署的成立，其党、政、军组织的改编情况</p> <p>五、铁南独立营和铁南工作团的关系及其各种动向</p> <p>六、对开滦地区及铁道的企图及</p>	进驻担任地区以后立即开始行动	

续表

第二大队	路线状况 4. 军的补给、设施、补充、教育、训练等事项 5. 军区建设状况 6. 有关对特别警备队的对抗战略事项 三、政 1. 行政组织、区划及行政机关的所在地的事项 2. 有关行政事项 A. 基层行政事项 B. 经济行政事项 C. 警察事项 D. 税制事项 E. 货币、金融事项 F. 土地政策 G. 文教及文化事项 H. 宗教事项 I. 卫生事项	工作现状 七、滦河的作用及利用状况 八、海上通路（包括基地的状况）的情况 九、滦河以东地区中共的企图和动向 十、对满工作状况 一、下列各县伪县政府及其县委的组织、企图、动向、活动状况：庆云、盐山、乐陵、靖远、沧县、禹县、宁津、振华及其他伪县政府及其县委 二、冀鲁边区的内讧状况及随之而来的中共对策 三、对津浦路及天津的企图及工作情况 四、国共矛盾（合作）状况 五、海上通路（包含基地）的状况	进驻担任地区后，根据情况在适当时机进行	山东分局 实施	迅速着手组成情报网	另行计划	考虑担任地区的程度及一般情况进行收集情报
					以临清县、博兴县为中心的地区		

部队名	区 别 地区	情报 收集 地区	应收集情报内容概要				为了以后作战应收集的情报
			一般情报 收集项目	时期	各地区的特殊情 报收集项目概要	时期	
第二大队第五中队	晋 西 北		1. 交通通信 事项 2. 有关简 政事项 3. 民众团 体、组织领导及 其活动状况 4. 人民武 装事项		六、北部冀 鲁边区的党政军 的编制及其活动 状况 七、以临清县、 博兴县为中心的 地方，中共的秘密 组织及其活动 状况		
		1. 作 命担 任地 区及 其周 围地 区 2. 阳 泉附 近 3. 汾 阳附 近	5. 行政渗 透程度 6. 有关对 民众宣传事项 7. 有关对 特别警备队的对 抗战略事项 四、经济 1. 经济的 一般方针及其特点 2. 经济机关 活动的状况 3. 经济建设 尤其有关产业措 施的状况 4. 各地区的 农业生产及其上 市情况 5. 经济运输 通道情况 6. 有关劳动	同 上	一、下列各 县伪县政府及其 县委的组织、企 图、动向、活动 状况等 榆太、清太 徐、以及阳曲西 部、榆次东部的伪 县政府及其县委 二、阳泉附 近、汾阳附近的 敌人的秘密组织 及其活动状况 三、太原市 及其附近的中共 的企图及其工作 状况 四、对同蒲 路及石太路的企 图、工作现状。 五、国共不	同 上	准 备 太原分局 迅速着手构成 情报网 实 施 另 行 计 划

续表

<p>第二大队第四中队</p>	<p>冀中北部</p>	<p>1. 命令担任地区及其附近地区</p>	<p>力及运输力的情况</p> <p>7. 与我方交易的关系</p> <p>五、治安</p> <p>1. 民心动向</p> <p>A. 对我政策的动向</p> <p>B. 对敌方政策的动向</p> <p>C. 对中国机关的动向</p> <p>2. 中国方面行政渗透的程度</p> <p>3. 中国方面行政机关二重性的状况</p> <p>六、兵要地志（有关行政事项是指中国方面）</p> <p>1. 有关人口分布状况</p> <p>2. 天气、气象、地形的特点</p>	<p>同上</p>	<p>盾（合作）情况</p> <p>一、下列各县伪县政府及其县委的组织、企图、动向、活动状况；</p> <p>第二联合伪县政府及其县委</p> <p>第三</p> <p>第四</p> <p>二、中共对北京及天津的企图及工作现状</p> <p>三、与冀东联络路线及其现状</p> <p>四、对京山线的企图、工作状况</p> <p>五、中共对担任地区内的模范地区建设的直接妨碍状况</p>	<p>同上</p>	
<p>第三大队</p>	<p>冀东西部</p>	<p>同上</p>	<p>3. 交通、通信事项</p> <p>4. 有关各地方的局地特性</p> <p>5. 行政区划事项</p> <p>6. 有关政策及其执行情况</p>	<p>进驻担任地区后迅速施行</p>	<p>一、下列各县伪县政府及其县委的组织、编制、企图、动向、活动状况；</p> <p>丰玉宁、丰玉滦、丰玉遵</p> <p>二、丰润、玉田、遵化的各县境附</p>	<p>进驻担任地区后迅速施行</p>	

部队名	地区	情报 收集 地区	应收集情报内容概要			为了以后作战应收集的 情报	
			一般情报收集 项 目	时 期	各地区的特殊情 报收集项目概要	时 期	
			7. 有关经济 事项 8. 有关财政、 税制事项 9. 有关保安 队、警察司法事 项 10. 有关宗教 结社事项 11. 有关文教 事项 12. 有关宗教 事项 13. 有关宣传 事项 14. 有关官吏 腐败状况 15. 有关卫 生、防疫事项 七、其它 1. 蒋系秘密 活动的状况 2. 国共合作 矛盾状况		近敌人游击队根 据地的状况及以 此为基础对遵 化、玉田县（包 括蓟县）的企图 与工作的情况 三、随着冀热边 区行政公署的成 立，其党政军的 组织及其改编状 况 四、滦河的作用 及其利用的方法 五、滦河上游和 长河的三角洲地 带的根据地建设 状况 六、对开滦地区 及铁路的企图及 工作现状 七、对满工作状 况		
		1. 命 令担 任地			一、下列各县 伪县政府及其 县委的组织、编		北准 方备 迅速着 手组成 情报网

续表

另计划 实施	分局				
考虑担 任地区 内的情 报收集 程度及 状况， 进行收 集	拒马河以南石门以北的京汉线两侧地区	进驻担任地区以后，根据情况在适当时机进行	<p>制、企图、动向、活动的状况：定南县委、安国、博野、深泽、安平、深晋极、饶阳、深北及其它伪县政府及其县委</p> <p>一、与冀西地区的关系（特别是联络、交通等）</p> <p>二、与冀西地区的关系（特别是联络、交通等）</p> <p>三、漳沱河、唐河流域的根据地情况</p> <p>四、对石门、保定的企图及其工作情况</p> <p>五、对京汉路的企图及其工作情况</p> <p>六、拒马河以南石门以北，在京汉路两侧地区的中共的秘密组织及其活动状况</p> <p>七、以南宫县为中心的地方，中共秘密组织及其活动</p>	<p>及其周地区</p> <p>2. 拒马河以南石门以北的京汉路两侧地区</p> <p>3. 以南宫县为中心的地区</p>	<p>冀中南</p> <p>第四大队</p>

续表

部队名	地区	情报收集地区	应收集情报内容概要				为了以后作战应收集的情报
			一般情报收集项目	时期	各地区的特殊情报收集项目概要	时期	
第五大队	平北	1. 命令担任地区及其周围地区 2. 拒马河北的京汉路西侧地区		同上	一、下列各县伪县政府及其县委的组织、编制、企图、动向、活动状况：蓟宝三、平三、香武宝、昌延、房宛昌、房涿 二、随着冀热边区行政公署的成立，中共党、政、军的改编状况 三、与冀东中共的关系 四、中共对蓟县地区的企图及工作现状 五、对北京及京占路的企图及工作现状 六、拒马河以北、京汉路两侧地区中共的秘密组织及活动状况 七、与冀中北部的联络、企图及	同上	拒马河北的京汉线两侧地区 同上

续表

				其活动状况 八、有关对满、蒙的工作状况		
第五大队的一部	察南	命令担任地区及周围地区		同上	同上	同上

备注

一、“各地区的特殊情报收集主要项目概要”的栏中记载的伪县政府及其县委名称，是指县内中共组织的中枢机关，对县政府及县以上的机关也都是收集情况的对象。

二、本表根据情况将有所变更。

华北特别警备队对共调查实施计划

(1943年10月15日华北特别警备司令部)

调查方针	<p>1、调查中共党政军民的组织及其活动的状态，探明其弱点及特点，同时观察其将来的动向。</p> <p>2、收集研究大队及特别侦谍队的剿共战斗的实际情况。以此提高剿共秘密作战的技能。</p>						
	<p>调查担任地区</p>						
	部队别	地区别	调查期间	编组	调查方法	报告	
调查要领	司令部	华北全部	第一期 (基础调查) 自1943年10月28日至1943年12月底	第二期 (地区的特) 自1944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底	各大队对共调查研究根据必要司令部或地兵团共调查班的援助	1. 重点放在对中的研究、调查当情顺序按规定的进度	每次调查情报记录，于一项完了后，逐次进行汇总报告
	第一、第二大队	冀东地区					
	第三大队	冀鲁晋西北地区					
	第四大队	冀中冀西地区					
	第五大队	平西平北地区					
	特别侦谍队	工业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	但期间仅表示作业内容的顺序				
调查纲要	司令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观察中共全部动向 2. 收集指导大队作战的必要资料 3. 收集指导以后作战的必要资料 4. 研究各地区的特性，并适应各种情况的剿共对策 5. 研究有关剿共的综合对策 				
	大队	的影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调查担任地区内中共的具体情况 2. 为便于侦察剔抉并提高其效果进行调查 3. 调查通过作战后该地区中共的变化及给予邻接地区的影响 4. 收集整理指导中队作战所需资料 5. 观察担任地区内中共的全部动向 				
	特别侦谍队	志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调查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中共组织活动的实际状况 2. 调查中共适应我方治安地区工作特点的外围伪装组织的实际状况 				

一、大队共同主要调查项目

调查要目	调查项目	调查(收集)细目
军	1. 组成、装备	1. 野战军、地方武装的总兵力、组织、编组、装备、游击据点、游击路线的状况 2. 民众武装的总兵力、组织、组成、装备、活动状况,但在民众武装方面各项情况有强弱之差,应按县分别详记
	2. 补充、补给	1. 上列武装的武器、弹药、食粮、器材的供应情况 2. 兵员、募兵、补充的实际情况 3. 实行义务兵的实际情况
	3. 后方机关设施	1. 后方机关设施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内部组织机构、经营、机能的实际情况 2. 军区状况 3. 交通、通讯状况
	4. 法令、制度	1. 有关军事的重要法令指令 2. 其它有关的军事重要文献
事	5. 军纪、团结、士气	1. 军内党的组织状况、党员的百分比 2. 军内党员和非党员的比率(军内党员和官兵的关系及其比率) 3. 军事部和政治部的关系 4. 地方武装与野战军以及民兵的关系 5. 抗战意志、军纪、团结的状况 6. 与民众团结的关系 7. 老八路与新八路之间的比率及其关系 8. 旧杂牌八路与纯八路的关系 9. 敌工部的活动及实际情况
	6. 教育	1. 教育机关的种类及其内容 2. 学校以外的教育训练状况
党	1. 党组织	1. 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人名 2. 党的各级领导系统及其领导管区 3. 县级以上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史 4. 党组织的要点(治安、准治安、未治安区要分开)

调查 要目	调查项目	调查(收集)细目
	2. 党员	1. 党员数量(各级党组织分开)与民众的百分比 2. 党员的级别、年龄、学历、性别、及地区(治安、准治安、未治安地区)分开统计的情况 3. 党员入党的办法(级别分开) 4. 党员的生活实际情况(干部党员与一般党员分别说明)
	3. 党的活动实际情况	1. 以地委、县委、区委为标准 (1) 组织宣传工作的状况 (2) 地方抗战组织领导的状况 (3) 民众组织的领导状况 (4) 上级机关的监督、领导状况 2. 党务会议的实施状况 3. 上级党与下级党的通信联络的手段方法 4. 党的行政机关领导的方法 5. 点线工作的状况 6. 对我方实行两面工作的实际情况
	4. 重要政策指令	1. 党的机关报及重要文献 2. 秘密文献
政	1. 行政组织	1. 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的机构及编制 2. 行政管区 3. 民主集中政府的实际情况 4. 县政府成立的办法 5. 有关行政各种法令
	2. 有关财政经济事项	1. 税制及其实施状况 2. 货币政策实施状况 3. 各经济机关的经营状况 4. 合作社活动的状况 5. 民众负担的实际情况(皇军驻扎地附近、中间地带、敌地区分别对照) 6. 与治安地区的物资交流的状况及其道路状况 7. 敌方的经济封锁实行状况 8. 家庭工业、手工业的增产运动及其成果

续表

调查要目	调查项目	调查(收集)细目
	3. 有关农业事项	1. 减租减息的实行情况 2. 土地政策 3. 增产政策
	4. 有关文化事项	1. 文教状况(尤其是学校) 2. 民众教育的状况 3. 宗教及会道门的政策 4. 文艺娱乐体育及其组织 5. 宣传活动及其组织 6. 宣传资料的收集 7. 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实行情况及其成果
民	民众组织及其活动	1. 民众团体组织的状况 2. 民众武装组织的状况 3. 民众团体活动的状况 4. 民众组织的优点及缺点
	有关秘密战事项	1. 各级党对我方的谍报宣传、谋略工作的状况 2. 各级军、师、旅、团、营对我方的谍报宣传、谋略工作的状况 3. 各级行政机关对我方的谍报宣传谋略工作的状况
	社会变革	1. 农村习惯的变化 2. 农村统治者的变动 3. 妇女地位的变化
	民心动向	1. 各阶级阶层对中共的动向 2. 各阶级阶层对新政权的动向
	有关新政权事项	1. 县行政工作状况与敌方对比其优缺点 (1) 财政方面 (2) 行政方面 (3) 警政方面 (4) 文教方面

续表

调查要目	调查项目	调查(收集)细目
		<p>按上列分别记述</p> <p>2. 敌方的民众工作与我方新民会的活动状况对比, 从剿共的角度看新民会工作的优点缺点</p> <p>3. 与敌方贸易局及合作社对比看我方合作社及采运社的优缺点</p>

二、司令部及大队、特别偵谍队的担任地区及调查项目

部队名	调查地区	调查事项
司令部	华北全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观察中共的全面动向 2. 收集整理指导大队作战所需要的资料 3. 收集整理大队以后作战准备所需要的资料 4. 研究各地区的特殊性 & 适应各种情况的剿共对策 5. 研究剿共的综合对策
第一三大队	冀东地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对日满蒙出入通路的形成状况 2. 有无冀热特别区党委的存在, 如果有, 其成立的日期、沿革、内部机构、领导关系、方针、企图如何 3. 海上通路的状况 4. 反战同盟冀东支部的状况 5. 对滦河以东的中共的企图、工作状况 6. 随着滦热边区行署的成立, 其党政军的组织的改编状况 7. 对治安军及新政府的武装团体及其它机关策反工作的状况 8. 县、总区、分区的关系及其活动状况 9. 各级公安局的组织及其活动状况 10. 天津、北京、唐山等及其它城市及我方治安地区的秘密运输物资状况及其通路 11. 向大城市经营的点线工作及其联系

续表

部队名	调查地区	调查事项
		12. 使用联银券、不使用边区券的理由, 及其对我方与中共所产生的利害得失 13. 联庄会、其它民众组织、宗教团体的利用状况
第二大队	冀 鲁	1. 冀鲁边区的内讧状况 2. 冀鲁边区北部的党政军的组织、组成、活动状况 3. 国共矛盾状况 4. 海上通路状况 5. 从纳税、货币、敌方谋略及其它各方面所看到治安状况
	晋西北	1. 根据文件探知北方局、太行分局或第十八集团军等的企图、行动 2. 国共矛盾状况 3. 通向中共中央后方根据地的通路情况
第四大队	冀 中 冀 西	1. 冀西地区与冀中地区的相互关系 2. 滹沱河、唐河流域的根据地状况 3. 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北方分局的主要文件、谍报 4. 从天津、北京以陆路、铁路、水路进行秘密运输的状况 5. 维持平原游击战的各种方法 6. 敌伪工作 (指对日寇及伪政权进行的工作——译注) 里外两面工作方法及其实际情况 7. 因山地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加剧所采取的对策
第五大队	平 察 北 南	1. 进入满蒙工作的通路状况 2. 平西、平北、冀热地方的相互关系 3. 中共党政军的组织 4. 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的领导状况 5. 平西、平北地方有无党委的存在 6. 军区有无改编 7. 冀北办事处有无改编

续表

部队名	调查地区	调查事项
特别 谍报 队	一、北京、 丰台、石 景山、门 头沟 二、天津 市 三、开滦 煤矿 四、井陘 煤矿 五、枣庄 煤矿	1. 中共及蒋党系统的谍报机关团体的状况 2. 中共及蒋党系统的谋略机关团体的状况 3. 中共及蒋党系统的宣传机关团体的状况 4. 中共及蒋党系统的各机关团体潜入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的活动方法 5. 中共、蒋党系统经济机关的潜入及其活动状况（特别从中共的点、线工作观察） 6. 中共党对城市及重要设施、资源地区的组织、宣传工作上的特点及其企图和战略 7. 调查中共适应我方治安工作的特殊性，其外围伪装组织的实际状态
备注		1. 调查顺序根据情报收集计划，按其进度进行调查研究 2. 司令部施行的特殊谍报另行计划

(二) 推广报纸杂志、散布、张贴传单、照片

(三) 墙报

(四) 拉洋片、电影、戏剧、民众大会、讲演会

(五) 通过扩音器、留声机进行广播

(六) 进行具体工作（应急配给物资、援助土建作业、支援农业生产）

(七) 根据需要组织参观城市

第五 宣传施行要领

十七、担任宣传人员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情操，要忍耐、和气、冷静、谨慎，不发威风、倾听民声、明察民众心情，以诚意处理事务。切记失一人如失万人，得一人则得万人的道理。对每一个人都应不厌其烦地进行工作，以此获得民心。

十八、宣传，特别是对民众宣传，要抛掉理论，投其所好。

要用鲜明的现实打动民心，顺应民情，这是宣传的诀窍。

十九、正确地判断当前的情况，迅速妥当地确定宣传重点，大力进行集中宣传。

为此，要大胆地使用兵力。

二十、宣传的时机适当与否，关系到宣传的成败。因此，要洞察全局形势，尽最大努力抓住宣传的大好时机，同时还应努力创造机会。

为了适应掌握民心、侦察工作、剿抉作战等各种目的，努力做到准确地判断进行宣传的时机，根据需要，预先进行酝酿，为宣传的成功打下基础。

二十一、宣传工作人员在宣传思想上应加强统一，特别要注意实际表现的一致。

为此，各级指挥官对于宣传工作，要在人员、时间、地点、事项等方面，使各机关能以贯彻到底，以不断加强宣传的领导力量。

加强部队间的宣传联系。

二十二、宣传工作一般使用多种手段，集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顽强坚决地推动工作。

二十三、鉴于剿共作战的特点，不能只着重对集体的宣传，要进一步对社会的各阶层的个人和被俘的党员，通过说服、讨论、启蒙等方法，顽强深入地进行宣传。

二十四、鉴于剿共作战的特点，各中队要抓紧时机建立秘密宣传组织。

特别是秘密宣传员，要积极进行对个人的煽动工作，利用民族性的特点，传播流言，运用这种方法能够迅速取得宣传效果。要尽量减少公开的宣传活动。

二十五、在争取秘密宣传员时，先做好对争取对象的调查，关于为了争取他应进行的说服、启蒙，以及被争取者的弱点等，均应预先作好周到细致的调查计划，在进行时切忌急躁和露骨，要顽强而慎重地进行工作。

二十六、在编写宣传资料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是否使用敌人的惯用语及其它术语以及有关使用类似的术语，要由司令部统一规定。

（二）根据宣传对象，要适当使用语言和文字。此外，对被俘党员、知识分子等，不要用错敌人的惯用语及其它术语。

（三）要充分使用绘画和图表等。

特别在绘制图画时，应使用强烈的色彩，通过粗大的线条，以便强烈刺激文化程度低的宣传对象的神经。

（四）宣传内容，要适合民族性、人民生活及文化程度、习惯，要特别注意防止我方的主观、自以为是的作风。

二十七、实行剔抉工作，对民心的影响很大，对此应特别注意，即使剔除一人，也要积极进行宣传，防止民心叛离。

在大规模实行剔抉时，要在大（中）队长的组织下，立即全面展开宣传工作，以防止民心动摇。

二十八、在进行宣传时，要竭尽各种手段，引导中国方面当地机关自动地积极开展活动。以期获得宣传效果，节约我方宣传兵力。

要特别重视利用俘虏充当宣传工作人员。

第一期作战的展开（1943年9月20日—1944年6月9日） 在10月间，第一大队及各特别侦察队，继续执行以前任务，从11月起以北特警的主力，开始了侦察、剔抉战。但在第五大队担任地区，敌人集团武装在平谷、三河附近游动，如不歼灭该地游击部队，侦察剔抉作战将有困难。因此，北特警司令官亲自指挥大队主力进行扫荡，直至12月上旬为止。

在11月间，北特警进行剔抉作战114次，敌遗尸76具、俘敌335人（区党委级4人、地方党委级1人、县委级9人、分区党委级43人、村支部以下278人）、缴获步枪27枝、手枪19枝。

当时华北方面军，正在进行冀西秋季作战，但冀西军区的共军为了重建根据地，正企图获取平原治安区的物资，以待我军作战完毕伺机活动。因此，第六十三、第一一〇师团，对该地区的物资流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北特警为协助这一作战，从12月上旬以第四大队，在担任地区内加强了侦察剔抉及宣传工作，同时命司令部的对共调查班，调查在保定、石门之间的物资流出以及其它经济状况，并使之协助第四大队。

其它，在12月间，北特警的主要部署如下：

一、由于我方已掌握了在冀东、京津、满洲各地积极进行秘密活动的中共情报机关（北方分局联络部：部长刘杰）的大致情况，为此，命令第六、第一、第三侦谍队进行深入侦察。

二、12月7日，命科学侦谍班在北京、天津展开对敌无线电通讯的侦察活动。

三、在北京特别市内旧俄国东正教堂附近发现中共系统的情报活动。为此，在12月9日，命令第一侦谍队进行深入侦察。

四、在冀东地区的中共势力，由于我兵团多次讨伐和各部队的剔抉战，敌发生动摇。据判断：其有力干部，已暂时转入热河省内，企图扩大锦热奉地区的党的势力。因此，为了在地区内深入侦察和加强剔抉作战，于12月18日，命令第一、第三大队及第六特别侦谍队，以1944年4月为期，在继续执行原来任务的同时，要尽快扩大成果。

在同一天内，司令部对共调查班的主力开赴冀东，预定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搞清民心恶化的动向及其原因。

五、在第十二军管区内枣庄附近的中共，进入12月逐渐活跃。为此，在12月24日，命令增强第五侦谍队的兵力进行深入侦察，同时，使其加强对山东分局及新四军的情报收集工作。

在12月间，剔抉作战次数为266次、敌人遗尸175具、俘虏1,559人（区党委级3人、地方党委级5人、县委级21人、分区委级74人、村支部以下1,456人）、缴获步枪103枝、手枪63枝、自动步枪1枝。

1944年1月下旬，方面军作了新的部署，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核心统一各战斗力，以加强冀东地区的剿共措施。

据此，北特警于1月24日下达了“侦谍破获战斗指导要领”，指示所部要与兵团各部队保持紧密联系，机动灵活进行战斗。根据过去的侦察，发现中共对井陘煤矿的工作逐渐展开，在煤矿附近的活动也转向积极。因此，命第四特别侦谍队迅速进行深入侦察，同时准备对之进行全面剔抉。另一方面，第一特别侦谍队，在1月下旬，破获了中共北方分局的北京情报组织，逮捕47人，摧毁了该组织。

2月2日，根据方面军命令，为加强第十二军京汉路方面的对敌谋略封锁及防谍措施，将第五大队第五中队主力派往新乡配属于该军。

3月10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特别侦谍队，对“中共北方分局联络部”（谍报网）同时进行了剔抉作战，捕获该联络部山海关负责人等55名。3月20日以后，以第一、第二特别侦谍队，破获了在北京、天津地区的蒋系秘密组织，到4月8日共捕获186名。

根据截至3月上旬的情报，冀东中共称本年度为“总反攻”的一年，在加紧政治攻势的同时，根据中共的指令，于初夏发动第一期反攻，以破坏交通、通讯及袭击重要资源设施为目标。据判断现在似正积极策划准备工作。

北特警为了保卫冀东唐山以东京山路及开滦煤矿，于3月19日，命第一、第三大队迅速加强侦察，并抢先部署，以扼制敌秘密活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2月13日～4月5日，曾在遵化县附近地区进行了肃正讨伐作战。）

另一方面，第四大队在冀中地区，对晋县、深县、无极各县工作组织、博野县委、清苑县的合作社等进行了剔抉，并扫荡了张村附近敌游击部队。第二大队以一部协助第五十九师团的肃正作战，同时捕获了渤海第三专员公署、冀鲁边区地方党委等的干部，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判断，重庆方面与中共方面乘大东亚战争形势的变化，将于初夏以后开始准备对日总反攻。为此，北特警司令部于4月18日发出如下命令：

一、各大队、直属中队应速行培育预备侦察网，使之能够适应治安变动情况，及时改变重点进行侦察。同时对重要铁路及主要国防资源设施作好防卫，不使发生问题。

二、为了加强侦察有关敌人总反攻的行动意图，在各大队特设一部分专任情报工作人员，并使各特别侦探队也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三、司令部新组成七个直属的临时特别情报队，分别布置在北京、青岛、兖州、归德、邯郸、潞安、大同，收集北特警担任地区以外的有关敌人总反攻的情报。情报内容包括武力反攻、带有战略统一性的游击战、破坏谋略等。

四、为了加强有关扼制敌人对铁路策划秘密战的侦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机关的特务组织暂由司令部干部直接指挥。

五、第二大队、第一～第三、第五特别侦探队在担任地区内，对中共方面及重庆方面的基层组织，进行扰乱，阻止国共合作的“谋略宣传”。

六、为应付治安情况的变化，应迅速实行教育训练，以提高侦察能力和加强游击战的力量。

4月20日以后，又部署司令部对共调查班及各大队调查班，对中共总反攻的情况进行调查。

各大队在四、五月间，除努力收集上述情报外，并配合当地兵团的肃正讨伐，积极收集情报、捕获敌干部、破坏中共的经济通路等，逐渐提高了效果。

科学侦察班，在5月16日以主力布置在京津地区，以一部分布置在济南，目的是要粉碎中共的谍报工作，特别对其无线电活动进行电波侦察工作。

从5月底开始，为了改编北特警，暂时中断部分战斗，在6月9日第一期作战任务结束。

在此期间，剔抉作战4,214次，敌遗尸1,984具，俘虏13438人。区党委级9人、地委级32人、县委级225人、分区党委级928人、村支部以下12,244人。（原文俘虏总数字与分类数字不符——译注）

教训及观察 第一期作战结束以后的形势及此次作战的教训，在“北特警战斗详报”中，有如下叙述：

一、作战后敌我形势概况

（一）敌方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敌虽多次受我剔抉作战的打击，但仍乘国际形势的变化，敌各种势力逐渐伸张，尤其在京汉作战时，由于一部分皇军的调出，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集结，县城的放弃，以及因改编变更重点地区等原因，使敌人得以趁机逐渐充实了地上地下的战斗力量。敌人一方面正在加强对中国武装团体进行谋略袭击、策反工作以及整军扩军、麦收工作等总反攻措施，一方

面积极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和对重要战争资源设施地区进行谋略活动。

（二）我方

各大队增加了侦察力量，逐渐充实提高收集情报、侦察、剔抉、宣传、谋略游击战等的战斗力量，为下次作战打下了基础。

（三）此次作战对敌的影响

华北特别警备队开始进驻时，各地的共军颇为焦虑，尽力收集有关该队的情报，至1944年中共中央始下达命令采取以下对策：

- （1）以武力掩护中枢组织。
- （2）集结分散的行政武力。
- （3）以加强除奸工作和围城工作，对情报、经济、交通进行反封锁。
- （4）烧毁良民证和户口簿。
- （5）中枢组织的干部分散活动。
- （6）各匪团使用秘密名称。
- （7）伪装基层组织。

敌采用以上方法企图对付特警的战法。然而，由于我方的侦察摧毁战斗，使敌蒙受多次打击，各地区的中共都显著地发生了动摇。尤其在冀中方面，中共被第四警备大队摧毁了28个重要组织。为了对地方加强戒备，中共逐渐以地方军进驻冀中。冀鲁中共，由于第二警备大队的积极剔抉作战，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失去了独立性，在3月初不得不与清河区合并，新成立了渤海区。

特别侦察队在京津地区进行的剔抉作战，给予中共和蒋系统的中枢机关以相当打击。

二、齟齬、过失、其它可供参考的事项

（一）有关作战一般情况

在完成作战任务上宪兵科出身以外的人员，对秘密战全无经验，对中共的理解也很肤浅，对敌情的掌握也不深入，各级干部在作战上缺乏信心，因此，在第一期作战期间，部队未能将全部

力量发挥出来。

(二) 中共党政军结成一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机的活动，并深深打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对此种组织及其顽强性，我方的思想、政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未能配合武力作战，尤其是中国方面政治力量未能与侦察摧毁战紧密衔接起来，致使其进展迟缓。更加严重的是，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及其它机关人员的贪污腐化，使民众更增加了负担，因而招致民众的憎恨，降低了我方措施的效果，给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中国方面政治力量的软弱和贪污腐败是敌人工作得以进展的良好条件，今后必须对此采取彻底的措施。

(三) 必须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各机关，剿共作战的要诀以掌握民心为第一。

为此，对于民众的呼声，应从内到外精心考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即从“深知中国民心的是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对有关机关要大力支援培植，使它能自觉地积极进行剿共作战。

(四) 因对翻译、情报人员的监督不够而造成民心离叛。在剿共作战中，必须有翻译、情报人员参加。在使用这些人员时，必须经常严格监督他们的生活起居，以杜绝不法不良行为。

由于翻译、情报人员的恶劣非法行为引起民心离叛，加上敌人的反宣传，给我军完成作战任务带来极大困难。

(五) 剿共作战要随机应变，要研究创新的方法。下面几点可供参考：

A. 对同一目标要反复急袭，以使敌人无法退避。

B. 用少数兵力分散化装成便衣，这种方法，可欺骗敌人和农民，成功的机会较多。在白天穿制服单独行动，容易被农民从远处发现，会暴露我方意图。

C. 各据点相互联系进行出击，往往可以取得大的战果。为此，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做好所有小据点之间的联系。

D. 为了作好检查搜索，一兵一卒都要具备警察的敏感能力，必须熟练掌握剔出混在农民中间的干部、发现潜伏的敌人、查出

隐藏的武器等工作。

E. 敌人的干部经常有较多武力掩护，如以我军一个小队的兵力往往难以展开活动。因此，在部署分驻时，需要考虑至少要有五十名以上随时可用的机动兵力。

F. 以少数侦察兵力分驻时，务必与该地兵团部队或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紧密联系。

有关北特警的作战的评价，当事者有如下回忆：（包括北特警第二期作战情况在内。）

北特警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的回忆：

（一）北特警在进行治安战中，最感头痛的问题是没有行政权。只凭武力并不能摧毁人的思想。治安战需要对军事、行政、经济、警察、宣传等进行统一指挥。但是，北特警和各兵团都没有这种权力。有协作关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其政治力量也十分薄弱。要推动地方政权求得所期望的成果，就必须刷新政治体制，使之适合进行治安战的需要。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所谓治安的概念是因为有主权才得以维持。没有主权就没有治安。我军在华北没有作为政治对象的人民，因而就没有真正的主权。严格说来，是军队掌握着主权。因此，北特警只能做本身能作的工作。例如通过严肃军纪取得中国领导者的协力，部队自己进行宣传、扩大新兴起的青年运动等工作以掌握民心。当时大东亚战争正走下坡路，整个战局的动向对敌我人心都有很大影响，一般的简单的领导，终难挽回颓势。

（二）侦察工作主要是通过谍报活动，侦察目标为某些人物和组织的动静并取得证据，但这超出了军事的范围。如果进行政治解决，其成果可能会更大，北特警的侦察活动，除进行反游击战外，比华北宪兵队时期更增加了侦察的深度和广度，力求通过剔抉作战，取得侦察成果。但其结果却看不出什么成效。

（三）要取得侦察成果，在我方地区内至少需要六个月时

间。华北战场广阔，又是处于异民族之中，难以象在日本国内那样进行周密细致的侦察。但因急于取得成果，产生了相信虚假的情报、而不能充分证实的弊端。因此，要对侦察人员进行再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并革新侦察工作。过去侦察活动往往是委派下级人员，这次特别加强了对侦察队长的教育工作，让他们每月绘制复杂的侦察图，并研究各种情报的精确程度。侦察活动以个人单独潜入敌区的情况为多，往往有生命危险。但是，对此并无充分保障。此外，还存在语言不通，不易得到优秀谍报人员和协助人员等等困难。

（四）剔抉意味着检举，然而又有其独特之处。剔抉要经常做好战斗准备，而且必须活捉对方而不得杀害。敌对观念不深的一般民众，在中共强制下作些敌性活动，对他们逮捕以后处分要恰当，过去存在处分过重的弊病。为了争取民心，改为释放政策，以防止出现因犯小过惩处过重而使之跑向敌方的情况。

（五）北特警不单纯是进行反游击战的部队，但为了进行侦察剔抉地下活动，首先必须击溃公开活动的游击部队。然而宪兵缺乏指挥战斗的经验，编入的步兵也并不都是优秀的战士。此外，方面军内的各兵团在情报战方面已被中共击败，只有在情况不明之中进行“主观的扫荡战”不能与敌人接触。因此，北特警尽力作到：使自己具备游击部队的主动性，研究如何能够与敌接触的方法，励行“每日出动”、“突击索敌”、掌握地方的特点及敌情，熟悉千变万化的游击战法。但游击战本来是在民众协力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战法，所以在异民族土地上进行游击战十分困难，肃清敌人的游击队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六）兵团为了经济封锁所设的隔断壕，在物质方面虽有所收获，但为构筑隔断壕使用劳力，破坏耕地以及阻碍物资交流，这一切对民心的叛离产生了极坏影响，因而遭到指责。北特警根据民众的要求，虽然也填埋了一部分，但那主要是为了剔抉支持中共的经济界人士和切断秘密通路才填埋的。

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的回忆：

为了加强对付中共的治安战，组成华北特别警备队着重部署于冀东地区，并且进一步加以改编，增强了兵力，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其部署和活动都以城市为中心，在山岳平原地带是无能为力的。宪兵只知见可疑的就绑，多有过分，毫无保护民众之意。该部队为按照方面军的希望所设，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由中央下达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完全未考虑现地实际情况。中国的政治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对此可能是毫无所知。实际上，要想得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方面政治力量上的协力是不可能的。因此，与中共方面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情况相对照，我方的军政民则是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

华北方面军参谋井门满明少佐的回忆：

北特警成立时，我对此剿共专门兵团抱有期望，但同时也有相当疑虑。期望的是：随着战争长期化，在走投无路之中，打开一条对付中共“丛林战”的门路，希望能够出现新的旺盛的战斗力。疑虑的是：敌人以民众为丛林，潜伏其中进行抗战。倘要剿灭该敌取得战果，就将伤害无辜的民众，因而造成对全局的危害。

对共作战的最终目标，可以归结为：第一是摧毁革命核心势力；第二是争取构成社会成员的民众。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就必须具备优于敌人的武力，但这种武力并非过去那种数量上占优势的武力，单凭那种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具有适应敌人特点的特殊力量。第二个目标，只靠整顿军纪是不能获得民众的。必须使广大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组织起来使社会与革命核心相脱离才行。因此，必须动员武力以外的其它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预料中的治安新情况

对治安新情况的观察 1943年内，华北肃正建设虽在局部地区或某一时期获得相当成果，但从全面看来，中共的潜

在势力逐渐增大，活动也更加积极。在1944年春，方面军对今后治安新情况，作了如下的观察：

由于皇军历次剿共作战的结果，使敌军政核心机关远避于山间僻壤，独立抗战的活动显著下降。但综观管内全面治安情况，难说有所改善。相反，不少地区正在趋于恶化或复杂化。由此可以看出华北的治安情况，并非仅由皇军与共军相互角逐而形成，而是有新的第三因素介入其中。所谓第三因素，即近期“新政权的走向政治独立的动向”、“在皇军赶走中共后的地区内，敌民兵的活动转趋积极”以及“饱尝连年战祸之苦的民众产生抗日、抗新政权的思想”等。

这样看来，由于反日、反新政权环境的形成，治安将趋向复杂混乱，就连中共也将放松其政治统制，而在政策上有所后退。至于对我方说来，那将是非常不理想的局面。为了对付这种局势，确立治安，必须以优越的政治对策掌握摇摆不定的民心。一方面要支援新政权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及其纯洁化的工作，同时要严格监视其抗日动向和防止其腐化堕落。并且要时刻防备和肃清民众及武装团体的不稳倾向。

形成治安新情况的原因：

（一）中共抗日战略的变化

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两面化的政策。对公务人员、武装部队和治安地区农村及其自动放弃的农村旧根据地，进行抗日赤化工作。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

（二）我方地区民众的穷困

治安地区民众，尤其是准治安地区的民众，数年来担负双方过重的战时负担，以致生产下降、壮丁缺乏、牲畜减少，深受战

祸之害，农村经济破产，几乎陷入饥饿的困境。共军从军政两方面掌握此种情况，在一个时期抑制农民的不平和暴力行动，而以其擅长的宣传战来振奋民心。然而最近皇军迫使中共势力退至边远地区，虽然中共党政军势力逐渐消失或减弱，但仅以皇军现有兵力维持新收复地区的全部治安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不得已只好使用新政权腐败的武装部队来维持治安，其结果使这些地区的民众更加穷困，找不到生活出路，从而变成土匪和暴民的情况愈来愈明显。

（三）新政权的严重腐化

新政权的腐化堕落和政治上的无能，已达到严重的地步。就连从未受过中共任何影响的我方民众，最近以来，也已暗怀第三种（第一重庆、第二延安）抗日思想。何况受中共的思想策动，或在其政策下生活的民众，他们对新政权的失望，完全被中共的宣传策略所击中。对此，应当重新认识其严重后果。由于新政权的腐化堕落，一方面使民众的思想转向抗日，产生了有利于敌人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共进行援助，有不少公开通敌供给敌人物资武器的情况。其言论和行动在中共和民众中间造成日本必败的信念，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以上情况，我方策略倘有失误，中共就要进一步利用新的形势，促使其更加恶化，以求壮大自己的势力。其主要策略大致如下：

（一）加紧开展民兵游击战

在新治安区，敌人乘我对治安的维持尚未巩固之际，通过精兵简政政策，以回乡务农的士兵、工作人员为核心，领导民众自卫，展开江西时代农民纷纷起义那样的游击战。

（二）利用匪化民众

民众变成匪的根本原因，虽是由于中共方面的抗战负担，但中共以巧妙的宣传说成是新政权的榨取所致，使匪化民众同情中共，使之成为最外围的武力，用来对付我方。

（三）对新政权更加彻底的怀柔和利用

中共现有抗战能力，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和利用新政权。今后势必以毒辣的谋略手段，更加疯狂地对新政权进行怀柔和利用。

（四）抗战经济（主要是粮食问题）对我方地区的依赖

中共放弃了主要生产地区逃入山区荒村，以其基层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设法进入我第一线的后方，试图依赖我方地区解决其粮食问题。

（五）在我方地区农村中贯彻两面工作政策

治安地区农村的两面工作，过去是以“使我方村政权通敌”为目的，现在则要更进一步，实现象冀东及东进纵队管区内的那种“村公所共有化”。由于我方县、乡政权的无力，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村公所难免陷入敌人操纵之中。

（六）变更征税方法

在山东已经放弃合理负担方法，采用了退步的“新征粮办法”，中共政权在皇军进驻地方，已经不得不放弃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高级赋税方法，因为这种税法需要对土地及农民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不断的指导监督。现在只能根据民众的经济力量及实际情况，由农民代表评议决定，实行累进的课税。

（七）民众工作的单一化

在完全由中共统治的地方，虽有可能按其意图进行复杂的民众组织工作，但在中间地区，象现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中共只能使组织单一化，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便于防谍保密。今春敌人计划开展的民众团体统一运动，可以认为就是具体的例证。

总之，以上所述是今后可能出现的管内治安的混乱复杂情况。为了确保治安，不能只顾剿灭共军，也必须对我方的腐败部门进行调查、防备和清洗。更重要的是应整顿阵容，贯彻强有力的清新的政治、经济力量。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剿共施策的主要问题。

对中共企图总反攻的判断 华北方面军对有关中共总反

攻的情况，在1944年初作了如下考察：

一、要旨：

中共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反攻阶段，号召准备总反攻，展开了顽强的政治攻势。至于重庆方面的向我军发动总反攻，根据日中战争的经过和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估计不能很快实现。中共所谓的反攻是指发动民众武装革命，因而与重庆方面的反攻形式不同。从中共现正倡导并进行的政治攻势情况看来，随着将来客观形势的演变，并非没有发动这种反攻的可能。因此，彻底探讨这一问题，实为当务之急。

中共的总反攻，并不是要进行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通过政治攻势争取新政权的武装团体，使之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叛乱，同时使新政权的公务人员作为内应，策动我方地区内民众一齐举行武装起义。

因此，战场上并没有一定的战线，而是在我占领地区内各处进行反攻。反攻的时期，要根据中共在我方治安地区内的反攻局势的形成和反轴心阵营总反攻取得显著效果，或北方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定。

为了粉碎中共总反攻的企图，要加强对新政权的监督指导，要肃清敌性部门，加强薄弱环节。在防止通敌叛变和民心背离的同时，要彻底剔抉中共的军事力量及地下组织，消灭其进行反攻的支柱。此外，要加强对中共的宣传，使之失去民众的支持，以促使中共自行消灭。

二、判断中共总反攻的战略根据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中共二年战胜论”看来，中共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因此，对其今后的企图，必须严密注意观察。

三、中共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战术

中共抗战战略的演变，从其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三期：到1940年夏百团大战为第一期（发展游击期），到1941年12月大东亚战

争爆发为第二期（防御建设期），从那以后到今天为第三期（政治攻势期）。

总之，在第一期内对军事、政治、经济建设方面完成了数量的发展，第二期，在质量方面也已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外，在军事活动方面，力求统一指挥，避免过去无组织的游击活动。第三期，在政治谋略中同时采用一些军事行动，企图培养“通州事件”那种袭击和民众暴动的力量。

现阶段的特征，在军事方面因恐日军大举讨伐，将主力控制在自己的根据地内进行整备，以一部为保卫其游击区只进行一些游击活动。在第二期中，为建设内部，其战略是：集中政治力量指向我方，通过政治谋略工作策动日军士兵反战，使新政权和我方民众赤化、抗日。

四、对中共总反攻企图的研究

中共的总反攻要依国际形势、国内实情而定，目前情况尚难有急剧转变。但是，他们似正采取政治谋略配合军事行动，与新政权里应外合的策略，稳扎稳打避免操之过急。根据情况的推移，中共进行总反攻是必然的，估计将要选择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在各个地方分别开始反攻。

五、对中共总反攻的对策

（一）粉碎中共对新政权的策动利用（加强对新政权公务人员及武装部队的清洗工作，严加监督掌握我方治安地区内的民众）。

（二）尽先歼灭中共的抗战力量，彻底摧毁其总反攻的准备。

（三）加强并改善对中共的情报调查活动。

（四）对“里应外合”袭击进行战术上的研究。

从中共方面看本年的军事成果 共军回顾1943年在艰苦奋斗之中，逐渐恢复、扩大了解放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概括叙述如下：（以下据原著称摘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一书，本文与该书有出入，译者按日文译出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1943年，日寇对我党我军的进攻有增无减，“扫荡”更加带有毁灭性和长期性。“扫荡”次数极其频繁，1000人以上的“扫荡”有150次。敌人在1943年提出了“对华新政策”，但这是“以华制华”的新发展，同时在华北的敌战区发动了“新国民运动”，这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继续。华北战场上残存的国民党军，丧心病狂地与敌人联合实行“反共第一”的政策，“变敌区为自卫区”，却将“自卫区”暗中献给敌人。并且称“解放区”为“奸伪区”，加以敌视。

敌人并不满足国民党军这种暧昧的态度，于是施加军事压力，要求更加“明朗化”，即公开投降，成为第二号汪精卫。这就是“山东作战”和“山西河南作战”。丧失民族意识的敌后的国民党军，纷纷大批投降。庞炳勋、孙殿英、吴化文、陈考强、夏继礼、侯如镛、李旭东、王尚志、张励生等，都是按照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报命令，带领部队投入敌人怀抱。他们手中拿着外国援助的武器不去对敌，而以本国抗日人民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敌。如果没有这样多的伪军，我八路军将能比现在多牵制敌人八个至十个师团的兵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还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调动胡宗南指挥下的驻守黄河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其结果，由于我大力揭露和谴责他们这种不道义的罪行，所以才没有象过去那样公开爆发内战。

我们的境遇虽然如此艰苦，但在1941至1942年的艰苦斗争中，为我们1943至1944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最初的一个时期，在解放区施行的政策及对敌的斗争方法，从1943年以来更要显出效果。

1943年我八路军与敌作战24,800余次，死伤敌伪军达136,000余人，俘虏日本军420余人，日军自动投降的有90余人。我军攻

克敌据点740余个，在环境极端困难的冀中平原，秋冬之间粉碎敌“清剿”40余次，毙俘敌伪3,5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300余处。在同样困难的冀东，一年内击退敌“扫荡”1,400余次，死伤敌伪7,000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以民兵建设作为解放区的建设及军的重要部分。民兵、游击队与正规军三位结成一體。各级党委、各军区抽调大量干部参加民兵建设工作，各级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提高民兵的地位，使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各部队发给一定数量的武器，并援助其进行教育训练。民兵的组织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大众运动的开展，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民兵进行政治战，从精神上打击了敌伪人员，使之瓦解。镇压敌人的间谍活动，摧毁伪政权。公开惩罚敌伪人员，使之脱离伪政权或为我方所用。

敌后的交通战，主要由民兵和群众担任。在民兵掩护之下，男女老幼一齐动手，破坏道路，烧毁桥梁、拆围墙、割电线。在冀中、冀南平原地带，基本在全部道路上掘了丈余深的道沟，使敌人快速部队难以前进，以之掩护抗日军民的移动。

1943年更加前进了一步，主要进行地形的改造，达到了即使是熟悉当地地形的人也要迷失方向的程度。在村与村、乡与乡之间构筑地道，彼此相通，在地面上不见人影，就可向邻村移动。在太行山区等的山谷间以隧道连结了山和山。这是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创造。

从1943年以后，随着群众运动的普遍展开，民兵组织也扩大了，由于有了战斗经验，也就更加坚强了。民兵从日寇手中夺取了很多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

第五章 1944年至1945年的治安战

一、京汉作战与华北治安的对策

京汉作战（“コ”号作战）概要

一号作战的发动 1943年秋，大本营根据同年9月制定的新作战方针，对各项策略及形势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当时，从整个战局需要出发似乎将有积极进攻的作战设想，即消灭美国在华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南北大陆，确保与南方的交通线。更鉴于11月25日在华美空军袭击了台湾新竹及年初以来日本船只在中国东海之损失日益增多等情况，为了保卫日本本土和我军在将来的总反攻，深感有进行上述作战的必要。因此，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商谈之后，对这一作战方案迅速进行了研究。

1944年1月2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传达了“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的大命。作战目的除上述以外，主要集中于“摧毁中国西南部敌空军主要基地，以扼制敌机活动。”同日下达了“一号作战纲要”，其内容如下：

第一 作战目的（略）

第二 作战方针

一、中国派遣军在1944年春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广东地区，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中央军，先行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段，继之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重要地区。

在进行作战时，只要情况许可，务将京汉及粤汉两铁路恢复原状。

二、南方军为了配合中国派遣军的作战，从缅甸及印度支那方面实行局部作战。

第三 作战指导大纲

其一 京汉作战

三、1944年4月，华北方面军从华北开始行动，击破第一战区敌军主力，占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并确保之。主要作战期间预定为一个半月。

四、使用兵力计划如下：

华北方面军

第十二军四个师团为基干

第五航空军之一部

五、本作战终了后，将所用兵力，由陆路经武汉转用于湘桂方面作战。

为确保新占领区，预计使用兵力为两个师团。

其二 湘桂作战（以下略）

作战准备 当时方面军的正面，在河南有第一战区蒋鼎文的部队约四十个师。该部自年初以来，见我方将要进攻，即努力加强防御。西南有第八战区的胡宗南部队，该部以其主力对延安共军、以部分兵力对日军保持警戒。

2月下旬和4月初，方面军为了贯彻作战意图，两次召开兵团长会议，并对作战计划进行了“兵棋演习”。方面军的作战设想是：以第十二军主力从京汉沿线开始作战，击破

敌人之后，向郾城附近挺进。尔后，准备向洛阳方面进攻。同时，分兵一部向信阳挺进，并与第十一军之部分兵力合作，打通至武汉的陆路交通线。如果第十二军主力能挺进到郾城附近，则立即向左迂回，向洛阳方面急进，歼灭敌第一战区部队。我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线，直接策应第十二军。在本作战期间，第一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蒲州附近，第十三军以一部兵力在颍川（今登封一带——译注）附近作战，以牵制敌军。

为了完成此次作战，尽量以优势兵力集中使用于主攻方面，这是此次作战的第一方针。因此，对占领区的治安，不得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牺牲，但对重要资源的开发、获得以及运往日本所需要的物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此，不能希望缩小警备地区，而且除已抽调部队参加作战兵团外，由于新调往南方两个师团，还必须考虑新编独立步兵旅团接替警备区域防务等问题，对此，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时，方面军拥有的兵力为124个大队，预定转用它处的有27个大队，预定补充的有40个大队，可以指望至少要抽出全部兵力的半数。

如上所述，1943年10月接到秘密指示，令方面军所属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调往南方，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作为大本营预备队集结待命。由于一年作战计划的实施，12月底曾经接到通知，拟以上述兵团作为一号作战兵团。然而、从全局的要求出发，至1944年1月下旬，将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调往南方去了。

当时华北地区治安日趋恶化，尤其中共的秘密活动不断

发展。对此情况北特警在其报告中，曾有如下叙述：

冀东及平北地区 中共对于华方及重要资源地区的策动极为活跃。近来，各地频繁召开干部会议，积极加强保粮生产运动、反特工作及反扫荡的对策。特别在对满洲行政力量的伸展方面，诸如逐渐改革行政区划及建立新县政府等工作，均有进展。北部山区，以长城线为中心的行政势力，亦在迅速发展中。同样，铁南区（北宁铁路南侧地区）在山区中心地方，中共方面的政权也已经建立。此外，其军事集结等活动，近来更加活跃。以袭击和绑架等手段，以获得武器、弹药为目的的活动，以及破坏交通和通讯线路，对开滦煤矿地区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特别引人注目。

冀鲁及山东地区 由于我方不断进行剔抉作战，中共的活动表面上虽然沉默，但其内部则正在积极进行整顿及更换干部，似已形成新的地下组织。看来今后在我势力范围内，将以扩大、加强党组织的基础为重点。在军事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队不断进行攻击和驱逐。同时，对鲁南地区的蒋系第十军也加紧进攻，国共的局部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冀中（西）地区 最近，中共突然活跃起来，正在加紧扩大党的势力。与此同时，军事行动，特别是以夺取县城为目标的行动，也活跃起来。

太原附近地区 中共把工作目标指向准治安地区，有不断向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及日军分驻部队进行袭击的趋势，需要戒备。

作战经过概要 4月18日拂晓，首先由中牟正面的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开始进攻。在第十二军主力方面，第一一〇师团19日拂晓夺取敌军部分阵地，20日晨，军的主力发起攻势，追击退却之敌。

作战进展顺利，第十二军于5月1日占领许昌，随后又以

第二线兵团向西大幅度迂回，对汤恩伯军，继于10日左右，对以洛阳为中心的敌第一战区主力展开歼灭战。在此期间，第十三军一部在寿县（归德东南约230公里，蚌埠西南约75公里）方面，实行牵制作战。此外，第十一军的一部北上与南下的第二十七师团于5月9日在确山会合，完成了华中华北的联络。第一军5月9日渡过黄河后，在陕州附近切断了陇海路，策应第十二军的歼灭战，予敌很大打击。于5月25日占领洛阳。

尔后，第十二军继续扫荡残敌，5月底以后，确保了京汉路沿线南部及洛阳附近的重要地区，随后转入新占领地区的警戒。第一军于6月上旬，在灵宝附近对第八战区军的反攻予以还击后，留一个支队于陕州，主力于同月上旬陆续返回山西省。6月9日关闭设于郑州的方面军战斗司令所，第十二军战斗司令所由洛阳返回郑州。

据6月11日内山中将向大本营提出的报告称：此次作战，蒋系军43个师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者占百分之六十，未受损失者占百分之十五，给了第一战区以很大打击，年底以前不可能恢复。我军战死者占参加兵力的百分之一，伤者占百分之三，患病者百分之五。

确保新占领地区的治安

第十二军转入占领态势、方面军占领洛阳后，鉴于该地附近治安迅速好转而北京方面治安恶化的情况，遂于5月27日，解散洛阳的菊兵团，命第六十三师团各部队返回原地。

第十二军对重庆军的活动和反攻，随时准备予以粉碎，

27日以后，对新占领区域的警备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一〇师团在洛阳西侧和西南侧，以确保洛阳城及洛阳至郑州道路。第六十二师团在临汝—郟县—襄城方面，占领阵地作好警备部署。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兵力集中于郟城附近，同时担任郟城至新郑间的警备。坦克第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在洛阳周围地区进行整顿，并作好以后行动准备。第三十七师团准备调往华中，在临汝西侧集结待命。

根据以上情况，各兵团继续扫荡残敌，并按照指示开始移动。进入6月，由于敌情的变化警备上作了若干修改。骑兵第四旅团，为了加强京汉路沿线及其西侧的警备，6月8日进驻舞阳。随着京汉路的打通，由第六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直接担任警备任务。23日大致部署完毕。7月上旬，第六十二师团由于抽出调用，该师团的大部分警备任务，由坦克第三师团担任。

8月份，第一一〇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警备部署作了若干修改，此外变化不大。第一百一十五师团担任黄河以南的京汉线地区，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担任黄河以北地区，骑兵第四旅团仍然担任陇海路沿线地区的警备任务。

敌方的动向 重庆方面第一战区军队在战局告一段落时，一面扬言要再度进行总反攻，一面积极整训，特别是加紧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同时进行着局部的活动。

中共中央方面，在此次日军进攻作战时，企图向豫西地区（主要为黄河南侧河南西部）伸张势力，但从作战一开始，除一部分当地党员及武装党员外，大部分党员撤退到河北和山西方面去了。日军转入警备态势后，民众出乎中共的

预料而信賴了日军。此外，敗退的重庆军队为了恢复其战斗力，掌握了地方游击队和武装团体。尤其是日军对中共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剔抉作战。为此，中共中央7月下旬，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指令太岳军分区南下，并令延安抗日大学原籍豫西的男女学生还乡，以图争取群众和地方的武装团体。

根据上述指令，在8月上旬，若干工作人员由济源地方的数百名武装兵力伴随，首次开始南下，这些兵力似已编入新安、巩县、偃师游击队内。8月中旬中共第五军分区老二团的一部继续南下，9月上、中旬第三、第七、第十七、第十八、第七六九各团合计约三千人，先后侵入该地区，以新安以北地区为根据地，经工作人员诱导，逐渐扶植势力，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似正进行怀柔和争取工作。9月下旬争取了新安游击队作为友军，编成两个大队，队长刘绍表就任暂编豫西独立游击支队长。此外候氏镇以南地区的黄宇宙为冀鲁豫边区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似已编成四个支队。

共军侵入我地区的情况如下：

新安北侧及东北地区：老二团、第十八团。

新安西侧地区：第十七团，暂编豫西独立游击支队。

宜阳西侧地区：第七六九团。

临汝北侧地区：第三团冀鲁豫边区游击第五纵队。

预料共军今后更要怀柔自卫团和游击队，进行争取群众的宣传，并以强有力的集团兵力进行袭击。

第一一〇师团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师团各部队，6月以来继续构筑阵地，8月中旬变更了部分部署，并对活动于境内之敌，特别是对共军进行了果敢的讨伐，以期确保占领

地区的治安。此外，进行了教育训练，培养战斗力，为对付装备优良的美中联合空陆军的反攻作好准备。

师团在实施军政中，特别注意对民众保持严格的军纪，不征收捐税，大力开展召回居民的工作。结果到8月中旬有半数居民归来恢复生产。按照兵团军政实施纲要成立治安维持会，并组织训练乡村自卫团等，各项措施进展顺利。地方游击队逐渐被击退到敌我交界地区，民众信赖日军，并得到其协助，因而管区内治安情况逐步恢复。

新占领地区的军政 华北方面军随着作战的推移，对新占领地区开始施行军政，作战告一段落后，即将占领区行政工作移交给第十二军。

过去，在黄河——新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有陆军联络部（开封陆军联络部的部长为山崎茂大佐，兼任河南省顾问。归德支部的支部长为近藤喜明中佐，新乡支部的支部长为河野又四郎中佐），并在开封设有总领事馆。但是，为了在新占领区内施行与之性质不同的军政，从3月份着手组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军政部，部长为山崎大佐，其主要成员由华北进行选拔，并有实业家、官吏、银行员、技术人员等多人充当顾问。

军政部于4月30日进驻郑州，随着作战的进展，为了迅速恢复治安，首先在许昌、随后在郾城、洛阳成立支部。同时派去了省政府厅长、县知事及各县指导官，以图恢复行政工作，并积极地设置警察，重新组织商会，进行抗灾救济工作。军政费用开支不实行征税，而从菸叶交易收益中提取。如此掌握行政、经济实权，进行强有力的指导。由于治安迅

速恢复，从5月下旬起，难民还乡者增多。

6月份，作战告一段落后，军政部移交第十二军司令部。该军根据“河南军政实施纲要”把支援作战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力图确保京汉路沿线及洛阳附近地区的治安，并以争取民心、收购物资等作为主要措施。由于作战的顺利进行和保持了军纪，通过推行上述措施，产生了好的影响。

参考：方面军与第十二军制定的“军政实施纲要”已无从查找，兹将大本营在一号作战时的“对新占领地区政务指导纲要”（1944年2月2日制定）转录于下，以供参考：

第一 方针

一、以便于进行作战为重点，并确保我军在当地的生活自给。

为此，特别要笼络民心，重视当地居民的积极性。

第二 要领

二、对于新占领地区的行政处理，依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尽量利用当地居民。

在战况允许情况下，尽可能迅速使国民政府行施政权。

三、力图确保我军在当地的生活自给，并恢复民生。

为此，必要的物资由中国派遣军在当地筹措，予以适当供应。

四、关于货币的使用，在华北要用联银券，在华中、华南用储备券，但由于作战需要，可以使用旧法币。

五、随着作战的进展，在情况允许时尽量作好重要物资的收集工作。

兵团转调和新兵团的编成

湘桂作战补充兵团的调用 中国派遣军通知方面军，转调第二十七师团，作为第十一军于5月27日开始进攻的湘桂

作战（“卜”号作战）的补充兵力。派遣军在京汉作战结束后，于5月31日，调第十二军所属第三十七师团，于7月初以前进驻信阳，归派遣军直辖。6月3日，又命令坦克第三师团主力，于7月中旬以后作好调往湘桂方面作战的准备。

第三十七师团主力于30日拂晓在临汝西侧南北线上集结后，6月12日转到郟城南侧集结，随后于15日左右开始南下。

坦克第三师团于6月上旬参加第一军的灵宝作战后，中旬归还洛阳近郊，准备调往武汉地区，因命令变更，仅以坦克独立第六旅团作为基干编成的部队派往武汉。师团主力则接管第六十二师团的警备任务，于7月6日进驻襄城、鲁山地区。

第二十六第六十二师团的调出 太平洋方面，美军终于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大本营在6月下旬，通知派遣军迅速集合两个师团，作好调用准备。7月4日发出命令，将第二十六师团和第六十二师团分别从驻蒙军和第十二军战斗序列抽出，直属大本营。

随后于7月25日，第二十六师团奉命编入第十四军战斗序列，19日由大同出发，8月8日由釜山乘船开往菲律宾。该师团为驻蒙军对治安肃正和准备对苏作战的核心力量。因此，原来的对苏作战计划在执行上发生了困难，只得相应地缩小了规模。

另一方面，第六十二师团，7月上旬，把鲁山、襄城附近的警备任务移交给坦克第三师团，集结于新乡及开封附近。7月24日奉命编入台湾军司令官属下第三十二军战斗序

列，逐渐向上海移动，8月16日由吴淞港开赴冲绳。

新兵团的编成 中国派遣军6月下旬接到大本营通知抽调两个师团时，为了迅速补充兵力，曾申请将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第四、第九旅团，改编成四个丙师团。7月10日根据军令第七十九号下令改编，8月10日至15日分别改编完毕。

与此同时，7月17日命令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属于第一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属于十二军，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属于驻蒙军，分别编入各该军的战斗序列。各师团由两个旅团（四个独立步兵大队）、一个工兵队、一个通信队、一个辎重队、一个野战医院、一个病马厂组成（1945年增设炮兵队）。其编制定员，师团为13,045人，独立步兵大队为1,233人。

注：第一百一十四师团（代号“将”，代理师团长为中代丰治郎少将）以步兵第三旅团为基干，在山西临汾编成，主要部队是步兵第八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百九十九～第二百零二大队）、步兵第八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四大队）等。

第一百一十五师团（代号“北”，师团长为衫浦英吉中将）以独立第七混成旅为基干，在河南鄆城附近编成。由步兵第八十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二十六～二十九大队）、步兵第八十六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十、第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七大队）等组成。

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代号“弘”，代理师团长为铃木启久少将）以独立步兵第四旅团为基干，在河南新乡附近编成，主要部队是步兵八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二百零三～第二百零六大队）、步兵八十八旅团（独立步兵第三百八十八～三百九十一大队）等编成。

第一百一十八师团（代号“惠”，师团长为内田银之助中

将)以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为基干,在蒙疆大同、平地泉附近编成,由独立步兵第八十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六大队)、步兵第九十旅团(独立步兵三百九十二~四百零一、第四百零三大队)等主要部队编成。

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全面状况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方面军在京汉作战期间,对旧占领地区的警备甚为忧虑,担心共军可能乘压力减轻的机会大举出动。

中共方面表面上虽未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但地下活动日益活跃,使我方警备增加了很大困难。视察过京汉作战现场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曾向大本营提出报告称:“作战期间,原来占领地区的治安急剧恶化。”

方面军于攻占洛阳后,命菊兵团各部队等迅速归还,有重点地进行了肃正工作。此外,于9月上旬起草了一个“华北警备刷新计划”,对警备、防空、剿共等工作作了全面的有力指导。

华北方面军在此时期至战争结束的主要成员如下:

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大将(至1944年8月25日)、冈部直三郎大将(至1944年11月22日)、下村定中将(至1945年战争结束)

方面军参谋长 大城户三治中将(至1944年10月14日)、高桥坦中将

方面军参谋副长 德永廉之助少将(至1944年8月1日)、冈田重一少将(至1950年4月7日)

第一课高级参谋 德永鹿之助大佐（至1944年7月31日）、寒川吉濑大佐（至1945年6月1日）笹井重夫大佐（至停战）

作战主任参谋 吉本重章大佐（至1944年6月26日）、田永契矩中佐（至1944年8月25日）、笹井重夫中佐（至1945年5月1日）、井门满明少佐

第二课高级参谋 高泽修平中佐（至1945年6月16日）、尾关正尔中佐

情报主任参谋 山崎重三郎少佐（至1944年7月31日）、堤宽少佐

第三课高级参谋 片山二良大佐（至1944年8月25日）、神崎长中佐（至1945年5月2日）、高泽修平大佐（至1945年6月16日兼任）

注：特命全权公使盐泽清室中将于1944年10月14日调出，由楠本正隆中将继任。

对中国方面的措施 华北方面军对中国方面实行的政务、经济等措施，特别是对剿共的措施，尊重中国方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并予以大力支援。强调日华必须一致协力作战，集中目标对付中共。为此，在“剿共指南”中特向各兵团、部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各兵团、部队残存着以支援中国方面为藉口的强制风气。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但是，又不能与共军争胜负，其地盘逐渐为共军

所蚕食。因此，当时治安军顾问山崎茂大佐曾指出：“由于政府支出的经费不足，粮秣等必须依靠在当地征收，以致民心背离，而指挥官得不到人材，薪饷被尅扣等，造成军纪松弛，战斗意志低落。”

此外，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3年秋，设立了剿共委员会，委员长荣臻，由军事顾问部指导，为剿共进行收集情报，宣传、教育等工作。然而，由于经费不足和人才的缺乏，工作一直没有进展，1944年底被撤销。

第十二军后方地区 第十二军为了京汉作战，将一向管辖的山东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负责。因此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由泰安移至济南，并将参加京汉作战的独立第七旅团的警备任务立即担当起来（4月6日）。但因该地区有顽强的共军盘踞在黄河河口一带，于是师团放弃了武定、利津地区，收缩到黄河右岸的青城、博兴地区。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管辖地区不变。2月调往南方的第三十二师团的警备地区由新编独立步兵第一旅团负责，但其战斗力很低，而从兵力看来，也不可能山东省西南部（曹州道的西半部）配备部队了。对于山东全区逐渐壮大的共军，采取相应对策实非易事。

山东省，原为第十二军的根据地，在肃正建设方面已有成效。在京汉作战期间，中共方面无显著活动。虽然日军警备部队逐渐集中，转向确保津浦、胶济沿线的态势，但是仍不断努力扩大治安区，除以小部队连续实行讨伐外，并进行了长期的肃正作战。这种作战的特点是：有系统地用方向探测器掌握中共的动静；平日组织训练好便衣挺进队，对敌中

枢部门利用挺进奇袭方法取得成果；以支援收买小麦、棉花为目的进行作战等等。此外，为了对付中共的政治攻势，进行了凌驾于敌人之上的政治攻势，如“1944年秋季山东作战”（10月下旬～12月中旬）即其一例。其特点是：以把握民心为第一，将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保安队置于前面，日军在后方作为支援和后盾。军队虽不参与政治，但要利用部队中在政治、经济、报道等方面具有专门能力的人，担当情报收集和部队内外宣传教育工作。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但中共方面确实扩大了潜在势力，秋季以后对日本分散驻扎的部队也能进行袭击了。

参考：

从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在第五十九师团曾担任参谋的折田贞重大佐，关于对中共作战有如下回忆。

当时的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因为对争取民心考虑不周，敌地区内的居民，饱受战祸的痛苦，以充满憎恨的眼光盯着日军，长时间忍受封建主义和外来压迫的民众，只盼望着过上和平生活。要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进行研究，以期改进对中共的作战。师团长采纳了这一意见，并逐渐实施。其设想及实施情况如下：

（一）作战目的的确立及启发教育

一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野战军，作战操典上也规定，“军队主要任务在于战斗”，但这并不适于对中共作战的特殊性。在治安肃正作战中，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把握民心。这一观点虽然从指挥官到士兵似已贯彻，但让他们转变头脑是需要长时间的。

（二）掌握战场的实际情况

要调查研究中共各地的党、政、军、民一体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地区政治建设以及其势力范围扩大的情况等。对于单凭反复追剿中共正规军，并不能破坏其党、政、民组织的道理，要向部队进行启发教育，同时要严肃军纪，真正成为无愧于皇军声誉的军队（军队要很好掌握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与干预政治是两回事）。

（三）废除翻译

翻译是宣抚工作的尖兵，是重要的情报员。当时的翻译能力低下，而且假借军威，作恶多端，招致民心背离，从而无法取得正确情报。为此，要使师团官兵学习中国语言，从中选拔出翻译人员，在把握当地民心的基础上，奖励他们收集情报。

（四）利用军队内部有特殊技能的人员

军队中有不少军事以外的专门人材，让其中的经济人材、官吏及有关报道人员等，担任适合其能力的工作，从事收集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和宣传形势，并对行情的变动、历史、经济、地理等进行研究。这对于掌握共军地区内的状况是很有有效的。

（五）对游击战的研究和训练

讨伐作战结束后，必须进行研究提出今后的教训。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师团编成特殊便衣部队一个中队（队长：大川健治郎大尉），进行游击战法的研究和训练，以期向各部队普及推广。此外，中国方面各机关、武装部队的指导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分散混乱现象，因此要进行改革，实行统一领导，以便能够集中使用。

（六）扩大治安地区的要领

期望飞跃的扩大，一举占领敌地区，这样在确保治安方面会出现不平衡现象，勿宁实行象潮水那样波浪式地渐进为好。为此，先将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武装团体放在敌我中间地区，随后对中共地区展开政治攻势，排除该地区中共工作人员，努力把握民心。日军则安置在治安地区以内，作其后盾予以支援，一旦判明

敌正规军的动静，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歼灭之。

以上的设想和实施，是1944年秋肃正作战时的事，后来因调动工作，未能看到其成效。

山东半岛治安恶化，对于青岛—莱阳—棲霞—芝罘路线的确保也很困难。10月中旬要地棲霞也放弃了。因此，在年底以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肃正作战。12月中旬至1月下旬，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实行了鲁东主要地区作战，1945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进行了山东作战。

豫北（开封、新乡）地区是京汉作战的兵站基地。三十五师团调出时，3月8日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四旅团接替了该地区的警备任务。由于兵力减少，旅团将司令部设于新乡，各大队部署于开封、卫辉、怀庆、阳武。撤回附近地区日军驻屯据点，由中国方面归顺部队担任警备。陇海路以南重庆军很少积极活动，张岚峰军得以确保该地治安。但京汉路以西地区，共军势力强大。日军驻林县警备队撤回后，该方面的庞炳勋、孙殿英军受到压挤，担当濮阳方面的孙良诚军也逐渐被蚕食后退。

京汉作战一开始，共军同时开始扰乱后方，特别是西面的庞炳勋军，被压到辉县、汤阴县西部，使京汉路经常受到威胁。

7月，旅团改编为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仍继续担任原来的任务。

冀东地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竹内安守少将）为了本地区的治安肃正和警备工作，连日进行活动，并由关东军及第六十三师团协力在满洲国境和玉田方面进行了

肃正作战。但是，由于共军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巧妙地进行了游击战，不断袭击我小的守备队，攻击中国方面的治安军，伏击讨伐队等，而想要捕捉敌人则极为困难，故未取得成果。

6月，因北特警改编，其主力进驻冀东，7月7日旅团划归北特警司令官指挥，以后即作为机动剿共部队在冀东全地区内实行剿共作战。10月17日，旅团主力在丰润县杨家店（丰润以北约24公里）附近，搜索到六、七百名中共正规部队予以歼灭。敌遗尸400具，俘170名。此次战果是由于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旅团自7月以来多方研究训练所取得的，主要是切断了共军和当地居民的情报来源（一连几天采取电光形的不规则活动）以及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一接触敌人，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声的方向一齐冲去）取得显著成功。此次作战旅团受到方面军司令官的嘉奖，并将此战例广泛予以推广。

津渤地区 津海、渤海两道由第九旅团（旅团长：藤冈武雄少将）负责，连日讨伐和警备，迄无安宁之日。京汉作战时，地区内的共军在我旅团未设兵力的地方，以及道、县的边界附近，加强其根据地和扩军工作，并且为了准备总反攻，下令专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进行策动和袭击，积极培养反攻力量、获取武器弹药。由于旅团机动果敢的讨伐，在高粱收割期间曾一度被压制下去。及至晚秋我方收缩警备部署，共军即利用其密如蛛网的情报组织，巧妙地避开交战，致力于重建工作，并逐渐采取集体行动，袭击兵力较小的部队，扰乱我方收购粮秣等工作。

对此，旅团从10月下旬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秋季二号作战”。作战的前期在支援收购棉花、杂粮上取得了成果。后期作战和继续进行的“冬季一、二号作战”，扫荡了所辖全区。大部分情况是：共军行动敏捷，利用围绕村与村之间的交通壕得以逃避，或得到民众帮助得以逃脱。但是由于利用骑兵部队和自行车队进行彻底追击，因而也取得不少战果。

天津特别市 天津附近的中共党委和晋察冀分局等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潜入市内，在社会各阶层伪装就业。为了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从1943年开始积极活动。随着战局的演变以及物价上涨，民生不安，便乘机以工人、苦役、青年、学生等为目标发展党的势力和进行围城工作（破坏交通通讯线、阻碍物资移动、封锁情报等），胁迫和收买附近的土匪，策动官吏反正，进行谋略秘密宣传，收集情报，购买和运出抗战物资等。

重庆系统特务工作人员，也企图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争取同志的活动，但较之中共方面的工作，质量低劣，行动也不积极。

天津为华北商业中心，文化发达，一般市民讲求实利，明哲保身的观念很强。随着中共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攻势日益激烈，他们对新中国政权和日本的信赖逐渐减弱，两面性的态度（任何一方都依靠）越来越明显起来。

天津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十七大队负责的地区，但市内则由北特警第二特别侦谍队分担。侦谍队以伪装身分打入社会各阶层和新民会等进行侦谍活动，同时与有

关机关，特别是天津宪兵队及中国方面的警察等密切联系，逐步剔抉敌方的工作人员，破坏其秘密通讯设施。

天津陆军连络部制造的“连络部情报”中，对1944年2月的情况有如下叙述：

一、重庆方面特务系统的工作有相当渗透。

二、华北交通会社的爱护村工作，为了行政一元化，有必要与县政进行调整。

三、有的房东压迫参军者的家属。

四、从天津的情况看到，华北经济界的混乱，现已成为失去平衡的统制经济，依靠时局精神的号召，采取姑息因循的手段，是不能挽救这种局面的。如此放任下去，则华北经济势必在道义和统制的旗帜下遭到破坏，而华北兵站基地的作用必将从根本上被彻底摧毁。当前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应以吸收游资为第一要务。

五、此次大使馆采取的粮食增产对策，是对当地片面认识的产物。它使当地华方机关对日本丧失了信赖，使驻津兵团和特务机关的多年努力成为泡影，至为遗憾。今后必须注视华方从中央当局向下级机关指示的内容及其诚意，鉴于彼等过去的所为，需要严加监视。

北京、石门地区 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将步兵第六十七旅团（旅团长：柳勇少将，8月以后为寺仓小四郎大佐）部署在燕京道，将步兵第六十六旅团（旅团长：佐久间盛一少将）部署在保定道，同时将警备真定道的新编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柳川真一少将）置于其指挥之下。

京汉作战时，最初预定只以部分兵力参加，但为了攻占洛阳，师团长急速率领第六十七旅团主力前往指挥菊兵团。

在此期间留守地区治安急剧恶化，驻北京附近的分屯部队也遭袭击，并不断发生炸毁铁路，向我城内后勤诸设施投弹，以及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叛变、被绑架和逃亡等事件。因此，洛阳攻克后，参战部队立即返回。

师团在刷新警备、促进剿共工作的同时，努力对新出现的防空问题采取了对策。其特点是：军民一体组织民间的防卫（以陆军联络部为中心，军、政、民、会的负责人每月召开“剿共联络会议”，推动组织联庄自卫团、民兵、剿共挺进队，建设治安村，改善和扩充爱路村工作，训练新民会青少年团等），加强北京市的防卫，刷新铁路警备和情报工作，怀柔密秘结社的先天道，大力支援农产品的收购。

肃正作战，是在9月至12月之间，对中共冀西根据地进行搜索讨伐，尽力消灭敌军并摧毁其设施。

蒙疆西部地区 为了京汉作战，抽出负责包头地区的坦克第三师团，3月25日以后，第二十六师团派步兵独立第十一联队担任该地区警备，随后命混成一联队参加京汉作战，仅以少数兵力担任广大地区的防卫。7月中旬，第二十六师团转移后，由新编第一百一十八师团警备大同地区，第十二野战补充队警备厚和及包头地区。

本地区的兵团有三项对敌工作，即：在北面要作好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在西面包头地区，要作好反击傅作义军队的对策；在南面和长城线中部地区，要彻底进行剿共工作。特别是由于兵力减少，要设法增强城防工事和刷新情报工作。在朔县、厚和地区，由于军警联合肃正讨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灵邱、清水河地区，共军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小部队

的兵力已无法应付。

第二十六师团转移前，该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对管区内有关治安状况，特别对包头方面兵力减少后的对策以及南部中共势力的扩大，极为关心，兹摘录其手记要点如下：

一、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对本地上层人物的情况虽不清楚，但要严加警戒。

二、朔县地区，县警备队和警察结成一体，并有青年突击队、皇协团等，按照我军的意图进行策应，取得了效果。其它地区尚未达到这种程度。特别是灵邱附近地区威胁较大。县总人口十三万五千人之中，治安地区居民三万五千人，居民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文盲，对彼我关系持两面态度，因而需要从根本上重建县的行政工作，并由警备队积极进行肃正讨伐。

三、在治安地区内外均需对共军采取经常攻势。要加强警备队伍，修筑城防工事，进行居民调查（由县、街、乡长协助），讨伐时必须采取包围战术。

四、关于包头方面的警备

对于傅作义军在我方占领地区的活动，务期及时集中兵力彻底予以粉碎性的打击。对包头地区要严加戒备。

当时包头特务机关长稻森利助中佐，收集五原、宁夏方面的情报，并指导由归顺部队改编的绥西联军（司令王英）、东亚同盟军（司令白凤翔），进行情报谋略活动。让他们与驻在五原的傅作义暗中交往，为的是防止傅作义对包头地区的反攻，如有可能，还要进行怀柔工作。

五、物价昂贵，赋税增加，省、盟的经济状况令人难以满意，只有军警一体才能打开局面。

六、日本人（官吏、居民）要率先以实际行动为当地人作出示范。

七、宪兵应以铁路方面的对共间谍破获为重点。

八、要加强对空监视哨和重要地区防空防火工作。

山西南部地区 第六十九师团于3月将临汾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独立步兵第三旅团后进驻运城，接替转向它处的第三十七师团负责地区的警备任务。

5月，以师团主力参加京汉作战。6月师团司令部返回运城。步兵第五十九旅团驻守黄河南岸的陕县桥头堡，步兵第六十旅团担任原师团负责地区的警备任务。

潞安地区，在3月间，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接替了六十二师团的警备任务。旅团在6月间进行了陵川作战，9月间进行了秋季太岳第二、第三军分区肃正作战。但是太岳军区共军势力强大，因此，警备队被压迫到东潞路沿线地区，将兵力收缩到沁县附近。此外，该军分区部队在西面的安泽、浮山、绛县地区也扩展势力，在部分地区内对同蒲路造成了威胁。

由于精锐兵团的调出，警备更迭频繁，密度降低，太岳军区的共军大有显著扩张之势。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第二期作战

（自1944年6月10日至1945年1月4日）

改变编制 北特警基于1944年度兵备计划，以2月15日军令陆甲第十八号，奉命再次改变编制，6月10日改编完成。

在此次改编中，北特警的宪兵人数未变，仅增加了步兵，主要是新增设了五个警备大队。从全体看来，兵力有所增加，但各大队的宪兵却相应减少了一半，致使情报和侦谍

能力降低。

新设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为：第六大队长猪俣稔秋少佐，第七大队长原重司宪兵少佐，第八大队长松田秀雄宪兵少佐，第九大队长松本满贞宪兵中佐，第十大队长长谷川俊文少佐。

警备大队由大队本部和五个中队组成，兵力为1,157人，中队是由四个小队组成（第五中队由三个小队组成，另有骑兵小队一个），兵力202人。小队由五个分队组成，与第一次编组相同。教育队由一个候补下士官中队、二个受训兵中队及一个教导中队组成。兵员增加100人。

北特警在6月份编成以前，首先从3月份开始对调进的军官、下士官进行了干部教育。组成后，以部队团结、破获间谍、进行战斗等必要的基本事项为重点，进行了两周的紧急训练。

当时，中共趁京汉作战日军兵力集中和转移的空隙，企图扩大势力，其秘密活动仍极顽强，尤其是冀东、冀中地区，各种活动都很激烈。其总的动向判断如下：

中共今后将展开更加积极的攻势，进一步对汪政权的军队和各机关策动反正工作，对我军民进行厌战和反战工作，对朝鲜人和在日本统治下的各民族，进行巧妙的离间工作，并加紧扰乱占领地区内的治安。此外，一方面利用美、苏尤其是美国缓和重庆对中共的压迫，而努力加强其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将重庆的战斗力量极力引向对日作战，以便扩展自己的势力。估计中共的实力将随着抗战的继续而逐年壮大起来。因此，占领地区的治安，特别是对中共

勢力的南下，需要严密加以警戒。

改变警各部署及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的方针是：“为了加强原有部队的战斗力，在山东省及河北省南部地区，邯郸以南的京汉路沿线和陇海路部署新编的兵力，同时在冀东、蒙疆、山西重要地区也增加兵力，以所需要的侦谍兵力直接与当地兵团的作战警备密切协作，进行第二期作战。”根据上述方针，北特警下令：“各部队必须在1944年12月底，侦破并摧毁当前敌人的秘密组织及秘密活动。”遂即在华北全地区部署了特警网，同时与当地兵团也形成了密切协作的态势。

各大队实行上述的教育训练后，逐渐向新驻防地区转移，于6月下旬配备完毕。在此期间，继续进行了侦察剔抉、压制敌行政及武力活动、扩大侦谍网、为保护国防资源设施和交通机关的秘密战斗以及破坏敌中枢组织等活动。

方面军重视冀东道的治安，于7月7日以后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列入北特警指挥之下，并制定了新的方针：“严格确保开滦煤矿区及京山铁路，同时大力摧毁、肃清中共势力，以期迅速实现冀东地区的安定。”华北政务委员会也计划将“冀东道定为特别行政区以彻底进行剿共”。因此，北特警于7月10日将司令部移至唐山，第九、第十警备大队、教育队、混合骑兵挺进队等逐渐投入冀东地区，开始进行冀东作战。

8月27日，北特警遵照方面军命令，将第六、第八警备大队、蒙疆特别支队，分别配属于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9月26日，又命部署在方面军直辖兵团作战区域内的警

备大队。在作战警备上接受有关兵团长的指挥。1945年1月4日，第二期作战结束。

1月5日，北特警第八警备大队主力（移驻青岛）和警备第二大队配属于第五十九师团，第四、第五警备大队配属于第六十三师团，第七警备大队主力配属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北特警主力仍留冀东，准备下次作战。

作战后的状况及教训 根据“北特警战斗详报”，第二期作战后状况和教训大致如下：

一、中共方面党、政、军均受到相当的打击，但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并积极展开对满军的工作和对新政权各机关及武装团体的全面斗争。特别是由于美空军在中国的活动、国共摩擦的缓和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均有利于中共的宣传工作。今后对其围城工作和反正工作，需要严加警惕。情况不容乐观。

二、由于关系兵团对北特警的特点认识不足，未能予以充分利用。同时，北特警与关系兵团及各个机关的联系也有很多缺点，以致搜索目标时，发生了竞争或隔阂，兵团的战斗力和北特警的侦谍工作之间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现象。

三、中国方面 上层领导机关没有积极的活动，在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入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新民会于10月全体联合总会上决议开展统一救国运动，虽然造起了声势，但在具体措施方面看不到任何成果。此外，尽管今年是丰收之年，但因统制经济措施拙劣，物价上涨，囤积居奇现象继续存在。因此，显著削弱了北特警的作战成果。

四、共军战术的特点 依然是以游击战为主。除以少数兵力或工作人员动员民众破坏通讯线路、警备道路、埋设地雷之外，并以集团兵力采取伏击、诱饵等战术，奇袭日军的粮秣运输队，

联络队、或偷袭中国武装团体。对兵力少的驻地，则夺取其枪支弹药等。近来由于招兵扩大了军队，对日军有可能积极果敢地进行正面作战了。

五、甄别民匪的注意事项 1. 八路军的人员，比一般老百姓步行速度快。2. 逃跑时，村民四处分散，工作人员则结成组向同一方向逃跑。3. 工作人员的口袋是鼓的。4. 正在耕地的老百姓，通常一处大约在五人以下。人数多的往往是来不及逃跑的伪装的士兵。5. 指挥官和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要怀柔、利用与他们有关系的人。

中共方面的军事状况（1944年）

——局部的反攻

据中共军战后发表的资料称：1944年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比上年又有进展，由于发动了局部反攻，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4月以后，华北日军一部分向国民党区进攻，一部分转移它处，由新的兵力迅速接替防务。敌人虽然进行了规模超过去年的“扫荡”，但我们取得的胜利则比去年更大。现将有关华北战场部分的记述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山东地区的罗荣桓部队：

在鲁中3至4月，发动第三次讨伐吴逆化文的作战，消灭伪军十三个团，共计七千余人，收复国土一万二千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人。^①8月中旬沂水作战，夺回沂水，收复国土三千五百平方华里，解放村庄三百五十个，巩固了鲁中山区。在海滨区，7月下旬讨伐李逆永平，收复国土一万余平方华里。11月在莒临公路作战，夺回了莒县，收复国土七千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三十万人，并有伪军三十个中队反正。在渤海区，7月至9月

的秋季攻势中，夺回了利津、阜陵、南皮、临邑等县，消灭敌伪一万二千余人，收复国土四万五千五百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四百余万人。在此次战斗中，王道率部两千余人投城。在胶东地区，8至9月的攻势中，夺回荣城、文登，收复国土二万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余万人。此外，伪军七个中队和刘公岛伪海军七百余人投诚。在鲁南地区夏秋攻势中，歼灭敌伪一万七千余人，收复国土二万平方华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余万。

晋察冀区聂荣臻部队，采取一连串的攻势，使该区形势为之改观。

1月攻入卢龙，2月攻入抚顺、昌黎，3月攻入赵县、晋县，4月攻入博野，5月攻入任邱、安新，6月攻入定县、涞源、河间、获鹿、灵邱、徐水，7月攻入大城、易县、蔚县，8月攻入雄县、沧县，9月攻入深泽、饶阳，10月攻入献县、平谷、安平。

此外，尚有若干大城市，如石家庄、保定、高阳、肃宁、武强等，均曾两次被我攻入。晋察冀军区共计拔掉据点一千五百个，夺回五千多个村庄。冀中平原自百团大战以后，敌蚕食严重，形势益形紧张，战斗更加艰苦。但至1月以后，由于反攻的胜利，又已恢复到百团大战以前的局面。至于冀西山地的北岳山区，我们的根据地扩大，敌人封锁第一线的碉堡全部被摧毁，迫使敌人后退。在冀热辽三省边界线附近，我们在巩固了平西、平北、冀东等根据地后，更进一步将游击战火烧到伪满境内。冀东的环境虽然艰苦，我们也屡次攻入县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势力的壮大。

冀鲁豫区的刘伯承部队，在太行、太岳区，3月夺回榆社，4月夺回林县、沁水。攻入的县城更多。如2月攻入武乡、大谷，5月攻入陵川、左权（辽县），7月攻入阳城，8月攻入和顺，11月攻入元氏。从6月到9月在豫北的黄河北岸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攻克据点三十六处，收复国土九千余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十万零五千余人，使济源、垣曲完全为我所控制。国民党军放

弃守地溃逃后，豫西沦陷区人民遭受残酷蹂躏，我八路军组成豫西支队，从晋南渡过黄河，积极打击敌人，建立起豫西解放区。从9月到年底短短时间内，作战一百三十次，活动地区五万平方华里，解放村庄四千六百七十六个，一百一十三万人，建立十六个县政府，我军势力东达平汉路西侧，西至澠池地区，南至宝丰、嵩县。给予平汉、陇海两铁路及郑州、洛阳的敌伪以很大威胁。我军与民众的约法五章，赢得当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协助。

刘师所属部队在平原地区（冀鲁豫）的活动，2月攻入沙河、朝城，5月夺回内黄、邱县，5月下旬攻占清丰县城时，捕获了正在开会的伪冀南道的道尹薛兴甫、伪县长、伪保安队长、警察所长、商会会长等十三人，此外俘敌伪军一千余人。给予敌伪一次意外的打击。7月夺回了莘县，8月从汶上到鄆城二百余里的战线上，对刘逆本礼所属部队展开攻势，拔掉三十七个据点，解放村庄六百余处，同胞三百余万人。9月夺回濮阳、寿张。11月再次攻克莘县。12月攻入尧山。据不完全统计，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部队1944年拔掉据点和碉堡一千余处，夺回县城七座，收复国土二千余平方华里，解放人口五百余万，至1945年，在该地区掌握了十一座县城，已将鲁西南和鲁西连成一片。

晋绥区吕正操部队取得了非常大的战绩。4月攻入方山，5月攻入静乐，6月攻入离石，10月攻入宁武。9月中旬在该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攻入汾河西岸的要地汾阳城，焚毁敌飞机场、电灯公司、火柴公司及车站，并将离石至岚县公路截成数段。一年来，共夺回敌伪据点九十五个，解放村庄三万一千八百〇八个，解放同胞二十七万人，收复国土九万七千余平方华里，这样惊人的胜利使晋西北形势大为改观。

由于这些胜利，使敌人受到极大消耗和牵制，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势力。至1945年，人民解放军局部反攻的规模更大，晋冀察边区人民解放军著名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开始后，在全华北地区不断地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以上未按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二、对华政治谋略的施策

改变对中共态度的工作

日军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主要敌人，认为第一是重庆政权，第二是延安政权，第三是美国在华的空军。这是陆军中央从1943年春开始特别强调的看法。但是，直到1944年才开始重视中共的存在及其实力，认识到中共与重庆政权尽管在本质上绝对不能相容，但它利用继续抗战的机会，巧妙地在我占领地区内扶植并扩大其势力，正在建立一个同重庆政权完全不同的半独立政权。这一客观现实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华北方面军成功地结束了京汉作战，华中第十一军5月27日开始的湘桂作战，也在顺利进行，于6月18日占领长沙，26日占领衡阳飞机场。

中央为了在政治上利用此次战果，7月3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作战时的宣传要领”大力进行对外政治策略宣传。

该“要领”特别要求贯彻在中国作战的目标是破坏美国的战斗力而不是重庆政权的精神，要以尽力阻止美、英、重庆在中国的合作，防止重庆与中共合作及美、英、苏共同对日为重点，强调采取政治攻势。

7月5日，根据上述“要领”精神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向国内外表明了日本关于在中国作战的真意。

此外，值得注目的是对中共态度的转变，“要领”中有如下叙述：

对中共本部暂称延安政权，对其所属军队，在需要讨伐时则以匪贼称之。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使用。

中共的名称也尽量不要用。

使用延安政权这一名称进行宣传的目的，是为了使重庆军产生动摇情绪，离间国共，使其矛盾激化。然而，效果如何，中央也抱怀疑态度。它是想要经过试验宣传，见到效果后，再作为政策下达指示。

中国派遣军接到该文件后认为：“这是容共政策，是对共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华北方面军的剿共方针以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导工作都有很大影响”，“其结果恐将变成讨好苏联的政策”（畑元师日记），对之表示反对。尔后经中央说明，虽然大致取得谅解，但华北方面军首脑认为“对反共政策决不能稍有歪曲”，仍表示强烈反对。

中央始终考虑到，为了不把苏联推到敌方，在表面上也不能把中共看成敌人，这乃是在谋略上的需要。经与华北方面军多方进行协商，结果于8月10日由总长指示，下达了上述精神的“对延安政权宣传谋略实施要领”，要求遵照施行。

该要领指出：延安政权在政治方面，事实上已经是独立政权，在思想上正从共产主义逐渐向民族主义蜕变，对此应予强调指出，以诱导敌人放弃抗战目的。要积极展开这样的思想战。随着工作的进展，必要时对延安政权的党和军队，进行地方性的、或局部的争取工作，并设法使之逐渐扩大和发展。

注：据当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案主持人田中敬二中佐的回忆：作为对战争终局指导思想的一环，当时的设想是，为了与美国谈判，首先需要和苏联的莫洛托夫握手，而作为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手段，就要考虑怀柔毛泽东。同时，还要推进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华北方面军于8月30日下达了废除“中共”称呼的命令。然而以后中央也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当地驻军也无认真实行“要领”之意，结果未取得任何进展。

中共对形势的判断

在中共方面，估计战争胜利已经接近，对日本方面，一心坚持斗争；对重庆和美国方面，虽本质上互不相容，但仍保持交涉和联系，力图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看来，在此期间其力量倒是集中于后者。

在此形势下，即使试探一下怀柔中共的工作，其结果必将是徒劳的。

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在太平洋方面，1944年6月15日美军在塞班岛、7月21日在关岛、23日在提尼安岛相继登陆。各岛守备部队经过奋战之后全部战死。在欧洲方面，美英同盟军也于6月6日在法国北部登陆，德军东西两面受敌，正在继续撤退中。

在日本国内，7月下旬发生政变，7月22日小矶内阁成立。在此形势下，8月19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即原来的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审议并决定了“对世界形势的判

断”和“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根据对付盟军的攻势，日本物质力量能够支持到年底的判断，确定了基本方针为：“集中现有作战能力以及截至年底能够用于战争的全部国力以击败敌人，摧毁其继续作战的企图”。对外政策是在认为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作为应付世界局势转变的手段，而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

在斡旋德苏和解方面，就派遣特使问题与苏联进行了交涉，苏联方面不但严加拒绝，而且11月斯大林的演说使人感到：连日本最重要的条件，即维持两国的中立关系，也面临危险。政府对此深感忧虑。

对重庆政府方面，则根据“迅速发动统一领导的政治工作，竭力利用苏联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作了具体的研究。此项工作一向由南京政府进行，但今后的工作究应如何进行，必须明确作出决定。于是8月30日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规定：“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由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取得联系，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在其自发的形式下进行工作（根据需要可以邀请南京国民政府顾问及其他人员参加）。驻华大使及陆海军最高指挥官仍不直接参加，只须给予支援。

9月5日，制定了进行此项工作的具体措施，以“速使重庆政权禁止抗战为重点”，以“创造彼我直接会谈机会”为第一目标。临到直接会谈时，日本方面的最大限度让步腹案如下：

（一）承认蒋介石返回南京，成立统一政府；（二）

废除日华同盟条约（指日本与汪伪的同盟条约——译注），缔结新的友好条约；（三）对蒋汪关系、延安政权的处理，蒙疆地带特殊化等，均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日本概不干涉；（四）满洲国的现状不变；（五）如在华美军撤退，日军也完全撤退。

这样，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

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传达日本方面这一意图，派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截至8月25日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最高顾问，其后为矢野勘十中将）前往南京，9月13日同南京政府首脑进行了会谈。当时汪兆铭正在日本养病，代理主席为陈公博。国民政府方面对此提案虽然谅解，但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

但是，当时中国派遣军的湘桂作战进展顺利，占领了湖南的重要区域，正在准备对广西省桂林、柳州的作战。因此，日本方面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战略形势，求得政治上的效果。

注：据曾任派遣军参谋副长的今井武夫少将回忆：“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国民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因此，他反对通过汪精卫国民政府进行此项工作。此外，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宣称，该项工作业已结束。

为了推进此项工作，宇垣一成大将（偕同坂西利八郎中将、渡边渡少将）受政府委托，从9月中旬约以一个月期间视察中国各地。宇垣大将回东京后似曾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

但是，最高指导会议听取了矢箬中将的意见之后，10月25日，仍未改变通过南京政府进行工作的原则。确定了“以最高军事顾问”为当地日本方面负责人，受总理大臣的直接指示行事，并决定迅速邀请陈公博来日本，听取汪主席有关全面和平的遗言（汪兆铭于11月10日死去）。

以后几乎未着手工作，又提出了必须由日本当地各机关密切参与的意见。12月13日，最高指导会议决定：“停止由军事最高顾问为当地日本方面负责人的作法，改由驻华大使及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决定“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这是从大东亚战争以来，由当地日本最高机关参与对重庆工作的开始。但是，在中央的负责人仍为内阁总理大臣，此项工作由南京国民政府以自发形式进行的方针，也未改变。

注：冈村宁次大将就任总司令官以来，极力设法和重庆进行秘密联络，同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互派使者。通过这一路线，传达蒋介石的口信说（2月14日），无意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政府尽管如此努力，但因世界形势的关系，此项政治工作终于无望。最后1945年3月底小矶首相的“缪斌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也是构成内阁更迭的直接原因之一。

注：缪斌为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受小矶首相的邀请于3月16日来东京。首相将通过缪斌进行和平工作的提案，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提出，但遭到与会者大多数，特别是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

重庆方面的政治状况

在此期间，重庆政权与英美等盟国的结合，通过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更加巩固。宣称：要彻底进行战争，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因而已无与日本单独进行和平谈判的余地。重庆方面主要关心的是增加美援和对中共的关系问题。

三、战局恶化中的各种紧急措施

(1944年后半年至1945年初)

中国派遣军态势的转变

1944年夏，为了在华中、华南迅速完成湘桂作战，决定新设立第六方面军司令部，8月25日任冈村宁次大将为该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由冈部直三郎大将继任）。以后湘桂作战进行顺利，11月10日攻占桂林、柳州，24日攻占南宁，12月2日追击到贵州省内，占领了独山，同时南下部队于10日与一部分印度支那驻屯军会合，将中国大陆南北分开。

在此以前，11月2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更迭，各方面军和司令官阵容为之一新。由冈村宁次大将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部大将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中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任第一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任驻蒙军司令官。

当时太平洋方面战局逐渐趋于不利，在10月中旬开始的

莱特决战日方失利，12月下旬转入持久战。估计美军下次很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因而在那里加强对美战备成为紧急任务。派遣军一面对沿海重要城市进行防备，同时，加紧进行占领粤汉铁路方面重要地区的作战准备。

在中国的同盟国空军活动愈益激烈，空军基地逐渐北移。为了防卫日本本土、满洲和朝鲜的需要，攻取西安作战又成了当前的重大问题。11月大本营通知派遣军对该作战进行研究。派遣军早有此意，当即要求华北方面军速行研究，参考其原来的计划方案，于30日制定出西安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敌在中国西北的空军基地，同时获得我方空袭中国内地的空军基地，以加强日本本土及满洲、朝鲜的空防”，并设想于1945年春由华北方面军实行作战。本案于12月上旬向大本营报告，并进行了研究。然而此时全局形势已不能允许该方案的实现。大本营当前最重视的是加强中国东海方面的防御，要求派遣军迅速作好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三角地带（长江下游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对美作战的准备。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大将的信念是：“为了支援全面战争，估计到将来美中同盟军可能由海陆两面进行总反攻，要做到先发制人，并有利于保卫日本本土，派遣军应该利用一号作战的成果，排除万难，坚决实行对重庆作战使之屈服”。因此，自就任以来研究的结果，于1945年1月初派松井总参谋长去东京，说明“中国东南方面作战计划大纲”，同时提出了进行四川作战的强烈要求。对此，大本营避而不作答复，却迫切希望加紧进行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冈村

总司令官西向作战的真意，是估计美军要在日本本土上登陆，而想要把美军吸引到大陆上来。）

1月9日，美军在吕宋岛登陆，围绕中国东海沿岸地区和岛屿以及日本本土的防卫形势，变得更加吃紧了。1月22日，对派遣军下达命令和指示，改变了基本任务。其中也采纳了总司令官的上述意见，要求以长江下游重要地区作为重点，加强东面作战的准备；对西面作战在缩小规模的范围内可以实行。

大陆命令第一千二百二十八号（实施纲要部分——译注）

（1）迅速加强中国大陆战略准备，击败从东西两方进攻之敌，特别是击败美军，粉碎其企图，确保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重要区域。为此，要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

（2）加紧压迫重庆势力，摧毁敌之战斗力，并结合实行政治谋略，以期使之衰亡。此外，应努力扼制在华美国空军势力的活动。

（3）为了确立我军作战根据地，便于取得国防资源，对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及长江下游重要地区应迅速使之安定。

（4）大体上，苏尼特右旗王府、百灵庙、安北至山西省西南端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连成一线，在其以西进行地面作战时，可采取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等方式，除此以外，要根据另外的命令方可进行作战。

（5）对台湾及西南诸岛方面的作战，在航空作战等方面，要尽可能予以协助。

（5）与南方重要区域，尽力保持联系，并要协助海军保护海上交通。

大陆指令第二千三百六十三号（摘要）

一、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要以促使重庆势力衰亡为主要任

务。同时为了封锁敌在华空军势力的活动，要组成多数小部队对中国内地长期进行有组织的挺进、奇袭作战。

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要承担作战地区内不归其指挥的部队的兵站业务，同时在必要时，对关东军、南方军及第十方面军的兵站业务，也要进行援助。

因此，派遣军于1月29日召开方面军及各军司令官会议，总司令官下达改变方面军及各军基本任务的命令和有关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的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派遣军对各军有关基本任务的命令摘要如下：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体上要确保现占领区域，尽可能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同时预定于夏初在青岛方面，大致完成对美作战准备。

在蒙疆方面，尽可能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此时给了青岛方面对美作战的新任务。

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要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地区，同时设法摧毁重庆方面的战斗力以促其衰亡。此外，将第二十三军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时间另行指示，并要极力与南方军保持联系。

三、第十三军司令官，要在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地区，同时预定在夏初大致完成沿海对美作战的准备。

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由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时间另行指示，大体确保现占领地区及赣南地区。同时预定在3月底大致完成沿海方面对美作战的准备。

五、第五航空军司令官，以一部分协助地面部队，并努力扼制在华的美空军的的活动，同时以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

六、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应加强对重要国防资源地、工厂、交通干线、主要城市以及飞机场的防空措施，特别是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及第十三军司令官，为了便于获得国防资源，对华北北部、长江下游重要地区，要努力设法迅速使之安定。

七、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关于对美作战准备，要依据附件“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进行。

为了对美作战，下达了“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关于兵力部署、城防设施、飞机场的设置、军需品的聚集和军事训练等作了指导。该设想分为华南沿海方面（“光一号作战”）和华中沿海方面（“光二号作战”）。后者的指导方针是预定在本年夏初，加强长江下游特别是上海周围的战备。美军进攻时即调用可能使用的兵力与之进行决战，以消灭敌人。因此，拟集中派遣军的主力准备决战。根据这种设想，兵力运用、兵备计划和华中、华北方面军有关事项，摘要如下：

一、预定从华北调往上海附近兵力如下：

第六十九师团（运城）、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大同）4月调出。

第六十三师团（北京）、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新乡）、第五十九师团（济南）5月调出。

第一一〇师团（河南）、第三战车师团（河南）6月调出。

二、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团，预定在5月调往徐州。

三、为了便于向上海调兵，4月上旬，在华北新设五个独立警备队。

四、应迅速加强武器的自给，特别是对美作战兵团的装备，尤应充实坦克部队。

五、为了对美作战，要重视特攻战法（以下略）。

除以上光号作战以外，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又接到命令，必须尽可能迅速占领老河口附近。

3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在4月中旬，将六十九师团及一百一十八师团调往上海（根据5月28日命令，自6月10日隶属于第十三军指挥之下）。

华北方面军治安警备和兵力配备的变化

治安警备 华北方面军京汉作战结束后，针对管内治安状况，于9月上旬制定“华北警备革新计划”，采取按照各兵团的兵力情况，对警备部署的整顿进行了指导。然而，新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深感：为了适应紧迫的全局形势，不仅限于警备，必须刻不容缓地制定包括所有各方面的综合措施，迅速果敢实行。因此，9月25日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下达了新计划，强调加紧进行决战的准备工作。

新计划的详细内容虽不清楚，主要是刷新警备、整顿兵备、做好防空措施，以及有关政治、经济的“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剿共强化治安要领”等。

参考：关于“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华北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本“纲要”系9月上旬在中国派遣军政务负责人会议上对大纲进行了调整，由方面军政务主任参谋塚本政登士中佐起草后，作出决定，并在上述兵团长会议和10月4日连络部长会议上作了传达。纲要是以军为中心，强力推行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要使已经不参与政治经济工作的军方重新进行干预，从此时开始，强调“向实质上的军政转移”、“军司令官和大使两位一体制”的主张。

对此，塚本参谋有如下回忆：

当时，日本对于战争必要的战略物资的增产和向国内的运送，要求非常紧迫。同时，随着京汉路的打通，日军在中国大陆上有了机动余地，必须加紧对共军的处理，节省华北的兵力。然而在华北，一般说来，对日本严重危机的时局尚无正确认识，缺乏自觉和紧张的精神。此外，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发挥积极主动性，我方虽按照“对中国处理根本方针”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南方战局的恶化，不相信日本的思想有所抬头，中国政府更加威信扫地，越发软弱无力。另一方面，由于京汉作战，共军乘方面军主力集中黄河南岸的机会，向河北省北部及满洲国境方面伸张势力，该方面的治安已感不安。

在此形势下，起草了“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其方针大体如下：

一、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往日本输送，以支持战争。同时，为了节省海上运输力量，尽量在华北制成成品，为此，决定将日本一部分炼铁高炉移至华北（未及实现战争即已结束）。

二、由于共军不能早日消灭，必须确保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的治安，以保证战略物资的收集和运输不受阻碍。特别是关系重大的开滦煤矿，由于治安很坏，务期早日确保该地区附近的治安。

三、应使在华北的日本人，充分认识全面战局和日本的实际情况，改正松懈不振的状态，加强团结，并进行必要的训练。

四、上述各项措施，以日军为中心，大力予以推进。改变过去以日本大使馆和由中国方面出面的麻烦作法。这就是说，要以军为中心，将日本大使馆、中国方面各政治、经济机关、新民会等从实质上统一起来。

但是，对中国方面的利用依然不变。

按照上述方针，各兵团均致力于管内的治安肃正、建设治安村、组织民兵工作，以及支援警察活动和收购物资等。但是管内形势依然不见好转，未能收到显著成果。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澄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当时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对方面军确保治安的形势有如下的叙述：

对于“面”的控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确保“点”和“线”的措施。当时考虑到，如果确保了点（城市），物资以点为中心收集和分散，人也自然以点为中心进行活动。如果进一步确保了主要的线，向毛细管流通也就有了可能，那样，不仅城市，农村的生产也会发展起来。因此，如果军事上确保了点和线，只要措施得当，不单纯是经济，就连政治、文化也是可以在面上无限扩大的。

但是，缩小各警备部队负责的作战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是很不容易的，直至1945年4月以后才得以实现。当时是1945年秋季（疑为1944年一译注），方面军的主力部署在河南新占领地区。但占领地区的警备部队，一般都经验不足，大部分是素质低劣的部队。而且分散部署在广大地区，

兵力非常稀薄。对当时情况举例证明如下：

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于1943年编成，负责北京特别市、燕京道、保定道地区的警备。真定道的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属于该师团指挥之下。师团虽以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为部署守备重点，但第一线守备队与敌地区非常接近。京汉作战后管内治安日趋恶化，7月份唐县、8月份满城方面的守备队受到中共优势兵力袭击；9月份平谷保安队发生哗变、北京西直门分哨发生被狙击的事件；11月份南口、昌平地区、12月份密云地区敌情活跃起来；炸毁铁路或未遂事件屡屡发生。因而，师团为了应付此种局面极为纷忙，野副中将的年终述感如下：

一、“静”的警备是失败的根源，要有坚固的据点设施和机动部队，要进行“动”的警备活动，不要陷入驻防和守城。

二、剿共战的成败，不在于战斗力如何，关键在于情报。要和特别警备队保持密切联络，在各行业各团体内部组成间谍网。

三、讨伐要以少数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夜间行动为主，不要走大道，要经常考虑伪装我军前进方向以欺骗敌人。

四、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要尽力发现其地道。

五、要以陆军连络部作为政治经济幕僚来使用。

六、组织居民联防、联攻。在铁路的重要地点设置伏兵。

有关冀东的情况：

方面军特别重视冀东地区的肃正工作。在北特警司令官统一指挥下，以北特警主力进行肃正、剔抉作战；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竹内安守少将）和华北治安军主力作为机动部队进行剿共作战。但是，李云昌（原文如此——译注）率领的第十三军分区的部队，以冀热边境山岳地带为根据地，与平北地区的肖克军联合一起，继续活动于热河和河北省内。北宁路以南平原地带一部分共军的活动也非常积极。为此特规定：“在敌地区内日军的行动部队，最低限度要有两个中队。”

1944年12月，根据关东军的提议，与华北方面军建立了协定，1945年1月派遣满洲国军到冀东归北特警司令官指挥，配属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该部队由装备优秀的一个步兵旅（汉族部队）、一个骑兵旅（蒙古族部队）及十个警察队所编成，步兵旅部署于北宁路北侧地区，骑兵旅部署于该路南侧地区。（在4月增派了铁路警护旅，总兵力约达一万五千人。）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要求各大队长指挥各自地区内的有关部队，自己则作为机动部队进行讨伐肃正作战。满洲国军由于地理不熟，剿共经验不足，以及与友军联系不够密切，开始损失较大，随着对情况的熟悉，逐步取得了效果。

改变兵备 1944年底，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中的主要部队有：第一军（第六十九、第一百一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十、第十四旅团），第十二军（第一一〇、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一十七师团、战车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驻蒙军（第一百一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直辖部队（第五十九、第六十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五、第八、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第二旅团、第十二野战补充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等。

但是，至1945年，除确保现占领地区外，尚须对美、苏、中进行作战准备。此外，派遣军为了进行“光号作战”，要由华北调出大约七个师团去上海方面。为此，1945年2月1日，根据军令甲第十八号改变兵备，然而在进行改编时，方面军的各部队必须一面担当作战准备和警备任务，一面自己进行改编，工作极为困难。

兵备改变情况如下：

一、预定担任对美作战兵团的“甲”师团化

(一) 第五十九、第六十三、第六十九、第一百一十七、第一百一十八师团的各师团迫击炮队(本部及三个中队、编制定员553名), 3月15日整编完毕, 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

(二) 上述各师团及第一一〇师团的各该工兵队经过改编予以加强(改编后包括: 本部二个中队、一个器材小队, 编制定员901名, 人员数约增至原来的5倍)。

二、增强独立混成旅团的治安警备力量

对独立步兵大队实行增员改编(包括本部、四个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 一个步兵炮中队、一个通信队。编制定员1,549名, 为原来的1.9倍), 旅团炮兵队(包括本部、二个野炮中队、一个山炮中队。编制定员582名), 旅团工兵队(包括本部、二个中队。编制定员531名), 4月30日编组完毕。(旅团编制定员8,439名。)

三、野战补充队的改编

以第十二野战补充队为基干, 于2月20日在大同编成第九十二旅团(旅团长为原补充队队长瓦田隆根少将, 该旅团由司令部、独立步兵第六百一十五~第六百一十九大队、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组成)。

旅团预定与徐州地区的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交换警备, 但因第十二军老河口作战的关系, 转到了河南省郾城地区。

四、接替调出兵团任务的独立警备队的编成

独立警备队, 系由司令部、六个独立警备步兵大队、一个独立警备作业队所组成, 定员8,857名。独立警备步兵大队系由本部、五个中队、一个步炮队所组成, 定员1,365名。中队有队长以下220名, 配备轻机枪六挺, 掷弹筒六个。步炮队有队长以下110名, 配备重机枪二挺, 步炮二门。作业队有队长以下235名, 配备轻机枪、掷弹筒各一。根据军令规定: “独立警备队司令官隶属于军(方面军)担任要地的警备。” “独立警备队司令部的工作, 适用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中有关旅团司令部之规定”。

3月9日, 下令编组第三——第七独立警备队, 30日编组完毕。4月5日, 分别于所在编成地区附近担任警备(其情况见下

表)。

独立警备队	司令官	独立警备步兵大队	编成地	战斗序列
第三	古贺龙一少将	第十三—第十八大队	北京	华北方面军
第四	坂本吉太郎少将	第十九—第二十四大队	大同	驻蒙军
第五	佐久间盛一少将	第二十五—第三十大队	运城	第一军
第六	饭田雅雄少将	第三十一—第三十六大队	新乡	第十二军
第七	冈村胜美少将	第三十七—第四十二大队	保定	华北方面军

五、华北派遣宪兵队的改变：除原有的天津、北京、太原、张家口、济南及特设冀东宪兵队（1944年7月5日特设）以外，新设青岛、开封宪兵队，于3月15日编组完毕。

六、其它，临时编成独立速射炮中队，独立山炮兵大队，独立轻装甲车队等，并改编加强野战高射炮联队，兵站医院等。

以上各部队，是以当地各部队抽出的人员为骨干，或由混成部队匆忙编成，故装备和人员均不充足，在独立警备队中，有的部队人员还不到50%，而且素质也低劣。转到炮兵队和工兵队的人员，大部分是步兵，很多部队需要进行再教育。

如下表所示，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的一百二十五个大队，约十九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它特种部队除外）。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对美作战准备和老河口作战 1945年1月底，中国派遣军命令山东半岛开始对美进行作战准备。由于该方面战备的重要程度逐渐增大，决定新设军司令部。原来第五十九师团为该方面的骨干兵团，但该师团调往上海方面，山东半岛已无师团，于是不得不由方面军直接指挥很多警备部队。

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演变情况表 (1941.12—1945.3)

时 期 兵 力	1944年4月				1945年3月
	1941年2月	1943年5月	进 攻	治安警备	
驻 蒙 军	14大 (18,500)	17大 (25,300)		14大 (15,600)	16大 (27,100)
第 一 军	47大 (59,900)	39大 (57,100)	17大 (17,400)	12大 (18,000)	27大 (44,300)
第 十 二 军	24大 (32,600)	36大 (54,300)	32大 (61,400)	21大 (29,300)	28大 (56,000)
方面军直辖	47大 (60,100)	50大 (67,600)	11大 (18,300)	28大 (32,000)	54大 (67,000)
计	132大 (171,100)	142大 (207,300)	60大 (97,100)	75大 (94,900) 135大 (142,000)	125大 (194,400)

注：括弧内为大概的人数。

3月13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四十一号命令，组成第四十三军司令部，4月10日编组完毕。在此期间，于3月22日下达了第四十三军的战斗序列。4月10日将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九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均划入第四十三军隶属。从此山东半岛的对美作战准备工作进入了轨道。

注：第五十九师团从1944年秋开始研究对美作战，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于1945年1月以后在塘沽海岸修筑防御工事。

另一方面，在西方进行了老河口作战（鄂豫作战）。至1944年秋，以老河口（郑州西南约三百公里，今湖北光化——译注）为前进基地的中美联合空军的的活动逐渐活跃，京汉铁路和长江下游，甚至津浦铁路也受到很大威胁。军队和军需物资的运输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派遣军1月29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摧毁老河口敌人的前进飞机场。

方面军命令第十二军担任此次作战。第十二军于3月22日发起攻势，4月5日占领老河口。但是重庆第一战区军在西峡口附近进行反攻，此后两军长期连续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另外，方面军根据中央的方针，于3月9日夜解除了华北的法国军队（北京、天津、秦皇岛）的武装。

确保经济和运输的对策

政经指导方针 随着战局的恶化，事态更加紧迫，必须火速将满洲和中国的资源与日本国内的生产力结合起来，努力造成立见功效的作战力量。为此，于1945年初，对满、华经济政策，以及为了确保大陆与日本之间的运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另一方面，当时在中国，就连比华中较为安定的华北，也由于支援战争的要求和战局恶化，造成民心的动摇，致使经济形势日益险恶。就连付出最大努力支援日满物资的运输和军用自给物资的增产，也逐渐难以确保。铁路运输力下降，统治经济不完善，以致囤积居奇、黑市交易盛行，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上市情况显著停滞。同时，联银券继续增加发行，各种货币任其流通，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增产开发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中国方面的官吏和经济人士情绪消极，法纪松弛，追求私利。在中国的日本人及国策公司也缺乏适应时局需要的情热，加以担任指导的陆海军、大东亚省各机关，其来自中央的指令系统不同，致使当地各机关的互相联系很不充分。例如：在筹措当地用物资和向日本送回

物资时，互相竞购，以致造成价格上涨。

在此形势下，华北方面军首脑认为必须改为实行军政，以此意见上报中国派遣军，并计划进行内部调整，从而制定出反映民意的决战政策。

1月1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审议并决定了“确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及“在中国统一筹措物资要领”。该“对策”的目标是：“以军的战时自给及支援日满为首要任务。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发生破绽，确保支援战争，尽力维持和培养当地经济力量，维护现行通货制度”。在实行“对策”时，“要使日华军、官、民真正成为一体，在军的强力推动下，重视当地意见，以期迅速取得各项措施的综合成果”。为此，决定实行（一）推行强有力的综合措施。（二）调整军队自给与支援日满工作。（三）维持和培养当地经济力量。（四）维护现行货币制度。（五）刷新日本人的经济活动。

“要领”是推行上述措施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筹办日军自给和向日本送回物资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重点在于提高筹办物资的效率，同时要制止由于互相竞争造成价格昂贵的现象，以期迅速收到效果”。

在华北方面军方面，去年9月决定大力推行的“华北紧急措施纲要”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从年底到年初迅速转向军政的主张强硬起来。但是，反对的势力也逐渐增强。到1月上旬，改变施行强权的想法，纠正依靠实力统制过火的行动，依靠日华军、官、民的紧密协作以打开政治经济困境的想法占了上风。4月15日为了实行上述中央各项施策决定了

“适应形势的政经指导方案”，作为方面军的综合措施。在此期间与各方面反复磋商，先从有可能的部门开始实行。

2月16日，在华北方面军兵团长集会上，下村方面军司令官在训示中强调指出：“不得滥用强权，各项事务不得独断专行，要力戒自以为是，遵循提携共荣之道。”

另一方面，1月底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辞职，2月8日王荫泰就任委员长，为适应日本方面的新施策，调整了阵容。

注一：神崎第三课高级参谋关于“适应形势的政经指导方案”有如下记载：

新方案是期望思想和政策上的大转变。其基本想法是：（一）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要确保政治上、经济上重要地域，即与兵力相适应的点和线；（二）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互相协作；（三）尊重中国人的自主自立，纠正过火的实力行动（缓和统制，逐渐转向撤销统制）；（四）军队充实自己的战斗力，密切与中国官民的协作关系（政治、经济措施胜过武力）等。

据此精神，经多方研究，结果，选出当前可以尽快实行的有以下各项：（一）撤销内河水运的统制；（二）处理可能向中国方面移交的煤矿等；（三）根据协商价格促进物资收购（禁止靠武力或行政力量收购）；（四）从中国各机关撤出日系职员的范围和实施办法；（五）设置大使馆和军的政治经济调整机构；（六）修改陆军连络部服务要领；（七）调查囤积等。

该方案4月15日得到批准。5月上旬正要全面推行时，我调转工作免去第三课长职务。因此，除撤销内河航运统制一项外，其它各项在更换课长后，仍旧维持现状。

注二：在方面军首脑中间，对“转向军政”的想法，从1月中旬以后虽未见公开表现，但强硬的意见似乎仍未打消。2月下旬，方面军

参谋长去东京汇报各项工作，其中申述了“军及大使馆的一体化的具体方案”，并要求迅速实现，希望实行军的强力统制。

关于上述神崎参谋的工作调动，与部内外特别是各统制机关反对“撤销统制政策”的活动有关。围绕统制经济的是非问题一度产生动摇，但从日满华经济一体化、物资总动员的观点看来，也是有问题的。

确保大陆重要运输的对策 为了确立日满华战争自给体制，以确保大陆和日本的重要运输为前提，大本营于1944年12月11日下令组成大陆铁道队隶属关东军司令官，规定由该司令官负责鲜、满、华铁路整体军事运输计划的执行。1945年1月1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审议了“确保大陆重要运输措施”，决定“为了提高大陆运输效率，暂时先将对日总动员物资（对大陆总动员物资）的运输，运到大连港为止，并要作为准军需物品一律按军事运输办理。”接着，该会议又于3月10日决定，“在暂时期间内，华北及华中两铁路的运营，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管理，军管开始日期定为1945年4月1日”。

大本营首先于3月15日，以“为适应日本本土决战，1945年上半年大陆铁路运营要领”指示关东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在朝鲜），要紧密切联系，以确保各该管地区内的铁路运输，并于3月22日改编了大陆铁道队，将关东军和朝鲜军的铁道队统一起来。又命令第一野战铁道队（在华北）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辖。至此，在大陆上的重要物资，以军事运输形成了整体的运输体制。但是，运输与生产的调整极为困难，一般民需物品受

到严格限制，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维持和培养。

注：铁路军管是以“暂时期间内”为前提的，一俟战争结束后，再与中国方面磋商，从根本上进行调整。此外，虽然实行军管，华北交通公司和华中交通公司依然存在，两公司的日本工作人员算作军属（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译注），当地的工作人员按军属待遇，各种供给物品由军方支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关于实行铁路军管问题，于3月30日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缔结了协定。

四、1945年4月至6月的状况

中国派遣军的新作战计划

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开始登陆。4月5日，苏联通告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同时急剧向东方增兵。欧洲战局向有利于盟国发展，战局已进入末期。在日本国内，4月上旬政局变化，7月铃木内阁成立。日本本土的防卫作战也在正式进行准备。

4月上旬，大本营对于中国派遣军新的作战指导方针，再次进行审查研究。4月14日，为了紧急应付美、苏的形势，对于如何运用兵力和促进对美作战的准备，提出沿岸战备的重点，应以首先在上海附近、其次在山东方面为宜的意见，并以此与派遣军进行联络。随后于18日，命令从华中、华南调出四个师团，在华中、华北重要地区集结待命。同时于4月12日命令在华中新设二个师团、华北新设六个独立警备队，作为调用兵团转出后的补充力量。

中国派遣军按照大本营的意图，于4月27日，除上述四个师团调出外，并部署第十一军从广西撤退，收缩了华南方

面的作战范围。此外，预定从华北调往上海方面的兵团中，除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按原计划不变外，命第六十三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改于北京、天津地区集结。第五十九师团改于济南附近集结，要求尽快完成集结。（这是由于上海方面作战设想的改变，对苏作战形势逐渐紧迫，山东半岛方面战备需要增加，以及在老河口作战西峡口附近继续进行激烈战斗等的缘故。）

大本营计划加强南满及朝鲜战备。5月上旬以来，就兵力使用问题同中国派遣军进行了联络。28日将湖南、广西、江西的兵力转移到华中、华北，以加强该地区战略形势，30日命令派遣第三十九（第三十四军）、第五十九、第六十三、第一百一十七师团前往满洲和朝鲜北部，由关东军指挥，又在当天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除执行现有任务外，还必须作好对苏作战的准备。

注：上述命令是梅津参谋总长前往大连，于6月4日在该地召见冈村总司令官时，直接传达的。

因此，中国派遣军立即修改原来的计划方案，制定出新的作战计划。其中有关华北方面军的事项，摘要如下：

第一 作战方针

一、中国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苏、中采取持久的战术，同时应歼灭沿海要地来犯的美军，以利于日本本土的决战。

二、对美战备的重点，首先是华中三角地带，其次是山东半岛，但应尽量于事先识破敌人在华中、华北登陆的企图，于适当时间集中派遣军的主力部队。

三、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时，也要确保南京附近、北京附近及武汉附近的重要地域。

第二 作战指导纲要

六、华北方面军确保华北重要地区，在9月底以前，要大体完成山东半岛方面对美作战准备，同时与关东军相策应，大体完成对苏作战准备。此外，第五十九师团、第六十三师团、第一百一十七师团等迅速派往南满及朝鲜北部，使之隶属于关东军，混成第九十二旅团于9月份派往徐州，归还第十三军属下。同时命河南地区的第十二军主力及山西省南部的第一军一部分部队作好适时撤回的准备。

七、速将第四十七师团派往济南，隶属于第四十三军（第四十七师团，为第六方面军属下的兵团，编入第二十军指挥之下，正在参加湖南省芷江作战）。

第五 三号作战指导纲要

二九、华北方面军将第四十三军部署在山东半岛，使之专门进行对美作战的准备，以其主力在青岛、日照附近沿海及后方重点地区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以一部分主力部队部署在济南附近，使之构筑进攻据点，并考虑到河南地区及山西省的兵力撤回，要使第十二军及第一军充分做好修筑防御工事和各项准备工作。

三七、于光三号作战时，倘苏联果真参战，华北方面军要与关东军互相策应，以驻蒙军（增加一个师团）及承德支队，力保张家口及承德附近的重要地区，尽力击败苏军。同时，以京汉地区所有兵力，坚决固守北京附近的重要地区。

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召开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会议，按以上计划布置了任务。

华北方面军的状况

改编及缩小作战范围 在华北编成第九—第十四独立警

各队，作为兵团调往上海后的补充兵力。根据4月12日的军令陆甲第六十五号，于5月10日着手编组，5月30日在山东及河南省编组完毕。按照4月20日的大命，被编入各军战斗序列。各队以在中国的各部队抽调的人员为骨干，由当地应征入伍者编组而成，人员不足，装备极坏。（其编制与原有的警备队相同）编组情况如下表：

独立警备队	司令官	独立警备步兵大队	编成地	战斗行列
第九	石川中夫少将	第四十三—第四十八大队	济南	第四十三军
第十	星善太郎大佐	第四十九—第五十四大队	郑州	第四十三军
第十一	濑田武二郎少将	第五十五—第六十大队	兖州	第四十三军
第十二	泷本一磨少将	第六十一—第六十六大队	青岛	第十二军
第十三	吉武秀人少将	第六十七—第七十二大队	郟城	第十二军
第十四	大井川八郎少将	第七十三—第七十八大队	邓县	第十二军

满、鲜方面调用的兵团，4月以后逐渐集结，第六十三师团于6月中旬、第五十九师团于7月中旬、第一百一十七师团于6月下旬——8月中旬，经过山海关转进，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第四十七师团奉命从6月27日隶属于第四十三军。但由于芷江作战后返回集结困难，其主力到8月中旬仍在武汉地区。

方面军随着精锐部队的减少，痛感必须彻底改变警备形势，采取了缩小警备地域、集中兵力、实行机动讨伐的指导方针。但是，各兵团考虑到日军撤出地区中国方面警备力量的不足，原来为日军出力的居民会受到中共方面的迫害，因

而缩小作战范围不易实现，处于半身不遂状态。为此，方面军在配备独立警备队时，强调只确保重要地区和路线。

6月，根据派遣军的新作战方针，方面军决定更加缩小作战范围，逐步使美、中军队延缓前进，而坚守济南、石门、京津地区，以进行机动灵活长期持久的防御作战。于是作了以下部署：第一军留下一部分，将主力调往石门方面。从第十二军抽出二个师团，由军的主力确保黄河一线。第四十三及驻蒙军分别作好对美和对苏的作战准备，并确保占领地区内的主要城市、交通线以及资源产地。

注一：方面军在讨论关于确保重要地区的问题时，司令部内部，有的从纯军事观点出发，提出放弃京津地区的意见。下村司令官批驳这种意见指出：“放弃此一地区，方面军即无存在意义。”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对司令部内一般情况曾有如下记载：配合关东军对从北方进攻的苏军进行作战准备，对于如何迎击在山东省或河北省东北部登陆的美军正在研究中。方面军为了研究如何进行对苏作战，曾举办军棋演习。关东军派来参观演习的该军作战主任参谋竹田宫殿下说：“关东军对付苏军的进攻，只能采取游击战。此外，热河方面的防卫，连补充一个微弱师团的余力都没有”。听他如此说明，很明显，如果美苏同时进攻，我军将一筹莫展。因此，方面军下决心以北京一带地区为最后阵地，坚决死守。在山东方面重视抗击美军登陆作战，为了尽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加紧进行构筑防御工事，士气颇为旺盛。

注二：方面军的对苏作战计划不详，作战参谋井门满明少佐有如下回忆：“6月底，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举行了研究会，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及关东军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方面军的设想是：以驻蒙军的全部和第一军的一部固守内、外长城线，并以坦克第三师团及方面军抽出的兵力调往蒙疆及热河方面，另从华中调来一个师团增援。此外，重新明确热河西南部地区，属于方

面军作战地区，该地区所驻关东军由方面军指挥。当时，方面军估计苏军进攻的时间将在9月底，决定进行准备工作”。

注三：据高桥参谋长的笔记内载：“为了尽量保持兵力的灵活性，必须考虑缩小作战地区，为此，从春季以来再次展开了‘对阎锡山工作’。8月5日，方面军参谋长亲自带领第一军参谋长进入敌地区，直接和阎锡山会见，双方约定：‘首先将山西省南部一带的警备让给阎锡山，并让阎的代表常驻太原，然后逐步进行交接警备，进一步密切联系有关共同合作对付共军’等事项。”

原方面军情报参谋堤宽少佐关于“对伯工作”的回忆如下：

我在主任参谋任内，从1944年9月开始，至1945年2月正式进行工作，此次对伯工作改变了方针，即：“为使第一军大部分兵力便于调往主要决战方面，要让阎锡山谅解亚洲大同团结的意义，首先与我合作进行武力剿共，然后合作进行政治剿共。应避免与阎军的摩擦。”工作进展顺利。3月，为了武力合作，允许阎军进驻我驻屯地区。6月华北政务委员会督办苏体仁降格任山西省长，对阎进行劝说，并于21日派苏到阎锡山处联系政治合作问题。随后于8月5日，由苏陪同方面军参谋长高桥中将、第一军参谋长山冈少将在湿县某村与阎锡山会见，向实现政治合作迈进。9日返回北京，当天接到日苏开战的报告。很遗憾，未能见到工作效果。

各兵团的警备 以下是指导各军缩小作战范围和各兵团警备的状况：

驻蒙军 2月以后，改变作战计划以对苏作战为第一，将张北以南的全部阵地作为集中掩护阵地，予以增强。在张家口附近开始修筑可以容纳军内各机关的大窑洞。在蒙古草原的重要地点安置情报机关，以加强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并对五原的傅作义进行妥协工作。根据其结果，研究并进行准备，通过让出绥远省缩小我警备地区，以便抽出对苏作战的

兵力。

注：5月中旬，曾经视察该方面的秦参谋次长的感想是：“驻蒙军的对苏作战准备无所作为，管内治安恶劣。”实际上所属各兵团，并未能按照军的意图完成任务。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渡边渡少将）5月底至6月上旬，收缩警备撤出涞源，固守铁路沿线地区。这是为了适应驻蒙军的意图和应付管内中共势力的显著扩大，同时为了重建治安地区而采取的措施。

注：渡边少将对政治特别关心而且经验丰富，在其笔记中有如下叙述：“我于1944年11月上任，当时管内治安紊乱，民心背离，感到必须改革各项治安措施。基于几年来的见解，计划在与我方势力相适应的地区内建立模范善政区，与中共‘解放区’的善政竞争，以争取民心。该方策以‘要爱护、同情、尊敬中国人’为口号。其内容为：（一）将军队驻地缩小到与兵力相适应的范围内；（二）对军官和日本官吏进行再教育；（三）控制武装讨伐；（四）整顿日本侨民的风纪；（五）撤回配属于北特警的部队；（六）刷新地方行政官吏的任用与推进政治治安工作；（七）整顿警察、邮局、监狱；（八）县政完全由中国人施行。此一德化政策，虽也收到若干效果，但大势所趋终归无法抗拒。

第四独立警备队虽然装备很差，人员也不足，但接替第一百一十八师团及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承担了大同、包头广大地区的警备任务。管内南半部中共势力显著强大起来，并从偏关方面继续北上。西半部有重庆的优势兵力采取包围形式，正在进行炸毁铁路、策动武装团体（蒙古军、警察队、铁路警护团等）叛变和瓦解等工作。警备队不断进行剿共讨伐，但管内治安状况并未好转。因此无力进行对北方作战的

准备（主要是在包头、武川、平地泉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作迄无进展。

第一军 指导全军在情况最坏时也要以确保太原附近及石太路沿线地区为最低限度，缩小作战范围。但是中共势力显著扩张，而且由于南部地区撤军，需要确保同蒲、石太路沿线地区，所以警备部署仅作了小的变动。5月为了策应第十二军老河口作战，以第五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的一部分进行了“岔官作战”（灵宝南方官道口，岔道口地区）。此外与阎锡山军的地盘协商及警备接替等仍在继续进行。中共方面正专心致力于地下工作，尚未发现积极的武装行动。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山田三郎少将），4月，为了将兵力收缩到同蒲路沿线，变更了部署。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板津直俊少将）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将警备部署收缩到太原附近及石太路沿线地区。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欣少将）4月放弃南部地区，重新重点部署于东潞路沿线地区。以上地区均靠近共军根据地，由于共军的行动活跃起来，各旅团在各该管区内积极进行了肃正讨伐。第五独立警备队4月初接管了第十九师团警备任务后，同月下旬在陕州桥头堡地区进行肃正讨伐作战，6月进行岔官作战，担任对重庆军的戒备。

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收缩了各警备大队的警备地区，将一部分地区转让给阎锡山军。4月转入新态势，立即在同蒲路东面及离石以东地区进行剿共作战。随后，各大队组织和训练挺进队，对活动于管内的共军

连续进行肃正讨伐。各兵团每次改编都要抽出精锐兵力，以致部队素质低劣、装备不足非常突出。

第四十三军 估计美军的主要登陆地点为青岛，对防御登陆积极进行准备。同时，为了对付美中两军总反攻，在济南地区修筑防御工事，并努力加强管内治安工作。

为此，从4月25日至5月26日之间，实行“秀岭一号作战”，命各兵团为确保各自管内的重要地区进行了扫荡。本作战结束后，命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部署于青岛附近，独立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浅见敏彦少将）部署于日照海岸附近，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一部分部署于海阳县海岸（青岛东北约一百公里），作好对付登陆作战准备。与此同时，新设的各警备队部署于后方地区担当警备任务。日照及海阳地区原为共军的根据地，我军讨伐肃正极为繁忙，以致推迟了构筑工事的工作。济南附近修筑工事虽由军直辖部队负责，但材料不足，工作也难以进展。此外，为了剿共作战组织和训练了挺进队，但因兵员素质低劣、装备不足，未能收到效果。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路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的野宪三郎少将）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旅团立即转入反击，将其击退，但此后该地区治安急剧恶化，天津市内也不断发生恐怖事件。

第十二军 以新编各独立警备队接替京汉路沿线及兵站沿线地区警备任务，主力部队在西峡口方面与重庆军进行激战（豫鄂作战）。6月，基于方面军缩小作战范围的方针，首

先将坦克第三师团调往北京、天津地区，该师团从7月上旬以后陆续进行转移准备。

方面军直轄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在日益恶化。在冀东地区，不仅威胁京山路，对满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因此，方面军从6月下旬，将分散在青岛、济南、太原、石门等地的北特警各警备大队调往冀东地区，7月以后，以北特警全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及配属的满军进行了冀东作战。

最后的和平工作

由于美军进攻紧急，特别是受对苏形势的逼迫，势必改变在中国的战略对策。为此，中央决定对重庆和延安进行政治工作，首先要尽力与重庆实现停战。

对重庆的政治谋略，一向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以自发形式进行的，由于工作停滞，几乎陷于绝望状态。于是，今后不能只顾维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信义。作为最后手段，决定在中央由陆军大臣负责，在当地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接进行工作，4月18日发出如下的参谋总长指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今后按照以下要领负责进行对华政治谋略施策。但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庆正在进行的政治工作仍不变。

一、利用目前对华战略优势，大力进行对重庆的政治工作及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力求与重庆实现停战。

二、尽量利用对延安的谋略施策，作为对重庆策略的牵制手段。目前要极端秘密地分别对重庆和延安进行工作。

注：据《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载称：“对重庆政治工作的目标，作

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环，在于利用重庆政府，以谋求缓和盟国的对日要求。在研究阶段，曾有主张对重庆和延安并行的方案。同延安的联络从去年夏季就已经考虑，但并无任何具体措施，今后的希望也很渺茫。于是决定以仅有一线希望的对重庆工作为主。然而不能考虑与重庆政府单独讲和，又因对重庆的谈判有变为对美谈判之虞，故不搞全面和平，而只是尽力促使实现停战。此外，该工作概由冈村大将负责进行，这是中央的意图。”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大将对5月来访的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完全达到我们的希望是不可能的，但愿作到能使重庆政府至少默默保持中立的态度。”他计划将一直在秘密进行的此项工作推向前进。

此外，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也从2月下旬和重庆第十战区副司令何柱国取得联系，于7月9日在河南省新站集就和平问题进行了会谈。但是互相都在试探摸底，尚未进入谈判阶段。准备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会见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也无结果。

另一方面，对中共实行何等策略则不明确。只是中央近来对思想战极为重视，对于英美的思想攻势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不断向军队和全体国民发出警告，并努力进行宣传教育。

兹将陆军省兵务局的一位职员以“思想战线”为题，在《偕行社纪事》杂志（军官阅读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一段摘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由于在中国民众中进行唤起民族觉醒工作，在农村中进行政治经济工作，成功地掌握了民心，其势力正在日益壮

大。党的势力壮大虽然并不意味着全中国的赤化，但是党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的一翼，从而具有推进世界革命一环的本质，因此，我等不能等闲视之。

对皇军将兵的瓦解工作，对国民政府官吏的反正工作，对上海及其它治安地区内重要城市和经济工作的扰乱等活动，日益积极、顽强。近来估计美军将在中国登陆，希图与之取得联系，正在极力奔走所谓“接岸工作”。

对日本国内，企图与左翼进行联系，同时趁调来华工之便，混进谍报谋略组织，使之担当各种谍报任务，或对军事设施进行放火、破坏工作。最近各地就有检举的此种行动。

再有，对朝鲜、台湾、满洲和其它共荣圈内的各地区进行赤化工作，特别是以支援民族独立运动为手段，在东亚各地到处伸展其魔掌。对此，确定综合对策，并付诸实行，实为当务之急，并且要了解他们的意图和战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对于他们所策动的对象——满洲和中国南方诸地区的民众，我等必须积极进行善意的诱导。作为指导者，我等自身更要自觉地严格要求，端正自己，此乃根本问题。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译略）

注：在此期间，中苏关系表现密切，7月开始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以前，赫尔利大使于4月15日曾就国共问题同苏联首脑进行会谈。当时，苏联方面说过：“中共党员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他们认为必要而正确的改革，苏联并未援助中共；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内部分裂和内战；苏联希望同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协调关系；苏联对新疆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件表示强烈的关心。苏联主张中国政府要防止对苏联人民差别待遇的一贯态度不变”。斯大林特别指出：“苏联和英美两国都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同时对中国全国军队完成统一愿予协助”，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地表示同意。然而，这不能认为是苏联的真意。美国接到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后，给赫尔利大使发出的训令曾指出：“这是当前形势下苏联的态度，并

非出于长远局势的产物，不要过于乐观地使中国政府轻易对之产生期望”。（本段中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译注）

五、战争结束

日本的停战

8月9日接到苏联参战的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立即部署上海方面的一百一十八师团（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向张家口挺进，并命令转用于南满的兵团作好出发的准备。当夜接到对苏准备发动全面作战的大命，遂将新编入中国派遣军指挥下的关东军承德支队，划归华北方面军指挥，并命令该方面军“当外蒙方面苏军来犯时，应以现有兵力将其击溃”。

华北方面军命驻蒙军进入现有阵地，掩护我方集结兵力，同时于12日将第一、第十二军从山西南部及河南撤出，分别部署于北京及济南方面。13日接到优势的苏蒙联合军从张库（张北——库伦）大道方面南下的情报。

中国派遣军14日接到全面开始对苏作战的命令，15日拜受停战的诏书，16日收到停止积极进攻作战的命令，接着又收到“即刻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遂命令所属部队立即设法贯彻执行。然而，日本停战真情一经判明，重庆与中共的矛盾便急剧激化，竞相夺取日军的武器、资材和抢占日军占领区内的重要据点。自16日早晨以后，占领交通干线和要求小部队解除武装的情况到处发生，群情为之骚动，治安突然恶化。为此，总司令官对所属部队下令：除根据统帅系统的

命令外，对于所有要求一概拒绝，必要时可以采取断然自卫措施行使武力。

内蒙方面的苏蒙军策应共军的纷纷起义；重庆方面傅作义军想要抢先占领张家口，从19日开始进攻张北阵地。中国派遣军及方面军于19日指示驻蒙军“停止战斗行动，适当进行局部停战谈判”。但是，当地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受到苏军的攻击，正在交战中。因此驻蒙军从20日开始进行交涉，并将前来增援的第一百一十八师团主力（因17日以后逐渐到达）部署于张家口以南地区。从当天夜里开始送日侨后撤。苏军方面强硬要求解除全部武装，交涉未能成功。驻蒙军不得已于21日夜間，将主力部队向北京北侧地区撤退，一部分向大同附近撤退。苏蒙军也未再向前推进。

侵入热河方面的一部分苏军，于21日将负责警备古北口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一部分解除武装，并将负责交涉的参谋绑走，且有南下之势。方面军准备断然进行自卫，但苏军于22日夜間撤走。

在山海关，苏军于31日侵入，当地警备队事先后撤，避免了发生冲突，但残留的日本侨民蒙受很大损失。

注：蒙疆方面，从兴安岭侵入的苏蒙联合军，为主攻军的右翼助攻军，苏军拥有一个坦克旅、二个机械化旅、一个骑兵师、一个反坦克旅等，外蒙军拥有四个骑兵师、一个装甲车旅等，总兵力约四万二千人，拥有坦克约四百辆，大炮约六百一十门。其中，进入张北方面的先遣队，为机械化第二十七团（外蒙军）、第七装甲车旅（外蒙军）、第三十摩托车团（苏军）。进入热河的先遣队为苏军坦克第四十三旅，机械化第二十五旅，坦克第二百六十九团。

在此以前，中国派遣军于23日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中国战区所有日军，必须向蒋介石投降。”今井总参谋副长作为总司令官代表，于21日飞赴湖南省芷江飞机场与重庆方面代表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会谈，23日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冈村总司令官第一号备忘录，并接受了上述命令。9月9日，冈村总司令官在南京签署投降书。投降仪式在各个地区分别举行。北京于10月10日举行投降仪式。

当时重庆军主力远在华中、华南的西方地区，因此向日军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进驻迟缓。在此期间，日军仍在占据地区维持治安，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在华北，日军被卷入国共矛盾的旋涡中，由于拒绝了共军解除我军武装的要求，到处都有被其攻击受到损失的部队。从8月15日到11月底，方面军官兵为此死伤约二千九百名。此外，尚有很多问题：我第一军由于阎锡山强烈要求协助对付中共，将一部分军人以当地退伍形式连同一部分日本侨民被阎军留用；各地暴徒的掠夺暴行事件；战犯问题；对约达三十三万日本侨民的保护及撤退任务等。直到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国内，尚有许多波折存在。

注：下村大将就任陆军大臣，8月19日成为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根本博中将，关于战争结束后的状况写有以下的笔记：

在华北，日军严守军纪，继续艰苦奋斗，掩护国民政府军（指国民党政府军，下同——译注）和日本侨民的集中，直到国民政府军能够防御共军的侵犯为止，始与之进行交代，并将武器交出。同时，帮助侨民有条不紊地回国。在此期间，逃亡和失踪的，全军只不过数百名。所以如此，中国领导人的善意也是原因之一。从十一月开始，中国方面对我军一部分部队解除武装，主力部队则是

从翌年2月开始解除的。但9月30日在塘沽登陆的美军（在冲绳岛作战时，由于苦战对日军持有强烈反感）担当了在天津地区的警备。在中国方面接收部队尚未到达之前，竟将日军武装予以解除（10月11日完毕），这是美军的越权行为，同时也是由于缺乏对中共作战的经验所致。因此，治安一时陷于混乱，津浦路到处被共军切断，以致使国民政府推迟了进驻华北和满洲的时间。

中国方面的状况

一方面，中共在今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日军继续进行局部反攻作战，但估计到日本即将投降，抢在重庆前面开始了机动敏捷的行动。

8月9日，听到苏联参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天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题发表声明，指出必须调动所有抗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朱德也在10日向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延安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对解放区的所有日军及傀儡军队立即解除武装，然后将其占据的要地予以占领。接着，11日，命令在山西、河北、山东的旧东北系中共各部队要配合苏军的进攻，并为接受日满军投降，向热河、辽宁、吉林挺进（同上，第二号命令），命令驻在绥远、察哈尔及热河的贺龙、聂荣臻部队北上，策应外蒙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军）的进攻（同上，第三号命令）。同一天蒋介石也给各战区发出解除日军武装占领要地的指示，12日获悉朱德的进攻命令，立即命令朱德原地驻防待命。在法律上共军是在蒋介石指挥之下，但实际上早已脱离其统制。13日朱德向蒋

介石提出抗议，同时在15日，以“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投降。此外，当天中共向美、英、苏驻华大使馆送交了备忘录，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享有参与同盟国对敌国受降的权利，并且为了减少中国内战的危险，要求美国马上停止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武器贷与法案。

（以上未按有关中文资料校正。——译注）

基于此一方针，各解放区的中共武装部队展开了解除日军武装的作战。在此期间，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期缓和国共矛盾。然而，日军服从盟国的命令，拒绝了向中共缴械。美军也援助重庆军向华北挺进，因而中共的意图很少实现。但是由于共军很快进入满洲，以及苏军对共军的援助，为以后国共内战带来很大影响。

注：据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内称，满洲有日本人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工业组织网，有强大的输出余力，有富饶的农业地区。其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工业超过中国其它各地总和的四倍，发电能力将达其它各地总和的三倍，铁路密度为其四倍以上。而且解除关东军约七十五万人、满洲国军十五万人的武装后，即可成为一个庞大的兵工厂。因此，国共双方及苏联当然对之感到极大兴趣。

结 束 语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它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对这样两种势力，我军一方面要维持艰巨的统治，另一方面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谋略斗争。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从芦沟桥事件爆发到战争结束，打了八年有余，如果不是全面停战，这里的战争恐将长期继续下去。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结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总之，华北的治安战，是一场在战线的形状、战斗力的构成、作战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战争。而且，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华北本身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加以其它方面战局的影响，使华北局势更加陷入动乱多变之中。

此外，使治安战的经过和成果受到很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日本方面进行战争的目的或基本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所作的改变。

“确保华北安全”，这是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事变初期为大本营）给与华北方面军始终不变的基本任务。这一任务的目标有二：一个是有助于中国派遣军完成其作战任务，粉碎敌方继续作战的企图。另一个是保障当地政权友好、稳定地成长。前者为军事目标，后者为政治目标，两者

本来并无矛盾。这就是说，政治的稳定和成长，应该是提高政治潜力，使敌人失去继续作战的借口，削弱其抗战意志。但是，现实情况的进展，却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从而对于治安战的进行造成了困难。这是因为，当地政权的稳定成长使原来的战争目的消失，而降低为一种战争的手段了。这种不得已的转变，自然是由于大东亚战争造成的。

对上述转变过程根据资料稍加说明如下：

根据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决定的“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其根本目的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日满华三国结为友好邻邦，以共同建成东亚和平轴心”。当前的具体目标则为：“一、在华北及蒙疆从国防及经济上（特别是资源的开发利用）设立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区；二、蒙疆地方除前项外，为了防共，要确立军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总之，扶植和加强当地新政权，就是处理事变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在1940年11月30日签订的“日华新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条文中也均未改变。然而，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美国强大压力的影响，使战争目的的内容和实施策略有所改变，逐渐成为只顾强调权利的趋势了。

至1941年1月，在“对华长期作战施策要领”中，明确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要联系日满两国的情况，彻底开发和获得国防资源。同时，要有助于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11月5日，在决定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御前会议上，在“完成帝国国策要领”的“对华方针”中，明文规定：“肃清英美在华势力”、“诱导并促进占领地区内的华方要

人的积极活动”，“在对华经济关系方面，重点在于获取物资”。从字面上看，并未放弃培育新政权和安定民生，但与之并列的开发和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则由于整个战局的要求，逐渐被重视起来，并不可避免地上升为战争的根本目的了。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达到了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也就是要将上述目的贯彻到底。

为了适应中央根本目的的改变，华北方面军的基本布局当然也要随之变更。华北方面军的主要目标一向是放在培育和加强防共亲日新政权上的，历尽艰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的治安战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其一切部署都要慎重考虑提高改善民生和安定民心（虽然新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否出于民意尚属疑问）。然而自从1941年以来，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对于经济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大东亚战争爆发，直接支援日军全面作战的兵站基地的使命，越发受到了重视。在1942年中，由于有效地支援了整个战局，以及华北对共措施的进展，前述两种要求的矛盾尚未表现出来。从而认为根本目的也是可以完成的。但至同年年底，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实力，而实行了新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于是，现地驻军不再过问政治，以致由军、政、会、民综合力量形成的防共基础发生破裂。另一方面，整个战局也出乎意料地迅速变坏。兵站基地的使命骤然加重，为此，确保治安就逐渐变为完成该使命的一种手段了。

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即为悬案。起初主要是针对苏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到缓冲地带的的作用。但是，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地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结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此外，华北治安战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权应有的状态成问题。拥立当地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等政权，并使其健全成长，以摧毁重庆政权的基本方针，不能认为是错误的，错误的是政权负责人的选择和扶持的方法。无论华北政务委员会或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展开活动，其领导者都是些保全自己和追求权势的中国旧的政客。这些人缺乏新的政治观念，根本不想真正掌握民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看日军的脸色行事。最初，曾指望以其武装团体在日军削减兵力时起到补充兵力的作用，但结果连这一点也都落空了。因此，其政治势力的范围，仅限于日军羽翼下的地区，即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狭小的两侧。所谓亲口防共政权实际上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作为兵站基地支援了整个战争，开发和获得了大量国防资源送回日本，可以算是华北治安战的一个成果。然而，其中也有单方面的强行榨取，以及陆、海运输力量的掣肘等情况，从日满华一体总动员的立场来看，其成果是不能令人满

意的。

总之，从全面来看，华北治安战是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

仅以对共治安战为主题，举出主要教训如下：

一、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共特性的理解

完全理解土地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气候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虽然极为困难，但如对之不理解，要想采取适当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国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往往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和社会情况缺乏理解。当时，在中国建设统一国家的运动和民族自觉的风气已在兴起。但是，在很多日本领导人的头脑中，仍然看做是旧军阀时代的中国，对其新的动向并无确切的认识。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主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

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争取民众。

与此相反，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不够理解，因而长期未能掌握中共的这些实际情况。这也是由于中共的高度保密，使我方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至1941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于是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太大了。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因而，日本方面一度试图与中共进行交涉，或与完全无力控制中共的重庆政府进行交涉，以期取得妥协，但即使交涉成功，也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办法，终究不能达到防共的目的。

二、各种肃正建设的统一和连续性

无论从治安战的目的或中共的战略战术来看，将肃正讨

伐等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措施统一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当时由于受国际、国内舆论的牵制，在不能实行军政的不得已情况下，推行统一措施受到阻碍。在日本方面由于兴亚院（后为大东亚省）系统的当地机构与军方各行其是，因而有时政令不一致，或者在业务上发生重复和漏洞；在中国方面，半独立的政权分别存在于蒙疆、华北和华中；日华双方军、官、民之间的根本观念不统一；日华双方都缺乏有关政治、经济的人材，尤其是中国方面有能力的领导人和官吏，大都离开日本占领区，或者隐居不出。日本方面渴望中国方面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虽然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多少取得些许成果，然而未能达到转让权限的地步，从而使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始终不能渗透到基层。

此外，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对象，如不特别重视各种政策措施的统一和持续性，工作就很难收效。然而，不仅是中央的对华政策频繁变更，当地也有同样倾向，而单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的部队调动、警备换防等，都是不利于政策措施的持续性的轻率行动。实际上，在彼我两军交互进入、撤出的地区，当地居民不知应该何所适从。结果，由于担心后患，而采取了不合作和旁观的态度。

至1943年以后，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宗旨，事实上是放弃了治安建设的一切措施，一变而为以军事为主体，肃正建设的统一被破坏了。

三、军队的精锐

共军主要是依靠民众来进行游击战，其装备远远落后于

英美苏军。因而，对付这样的军队，与其使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倒不如使军队精锐化。所谓精锐化，就是说，在进行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治安战即游击战、政治战、思想战等多种战争的情况下，都要具有取得胜利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军纪。如果能做到以军队的威容和武德获得民心，就可使共军失去民众的协助，而导致其战斗力的衰退和崩溃。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大将于1943年9月1日曾在训示中指出：“进行剿共战争，在于充分发挥皇军之威力，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

然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违反军纪的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从1942年底前后，性质恶劣的犯罪增多起来。对此，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必须严加注意。

再从部队的军事行动方面来看，面对变化无穷、进行高度游击战的共军，从上级指挥官以至最小部队的指挥官，都必须经常仔细研究编制、装备、战术，设法加以改善，遇事随机应变，掌握高超的指挥战斗的能力。关于治安战，在进行战斗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治安工作，必须把政治战贯彻到底。因此，所有官兵都必须是具有坚韧精神、精通政治的精锐战士。

四、关于剿共战

在华北方面军中，除部分有识之士外，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灭，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然而1940年经过所谓“百团大战”开始觉醒后，在肃正讨伐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剿共指南”中指出：剿共战的秘诀在于首先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进而满怀信心，制定因地制宜的对策，并坚决贯彻执行，断然予以剿灭。在进行剿灭时，要采用积极果敢的武力作战，摧毁其军事力量，并以周密的剔抉战术破坏其党和行政组织，特别要破坏其核心部分。随后即须展开各种清新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确立治安、安定民生。此外，还应懂得摧毁敌方武力是完成剿共战的先决条件。同时要仔细研究敌方惯用的游击战术，考虑并制定新的有效的对共战术。努力争取及时获得准确的情报，不断地进行讨伐，不容敌方有回旋余地，以期迅速将其消灭。总之，主要依靠担任这一任务的部队的信心和力量。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之民兵和拥护者。民众具有两面性，他们是要看彼我力量如何而决定去从的。因此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这种情况同正规作战完全不同。

当时有关人员曾慨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

剿共必须首先破坏其军事力量的核心，同时要挖出中共和行政组织。此等组织地下活动能力很强，用武装起来的民众团体进行自卫，依靠彻底的除奸工作清除异己分子，并具备相当完整的防谍组织。在这样情况下进行间谍工作，尤

其是想要侦破存在于异民族内部的高度有机体的秘密组织，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宪兵队以及我侦察机关所获得的成果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从剔抉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可以归纳为：“通过周密的谍报活动，掌握其中枢地下组织的情况后，有计划地以疾风迅雷之势实行剔抉，务期无遗漏地挖出其所有干部，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此际，也必须做好立即投入战斗的准备。

这些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往往是只能挖出一部分或仅仅挖出低级分子。这样，反使对方加强了保卫党的手段，行动更加巧妙，从而使以后的剔抉工作更加困难。

其次是警备的问题。在华北方面，直到最后都是采取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方法。

华北方面军强调这种部署的积极意义，并指示：妥善部署警备部队是进行讨伐行动的基础。占据的重要地点，既是搜索警戒的据点，同时也是准备机动讨伐的处所，依此即可直接摧毁敌人的根据地。

但是，当我们观察为改善治安所部署的警备队的状况时，不难看出，只是在连续不断地出动，进行果敢的讨伐，但其结果往往是未曾交战而疲于奔命。然而，每当得到居民的报告就立刻出动，将会提高居民对我方的信赖，所提供的情报也会是正确的，从而也将取得大的战果。如果我方部队在所辖范围内公然通行，部队的威令即可渗透到基层。即使是小规模也好，只要是不断地积极出动，就可使敌人经常感到不安和动摇。反之，如我方处于静止状态，敌人就可以行动自如。

然而，如果长期采取高度的分散部署，会使警备部队的官兵产生孤立感或涣散情绪，同时也会使上级指导官不能充分监督指导，形成急于讨伐和放松警备的倾向。从而使中共有机可乘，在山区或行政边界附近逐渐扩大其根据地。至1943年以后，警备兵力小的地区就频频受到中共的攻击。

要想得到中国方面武装力量的协助，主要应该着眼于乡村自卫之上。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愿意同胞之间自相残杀，所以治安军等进行讨伐作战并不起作用。据说县以下的警察及警备队为了自卫倒是起了很大作用。

五、有关情报问题

中共及其军队与政治团体、民众团体结成一体，进行息息相通的情报活动。尤其是在民众的谍报、防谍组织方面有独到之处。

我方的情报活动也是以民众作为情报的重要来源的。只要掌握了民心，情报自然就会源源而来。得不到情报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此外，利用密探、俘虏、秘密结社、宗教团体、经济团体等，或以文件谍报、无线电特种情报等尽量掌握细微的征兆。中共方面的密码虽极其严密，但经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春约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成功。

情报活动，除军事情报外，还要尽力收集以下情报：

(1) 收集中共各项工作的情报

中共的工作主要是争取民众的工作。因此，观察敌方工作对民众的影响如何，是对中共情报工作的第一步的工作。

(2) 为别动工作收集谍报

侦察获取有关中共方面党、行政机关的地下组织及其机能的

谍报。

(3) 治安情报

在调查敌我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政策及其实施的效果和各阶层官民的言行及秘密活动等情况时，如果仅仅了解表面的社会现象，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中共的地下策动极为巧妙，待到表面上出现某些征兆时，往往是已经无法应付了。

六、关于治安建设

华北方面军为了达到剿共的目的，在实施军事对策的同时，力图强化治安、安定民生，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种政策，期望不直接行使武力，而以武力为后盾发挥政治力量，进行治安建设。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安定民生和掌握民心

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指出：“华北治安的关键在于掌握民心。只要能掌握民心，治安工作大体即可完成。如能做到使民心归顺，一切治安问题当可迎刃而解。中共最害怕的是日本人的诚心诚意。实际上，只有掌握这一精神武器才是剿共的要诀。”

然而我方工作的成果和理想的差距太大。究其原因，早在事变初期即已失去民心，这对以后影响很大。当时处于军事作战时期，致使中国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虽说占领地区的行政工作因不熟悉而不够完善是不得已的情况，但我方军、官、民的思想认识上，确有很多应该反省之处。例如，当时提出“讨伐暴华”的口号，“讨伐”在态度上就有问题，所谓“暴华”也有问题。这一口号的用意本来是惩罚暴戾的中国军阀。遗憾的是，其后竟不加区别地将一般无辜民

众也卷入在内。这样一来，反而更加煽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抗日、侮日的思想。

华北方面军自1939年以后，开始努力建设华北，然而难以消除上述影响。日军对民众纪律也有缺点，而在日本官吏及侨民中滥用特权的也大有人在。再加上中国方面的贪官污吏和奸商等对经济的破坏，使民众生活日益困难，民心更加叛离。

总之，日军所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上层的一片颂扬之声，根本听不到一般民众的责难。有很多实例说明，凡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民众，一旦对其它民族抱有怨恨，要想消除是不容易的。军事上的失败比较容易挽回，但要弥补对社会犯下的过失就极为困难了。因此，深深感到作为领导者的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华北方面军是想树立起反共亲日新的社会秩序，但只靠宣抚等工作来取得民众的好感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将民众组织成为具有反共亲日意识的社会，并使之与共产党势力隔离开来。中共想乘民心不稳、民众生活不安之际，展开强烈政治攻势，如果占领区内的民众，没有这种反共亲日意识的社会组织，民众就只能表现出顺应形势服从任何一方的两面性。一个村子里就有属于日方和共方的两个村长向两方面纳税的情况。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我方政策的不当。

（2）关于特务机关

华北方面军随着治安的恢复，在各地设置特务机关，以便有效地利用当地特点实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行政管理。

各地的特务机关处理复杂的多种业务，同时进行行政略战

略两方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人材和经验的不足，也产生了很多错误和过分的现象。对于本来应该由中国方面自己处理的政务，也借口幕后指导进行干涉。要想借助外部压力改造社会结构，是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的。必须用精通实际情况的中国人自己担负起改革社会的任务。

华北方面军指示各政务工作人员，对于华北政务委员会以至各乡村，都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作用。要培养和加强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自卫力量，让他们自己负责确保治安。这是从最初就确定了的的基本方针。然而中国方面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不得不始终对这个软弱无力的政权进行扶持，这是华北方面军极为苦恼的事。结果就产生了日本人拼命干，中国人休息的现象。

（3）有关治安地区工作

按照治安情况，将占领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肃正建设措施，有步骤地扩大治安区，可以说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尤其是华北地区过于辽阔，同我军拥有的兵力很不相称。因此，在治安地区中，进一步将特别重要的地区划为模范治安区，以中国方面为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有机的综合工作。此种办法，通过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向周围地区渗透行政力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在1943年以后，由于整个局势的变化，不仅这种设想未能实现，到最后竟形成了只能保住所谓“点”和“线”的局面。这表明我方的军事力量直接影响到治安，同时也表明只靠军事力量扶持的政权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方面军实施的封锁战术，最初，在隔断和敌方地区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方面是取得了成果的，然而到头来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并非由于该项施策的不当，而是在制定适合当地经济情况的措施上有缺欠，同时在实施中也未能贯彻到底所致。

（4）关于新民会

进行总体战争，须有一个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有机的组织。在中共方面，就形成了一个从中央直到基层以党为中心的具有强大统制力量的军、政、民的巨大组织体，完全能够适应总体战的要求。在这方面，日军虽然能与之匹敌，但日军与中国方面是各自单独存在的。为了使中国方面官民成为一体，形成以民众为基础的实践组织，因而成立了新民会。从当时的政体看来，对新民会势必要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该组织的发起并非出于民众的要求，而是官办的御用团体，是在日本庇护下的所谓“日本新民会”。其基层的民众对时局既无认识，又无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找不到优秀的领导人材，这样的组织，终究是无法与中共抗衡的。

七、关于思想战

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分别在华北树立新民思想，在蒙疆树立兴亚思想，在此基础上力图达到舆论的统一。但是，这

些思想，是在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理论、中国的传统思想及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仓促拼凑的，同华中的正统国民党、东亚联盟、或满洲国的协和会等思想的基本概念有所不同，甚至有对立和分歧之处。

在异民族或全中国实行统一思想，虽然既有困难也不受欢迎，但至少反共这一基本政策方面，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才行。但是象那种内容极端抽象、超越现实、缺乏实践性的理论，一般民众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此外，对于既反共也反日，即对于历来一贯认为日本思想和政策的本质就是侵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根本没有说服力。中国人要的是自己的理论和由自己建立的思想。但是，占领区内居于指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多为投机取巧之人，无所谓自己的理想。如果用以思想对付思想的观点来看，象新民思想等等，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对抗。

在中共方面，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党内思想，对于党外，以“抗日”思想团结大众，以严厉的除奸工作加强统一战线，但是，并不急于用共产主义去实现统一。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也以党为核心，全体党员、全体战斗员均作为思想战线的战士进行活动。

思想战并没有界线，所以赞成中共的人也广泛出现于中共游击队战区以外的地方，其原因即在于此。（以下译略）

译 后 记

《华北治安战》一书所依据和引证的资料，几乎完全是日本侵华时期军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以及当时战争决策者、执行者的日记、回忆等。因此，本书虽为战后编写，但仍然是当时侵略者的立场、观点，以致有不少粉饰侵略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书中一方面再三否认侵华日军执行“三光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记载了“三光政策”所造成的犯罪事实，并把犯罪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日本国民教育上的缺欠。又如书中引用了大量“赫赫战果”以炫耀日军的强大威力，而在某些地方却暴露出“由于一向只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虚报战功的坏风气”（折田贞重大佐语）的内情。而对于侵略军在“扫荡”中杀害和绑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到“赫赫战果”之内了。此外，书中并有多处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歪曲和诬蔑。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详述日军侵略我华北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它不仅叙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各个阶段侵略我国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演变的详细情况，并且记载了历次作战计划、军事部署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所谓“总体战”的具体内容。这些资料，不仅可供研究

战史之参考，而且对于了解侵略者采用的战略、战术，掌握其作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本书从侵略者的角度，以大量事实说明了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终必失败的道理。这在当前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书中记载的整个战争过程生动地表明：日军侵略华北是费尽了心机的。在军事上它用尽了各种战略、战术，挖空心思研究和采用了诸如“楔入战术”、“居座战术”（泡蘑菇战术）、“剔扶战术”、“撒网战术”、“囚笼战术”、“铁壁合围”、“分进合击”，以及制造无人区等等无比残酷的手段。在政治上用各种阴险的谋略，进行欺骗宣传，组织“新民会”，企图树立所谓“新民思想”，把华北广大人民网罗在侵略者所设的圈套中，实现所谓日、满、华亲善；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怀柔、诱降政策，例如所谓“对伯（阎锡山）工作”，企图不血刃而取得华北的领土。在经济上，采用各种手段，搜刮掠夺，以达到“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往日本输送，以支持战争（华北方面军第三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大佐笔记所记‘华北紧急措施纲要’大意）”的目的。但至最后，侵略者终于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样一场军民不分、战线不明的特殊战争，一切战略战术、政治谋略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充分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凶恶、强大的敌人胆敢入侵，终必遭到可耻的失败。

本书译文，为了保存原著的精神面貌，有些地方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如“华北治安战”（实际是侵略华北之战）、“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国事变”

(七·七事变)、“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国方面”(伪政权方面)……等等，均照原文直译。书中引用《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革命史讲义》、《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概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书的文字，除译略者外，均按原著译出，未按中文资料校订。有些地方将我方军政领导人员的姓名写错了，仍保持原样，未加订正。这也可以反映出敌人的情报工作并不准确。请读者注意。

限于译者的水平，难免错误或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最后，本书上下卷译出后，承李麦同志审阅，特此表示感谢。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